

邓小平理论教学实例评析

李桂平 主编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教学实例评析

李桂平 主编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0年·长沙

邓小平理论教学实例评析

李桂平 主编

责任编辑：童芳远 文跃飞

*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80千字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00

*

ISBN 7-81061-181-X/D·043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家调换

厂址：湖南长沙

邮编：410083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按照国家教育部颁布的《邓小平理论概论》的教学要点来设置内容体系的，目的是用一系列实例和案例来解析、认识邓小平理论。每章前一部分是理论，后一部分是实例和案例。它对于读者学习邓小平理论、进行邓小平理论教学和研究，进一步提高思维能力和水平有重要的作用。本书适用于广大党政干部、教师、学生作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参考资料、辅助教材使用。

出版说明

按照国家教育部的部署，1998年普通高校开始进行“两课”新一轮改革，首先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以实现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即“三进”）。我们在教学改革研究及实践中发现，案例教学具有直观性、针对性，是《邓小平理论概论》教学的一种新的尝试。因此，我们把平时教学中运用的案例、实例整理出版，希望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及进行《邓小平理论概论》教学有所帮助。

本书按照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理论概论》安排全书的结构，每章为一专题，每一专题前一部分为邓小平理论内容介绍，后一部分为实例，多数反映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况及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李桂平（导论、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张桂蓉（第一章、第四章），马润生（第二章），陈立新（第三章），王璨（第六章），李康祥（第九章），肖家君（第十章）。全书由李桂平、车文辉修改定稿，李桂平担任主编。

编 者

2000年2月

序

“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是党的十五大作出的结论，也是历史和时代的结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整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总的来说，它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強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战胜任何风险、继续开拓前进的“主心骨”。

基于这个共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对普通高校“两课”课程设置作了重要调整，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概论》为核心的新的“两课”课程体系，其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其他理论能够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帮助他们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基

本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革命风格和创新精神，树立坚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1998年以来，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概论》课中大胆地进行了新的教学尝试，即在教学实践中采用了案例、实例的教学方法，受到了大学生的普遍欢迎。它是政治理论课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教学形式，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吸引力，更能调动教与学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更能使课堂教学留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充满生机和活力。为此，我们特组织撰写了《邓小平理论教学实例评析》一书，为大学生更好地掌握邓小平理论，提高其教学效果而架桥。

《邓小平理论教学实例评析》一书是由李桂平等同志编撰而成的。全书围绕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个主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视角剖析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成功的范例和失败的教训，剖析了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取舍，内容较为翔实，涵盖面较大，信息量较多，是我们进行教学改革尝试的结晶。

在《邓小平理论教学实例评析》一书即将出版面世之时，我为之感到高兴和祝贺。

章辉美

1999年12月

目 录

导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
一、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	(2)
二、独树一帜的万丰共有制·····	(19)
三、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24)
四、邓小平理论与新中国三次思想解放·····	(26)
五、闻名遐迩的温州发展模式·····	(32)
六、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南街村·····	(33)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38)
一、山东省内东西合作走向共同富裕·····	(38)
二、牡电康佳“联姻”，双双谱写新章·····	(41)
三、“燕京”拒合资，自有其主张·····	(45)
四、顺德改革多曲折，力克难点创新优·····	(47)
五、“乌托邦”的中国产物——人民公社和学大寨·····	(49)
六、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吗·····	(52)
第二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57)
一、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	(58)
二、中低技术依然“垄断”中国产业·····	(61)
三、我国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	(67)
四、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	(69)
五、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政党是如何丢失政权的·····	(77)
六、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有多高·····	(85)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	(89)

一、罗斯福“新政”	(89)
二、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决策的背景	(92)
三、从数字看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	(95)
四、中西部经济强县——泽州	(97)
五、多彩农业竞风流	(100)
六、科技长一分，市场拓千里	
——苏南乡镇企业从草根长成大树	(102)
七、五粮液“五连冠”探秘	(106)
八、日本的科技战略	(109)
九、“863 计划”与发展高科技	(113)
第四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117)
一、沈阳国企：依旧砥柱中流	(117)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光彩事业”	(121)
三、亚星——奔驰有限公司	(123)
四、安徽农民的自发改革	(126)
五、由调整工资引起的恶性事件所想到的	(130)
六、是是非非论私企	(133)
七、从诸城“卖”企业看非国有化	(137)
八、公费医疗下的医、患、药	(142)
九、“五九现象”与企业家年薪制	(146)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50)
一、无形的“墙”谁来拆	(150)
二、农业市场化改革	(152)
三、天津市鸡蛋价格管制的复归	(154)
四、四川长虹的体制转型过程	(156)
五、邯钢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162)
六、国企改革中的犯罪	(168)
七、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收购战略	(172)
八、建设市场的警钟	(176)

九、美国、日本、法国的宏观调控·····	(178)
十、一次空前的成功之作·····	(182)
第六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 ·····	(190)
一、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 ——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	(190)
二、欧洲经济共同体·····	(196)
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199)
四、GATT 与 WTO ·····	(201)
五、海尔, 真诚到永远·····	(205)
六、我国首例反倾销案·····	(208)
七、中策现象·····	(210)
八、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214)
九、深圳特区·····	(216)
第七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 ·····	(221)
一、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	(221)
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厂务公开·····	(223)
三、祁东县的村民议事会·····	(230)
四、官僚主义者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31)
五、政府机构: 不改革没有出路·····	(232)
六、国务院机构改革一马当先·····	(234)
七、普通市民吴杰祺状告政府·····	(238)
八、打假“雷锋”郭振清·····	(240)
九、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权斗争 ·····	(243)
第八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249)
一、市场经济给精神文明带来了什么·····	(249)
二、都市社区文明之路·····	(251)
三、我国目前道德状况的基本估价·····	(254)
四、社会的毒瘤、人民的祸害·····	(257)
五、曹春生: 民间教育家的地下实验·····	(265)

六、校园创业计划·····	(270)
第九章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 ·····	(276)
一、祖国统一问题的由来·····	(276)
二、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279)
三、《基本法》的制定·····	(286)
四、《政改方案》的推出和中英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谈判 ·····	(289)
五、以“一国两制”构想解决澳门问题·····	(292)
六、“台独”活动的国际背景·····	(295)
七、“两国论”的真实嘴脸·····	(296)
第十章 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 ·····	(302)
一、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303)
二、滕头村的富裕文明来自何方·····	(306)
三、副省长如何步入监狱·····	(309)
四、当代工人阶级的榜样秦文贵·····	(311)
五、弓棚镇的网上农民·····	(315)
六、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研制·····	(317)
七、“黑色女侦探”折翼大陆·····	(321)
八、藏族人民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324)
九、“普通”公民溥仪·····	(327)
十、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	(330)
参考文献 ·····	(335)

导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一次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一次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探索。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政治保证、外部条件、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战略步骤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学习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革命风范和崇高品格，以及他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 70 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1904 年 8 月 22 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原名邓先圣，5 岁进私塾发蒙，学名邓希贤，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 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时他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1920 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邓小平到法国后，因生活所迫，只在中学学习过几个月，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做工。他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体验到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当时，他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1922 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他还做过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

1926 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当时写的自传中说道：“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

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1927年春，邓小平受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小平于六七月间转赴汉口，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汪精卫主政的武汉政府也公开反共，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邓小平。8月7日，他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年底，他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张云逸等于12月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不得不转战7000里（即3500公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邓小平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931年2月，他受前委的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他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

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临时中央开展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他们率部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在太行山站稳了脚后跟，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由鲁西等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40年3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全歼进攻太行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万余人。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从1940年8月起，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即“百团大战”。刘邓率领所部38个团参加，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

从1941年开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做准备的方针。他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所发表的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1945年6月，邓小平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

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地挑起局部战争。由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横亘中原，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通道，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个地区。1945年9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队，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外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他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5.6万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约20万人，斗争极端艰苦。邓小平激励部队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刘邓领导大别山根据地军民，积极、灵活地打击敌人，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刘邓大军挺进大

别山，同相继南下的另外两支野战大军在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牵制和吸引了敌军南线 160 多个旅中的 90 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1948 年 5 月，邓小平任辖区扩大了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等讲话和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从 1948 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粉碎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具有决战性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1948 年 11 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先后集结近 80 万军队，而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只有 60 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队更是占有巨大的优势。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经过 66 天的作战，共歼敌 55.5 万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1949 年 3 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受命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4 月 21 日，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

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迅速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三省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在西南期间，他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和刘伯承、贺龙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等等，很快改变了那里的混乱的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的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他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他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财政工作要有全面观念。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

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人。1959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10年。这10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这是他工作最繁忙的10年。他积极贯彻党的八大的路线，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接着是3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他到农村调查，在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他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对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正常的生产秩序，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起了重大作用。他还主持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2月，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年5月，他提出要做好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用“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一次解决。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许多农村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62年7月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

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中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1969年10月，他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他每天到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半天，做钳工活。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于1973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力挽狂澜，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以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他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文件。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起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

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乘机诬陷邓小平，他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这是亿万人民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叶剑英、陈云等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亟待解决。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

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非常重视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了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右的思潮。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方向，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他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在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他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中共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中共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共十三大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要实现现代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要始

终如一地搞这件事，扭住不放。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发展生产力中，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他认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针对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村率先发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他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1979年到1992年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这一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现行领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出必须进行改革。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智力，大量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搞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干扰。对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坚决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平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他特别强调，改革和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压倒一切。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都没有错，错在四个坚持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他强调，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以后他又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他对当今时代和我国安全环境作了科学判断，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他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求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自觉地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他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这是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1989年在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候，向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深情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97年7月1日，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他的伟大构想即将实现。1983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他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提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和领导制度。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

造性。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的权威。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导职务。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大家要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他的这个谈话为开好中共十四大，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

标。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3年，邓小平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共出版三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与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正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胜利迈向21世纪。^①

讨 论 题

1. 我心目中的邓小平。
2. 毛泽东与邓小平。
3. 邓小平“三落三起”之经历对人生的启示。

二、独树一帜的万丰共有制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的发展之路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万丰村距深圳市中心50公里，距广州市125公里，面积6.8平方公里，共有旱地62公顷（即930亩），水田53公顷（即800亩），鱼塘33公顷（即500亩），水库6.7公顷（即100亩），人口1963人，外来人口5

^① 以上资料引自《人民日报》，1997年2月22日。

万多，5个自然村（组）。万丰村离香港只有一箭之遥。20世纪50年代，香港、万丰两地劳动者的生活差异不显著，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的经济起飞，差距就大大拉开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洪水淹没了村子，洪水过后要用盐洗井，偌大的万丰村连15元的盐钱都拿不出来。就在这一年约1000人去香港谋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丰人在1981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全村的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万丰人的生活开始进入小康水平，他们的做法是：

首先，重整集体经济。用万丰人的话讲，叫做开始了万丰村的“产业革命”。他们的突破口选在一座旧仓库。这个仓库原来是“大跃进”年代盖起来的一座大食堂，食堂解散后，改作仓库。承包后，它被村民分割成无数小空间，以砖头、木板为界，放置杂物，犹如一幅小农经济的大特写。党支部决定收回仓库，把它拍卖得到10多万元，成为万丰村的首笔资金，连同向银行贷款的300万元，就构成当时闻名遐迩的万丰集团（股份）公司的启动资金。万丰村在这里办起自己的第一个乡镇集体企业——塑料花厂，实行香港来料，产品又销往香港，即后来称为“两头在外”的做法。这个小厂安排了200多名劳力，当年拿回纯利润60多万元，比全村133公顷（即2000多亩）土地当年创造的总产值还多10万元。万丰“产业革命”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塑料花成为万丰村村民的“希望之花”，给万丰村党支部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极其深刻的启示。

其次，培植民间的财力。万丰村党支部按照党中央搞活经济的富民政策，引导承包了土地的农民走“专业户”之路，广开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之门道。经过2年多的努力，到1984年，全村出现了100多个专业户和300多个万元户。与此同时，党支部积极引进外资，大办“三来一补”企业，于1982年4月开办实

用五金厂，由香港实用电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来料加工；1983年3月开办伟丰制衣厂，由香港伟丰贸易公司来料加工；1984年7月开办普丽贸易有限公司，由香港普丽玩具有限公司来料加工……一座座新厂房像雨后春笋般崛起在万丰的土壤上。

改革开放的实践教会了万丰党支部一班人，要把万丰经济搞上去，必须要改变单一搞农业的做法，要突破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的禁锢，大力发展工业，充分利用毗邻港澳、劳动力廉价、房地产价较低的优势，将兴办“三来一补”企业作为起点，广开渠道，外引内联，建设起新型的社会主义万丰村。仅从1982年起步到1984年8月，新创办了5个来料加工厂，集体年收入已达250万元，固定资产达1200万元。

第三，实行股份制。在兴办农村工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的时候，1984年8月，万丰村党支部决定进一步拓展工业生产，经过研究，决定以股份制为融资手段，发动群众集资办企业。对于这一决策，党内外认识不一，意见分歧。有些同志因长期受“左”的影响，认为股份制是从香港学来的，总觉得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搞这一套危险，怕犯错误。但是，大多数党员认为，实行股份制，究竟是不是搞资本主义，要经过实践检验，看它到底对发展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全村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好处，不能主观断言。经过反复酝酿，党支部作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后，正式实施了股份制。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债券式股份制

全村32名共产党员带头每人拿出入股资金5000元。59户村民效法共产党员，拿出“私房钱”换成盖有“万丰经济发展集团财务章”的股票，全村聚集了25万元资金，加上部分银行贷款，2万平方米的厂房拔地而起。万丰成立了深圳农村第一家股份公司，建立了万丰工业村，与外商合作开办工厂。1985年，每个股东获得了25%的红利。这种债券式的股份制对村民所购

股保本保息，定期5年，每股100元，股息每月6厘，5年内不能退股，股份企业纯利按三七分成，村集体提留三成，七成按股分红，5年后留退自由，退股的还本，留股者继续享受股份分红，但停发股息。这种做法，投资者与企业只共享利益，不共担风险，因而不够完备，持股者不很关心企业的兴衰。尽管这种股份制还不完善，但这无疑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途径的一大突破，在农村体制改革上迈出了一大步。股份制实施仅仅1年，对万丰农民震动极大，利益是最好的向导，未入股的村民看着股东们兑现的金额，猛然地明白了：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按劳分配”，也允许“按股分配”。这是推进股份制发展和完善的内在动力。万丰党支部适时地继续完善和发展股份制。

（二）完善股份制

1985年党支部从万丰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保本不保息，按股分红，每股1元，定期50年等做法。企业经营所得纯利润三七分，三成留给集体，七成按股分红，50年后不退股金，股份制企业全部财产归集体，股东可以自由放弃股权。这种办法，使投资者受益时间长，因而深受欢迎，村民纷纷争先恐后地把手中的“消费基金”转为投资，入股资金比上年翻两番，总金额达75万元。这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完善了许多，但仍然未摆脱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的老框框。

（三）发展股份制

1986年村党支部决定把部分企业拆股联营，让群众投资入股，扩大和发展生产。将村办的实用电器厂和普丽玩具厂改为股份制企业。这一变动，将两个厂的300万资产升值为600万元，定为600万股，集体留一半，群众认购一半。结果一下子回笼300万元。公司规定不保本不保息，按股分红50年，股份可以转让，但不得中途退股。

这3年间，村民先后投资1500万元，加上“产业革命”滚动起来的2500万元，到1987年间，万丰已拥有4000万元资本。

村党支部利用它办起了 17 家企业，组建了“万丰经济发展公司”和“万丰股份公司”。

到 1987 年底，全村共办起 27 个企业，固定资产超过 1.5 亿元，入股群众占全村村民的 60%。3 年的实践，为万丰实施的股份合作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万丰村党支部书记潘强恩推进和发展股份合作制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通过股份合作制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必须实行股份共有，以股份的共有，达到生产资料的共有，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才能真正建成”。基于这样的思想，1988 年党支部、村委会决定，拨款 400 万元，给无力出股金未入股的村民每人“贷款”5000 元，可入 5000 股。这笔股金 50 年内归自己，50 年后归集体。这种做法不是单纯的救济而是积极的扶贫；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万丰村 1900 多名村民全部都成为万丰股份公司的股东，股东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为董事会，下设 5 个合作社。一种新型的以股份合作制为核心内容的共有制便应运而生。

现在，逃到香港谋生的万丰人，又回到了万丰村，回乡人感慨地说：“万丰人的生活绝不比香港差！万丰已经迈向现代化。”

万丰村发动村民参股兴建工业村，这是股份经济思想在中国农村大地的一次破土萌芽；“万丰模式”以股份制的一种形式向传统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冲撞，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讨 论 题

1. 谈谈“万丰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中的普遍意义。
2. 结合本实例，谈谈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理论精髓的意义。

三、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说：“你们到农村去看了一下吗？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有些变化出乎我们的预料。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我们原来没有想到很好的出路。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平均只有一两亩土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一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①

解放初，我国农村只有少量的木匠、铁匠、石匠等“五匠”，以及碾米、做豆腐的“四坊”，情况极为可怜。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了社队企业，社队企业主要是搞些传统项目。如农机修理、烧砖制瓦、农副产品加工等。但由于“左”倾思潮片面夸大和强调“以粮为纲”，并经常展开清算和批判，社队企业发展极为缓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制定了两个关于农业方面的文件，强调了在农村中除了要经营农业外，还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业，逐步把农业发展成为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企业。于是农村中那些曾经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加以打击和取缔的社队企业——加工业和商业又重新获得了生命的春天。江苏南部、浙江温州等地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4号文件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251～252页。

告》，文件下发后，出现了“四轮驱动”（乡镇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和“六业齐上”（农、工、商、建筑、运输、服务）的兴旺局面。

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1978年的15万个发展到1750万个，增加10倍多；从业人数从1978年的2826万人猛增到881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4%，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当年，乡镇工业产值就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到199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据了解，1996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1.76万亿元，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1.22万亿元，营业收入达到6.83万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3倍、2.7倍和4倍。

就效益和贡献增长而言，从1992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利税总额由1573亿元增加到6253亿元，增长3倍；出口商品交货值达到6008亿元。

从1992年到1996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部分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职工总数由1.06亿增加到1.35亿，共吸收2883万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职工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5年来，乡镇企业用于以工补农、建农和农村各项事业的投资超过1000亿元。

以上的数字和事实，可以让我们达成以下的共识：

乡镇企业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不仅显示出自身的实力、潜力和后劲，而且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一个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以支援农业、富裕农民、振兴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为己任的乡镇企业，不仅解决了实现农业现代化“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人往哪里去”的问题。

讨 论 题

1. 结合本案例，说明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的首创

精神。

2. 发展乡镇企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是什么？

四、邓小平理论与新中国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切实把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破除姓“社”姓“资”的束缚，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第三次思想解放，以党的十五大为标志，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突破姓“公”姓“私”的束缚，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的含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可以多样化，因此突破并对政治体制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进行改革。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与三次思想解放息息相关。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提出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是我们党拨乱反正，总结经验，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也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阶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

第一，在思想路线上，这次会议肯定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从而恢复和发扬了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号召。

第二，在政治路线上，这次会议果断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第三，在组织路线上，这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同时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同志重新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职务。

第四，开始了清理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工作。主要是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为邓小平平了反，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平了反，等等。

第五，这次会议从原则上提出了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而进行改革的历史任务，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重大决策，从而推动了改革的进步。

第六，这次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廓清了迷雾。

可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由此具备了雏形。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基本完成。《决议》总结了10条经验，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反对和平演变，加强党的建设等，这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的第一次初步概括。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

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命题的提出，准确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本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范畴。它的提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产生的标志。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的阶段。

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1987年，邓小平根据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以及不断积累起来的新鲜经验，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怎样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二大以后指出了全面改革，全面对外开放。我国农村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乡村政权机构；调整了农产品价格政策，农村经济开始纳入有计划商品经济轨道；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决定》的指引下，1985年开始，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商业体制、税收体制、计划管理体制、工资制度、价格体系以及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等相继展开。同时，实行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整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以进一步实现全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3页。

路线基础上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原则，把那些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党，开除党籍。整党历时3年半，1987年5月结束。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决议》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意义重大。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这次大会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阐释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我们党贯彻、执行和发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如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观点；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观点，等等。十三大概括的十二个基本观点，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特征、动力、条件、策略、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作出了基本回答，已初步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确定

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

党的十三大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新的发展；但也发生了对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二是东欧苏联政局的重大变化。国际国内的重大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未曾面临过的，也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怎么办？这时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开始困惑人们，有些同志囿于传统观念，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抽象地讲坚持社会主义，明明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却担心是搞资本主义；而有些明明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却认为符合社会主义而加以坚持。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都被质疑。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谈话。这个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把这个理论推向了新高度。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新论断；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论断；关于“两个借鉴和吸收”的新论断；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新论断；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的新论断；关于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新论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新论断，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带来了我们党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不可少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每隔几年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在社会主义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对这个理论主要内容的科学概括，也就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进了党章。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了论述，指出这些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报告还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对政治体制

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了深入论述，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带来了我们党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概念，到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可以看到这个理论是一步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十五大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形成。

讨 论 题

1. 谈谈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特点和经验。
2. 解放思想与创新有什么联系？

五、闻名遐迩的温州发展模式

温州经济发展经验，又称温州模式。指温州市以家庭工业为基础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经验。

温州是通过发展家庭工业，实现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由农业型结构到工业型结构的转变的，首先是发展家庭工业。这种家庭工业多是以小商品为主，而且多是设备简单，进行专业化协作生产，产品生产周期短，如服装、制鞋、家什等。1985年以来，温州从事家庭工业生产的有13.3万户，产值达16.6亿元。其次是流通领域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将地域分散，规模较小的各种形式的民办工业联成一个加速运转的整体。专业市场有5个特点：①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特色，全区有农业市场472个，闻名全国的有10多个，如乐清县柳市电器市场，瓯海县梧廷镇粮食市场，永嘉县桥头镇纽扣市场等；②每个专业市场都有比较齐全

的品种和货源；③价格完全放开；④小商品、小市场，市场辐射面广；⑤店厂结合。第三是商品经济活动以农民购销员为骨干。温州有 14 万农民购销员，分布在全国各地，采购原料，推销商品，传输信息。他们与农业市场相互补充，构成商品流通网络，对发展家庭工业起了推动、调动和组织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大批信息专业户，向用户提供各类信息，指导家庭工业的产销活动，推动了市场的综合效应。第四是家庭工业的原料以废旧物资为主，商品开发以小商品为目标。利用废旧材料，不与国有大企业争原料，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温州模式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效益。1978 年到 1987 年，温州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两番，9 年上缴财政 20 亿元，比国家对温州的总投资（1949～1987 年）还多 7 亿多元，农民收入 1987 年比 1978 年增长 9.1 倍。现在温州人自己投资修起了温州大桥、温州飞机场，温州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明显缩小，温州乡村正在逐步走向城市化。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门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

讨 论 题

1. 谈谈温州模式的普遍意义。
2. 请你联系家乡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谈谈引起经济发展变化的原因。

六、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南街村

河南省南街村的发展，为我们树立了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榜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街村也先后在农业上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村办企业也实行了个人承包；根据党的发展农村经济政策，也鼓励发展个体、私营和各种形式的经营联合体，在发展过程中，几经周折，结合南街具体实际，探索出了一条加快南街发展步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确途径。

南街村地处县城，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习惯，放开搞活的农村政策，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摆小摊的、卖烟的、卖饭的、外出务工经商的、合伙办工厂搞企业的，纷纷施展才华，而风险大、效益低的农业生产，被人们渐渐冷落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没有了，对农业的投入减少了，种“卫生田”的多了，不施肥、不浇水、不管理的多了，有的干脆转包给亲朋好友，更有甚者长期弃耕撂荒，到1985年，粮食年亩产只有250多公斤，农业陷入了全面萎缩的境地。

村党支部一班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过认真讨论，在1986年5月贴出了一张安民告示，主要内容：一是凡有能力种责任田的，首先要种好管好自己的责任田，在此基础上才能务工经商，否则村里有权干涉。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他人耕种，更不许弃耕撂荒。二是确有特殊情况没有能力管好责任田的，可以写出申请，经村委研究批准后，把责任田交归集体，由村面粉厂负责解决吃面问题。村民看了告示后，当时就有300多人写了交地申请。经严格审查把关，批准了100多人的申请。随着村办企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自愿把土地交给了集体。到1990年10月，全村153公顷（即2300亩）土地全部交回村里，由个体经营过渡到了规模经营。几年来，集体对农业投入资金已达300多万元，添置了大型农业机械，搞了半固定喷灌，农业生产实现了耕播收打机械化，浇水灌溉自动化，农田管理专业化，田、林、路、渠、水、电、机械七配套，达到了旱涝保丰收。全村133公顷（即2000多亩）耕地，只需70多人管

理，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小麦单产近几年一直保持在450公斤以上。

南街村的工业同样经历了由个体承包转向集体经营的曲折历程。1981年，实行不实行承包责任制好像成了检验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甚至一个领导者是不是改革者的惟一标准，承包成了一种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南街村也把村里的两个小企业——砖瓦厂和面粉厂搞了个人承包。承包结果与原来村民的希望相反，大家不仅没有尝到甜头，却更多地品尝了个人承包带来的苦果：群众受了骗，村民们给承包者干活，不用说每月按时发放工资了，就是一年到头，工资也兑不了现，白白辛苦一年。但承包人却大发横财，吃的、穿的、用的、住的明显比普通村民高出了几个档次；南街村党组织领导的威信一落千丈，村民们怨声载道，告状信上至省委，下至城关镇，大字报远者贴到县委，近者贴到王洪彬书记门口，各级领导对村干部也非常不满意。

面对严峻的现实，王洪彬书记和支部一班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群众意见这么大，领导这么不满意，党组织威信这么低？查来找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组织没有带领广大群众治穷致富，而把两个企业承包给了个人，伤害了群众的感情，败坏了党组织的声誉和形象。大家经过认真反思，一致同意：鉴于个体承包者不履行承包合同，终止他们的个人承包权，南街村党组织实行集体承包。

从1984年党组织集体承包以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产值、利税以连年翻番的速度递增。1984年产值70多万元，1985年130多万元，1986年320多万元，1987年730多万元，1988年1400多万元，1989年2100多万元，1990年4100多万元，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1992年2.1亿元，1993年4.2亿元，1994年8.02亿元，利税从1984年的7万多元猛增到6000多万元，产值增长了1100多倍，利税增长了900多倍，这就是党组织集体承包以来的经济效益。南街村因此迅速消灭了贫困，解决了温

饱，实现了小康。集体经营调动了村民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南街村的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宽广。

南街村的分配方式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逐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资加供给的分配方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又促进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因素的不断增加，就工资部分来讲，凡是参加企业的南街人或外籍职工都实行的是工资制，但在分配比例上采取了四个倾斜：第一是集体与个人相比，向集体倾斜；第二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比，向脑力劳动倾斜；第三是外来工与内部工相比，向外来工倾斜；第四是农业工人与企业工人相比，向农业工人倾斜。

南街村的供给制始于1986年。从1986年到1994年，由最初的水、电免费发展到了14项公共福利，集体对村民实行了免费供给水、电、煤、气、食用油、面粉、节假日改善生活食品；儿童入托、学生上学直至大学毕业，一切费用均由集体负担；文化娱乐、人身保险、防疫、医疗费、计划生育、农业税、农村各项提留也由村里承担。1995年春节，村民每人供给5公斤猪肉（5公斤牛肉）、2.5公斤鱼、1公斤白条鸡、1公斤鸡蛋、5公斤大米、2.5公斤苹果、0.5公斤糖块、0.5公斤瓜籽、1公斤大枣、5公斤豆腐、0.5公斤小麻油、2.5公斤粉条、1瓶酒、1条香烟、2.5公斤核桃、1.5公斤柿饼、2.5公斤葱，还有五香粉、酱油、醋、八角、茴香、生姜、味精等29种节日食品。村民们一分钱不用花，村里把节日食品全部安排齐了，不少老太太感慨地说：“村领导安排得真周到，我们想不到的也都分回来了。”

从1993年起，村开始建高标准的住宅楼，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方米。村里统一配备了中央空调，54厘米平面直角“长虹牌”、“北京牌”彩色电视机。高档家具齐全，卧室摆好了席梦思床、高低柜。炊具也是统一配置的太阳牌双芯液化气灶、万宝牌抽油烟机，连液化气罐都是名牌产品。卫生间设施齐全，每周供2次热水，让村民洗澡。一套住室

配套下来近8万元人民币。不少京城、省城来的参观者、考察者都十分羡慕：“这样的条件，我们大城市的市民也比不了。”

随着供给成分的增加和供给档次的提高，南街人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将越走越快，生活水平会越来越高。

讨 论 题

1. 怎样在改革和发展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2. 共同富裕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点在哪里？怎样解决？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要总是纠缠于是姓“资”还是姓“社”，而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山东省内东西合作走向共同富裕

1992年山东省共有贫困县54个，人口3200多万，面积6.6万平方公里，均占山东省县市区面积和人口的40%以上。1979年以来，省里虽然共向54县财政补贴39亿元，他们的经济却始终发展不起来，与东部各县市差距越拉越大，成为山东实现三步走战略、早日奔小康的最大难点。

山东省省长李春亭、副省长杜世成认为，如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起来，没有稳定的局面，大局就要受影响。因此，他们积极推动本省发达地区、优秀企业向山东省中西部发展，并响亮地提出了两句话：“欠发达地区是发达地区的用武之地。”“搞东西合作要坚持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这一融国民的责任感与经济的利益观于一体的理性认识很快在山东省

上下形成共识。

从1992年开始，山东省实施省内东西合作方案，在省内西部选择25个弱县与东部25个强县（市区）结成合作对子，省委常委和副省长每人带1~3个弱县，做联系人，一些综合协调能力、经济实力强的省直部门作“中介”，形成131家大企业、十几个大中城市共同参加的“二加四模式”。

方案是好，但是如何实施呢？

山东省在实施中逐渐认识到，必须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推动。用“看得见的手”即政府行为把有关方面撮合到一起，再靠“看不见的手”即“经济规律”使之互相吸引，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优势互补，广泛合作，共同发展。

山东省西部经济发展慢，除了地缘、历史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干部群众思想解放不够，不善于掌握、运用经济规律和技术人才缺乏等。省体改委因此在54个贫困县中选出25个作为“改革开放欠发达试点县”，采取各种措施，使之放手“破除‘左’旧（观念）小（农经济），摒除等靠要”，解放思想。同时从东部选出25个强县与之结成对子，通过对子县之间干部、企业领导相互异地挂职促进观念更新，并以人才合作为纽带使东部的先进观念、技术、资金、管理、项目向西部输送转移。几年来，东部开展了“千人挂职活动”，共派出1000名优秀干部到西部工作，“试点县”的乡镇和村书记，县里的一些干部先后到对子县挂职。

那么，富县与穷县结对子，互利合作应以谁为主？遇到双方解决不了的问题影响合作时应当怎样及时解决？这时，他们就找一批省直部门作“中介”，再联系起“试点县”。山东省科委联系沂蒙山区的费县，他们除了发挥行业优势把一些星火项目送出去外，还利用省直部门关系熟、路子广、融资能力强的优势，为费县拉项目、跑资金，取得了较大成果。

东西合作实践中还出了一道难题：省直部门依然不够权威，

有些工作推不动，怎么办？山东省主要领导就主动带头联系几个“试点县”，从中协调，促进对子县之间把合作深入搞下去。省委书记一人联系3个县，每年都亲自去一次，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問題，给试点县出主意，想办法发展经济。

东西合作光靠政府行为不行，还必须要有大中型企业自觉地参与进来。山东省及时抓住东部正在开始的产业结构调整，推动鼓励东部131家辐射力强，实力雄厚，但发展制约因素越来越多的优势企业向（山东省）西部发展，与西部合作。对此，山东省没有简单地采取“拉郎配”的办法，而是把有必要而且意欲西进的企业名单公布出来，让“试点县”根据自己的工业优势和资源优势，按经济规律去“找对象”、“谈恋爱”，通过相互吸引结合到一起。目前，已有78个大中企业与25个试点县建立了合作关系，像青岛“双星”、兰陵酒厂等著名企业分别到沂源、蒙阴办厂，一年创效益1000多万元，发展势头很好。

目前，“试点县”发展速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994年人均收入增长318.9元，比全省人均增长200多元高出近百元。山东省内的东西合作取得了成功。

山东省外东西合作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如新疆利用自己优越的光热和土地资源，与东部的人才和技术合作，发展种植业。目前，东起哈密，西到喀什、和田，都能看到来自东部的种菜能手。新疆还利用丰富的棉花资源，在棉纺工业上与东部展开了大范围的技术、设备合作，形成了闻名全国的“东锭西移”热潮。

河南省西平县则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人人为东西合作办一件好事，说一句好话，使人人都成为投资环境。”公路收费站只要听说是来考察合作的外地车辆，自觉不收费。江苏省在该县办了独资冷冻厂，一年利润1200万，当地没有眼红的。其结果是，观念更新没花钱，却引进389个合作项目，已投产178个，合同项目资金9亿多元。

山东省东部的结构调整东西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中西部

则以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为东西合作不断创造着条件。有这两个条件，东西部经济的互补性，将使东西部的企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基础。

讨 论 题

1. 社会主义优越性怎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2. 如何在现实中落实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3. 山东省东部与中西部合作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二、牡电康佳“联姻”，双双谱写新章

康佳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来叫光明华侨电工厂，由原宝安县光明华侨畜牧场与香港港华电子企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672 万元创办的，1980 年 5 月才开张营业。经过 10 多年的风风雨雨、开拓奋进，这个不到百人的来料加工小厂已发展成年销售额 27 亿元，税后利润 2.2 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深圳市最大的工业企业，其股票已公开上市，在中国综合实力百强企业中名列第 32 位。

牡丹江电视机厂创建于 1970 年，是机电部电视机专业定点生产厂，就其资历来讲，在全国电视机行业可列入老大哥之列。虽然曾引进过国外设备，也曾跟别人合作过，但最高年产不过 3 万台。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到 1992 年，这个 800 多人的电视机厂亏损 5000 多万元，濒于破产的境地。

1992 年，康佳集团彩电年产首次突破百万大关，但是他们为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向内地发展的战略。他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深圳特区经过 10 多年的高速发展，生活空间已十分拥挤。

劳动力、房地产、水电等价格持续上涨，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必须走出特区，走出深圳，先跨市，再跨省，后跨国。

康佳集团北上抢滩时，首选目标并非牡丹江市，他们曾考察了沈阳、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的有关厂家。而牡丹江方面听到康佳集团意欲在东北建立据点的消息后，马上飞赴深圳要求合作。经过3次实地考察，康佳集团看中了原牡丹江电视机厂规模适中、员工素质高等长处，牡丹江电视机厂经过近一年的“试婚期”，也体会到了康佳集团在品牌、资金、销售、管理上的优势。于是，康佳集团投入1800万元现金而取得60%的股份，牡丹江电视机厂以厂房设备等实物作价1200万元，取得40%的股份，深圳康佳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牡丹江电视机厂合资举办的牡丹江康佳实业有限公司（简称牡康）开始正式营业。

然而，合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康佳电子集团与陕西如意电视机厂合作时，就曾发生过冲突。康佳派员进厂的头一天，就有工人堵在大门口不让进，“砸烂康佳的牌子”，“就那几个小王八蛋要来管我们？”甚至有人攻击董事长是“卖国贼”、“吃里扒外”，“赠送”绳子让他上吊……

与牡丹江电视机厂的合资也遇到了阻力。如同10多年前外资大举进入东部沿海地区激起不同观念撞击一样，东部沿海地区企业今天挺进中西部经济区时，也使许多人感到心里不平衡、不适应。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人们在观念上难以适应康佳的管理模式。开业之初，日产量只有200台，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当时，上上下下都十分着急。集团总部选派一名曾在东北生活过多年的副总经理带领11个人赴牡康进行管理。从郁郁葱葱的南疆一下子飞到冰雪皑皑的北国，他们凭着高度的敬业精神，严以律己，给牡康的员工们以很大的冲击。

在用人上，他们坚持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打破多年的铁饭碗。在分配上，制定22个薪级标准，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

60%以上，还有年功工资和学历补贴，一些埋头苦干的员工的月工资超过总经理的事情时常发生。在管理上，严明奖罚制度；对严重违犯厂规的员工坚决除名，不搞“下不为例”。在质量上，按 ISO9000 国际标准，编制 43 个程序，严格把关，现场管理，层层控制。企业管理在很短时间内跃上一个台阶，成为牡丹江市各大中企业仿效的榜样。

康佳的合资是诚心诚意的。他们不是把一些过时的夕阳产品转移到子公司以赚取利润，而是把最新开发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连图纸一起拿到牡康。企业刚刚启动时，资金比较紧张，康佳集团不仅在一个月內使作为股本投入的 18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到位，而且还拿出 2000 万元作为流动资金，解决牡康的燃眉之急。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生产效益，集团总部跟牡丹江电视机厂合资双方取得一致意见，连续两年不分红，把盈利部分投入技术改造和扩大规模。

由于合资双方的竭诚努力，新生的牡康在第一年的 10 个月內就生产彩电 7.6 万台，超过了以往牡丹江电视机厂最好的年景。1994 年牡康生产了 19.9 万台彩电，销售收入 2.5 亿元，利稅超过 5000 万元；占黑龙江省电子行业产值的 40%，把牡丹江市的工业产值提高了 2.5%。“我为你，你为他，人人为康佳，康佳为国家”的信念已深深地扎根在牡康员工的心中。“牡康模式”在牡丹江市和黑龙江省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通过嫁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机制的范例。

回顾牡康成功的历程，牡康的成功不仅仅是合资双方的努力，不能忽略的，还有政府的作用。

原牡丹江电视机厂如同其他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样，人多债重社会负担大。合资时，牡丹江电视机厂把最好的厂房拿去合资了，最好的设备拿去合资了，业务技术骨干也大都去合资了，剩下只有原牡电 370 多名员工、5000 万元的债务和 176 名退休工人，牡电全接收了。合资时，市委书记申立国、市长杨国俊曾表

态：“决不能拖累合资企业，我们自己背起来吧。”牡丹江市政府采取的是退让战略，即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是对的。牡康虽然选用了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厂房合资，但是如果不合资，由于原牡丹江电视机厂产品落后、销售受阻、资金短缺、管理混乱，那块厂房将闲置，那批设备也许会成为一堆废铜烂铁，甚至还不如废铜烂铁，因为越生产越亏损。虽然牡电背了 5000 万元的债务，但由于手中握有牡康 40% 的股权，合资仅两年，它就可得利润 2000 多万元，如果不是把盈利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话，牡电的债务两年内可以减少一半。而且，现在牡电在合资初年，就为牡康生产配套件。随着牡康的发展壮大，牡电也在不断发展，原来“吃不饱”的牡电职工全部上岗，没有产生新债务，实现了扭亏为盈。

现在牡康仍在不断壮大，它的员工由开业初的 400 多人扩大到 1100 人。牡丹江的企业每年为牡康配套产值在 1000 万元以上，开业后一年半，牡康上缴税款 1400 万元。牡康回报了牡丹江。

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说：“这样的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请人家来，是要给人家一些好处。我们的厂子靠自己没指望了，人家来给救活了，人家赚了 100 元钱，拿走 90 元，我也愿意。哪怕一块钱也没给我，但工人有饭吃了，政府有税收了，我看也是好事……最重要的是，引进新的观念、新的机制。”

也许，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牡康”成功的原因。

讨 论 题

1. 试分析牡康成功的原因。
2. 康佳帮助扶持内地贫困企业是一种经济行为，还是单纯的一种“扶贫”行动。
3. 在牡、康合作中，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企业究竟谁唱主角？

三、“燕京”拒合资，自有其主张

“要问‘燕京’为什么不合资？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不想被别人吃掉。”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总经理李福成快人快语。

燕京啤酒的辉煌在中国啤酒史上也许是一个奇迹。1980年投资640万元建成时，不过是年产1万吨的小厂。当时全国啤酒产量有60多万吨，而且北京啤酒市场被“五星”、“北啤”两个牌子所垄断，好在当时供应紧张，只要是啤酒就能卖得动。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逐渐饱和时，“燕京”瞄准大众消费档次走街串巷，送酒上门，被人讥笑为“胡同战术”，硬是在夹缝中成长壮大起来。1986年，产量上到6万吨，1994年增至23万吨，1995年为35.6万吨，与我国啤酒的“老大”——“青岛”平起平坐。1995年的利税总额为2.26亿元，还兼并了华斯啤酒公司；预计1996年的产量在50万吨上下。

李福成说：“其实我不是一概不赞成合资，但要看怎么合，什么行业合资，什么企业合资，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应该一哄而上，更不能以建几个合资企业为目的，就说啤酒行业吧，有的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资金周转困难，管理落后，市场难销，搞合资是无可厚非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积累阶段，利用外资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真正大的龙头企业，经济效益比较好，又有广阔的市场销路，就不应该让外商控股把大头给人家。”

“我曾经跟美国的百威、荷兰的海尼根、法国的达能、新西兰的狮王、英国的巴斯、日本的麒麟等国外公司都谈过合资问题。有的还谈得很深，写过意向书。但我的感觉不对头，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得出结论是这些外国公司要吃掉我。”

“有段时间，我自己老在心里犯嘀咕：是不是我的思想太保守？是不是我走的路不对？会不会错过发展机会？去年夏天，德国一家啤酒设备企业的总裁金·保罗先生来北京，我带上公司一

班人去他那儿探讨请教。他说，第一，我不是厂长，不了解具体情况，很难说该不该合资，但有一条，不是外国的钱进来了就是利用外资，有一个谁更多利用谁的问题。第二，我不会花1亿马克去建一个厂，而用1.2亿马克买2个厂的60%的股份。如果你能控制市场，最好不合资更不能失去控股权。”

“金·保罗先生的话使我更坚定了，外商纷纷要跟我合资，看中了什么？是人？不是。是设备？也不是。是技术？也不是。他们看中的是市场，是中国啤酒的市场，我们的燕京啤酒在北京的市场占有率达到70%，春节前后达到80%；在天津也有20%的市场占有率，这么好的市场我会拱手送人吗？我的产量今年能上到50万吨，我会让别人吃掉我？我会让别人把‘燕京’这块牌子给灭了？如果是诚心诚意寻求合作的，不是来吃掉我的，股份在30%以下的，我是欢迎的。我现在正搞矿泉水和电子企业，属于刚起步阶段，技术不强，如果外商来合资，他占大头我都愿意，因为这里有个风险度的问题。”

李福成说：“啤酒行业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过去我们是国内同业之间的竞争，现在已变成在中国国内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人家追到我们的家门口了，北京的啤酒厂，如‘五星’、‘北啤’、‘三环’、‘丽都’等都合资了，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压力。但我相信，在中国的土地上与外商竞争，我们是有优势的。创造自己的名牌，发展民族产业，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讨 论 题

1. 啤酒行业需不需要引进外资？
2. 有人把外资比作“狼”，“狼”是资本主义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打开大门呢？
3.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怎样落实“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四、顺德改革多曲折，力克难点创新优

人称“广东四小虎”之一的顺德，是一个拥有面积 806 平方公里的县级市。由于改革先行了一步，1992 年它已从一个农业县实现了向工业化的历史性转变，创建了科龙、容声、万家乐、美的、华宝等一大批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已从 1978 年的 49:51，转变为 92:8。这是顺德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取得的成绩。

顺德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把门关得严严的，怕被“高帽子”压倒。但无论是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府机构改革，都不断地使顺德人卷入一个个漩涡之中。在回忆改革往事时，冯润胜市长感慨万千：“从 1992 年到 1994 年改革基本完成，我的心情是悲壮、痛苦，甚至不准备干了！”

那么，是什么使顺德坚定信心，从改革的此岸一步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彼岸呢？

1992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谈话，顺德人说，我们听得最清楚的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

顺德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之初，既无明确的政策依据，也无先例可循，他们只有一个感觉：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非改不可！

顺德经济发展模式又叫“三个为主”：公有制经济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在这个模式中，政府唱主角，既是投资主体，又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同时通过减免等优惠政策扶持企业成长。然而，政府辛辛苦苦，只能从企业拿到有限的效益，却要负无限的责任。虽说顺德的公有制企业在 90% 以上，但是健康的不长寿——好企业由于缺乏好机制，盲目膨胀，投资失控，用不了几年就拖垮了；长寿的不健康——那些经营不善、产品落后，又资不抵债的企业本应破产，却由银行不断贷款来输氧维

持，顺德的企业负债率在85%以上。顺德形成了“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局面。顺德必须改革经济体制，明晰产权，解放企业，解放政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尽管顺德人坚信改革没有错，但是顺德在进行涉及产权制度的企业改革，对老企业进行引资嫁接等改造时，仍被人指责为搞私有化，造成公有资产流失。然而，似是而非的“软道理”，应该服从于搞好国有经济这个“硬道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97年6月，顺德在北京搞了一个“顺德名优产品博览会”，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没想到，顺德生产的电风扇占了全国的1/3，微波炉占1/3，电饭锅占1/2，冰箱占1/8，热水燃气具占1/2，顺德取得的成绩是令人叹服的。

顺德改革成功还得益于顺德拥有一支思想统一、工作实干，敢于“自我剥夺”的干部队伍。

改革前，顺德这么一个不大的县级市，有部、委、办、局机构56个，还有100多个临时机构。各方面工作是党政同设机构，分工过细，职能交叉。顺德是蔗糖之乡，过去是农业局管生产，糖蔗办公室管砍、运、榨，农委管政策，大家各管一段，互不通气，真是苦了乡里，今天局里来检查，明天室里来视察，后天委里来调查，农民意见很大：“能不能几个部门一起来？”当然，基层上来请示工作也不容易。

政府机构必须精简，政企必须分开。顺德在实施政企分开的过程中，把原市政府5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32个，各部门的内设机构减少了125个，撤销临时机构100多个，机关人员从1200多人减少到900多人。农口系统原有18位局长、副局长级的干部参加了职能调整，在新机构中，只有4人分别任局长、副局长，有4人改任科长、副科长，2人改任调研员，另有7人参与企业经营，有1人调其他新行政机构任职。这种改革，力度不能说不大，但顺德的干部们不怕“自我剥夺”。

正是由于顺德干部这种顾全改革大局的精神，使顺德赢得了

发展的优势，赢得了发展的时间。

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说：“我们早就在想，顺德靠什么去竞争？过去是靠乡镇企业，现在可以说，是靠企业体制的优势。”顺德领导班子多次分析自己的长短：论政策优势，我们比不上深圳、珠海；论城市辐射，我们比不上番禺、南海；论行政权限，我们比不上地级市；但外商为什么愿意来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投资环境好，政府办事效率高。现在，顺德市政府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企业的经营状况，而是如何引导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用好资本运营这一手段，到国际市场上一搏身手的问题。顺德的发展整整比其他地区快了一拍。

当然，顺德的改革也得到了广东省委的支持，省委在争议面前，态度非常明确：“允许试验，支持改革，多干少说，探索以后再说。”对顺德的改革，省委领导也一直特别关注，定期到顺德调查研究，及时解决改革中提出的新问题。党的十五大后，广东省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为广东改革的重大课题。顺德改革先行一步，为这个课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使人们看到了广东创造体制优势的希望所在。

讨 论 题

1. 通过顺德的成功改革，谈谈你对解放生产力的理解。
2. 你认为目前我国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3. 试分析改革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五、“乌托邦”的中国产物——人民公社和学大寨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是湖北浠水县人，他从那里的农民中了解到，在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期间，曾发生了几起十八九岁的女

孩子集体自杀事件，这些小姑娘是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不堪忍受人民公社对个人自由的严酷控制而死的。当时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无怪乎有的农民说：“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和学大寨。”

人民公社是1958年建立的，它是“乌托邦”在中国的再现。毛泽东想把它建成“大同世界”，他曾经说过：“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路。”1958年，毛泽东认为已经找到了“通往大同的路”。在成立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送给河北省徐水县干部两本书：《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都是“乌托邦”式的设想。当时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一大二公”式的共产主义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在1958年的惨痛教训下，不得不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管理模式。但是，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种什么，怎么种，都得由上级决定。打下粮食以后，农民吃多少口粮还得由上级作决定。生产队没有生产自主权，没有产品支配权，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人民公社严密组织下的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农业早就期待从人民公社里解放出来。

1982年4月，四川省广汉县取消了人民公社（1979年3月，这个县就在向阳公社进行政社分开，建乡改社的试点）。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从此以后农民成了自由人。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在20世纪60年代初，因其著名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64年2月10日，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等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在全国引起了轰动。1964年3月，毛泽东肯定了大寨经验。在同年6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宣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同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从此，大寨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先进单位，而且被作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

在没有成为一场政治活动之前，大寨的农民是可钦可佩的。但是，在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种宣传工具的推动下，大寨成为全国各界人士朝觐的圣地。从1964年到70年代末，共有700多万人到大寨去“取经”。而大寨的经验，也被人们演化成了几条：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二是无休止地开辟“大寨田”，即开山造田或围湖造田；三是搞阶级斗争，“七斗，八斗”。在许多地方，“七斗，八斗”变成了打击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不顾具体情况的“修大寨田”破坏了农业生态平衡，“大寨式工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仅大寨所在的昔阳县，立案处理过的人超过3000人，每70个人中就有一个挨斗、挨批，

并且被带上各种“帽子”的有 2000 多人，占全县人口的 1%。为了创造大寨神话，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 1.35 亿公斤，占实际产量的 26%。当时陈永贵还对昔阳的气象报告进行审批，以保证“大灾之年大丰收”。不仅农业要学大寨，工厂、学校、商店、国家机关都要学大寨。直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农业学大寨”才偃旗息鼓。

人民公社和学大寨是中国农村发展经济过程中进行的两个大的运动。它们反映了当时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希望以最大的努力发展经济的心愿。但是，事与愿违，它不仅破坏了生产力，而且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为僵死的、教条的社会主义。

讨 论 题

1. 人民公社和学大寨的教训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2. 请你谈谈对邓小平关于“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理解。
3. 对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千百万人曾喊过的口号，你认为它错在哪里？

六、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吗

1994 年 9 月以来，美国学者、世界观测研究所所长来斯特·布朗多次向世界提出一个轰动性的问题：2030 年谁能养活中国？在世界刮起了布朗“旋风”。下面将其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中国的人口每年以 1400 万的速度在增长，收入也以空前的速度上升。收入增加过猛意味着肉食消费比人口的增长还要快，从而引起对食物越来越多的一连串要求。1978 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起步时，用来饲养动物的粮食只占粮食总产量的 7%。到 1990 年，这个比例增加到 20%，大部分是用来养猪。肉食越多，所需的粮食也越多。比如说，家

禽增加 1 公斤，就需要增加 4 公斤的粮食。如果粮食不能随着改善伙食的需要而快速地增加，食物的价格就要上扬。其实，在政府还未着手投放库存来抑制抢购之前，1994 年头两个月中国 35 个主要城市的粮价已猛涨了 41%。

中国养活自己的能力现在完全依靠提高越来越少的耕地的产量。日本的情况发人深思。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居于提高大米产量的领先地位。但到 1984 年，日本达到每公顷不到 5 吨的水平就停滞不前了。此后，不算 1993 年因气候歉收，产量还是略有下降。中国的大米产量提高到接近日本的水平时，也开始停滞不前，如果不能在科技方面有新的突破，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产量是不可能的。限制中国粮食发展的，除了可利用的农田和水以外，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包括土壤流失、水涝、土壤的盐碱化、空气污染和全球性的气候变暖，等等。

据估计，中国的粮食产量在 1990 年和 2030 年之间至少要降低 20%。由此而来的粮食短缺是巨大的，比日本要严重好多倍。1990 年中国生产粮食 3.29 亿吨，消费 3.35 亿吨，差额由进口补足。如果只考虑预计人口的增长而不计每个人消费的增加，中国对粮食的需求要从 1990 年的 3.35 亿吨增加到 2030 年的 4.79 亿吨。

当然，中国几百万新富裕起来的人，对畜产品的消费不能进一步增加会产生不满。如果每个人的粮食消费从目前的 300 公斤增加到 400 公斤，全部粮食消费要达到 6.41 亿吨的惊人数字，进口补缺将达到 3.78 亿吨。谁能提供数额如此之大的粮食？答案是：谁也提供不了。自 1980 年以来，全世界粮食出口量每年平均约计 2 亿吨，近半数由美国提供。但是，美国也面临耕地和灌溉用水被非农业侵占的问题。此外，考虑到未来的 40 年内，美国人口要增加 9500 万，未来的农业产品首先要满足自身需求。同时，在世界的其他区域，预计的粮食短缺也是巨大的。特别是非洲，到 2030 年，预计短缺 2.5 亿吨粮食——10 倍于目前的进

口量。印度次大陆的欠缺预计要比眼下大几倍。几十个人口增长快的国家——其中有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尼日利亚——也将会出现巨大的食物短缺。在这种情况下，预计的中国庞大的粮食短缺将引起对有限的粮食出口供应的激烈竞争，促使世界粮价大大超过一般水平。如何满足中国对粮食进口的需求和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满足此需求所预计剩下的差额，都将成为问题。

最后的结局是，当中国一个劲地转而依靠世界市场时，食物短缺将变成全世界的短缺，它的耕地和水的不足将变为全世界的不足。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经济命运和中国的 12 亿人民现在密不可分地连接在一起了。这种预期的中国粮食短缺将迫使其他政府——不管多么不情愿——要认真地重新估计自己国家承受人口的能力以及对人口和消费的政策。其实，布朗的观点与过去西方流行的“中国粮食悲观论”有共同点。

45 年前，中国人口不足 5 亿人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扬言：“能够救中国的，是美国的面粉。”45 年后，中国人口已翻了一番多，而粮食产量却由当时的 1.31 亿吨增至 1993 年的 4.65 亿吨，跃居世界首位。而且，中国仅使用相当于美国 50% 的耕地。

尽管如此，布朗先生的观点仍然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粮食问题的大讨论。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供需平衡论

这一观点认为，布朗是科学家。他是依据统计、测算说话的。但是他对中国粮食总产量及递增率的测算缺乏科学性。布朗估算的 2030 年 2.67 亿吨的粮食总产量是 21 年前（1973 年）的数据。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 年版）发表的数字，从 1973 年至 1993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 72.7%，1993 年达 4.564 亿吨。而且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粮食纯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是世界各国中粮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

一。据世界银行统计，若以 1979 年至 1981 年的粮食生产指数为 100，中国 1988~1990 年的该指数已达 133。此期间，低收入国家（不含中国、印度）仅为 105，中等收入国家仅为 102，而高收入国家为零增长。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对 2020 年进行了预测，在充分考虑各种经济变量的情况下，预计 2000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可达 5 亿吨或 5.2 亿吨，2020 年为 7 亿吨或 7.3 亿吨。仅此数字，就大大高于布朗测算的 2030 年粮食总需求量。虽然，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粮食的消费量将超过生产量，需要继续进口粮食弥补缺口，调剂品种。但据中科院的估算，2020 年粮食进口量为 1000 万吨或 3000 万吨，仅占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 3%~10%。粮食自给率将达到 95% 以上。

我国资源拥有生产 7 亿吨至 8 亿吨甚至 10 亿吨粮食的潜力。2030 年完全可以满足 16 亿人口的 95% 以上的需要。但是生产潜力转变为生产能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二）供需缺口论

这一观念认为，我国粮食供给将从有余转为不足，供需缺口到 2005 年可达 6900 万吨，2010 年为 1.363 亿吨；另有估测认为，未来 25 年至 30 年最大缺口为 5000 万吨至 7000 万吨。

他们着重从政策倾斜不足方面分析粮食增长乏力的原因，认为粮食供给的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国内未来投资政策。因此，他们提出许多政策建议：①引导农民从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济发展，为增强粮食供给能力提供制度保证；②逐步放开粮食定购价格，向“反哺”农业转移，以增强粮食生产活力；③确定国家对农业投入最低保护线，防止资金向城市倒流，使增长粮食具备资金保障；④调整工农业增速比，构建粮食生产顺利发展的宏观环境。

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使粮农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三) 水土农业临界论

这种观点认为，再过三四十年，以水土为中心的农业将达到其承载能力的临界线，无法应付人口剧增和环境恶化的挑战。出路就在于，将露天农业与工厂化农业结合起来，发展微生物工程与细胞工程农业；并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

中国究竟能不能养活自己，我们等待事实说话。

讨 论 题

1. 请列举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地位的观点。用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说明农业发展对中国的意义。
2. 怎样提高农业的生产力？
3. 你对布朗先生的观点有何评价？

第二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 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不发达状态，我们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一国情是制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了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概括了我们的主要经验，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上百年时间，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其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同时，必须把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制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一基本纲领回答了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

一、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贫困人口数下降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1978 年至 1985 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 2.5 亿减少到 1.25 亿，下降了 50%，年均减少 1786 万人。1986~1993 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 1.25 亿减少到 8000 万人，年均减少 640 万人。但从 1991 年开始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明显减缓，平均每年只解决了 250 万人的温饱问题。针对这个情况，国务院从 1993 年开始准备，1994 年 3 月正式公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 7 年时间，基本解决剩下的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 20 世纪末力争消除贫困现象。从此，全国扶贫进入第三阶段，即最艰难的攻坚阶段。通过实施《扶贫攻坚计划》，从 1993 年到 1995 年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减少了 1500 万，年均减少 500 万人。因此，在“九五”计划期间需要解决全国农村的 65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若想在 20 世纪末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每年解决 1300 万人口的温饱问题；若每年只能解决 500 万人，则要用 13 年的时间，就是说，还将有 4000 万人的温饱问题留待 21 世纪去解决。

剩下的贫困人口全部是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530 元温饱线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其中还有 50% 的人极端贫困，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300 元，有 990 万人年平均纯收入低于 200 元。截至 1996 年，全国 592 个国定贫困县有 2897 万人和 2674 万头大牲畜常年饮水困难。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决非易事，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1. 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恶劣。剩余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南、西北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边疆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淹没区，水土流失严重，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电力、道路、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生态环境恶劣、脆弱，耕地稀少，土层浅，土壤瘠薄，相当部分不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

2.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差。贫困地区农业比重大，粮食生产比重大，基本上是农耕社会，二、三产业极为落后。一部分贫困县大中型乡镇企业还是空白，“空壳村”比例也很大。无法与发达地区经济构成中乡镇企业“半壁江山”相比。低投入、低产出和低商品率则是贫困户经营效益写照。据安徽省调查，1994年贫困户家庭每百元投资的纯收入仅106元，不足全省平均水平218元的一半。长期以来，广大贫困户处在“低收入——低投入——低生产率——低商品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脱贫。

3. 单一性的产业结构导致收入来源单一，收入水平低。贫困户的收入来源绝大部分来自收益不高的第一产业。

4. 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医疗保健落后，文化生活贫乏，文盲、半文盲比率高。广西23个特困县文盲、半文盲的比率比全区平均水平高7.2个百分点。湖南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只及全省农民平均水平的1/3，其中人均文化教育支出只及全省农民人均数的1/4。

5. 贫困地区劳动力人口素质低下的情况较普遍。受传统小农经济观念影响较重，安土轻迁，富在外不如穷在农村，守土观念严重，流动意识差。那里科技力量薄弱，人才缺乏十分突出。贫困人口中低龄和老龄人口比重大，造成劳动力负担加重，终年不得温饱。

6. 贫困地区自救能力差。由于贫困地区第二、三产业比重很小，输出的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导致财政不能自立。这些县

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寅吃卯粮，干部和教师的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发放，长期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因此，当地县级政府没有财力解决农民的生产发展和贫困问题，必须依赖于外部“输血”。

除上述艰巨的扶贫任务外，全国农村尚有 2300 万人年均纯收入在 530~600 元之间，收入很不稳定，处于绝对贫困的边缘，一遇自然灾害和经济波动，就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企业制度、就业、工资制度的改革，企业破产、停产、半停产和减员增效措施的推行，就业难和职工下岗使城市贫困人口也渐渐浮出水面。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以前的 1978 年，据世界银行测算是 0.16，这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差距开始拉开，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 1986 年为 0.19，1987 年为 0.20，1990 年为 0.23。据有关专家测算，1994 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434，同年，在城市中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为 0.445。这已经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 0.3~0.4 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超过国际上中等贫富差距程度的国家。另外据有关专家测算，在中国城镇居民中，最富有的 1/5 家庭占有了总收入的 44.46%，而最贫困的 1/5 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 6.04%。

中国消除贫困之战任重而道远。

讨 论 题

1. 你认为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2. 你认为中国在近期内能否消除贫困人口现象？如何消除贫困人口现象？

象？

二、中低技术依然“垄断”中国产业

(一) 高、中、低技术产业的衡量标准

关于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定义，至今没有统一。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是按研究开发（R&D）的含量对产业进行分类的，见表2-1。

所谓研究开发的含量，指的是研究开发（R&D）的经费占其产业营业额（销售收入）的比例。

这种分类方法非常简捷，而且得到了经合组织各国的认同。表2-2揭示了经合组织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

表2-1 产业分类

R&D含量	产业
<1%	低技术
1%~3%	中技术
>3%	高技术

表2-2 经合组织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

分 类	1970 年	1991 年
低技术产业	57.9%	51.9%
中技术产业	26.6%	29.0%
高技术产业	15.5%	19.1%

所谓高技术产业，一般认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合组织和美国曾多次依据产业技术密集度的变化，确定高技术产业的范围。目前，高技术产业包括航空、航天、办公机械、电子计算机、电子元器件、医药、医疗、仪器仪表、电器等，所谓中技术产业，包括汽车、化学、机器制造、非电器产业、橡胶、塑料、有色冶金以及其他运输机械等；所有其他工业都是低技术产业。

从发展趋势看，高技术产业在经合组织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但是，低技术产业向中、高技术产业的转变（或升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1970~1991年，经合组织国家高技术产业的比例平均每年增加0.17个百分点，中技术产业的比重平均每年增加0.11个百分点，低技术产业的比重平均每年

降低 0.29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经合组织国家高技术产业的比例平均 5.8 年才增加 1 个百分点，中技术产业的比重平均 8.8 年才增加 1 个百分点，低技术产业的比例平均 3 年半才降低 1 个百分点。

（二）发达国家在中低技术产业的发展 and 升级方面仍处于主导地位

第一，中、低技术产品仍然要靠设计、功能和质量进行竞争，低的价格并非完全的优势。以塑料工业为例，发达国家遇到了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但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该行业的低档区进行竞争。

第二，低技术产业的生产自动化非常重要，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工艺创新，所以，它们在全球低技术产业中仍然占垄断性地位，例如，食品工业。

第三，靠近市场和顾客对低技术产业更具重要性。服装、鞋类、包装工业等，其产品的款式和设计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发展中国家在此类产业竞争中虽然有一定优势，但其设计大多垄断在发达国家手中。

第四，中低技术产业正在发生结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生产活动正在向低工资国家转移，但创新活动仍然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内进行。

（三）中国低技术产业所占比重在 60% 以上

从下面的几个情况来推断，我国国民经济的低技术产业特征非常明显，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以上由低技术产业提供。

首先，我国的经济结构表明我国目前还处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来看，我国第一产业占 GDP 的份额大约为 20%，比低收入国家 29%（1970 年）的平均水平要低，比中等收入国家 12%（1970 年）和高收入国家 4%（1970 年）的比例高出许多。第三产业的份额则比所有收入组别国家都低。中国社科院主持的《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

课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到 2010 年之前，我国工业将处于完成工业化与进行工业现代化两个阶段重叠进行的时期。

其次，发达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初，高、中、低技术产业的比重对判断我国的相应比例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或称为“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大致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其产业结构的特点是国民生产总值中服务业产值开始超过物质产品产值；而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工业化尚未完全完成、信息化挑战又极为严峻的历史关头，在产业结构方面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大约有 25~30 年的差距，因此，从表 2-2 可以推断我国低技术产业所占的比重应该在 60% 以上。

第三，我国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近年来，全国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 0.5%，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5%）的 1/3，与西方七国（美、日、德、英、法、意、加）2.2% 的平均水平差距更大。

表 2-3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情况

项 目	1990 年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技术开发经费支出额 (亿元)	133.1	339.2	366.2	384.9
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	1.38	1.37	1.19	1.10
技术开发经费中研究开发支出 (亿元)	—	72.0	90.60	—
研究开发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	—	0.29	0.29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7》，第 678 页；《中国科学技术指标 1996》，第 79 页。

从表 2-3 看看我国企业的主体部分——大中型工业企业（共计 2.3 万家）的技术开发情况：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近年来逐年下滑，从 1990 年的 1.38% 骤降到 1996 年的 1.1%。必须指出的是，在企业技术开

发经费支出中, 研究开发用款大致为 1/4。换言之,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开发含量大约为 0.3%!

表 2-4 我国部分行业的研究开发含量 (1995 年)

项 目	R&D 经费支出 (亿元)			R&D 经费占销售 收入的比例 (%)		
	全部 企业	大中型 企业	小型 企业	全部 企业	大中型 企业	小型 企业
全国总计	94.2	90.6	3.6	0.18	0.30	0.0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3	10.3	—	0.75	0.78	0.01
武器弹药制造业	1.9	1.9	—	0.71	0.71	0.08
医药制造业	4.7	4.3	0.4	0.53	0.77	0.12
橡胶制造业	2.4	2.3	0.1	0.41	0.62	0.0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3.0	12.9	0.1	0.41	0.55	0.02
专用设备制造业	6.2	5.6	0.6	0.37	0.61	0.0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机械制造业	1.5	1.4	0.1	0.36	0.77	0.06
普通机械制造业	7.7	7.6	0.1	0.35	0.62	0.0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6.1	5.6	0.5	0.25	0.38	0.0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	8.3	7.9	0.4	0.23	0.36	0.0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6	5.4	0.2	0.22	0.38	0.02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3.7	3.6	0.1	0.18	0.19	0.08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家经贸委 1997 年完成的《1996 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统计调查报告》。

从表 2-4 可以看出, 所列 12 大行业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全国工业企业的 3/4 以上。我国工业的研究开发含量仅为 0.18% 左右, 即大致相当于低技术产业和中技术产业的“分水岭”(1%) 的 1/6! 从整体上看,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乃至全部

企业都属于低技术产业。我国研究开发含量最高的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其研究开发含量为 0.75%，也只能“屈居”低技术产业之列！

如果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情况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部分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含量（见表 2-5）作一比较，就会发现：

表 2-5 部分国家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含量（%）

项 目	美国 1987	日本 1985	德国 1986	意大利 1985	英国 1984	加拿大 1986	OECD 成员国 1979~1981	中国 1995
全部制造业	2.14	2.03	2.38	0.73	2.15	1.05		0.68
全部高技术产业	—	5.58	—	6.33	9.71	7.59	7.7	1.40
航空航天制造业	22.35	4.87	23.0	18.75	14.20	10.79	14.22	8.19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16.81	5.03	4.88	6.27	12.70	10.80	9.0	0.6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7.91	5.72	—	5.10	11.98	16.29	7.4	1.00
医药品制造业	2.83	8.34	4.71	5.53	13.17	3.87	7.5	1.76
专用科学仪器设备制造业	2.92	4.99	2.79	0.77	2.53	2.55	4.9	0.85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	4.51	7.51	1.56	3.68	1.24	3.2	0.92

资料来源：摘自《中国科学技术指标 1996》，第 156 页。

①高技术产业的基础水平不同。多数发达国家全部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含量都在 2% 左右，即在整体上属于中技术产业；而我国全部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含量 1995 年只有 0.68%，整体上仍属于低技术产业。

②高技术产业和全部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含量间的差别不同。

各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含量都在 5% 以上，有的甚至接近 10%，远远高于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含量；而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含量仅为 1.4%，与全部制造业相应强度的差别较小。

③发达国家每个高技术产业部门的研究开发含量都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而我国的六大技术密集产业中，只有航空航天制造业和医药品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含量比较高，分别是制造业研究开发含量的 12 倍和 2.6 倍，其他行业的研究开发含量都不太高，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研究开发含量甚至低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这种现象是非常独特的，说明我国的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专用科学仪器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急需增加研究开发含量，摆脱目前这种以研究开发含量不超过 1% 却“跻身”高技术产业行列的“尴尬”局面。

总之，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研究开发含量这一特征指标很不突出，绝大部分行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有的行业甚至根本不具备这种特征。按照经合组织的标准，我国只有航空航天制造业算得上真正的高技术产业，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我国全部高技术产业整体上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中等技术产业。

所有这一切，说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体质”较弱。

第四，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和所占比例小，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只有 5.1%（1996 年数字），比经合组织成员国 15.1%（1990 年）的平均水平低整整 10 个百分点，比美国低 18.4 个百分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额中占的比例只有 1.32%（1994 年），相当于美国所占比例的 1/19，日本的 1/13，德国的 1/9。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虽然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出口额还很低。1994 年的出口额仅相当于美国高技术产品出

口额的 5.2%；而且出口产品类型高度集中在计算机与通信和电子类产品。1995 年上述两类产品的出口额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 74.1%。高技术产品出口以来料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原料、材料和元器件等，说明我国高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还不强。另外，从地域看，出口的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很少。1995 年，西南、西北 9 省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仅占全国总量的 2.8%。广东、天津、上海、北京和辽宁这 5 个省市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合计超过 80 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 4/5。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地区分布看，出口额排在首位的是广东省。1995 年，广东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 53.4 亿美元，占全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半壁江山”（52.9%），其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类产品出口 37.9 亿美元，占该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 71%。其他出口额超过 5 亿美元的省市还有：天津（8.36 亿美元）、上海（6.51 亿美元）、北京（6.41 亿美元）和辽宁（5.44 亿美元）。超过 1 亿美元的有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

讨 论 题

1. 中国产业技术的落后状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联系吗？
2. 中国产业技术落后的状况能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结束？

三、我国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

能源系统包括能源的开采、加工、转换、输送、分配到终端利用几个环节。能源效率，从物理学观点来看，是指利用能源的各种活动，如从开采到终端利用中，所得到的起作用的能源量与实际消耗的能源量之比；从消费的观点看，是指为终端用户提供的能源服务与所消耗的能源量之比。

按国际通用的观点和评价方法，能源效率可分为开采效率、加工和转换效率、贮运效率以及终端利用效率。“开采效率”即回采率或回收利用率，用从一定能源储量中开采出来的产量的热值与储量的热值之比来衡量。“加工和转换效率”的“加工”是指煤、石油、天然气等的精选炼制，“转换”则包括炼焦、发电、产热以及汽化和液化等一次能源变成二次能源的过程。“加工和转换效率”是起作用的产量与加工转换时投入的能源量之比，其差额即加工转换企业，如炼油厂的自身消耗。“贮运效率”是指能源输送、分配和贮存过程中的损失量来衡量。“终端利用效率”是指用户得到的有用能与过程开始时输入的能源量之比。终端利用效率的计算极其复杂，从不同角度计算，结果差别极大。例如，白炽灯输出的有用能，如按光通量计算，效率很低；若按发出的热量计算，效率高达 95% 以上。

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国家计委、中科院能源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采取国际通用方法，编制出 1980 年全国能流图，计算结果几乎完全相同，能源效率分别为 25.5% 和 25.9%。

中国煤炭科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王庆一对我国 1992 年能源系统的总效率进行了估计：我国能源开采效率为 31.1%；加工转换和贮运效率为 70.3%；终端利用效率中，农业利用效率为 30%，相当于欧美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水平。工业利用效率因统计极其复杂，只能按工业锅炉和水泥窑的平均热效率提高的幅度推算，为 44.5%；交通运输利用率 25.4%；民用商业部门利用率为 42.5%。根据上述四个部门的能耗比和终端利用效率，算出总的终端利用效率为 42.1%。而 1992 年我国的能源效率为 29%，比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高了大约 3 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通用的方法计算，我国目前的能源效率比美、日等世界先进水平约低 10 个百分点；终端利用效率约为 41%，比世界先进水平低 10 个百分点以上。

我国“能源系统的总效率”非常低，只有 9.3%，也就是说，我国每开采 100 吨能源储量，变成终端能用的还不到 10 吨，90 吨以上的能源在开采、加工转换、贮运和终端利用过程中损失和浪费掉了。

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为美国的 3 倍，日本的 9 倍，德国的 7 倍，法国的 8 倍，英国的 5 倍，韩国的 4.5 倍。据测算，如果我国的能源利用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每年则可节能 6 亿多吨标准煤（1996 年我国煤炭产量为 13.75 亿吨）。

我国能源效率的低下反映了整体工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还有较大差距。

讨 论 题

1. 能源效率低下的状况暴露了我国生产力状况的哪些问题？
2. 提高我国能源效率的意义是什么？

四、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防战略以及二者的关系也随其发生过变化。下面就这一问题作一简略概述。

（一）初步的工业化建设

旧中国国民经济中只占 10% 左右的近代经济成分基本处在沿海地区，布局极不合理。“一五”计划（1953~1957 年）期间苏联援建的 156 项大型建设项目几乎全在内地。其原因是：一是为了改变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局面；二是考虑安全需要。在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曾向斯大林提出如果美国派飞机大肆轰炸中国的沿海城市怎么办，经交涉，斯大林同意了派出苏联空军进驻上海附近地区。

“二五”计划时期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忽视了经济建设和现代工业的复杂性，高估了群众热情的作用，炼铁炉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失败了，被迫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进行 3 年的经济调整。

（二）60 年代三线建设的决策

经过 3 年调整，至 1964 年和 1965 年初，国民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开始新一轮上升，“三五”计划制订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这时的国际形势于我极为不利。

中、苏两党关系走向了决裂，苏联一步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特别是在 1969 年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后，苏方在中苏边界自己一侧和蒙古屯兵上百万，其 1/4 的导弹及核武器摆在西伯利亚指向中国。苏联曾考虑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突袭。

美国在韩国、日本的冲绳、横须贺两地、中国的台湾、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泰国、巴基斯坦等地驻有庞大的海空军事力量，并出兵越南南方，矛头所向路人皆知。

印度也以为短时困难会把中国压垮，有机可乘，不断吞食中国领土。中国尽了最大努力争取通过谈判解决，周总理亲赴印度，但是印度尼赫鲁政府摆出一副不容谈判的架式。在万般无奈之下，中国被迫在 1962 年进行自卫还击。随后两国一直未建立互信。苏联大量向印度提供军事技术。

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叫嚣要反攻大陆，曾不断派出小股匪徒渗透到大陆，从事侦察和袭扰活动。常利用美国提供的先进飞机窜入内陆地区进行侦察活动。

实际上那时我们处在一个军事包围圈中。而对险恶的安全环境，国民经济布局却很脆弱。东北是当时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几乎全在苏联轰炸机一小时航程和中短程地对地导弹射程之内，反应时间短，防御能力差；以上海为核心的华东工业区全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和以台湾为基地的航空兵的攻击距离之内，一旦桥

梁道路被破坏，上千万市民的生计都成问题，更谈不上能源、电力、原材料和产品运输了。要知道，仅这一地区的上海一市在建国后的前 30 年中，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始终占全国的 1/6。1964 年 4 月，总参作战部提交的报告曾详细分析过安全和国防的被动局面。

在 1964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重要讲话，其内容是：一讲经济发展计划；二讲战备问题。关于后者，毛泽东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枪炮弹药。有了这些就放心了。攀枝花（在四川西南部）钢铁基地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他还幽默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我国曾按照设想的军事地理划分，沿海地区为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后方为第三线。云、贵、川和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其工程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彭德怀等人负责指挥，陕、甘、宁、青和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由中央西北局的刘澜涛、王林、安志文、宋平负责指挥建设。相对于西南西北的大三线，中部和沿海地区的腹地称为小三线。

（三）三线建设的展开

1964 年 8 月 9 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均应摆在三线，布点要分散、靠山、隐蔽；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院校、科研机构，要全部或部分迁到三线；不再建新的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沈阳和上海建地铁问题，用于备战。经批准后，这个报告纳入了 1965 年计划和“三五”计划（1966～1970 年）。此计划的执行效率非常惊人。国家计委组织建新厂，建委组织一线的“独生子”工厂搬迁；经委组织生产三线所需的设备和材料。一线省、区也在自己的腹地

山区部署一些新建和迁建项目。1965 年开始，大小三线几乎同时开工。这些都意味着进入了临战状态。

那是一个忘我、奉献的轰轰烈烈的建设年代。仅在 1964 年下半年至 1965 年，在西南、西北地区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就有约 300 项。其中钢铁 14 项，有色金属 18 项，石油工业 2 项，化工 14 项，铁道工程 26 项，以及其他的交通、民航、水利、森工、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项目。

以四川为例，“三五”、“四五”计划期间，当时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重庆至万县的造船工业基地，都陆续投产，20 世纪 70 年代初又在重庆上马重型火炮牵引车项目，其他民用工业项目就更多。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相继成为西南地区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生产的重要城市。

三线建设改变了那里的面貌。以贵州为例：贵州全省的电站装机容量仅有 3030 千瓦，能开动几台机器！1965 年终于达到 50.26 万千瓦。“三五”、“四五”计划期间，中央在贵州的能源、铁路、冶金、军工等领域进行了大强度投资，新建、迁建了一大批航空、航天、电子类高科技产业、冶金、机械、通用电子仪器等项目。一位社会学家评论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 50 年。这同样适用于陕、甘、宁、青等省区。

西南三线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项目的技术难度和施工难度为世界罕见。例如，攀枝花钢城、成昆铁路等项目。

（四）三线建设的成效

1965~1975 年的 11 年间，三线地区共完成基建投资 1269.67 亿元，建成项目 2000 多个。其中军工项目投资占总投资的 18.6%，形成占全国一半的军工生产能力。在援越抗美期间，在其消耗最大的 3 年中国提供的物资军火是 90 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是由三线地区工厂所产。通过调人、迁厂、建新厂，利

用三线地区的丰富资源，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建设为重点，形成一大批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工、电子、轻工、航空、航天、仪表、科研门类齐全、互相配套的民用、军事经济体系，简直就是中国现代经济结构的浓缩版，有“小中国”之称。至今陕西、四川（含重庆）的科技人员数紧跟北京、上海之后。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三线企业中有的军工企业实现“军转民”，形成了“长虹”、“嘉陵”、“长安”等一批著名民用工业基地。但是也有不少三线企业被迫关、停、并、迁。人们对三线建设评价也出现否定和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否定的意见多从经济效益着眼，肯定意见不仅从经济效益，而且从国防安全效益、社会效益、西部开发等多角度观察。

（五）进入 80 年代后经济重心重回沿海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同时感到中国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有了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日渐有利，国防建设压力有所减轻。自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逐渐形成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于是裁军百万；在沿海建立 4 个经济特区，开放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东部地区掌握了更大的财力和投资决策权；引进外资……这一切都使得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心重新回到沿海地区，使之成为首先富起来的地区。

在国防建设方面，除大量裁军外，还控制军费增长，使军队建设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此，邓小平作过多次论述，对于要求军队装备现代化的呼声，他要求军队要“忍耐”。

（六）1989 年政治风波的考验

1989 年前后，东欧、苏联局势剧烈动荡，中国也在 1989 年发生了政治风波，一时间，西方和平演变的气势逼人。这是对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路线的一次考验。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说：“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的‘三步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正确、肯定的回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邓小平选集》第三卷，1993年版，第309页）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的谈话中说：“请你相信，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订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325页）

1991年12月26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正式宣告苏联不复存在。1992年一二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几个城市，他在视察过程中的谈话中强调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多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371页）

（六）90年代世界新格局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是一超多强，向多极化方向发

展。在经济上出现经济全球化、一体化、集团化趋势。“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383页）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华势力对我国实行分化、西化的野心和战略没有改变。有一股势力总是试图遏制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交往”、“接触”、“遏制”只是形式不同，其实质一样。

从整体上来看，国际形势于我发展仍有利。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发展，新的干预主义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野蛮轰炸，首开绕开联合国在其成员国范围之外，对一个并未对北约成员国构成安全威胁的主权国家动武的恶劣先例。并公然攻击我驻南使馆。

在东亚，美、日于1997年9月完成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订。这个“防卫指针”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平时周边发生紧急事态时对美军实行支援任务，突破了日本宪法专守防卫的限制，其“周边”的范围包括了台湾海峡和南海在内的整个太平洋地区。随后日本国内一步步完成了相关的多项国内立法。美国国内也不断有仇华势力叫嚣要武力保卫台湾，阻挠我国和平统一事业，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我国南沙群岛的多数岛屿已被他国占去，我国渔民被菲律宾肆意扣押而得不到有效保护。美、日也有改变对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中立立场的动向。

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行动使新的军事技术革命已露出端倪，向电子信息化、精确制导化、隐形化、高速化方向发展。暴露了我国军事装备与发达国家之间新的差距。面对与80年代不同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我们发现大部分经济设施，也是最发达的部分均分布在离海岸线只有200公里宽的地带内，这里没有防御纵深，甚至是不设防的，我国陆海空中海军至今都是最弱的防御力量，使

我国经济的精华部分暴露在潜在侵略者很容易攻击的状态下。

有所恶化的形势对我国是一种挑战。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重申了初级阶段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针对国防建设，他指出，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勤俭建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国家建设；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3年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要重视科技强军，加强国防科技研究，逐步更新武器装备；加强教育训练，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加强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在其他场合，他还明确指出过，在军事斗争准备上，实现由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事建设上，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关于国防装备发展，江泽民多次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差距，需要赶的东西很多，这就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面面俱到；必须抓住关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重点突破。对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指出，立足于防卫是中国发展武器装备的一条重要原则；要坚持科技先行，跟踪世界上高科技的最新发展，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技术，使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提高，形成自己的“撒手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发展路子。

讨 论 题

1. 如何理解“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2.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须排除哪些干扰？
3. 你认为目前的国防力量能否保证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

关于航空母舰的话题社会上已议论多时，一部分公民还为此捐款，你认为

我国是否有必要、有能力建造和维持一支或数支航母战斗群？

五、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政党是如何丢失政权的

邓小平同志在 1992 年春天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左’的东西也有。”“左”和右都会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命运和经验教训充分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

自 1989 年开始，东欧六国局势先后发生急剧变化。波兰、匈牙利的变化经历了 7 个月，民主德国 70 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7 个星期；罗马尼亚只有 7 天。变化的性质是工人阶级政党丢失了政权，资本主义复辟。局势变化之快令世人震惊。苏联则在 1991 年 12 月 26 日宣告解体，同时原苏共被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下面作一简略回顾。

波兰 1980 年 7 月因政府宣布提高肉制品价格，引发罢工，社会局势持续动荡。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于 1981 年 12 月被迫宣布实行全国军管。军管主要是针对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团结工会成立于 1980 年秋天，全国 1300 万职工中有 1000 万人参与其中。统一工人党作为共产主义政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发展到针对全国绝大多数工人群众实行军管，令人费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肯定包含着一系列的政策失误。军管持续 1 年 4 个月，形势有所缓和，以为局势控制住了。实际上团结工会仍在继续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秘密地为团结工会出钱、出宣传工具，出谋划策，挑动团结工会与党和政府的矛盾和对立。军管并未解决社

会矛盾。到1988年，统一工人党经过党内民主讨论，认为对工人群众实行压制的办法不妥，同时反对派继续施加压力，于是就提出召开“圆桌会议”，想和反对派协商一个拯救国家的办法。原设想使团结工会成为一个拥护统一工人党领导的“建设性的反对派”。1989年1月进而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并在4月份与团结工会达成了协议。可是到1989年6月开始选举以后，情况就变了。团结工会并不拥护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而是步步紧逼，把统一工人党赶下台，取而代之，在8月份组成了以团结工会机关报《团结周刊》总编辑为总理的政府。

匈牙利于1989年1月决定转向多党制，七八月间，在议会补选中，共产党候选人落选，反对派民主论坛的候选人当选。

民主德国1989年10月间爆发群众示威游行，昂纳克被解除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到12月间，由自由民主党主席格拉赫担任国家元首。

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1月17日首都布拉格爆发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并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11月24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被迫全体辞职。捷共同意实行多党制，12月5日改组政府，共产党人成为少数派。12月29日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一致选举“公民论坛”发起人哈维尔为总统。

保加利亚1989年11月也出现社会动乱，10月底到11月初，首都索非亚持不同政见组织多次举行示威。11月10日保共中央全会决定解除日夫科夫的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12月13日进而开除日夫科夫父子等人的党籍。保共同意实行多党制，12月26日同意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为反对派夺取政权打开了缺口。1990年1月保共决定成立多党联合政府，4月改名为社会党，6月举行大选，组成以社会党为首的联合政府。1991年10月第二次大选，民主力量联盟获胜，社会党最终失去政权。

上述5国在改革中，共产党同意实行多党制是走向失败的重

要关口。

罗马尼亚是东欧惟一坚持不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维护旧的经济体制，也不同意多党制，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但国内经济出现困难，状况很糟，引起人民群众不满。在东欧其他几国社会动乱的冲击下，1989年12月下旬，群众也走上街头。罗共总书记、总统齐奥塞斯库认为是蒂米什瓦拉由于匈牙利族人集中地区，是匈牙利煽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人上街，是外国人挑动的，于是他派了4个政治局委员去那里，抓外国插手者。但是动乱很快波及到首都布加勒斯特。这时齐奥塞斯库正出访伊朗，他急忙赶回国内，动用内务部队试图平息动乱，但军队发生哗变。齐奥塞斯库夫妇于12月22日在出逃外地途中被捕，25日即被枪决。12月26日选举产生救国阵线政府，罗马尼亚从此也转向多党制，罗共不复存在。

南斯拉夫1990年也开始出现变化。1月间，南共联盟十四大不欢而散。南斯拉夫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联邦，由6个自治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构成。这时各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联盟纷纷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都主张实行多党制。最终导致南斯拉夫四分五裂，战乱不已。

东欧的剧变与苏联的影响关系十分密切。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西方一味退让，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任由西方反共势力对东欧局势发生影响，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发表后，向西方作出原则让步，在东欧严峻的社会局面出现后，未对东欧各国共产党予以支持，反而对其施加巨大压力，导致东欧各国共产党先后失去政权，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东欧出现剧变后，随即又反馈到苏联。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终解体。苏联的解体与戈尔巴乔夫的错误理论、指导思想和政策有关。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54岁时开始担任苏共总书记。他领导的苏联6年多改革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3月～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

前。戈氏上台后，看到了世界新的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态势，想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以图取得科技优势。这三年，他领导的改革着重抓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加速发展战略。改革中，仍仅限于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补，对中国 1984 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路持批评态度。公布了《合作社法》、《个体劳动者法》等几个改革法律。可是经济体制改革遇到来自党内干部的阻力，干部中思想僵化。改革措施并未奏效，未能根本扭转苏联经济停滞的态势，苏联历史上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风光不再，不但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前动作迟缓而输给西方国家，而且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长期优势也丧失掉了。其间，于 1987 年末首先在西方，然后在苏联出版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书中提出要与西方共同建立“欧洲大厦”，“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口号，贬低阶级斗争学说，向西方作原则让步，以图取得西方对其国内改革的支持。该书出版后引起西方国家的惊喜，博得一片喝彩声。在国内则大批撤换干部，从中央到地方撤换了 80% 左右的干部。此后，苏联改革的重点和方向逐渐发生变化，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第二阶段，1988 年的苏共第 19 次代表大会至 1990 年初。在这次会议上戈氏第一次明确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改革的理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展的原因是党内和干部的阻力太大，进而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戈氏干脆甩开党中央，提出全部政权重归苏维埃，要把苏维埃变成西方议会式的机构，搞“公开性”和“民主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进而发展到批判列宁主义，开始全盘否定苏共自十月革命后的所作所为，把苏共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自己砸自己的招牌。

第三阶段，开始于 1990 年苏共中央 2 月全会。在东欧局势剧变的影响下，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转向西方的多党制和总统制，此后，戈氏自任苏联总统。各种各样的与苏共对抗的党派和政治组织纷纷出笼，至1990年8月1日，苏联当局所称的“非正式社会团体”已达9万多个，其中全国性政党约26个，加盟共和国一级的政党500多个，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就被取缔的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也死灰复燃。各种政治组织公开鼓吹反共、反社会主义论调；苏共党内也派别林立，使苏共处在党内外的两面夹攻之中，思想搞乱了，人心搅散了，党搞分裂了，从而使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了。苏联是一个有15个加盟共和国、100多个民族组成的联盟，失去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苏共的领导地位遭到了严重削弱，中央政府已无力对各加盟共和国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民族主义情绪也泛滥起来，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助长了各民族的分立活动。从1990年春天起苏共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等重要城市先后失去执政地位。立陶宛于3月间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即跟上。至此，苏联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1991年3月17日就签订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举行了全民公决，其中主张维护联盟的票数占76.4%，但有6个加盟共和国反对、抵制了全民公决。

第四阶段是从“8·19”事件之后至苏联解体。原定于1991年8月20日由各共和国签署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以维护摇摇欲坠的联盟。这时，包括副总统、国防部长、安全情报部门负责人在内的8个政府领导人担心这个新的联盟条约的签订会进一步导致苏联解体，竟于8月19日趁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外地休养之际在莫斯科宣布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发布了停止阻碍局势正常化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活动、禁止集会和游行等命令。但是该委员会并未采取什么足够有效的措施，只存在60个小时就被摧毁。此后，戈尔巴乔夫总统实际已被架空，联盟最大主体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却发挥主要

的政治影响（摧毁紧急状态委员会有功）。在全民公决中赞成维护联盟的各族群众本来占多数，但是，“8·19”事件后，由于担心又恢复到过去那样高度集权的旧体制，反而转向分立、独立，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层有的出于维护本民族利益，有的出于维护个人权势的考虑，也都纷纷主张独立。戈尔巴乔夫在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情绪面前又进一步退却。8月21日，他从休养地回到莫斯科时，还谎称自己是“坚决信仰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表示不能把苏共“看成一支反动的力量”。可是，在他启动、纵容、姑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和声音已成气候的情况下，他的话还有谁听！右翼势力上台后担心共产党东山再起，竟将苏共置于死地。8月22日，莫斯科市长擅自下令停止苏共莫斯科市委和各区委的活动；23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擅自下令停止俄共活动。戈尔巴乔夫不但未与这些行为作斗争，反而紧随其后，于24日以苏共中央“未能坚决反对‘8·19’事件”、“未能站在谴责和坚决抵制的坚定立场上”为理由，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超出党内矛盾、斗争的范畴，站在右翼反共立场上，擅自宣布苏共中央应作出“自行解散的决定”，还以总统身份宣布禁止苏共在军队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25日苏共被迫解散。亡党更加速了亡国。12月21日，前苏联的11个主权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市以独立国家创立者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其他几个主权国家未加入。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局外人，他这个靠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走上权力巅峰的人被迫于12月25日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其实这时“苏联”已不存在了），26日苏联正式宣告解体，在克里姆林宫飘扬了数10年的苏联国旗悲戚地缓缓降下。取代苏联的是一个松散的独联体，无多少实质内容。此后在各独立国家内执政的是各式各样的政党。前苏联时期的共产党不复存在，虽然新成立了一些共产主义政党，但力量较弱。各独立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在有的地区

还发生内战。独联体国家一致同意由俄罗斯继承前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还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在东欧局势剧变发生后，就已无奈地宣布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但与之对抗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组织却拒绝解散，相反，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它要东扩，将原华约的东欧成员国纳入其中，并且，企图将自己的势力插入某些独联体成员国。原来天真地以为只要打倒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投向西方，就成为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朋友、伙伴，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却步步紧逼，毫不留情，继续削弱它的战略空间，俄罗斯被迫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在稳定与西方的关系的同时，重视发展与中、印的关系。

东欧和苏联剧变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有：

第一，旧的体制僵化。传统体制曾带来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和 50 年代高速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还曾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领先于西方，如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等。但后来这个体制逐渐暴露出其潜在弱点，未能及时革新，导致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停滞，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前期，还在批评我国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思想保守。

第二，在指导思想长期搞教条主义。

第三，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思想和方向不对头。经济改革措施没有效果，然后匆忙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给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整个改革实际上未能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转移了社会的注意力。

第四，在思想文化领域放松、削弱甚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任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造成思想理论上极度混乱。

第五，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以完善、巩固党的领导为导向，而是盲目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对西方的那套制度的实质发生错误的认识，启动了各利益集团的狂妄野心，造成政局动荡。

第六，政治体制改革不注意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长期以来高度集权，领导职务终身制，少数几个人说了算，使基层群众失去了信心。面对右翼势力的进攻和党内的错误决策，基层党员和群众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虽然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每天都收到如雪片般飞来的由坚持正确立场的党员、群众发来的信件，但不起任何作用，一个有近百年历史而又组织严密的党顷刻间瓦解。

第七，后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到市场经济。虽然改革的目标也是搞市场经济，但改革方案是请美国银行家设计的，采取私有化和激进的“休克疗法”。暂且不谈私有制和公有制谁优谁劣，仅就其在多年改革未带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就进行如此剧烈的改革来说，必定带来社会经济利益关系急剧的大调整；原东欧苏联的“经互会”的瓦解和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立刻打乱、割裂了几十年来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纽带，导致社会动荡加剧和经济急剧滑坡。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在苏联解体后下降了一半，卢布币值一贬再贬，依赖西方的一次次经济援助度日。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是俄罗斯经济持续下滑的年代。

第八，对西方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和平演变战略缺乏清醒的认识。对西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和其分化瓦解竞争对手的意图也没有清醒的认识，首先自乱阵脚。

第九，未摆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落入与西方军备竞赛的陷阱，长期的军备竞赛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人民生活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第十，未能科学公正地评价苏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斯大林，而是一味地对其泼脏水，向其发难，扰乱人们思想，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理性，迷失了方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本来靠其《改革与新

思维》的稿费、诺贝尔和平奖、到国外演讲所获酬劳还可使基金会维持下去，无奈在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中他存在银行的美元因其破产倒闭而血本无归，1999年其妻赖莎身患白血病无钱医治。戈氏携妻赴德国就医，不久，其妻在德国医院病逝。在德期间，得到德国卸任总理科尔和现任总理施罗德热情关怀。

讨 论 题

1. 如何完善、巩固、发展社会主义？
2. 你从苏联东欧剧变中得到哪些启示？
3. 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时曾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谈谈你对这段话的认识。

六、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有多高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论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时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一个“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发生了多大变化，目前的市场化程度到底有多高？这里介绍一个理论界对此问题研究的成果。此项研究对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首先对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然后按经济体制的主要构成部分即企业、政府、市场三个大的层面11个领域进行测度。

（一）对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的测度

总体市场化的测度可以有不同的思路，为了防止片面性可采用五种思路进行测算。（1）“社会总产值流量构成加权”市场化，即以社会总产值流量的构成作为权数来测算总体市场化程度。（2）“投入要素价格几何加权”市场化，即以生产函数中各投入

要素指数作为权数来测算市场化程度。(3)“三次产业构成加权”市场化。(4)“GNP 构成综合加权”市场化。(5)“市场参数简单平均”市场化，即以各类市场的价格参数的平均数来反映市场化程度。

用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测度了 1979、1985、1988、1990、1992、1994、1997 各年的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其结果如表 2-6：

表 2-6

年份	社会总产值 流量构成 加权市场化	投入要素 价格几何 加权市场化	三次产业 构成加权 市场化	GNP 构成 综合加权 市场化	市场参数简 单平均市场 化
1979(估计值)	1.4	4.4	4.7	0.2	3.12(2.09)
1985	20.8	23.9	35.4	12.7	20.1(16)
1988	33.4	36.1	44.5	27.5	—
1990	32.4	33.3	45.1	25.1	37.4(29.6)
1992	53.9	54.7	55.0	51.0	—
1994	59.0	59.4	60.0	57.3	62.8(49.4)
1997(预测值)	62.5	62.8	64.9	61.4	68.0(55)

注：括号内数据为除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之外，还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四个市场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用 5 个方面的资料从不同角度进行测度的结果差别并不大，说明测度对研究思路及测度方法和资料不是特别敏感，说明其结果是可靠的。1997 年我国经济总体上的市场化程度在 60% 以上。

(二) 从三大层面对 11 个领域的测度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企业的各项自主权是否落实，经营体制、企业家的选择机制是否改变，所有制形式的自主选择等都是衡量企业体制市场化的重要标志。

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者。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从直接生产领域退出，转移到宏观调控层次；多大程度上放弃直接的行政干预，而采用间接的经济手段；政府对宏观控制的时机和艺术的掌握，以及政府机构和官员的精简程度等，都是测度政府行为为适应市场化的重要标志。

市场是企业的运行环境及宏观引导信息的载体。市场包括像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这样的商品市场和劳动、资金、外汇、房地产、技术等要素市场。这些市场的价格、价格形成机制、管理体制等的改革程度，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

农业部门主要考察农民、农户投入产出商品化，农村非农产业以及农民进城从业的比重，以及农村社会服务商品化和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比重。

工业部门主要考察工业有效劳动就业率、工业产品产销率、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比重、企业服务的社会化程度等。

外贸领域主要考察经营主体自主对外程度、汇率市场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下降幅度、外贸依存度的提高等。

各主要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变动趋势如表 2-7：

表 2-7

年份	1979	1985	1988	1990	1992	1994	1997
工商企业	0	—	23	15	25	39.6	48.0 *
政府行为	4	—	63.3	62.2	66.6	72 *	72 *
商品市场	2.25	—	60	54.5	84.7	85.9	85.0 *
劳动力市场	3.24	24.2	—	34.7	—	—	65.0 *
金融市场	1.0	3.6	—	6.3	—	—	10.0 *

续表 2-7

年份	1979	1985	1988	1990	1992	1994	1997
房地产市场	0	—	27.8	22.8	21.9	38.2	40.0 *
技术市场	0	46.3	—	54.1	—	—	71.0
农业	7.67	49.7	53.9	51.6	50.5	64.7	66.0 *
工业	0	23.5	32.1	—	—	48.4	50.0 *
外贸	1.5	9.0	19.0	—	—	—	54.4 *
地区差别 1996	东部地区 70.3(56.8)	中部地区 64.4(52.1)	西部地区 64.9(52.5)	北部地区 66.4(53.7)	南部地区 67.9(54.9)		

注：①“*”表示估计值。②地区差别以不同的权数测度可得出不同的数据：这里选择了最高和最低的两组，括号内为最低一组。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研究所谷书堂基金资助的1996年课题《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的11个子报告。

测度结果表明，1997年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达85%，最低的是金融市场领域。从发展趋势来看，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显著的实质性的进展。

讨 论 题

1. 联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谈谈进一步提高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意义。

2. 你认为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多高合适？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面临哪些困难？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台阶式发展战略，该发展战略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三步走”的台阶式发展战略，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是大力发展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着力加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争取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加快科技进步的关键是要有一大批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而这又依赖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罗斯福“新政”

“新政”是1932年罗斯福参加总统竞选时提出的政策纲领，其目的是想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结束1929年末经济大危机以来的混乱状况，使美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从1929年10月下旬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受到严重打击。在美国，从1929年到1933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下降了50%以上，工业生产降低了46.2%，进出口贸易减少了75%左右，工商企业倒闭

86500 多家，失业人数占当时工作人员的 $\frac{1}{3}$ ；由于公众对银行失去了信任，挤兑风潮遍及全国，有 10500 家银行破产，占全国银行总数的 49%；整个证券市场大崩溃，从 1929 年 9 月到 1933 年 7 月，道琼斯指数下降了 80% 以上，股票市场股价总共损失了 740 亿美元，约损失了 $\frac{5}{6}$ 。整个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和瘫痪状态。

为了对付严重的经济困境和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罗斯福总统在 1933 年 3 月初就职后要求国会授予他“紧急全权”，并宣布执行“新政”，声称“新政”可将国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自此“新政”在美国紧锣密鼓地推行。

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不仅是一种反萧条措施，而且涉及对现行制度的改革。“新政”的内容主要有：

（一）对银行制度和币制进行改革

银行信贷体制的崩溃和国库黄金储备的急剧减少，是当时经济危机暴露出来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此，罗斯福总统上任伊始就对银行制度和币制进行改革，先后通过了《紧急银行救济法》、《存款保险法》和《1933 年银行法》，遏制各银行因挤兑而出现的普遍倒闭风潮，恢复储户对银行的信任，加强了政府对银行的集中管理，充实了国库的黄金储备。“新政”的银行政策恢复了整个银行的信贷体系。

（二）颁布《农业调整法》和一些农贷法令

“新政”中改革农业的主要立法是《农业调整法》，其实施办法是实行减产，缩减耕地面积，农民减产的损失由国家通过征收加工税给予补贴。此外，农业信贷也是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许多农民苦于资金缺乏，有不少困在债务中不能自拔的状况，罗斯福总统通过颁布《紧急农业抵押放款法》、《农业信用法》、《农作物收获贷款法》和《农产抵押取赎法》等法令，给农民低利信用贷款，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给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三）颁布工业复兴计划及其措施

1933年6月16日国会通过了《全国工业复兴法》。它的目的是为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取缔企业间的不良竞争，使现有工业生产力得到充分利用。《全国工业复兴法》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现行制度下对工业进行改组和改造，意在保持小企业的竞争，防止大企业的垄断，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它要求各工商企业拟订“公平竞争业规”，接受法规的约束，让雇工团体实行集体谈判，雇主必须定出工人最长的工作时间与最低限度的工资，以使企业劳工与政府打成一片。第二部分是“公共工程与建设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贯彻“以工代赈”的方针，使闲散的工人得以就业而无需增加政府负担，并使大规模的建设计划得以实施。公共工程主要有公路、公园的建设和修理，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等。联帮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支出一般占到联邦的10%以上，“新政”的公共工程中最大的一项是対落后地区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通过开发，使得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和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田纳西流域的各项事业很快兴旺起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

（四）实行紧急失业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经济危机中，庞大的劳动力失业大军严重地威胁到美国的社会稳定。为了救济失业者和维持社会稳定，罗斯福政府先后制订了一连串的法案，如1933年3月31日通过的《失业救济法》，6月6日通过的《全国就业服务法》等。通过这些法案和举办公共工程，一方面对失业人员实行临时性的救济工作；另一方面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解决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提高受惠者的自尊心。此外，罗斯福政府于1935年8月14日颁布了《社会保障法》，这是“新政”中的重要立法之一，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立法。它使老、幼、病、残疾失业者得以解除生活的顾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力地扩大了消费需求，而且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一张安全网，对克服以后的经济危

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在使用和完善之中。

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把美国从深渊中挽救过来，在缓和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和减少失业人数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当时走投无路的美国经济开辟了一条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来摆脱危机的出路。

讨 论 题

1. 罗斯福“新政”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有哪些启示？
2. 假如没有罗斯福“新政”，美国将何去何从？
3. 政府在反经济萧条中的作用是什么？

二、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决策的背景

199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1998年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199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工作和需要把握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作为需要把握好的四个重大问题之一；明确指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我国为什么这样重视扩大内需？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国虽各有不尽相同的内部原因和直接导火索，但这场危机持续化并向全球蔓延，大大超过了人们早先的预料，有其深刻的共同的国际经济背景。一是世界经济多年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激化，从初级产品到汽车之类复杂技术产品以及半导体芯片，几乎所有成熟技术制造业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在实质经济领域缺乏强有力的新增长点 and 利润增长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兴起，虽然促成了美国在本次经济周期中长达80多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但高新技术

产业目前大约只占美国经济总产出的 1/5 强，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仅 5% 左右，尚不足以扭转世界经济由于结构性矛盾突出导致增长速度的放慢、市场需求不振的总趋势。即使是美国经济，也开始呈现经济增长放慢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宏观政策失误或金融监管不严不力，就可能由于无法收回投资形成银行呆账坏账，或出现大量资金流向投机性很强的股市、房地产等领域形成泡沫经济，从而埋下金融危机的祸根。一旦金融危机爆发，难免要由货币、信用危机演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并且很难在短期内平息危机和实现经济复苏。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大规模的金融资本在国际间迅速流动，虚拟经济与实际经济运动严重脱节，大大增加了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各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现在许多国家都呼吁要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管，但由于解决各国之间复杂的利益矛盾决非易事，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突破，这就使国际金融动荡很难根本平息。由于存在这种国际经济背景，仍不能排除在某个国家再次突发震撼全球的金融风暴。可以说，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调整时期。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的经济都会处在相当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在这种背景下，立足于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就更为必要。

其次，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所在。总需求中以国内需求为主体是大国经济的重要特点。美国是世界上出口最多的国家，但其出口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左右，比我国经济目前对出口的依存度还低 8 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基础设施到制造业、服务业，在满足人们吃、穿、用、住、行、教、医、娱、游等消费量的增长尤其是质的提高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快速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外资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

个优势，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另外，我国与那些国内市场狭窄，过分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同，当国际市场环境不利时，我国仍可凭借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减轻国际经济风险的影响。同时，我国目前社会总储蓄率高达40%左右，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30%以上的高储蓄率。中国经济发展虽然需要积极利用外资，但全国投资资金的80%以上来源于国内储蓄，而不是靠借外债来扩大国内需求。

第三，经济增长是需求和供给双向作用，相互转化的结果。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日益深化和“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机制明显强化，宏观调控的需求管理也必须由主要着眼于防止需求膨胀转向于促进需求适度增长，同时警惕可能出现需求过度扩张。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不适应居民消费转型升级带来整个需求层次提高和国内外市场竞争形势变化的要求，已成为制约有效需求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但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一定的需求条件。尤其是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加以培育的新兴产业，在其成长期更离不开相当规模的市场需求的支持。

讨 论 题

1. 为什么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的战略方针？
2. 你认为当前我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扩大国内需求？
3.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表现主要有哪些？应该怎样调整？

三、从数字看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

地区发展中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是经济发展的世界性难题。这一现象目前在我国也比较明显：建国后一度缩小的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由于东部发展得比中西部地区更快，如今又扩大了。缩小这一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我国跨世纪的话题。

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指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等 12 个省、市、区。中部地区指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 9 个省区。西部地区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 10 个省、市、区。

新中国成立以前，占国土面积不到 14% 的东部却拥有 70% 以上的工业和铁路、公路；国土面积数倍于东部的西部，除了重庆有一点近代工业以外，其余广大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近代工业。建国后，中央实施缩小东西部差距的经济政策，使东西部的差距逐渐拉近。从新中国成立起至 1978 年的 30 年间，以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部、中部、西部之比为 7.08:6.7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 0.44 个百分点。这种速度差的积累，使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步缩小。到 1978 年，东西部的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已缩小到 190 元。但是，从 1979 年开始，东部地区或以中央所给予的特殊政策，或以自身的区位优势，或以雄厚的工业基础而取得超常规的发展，1979 年至 1995 年的 17 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9.8%，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比为 12.8:9.3: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 4.1 个百分点。这种速度差的积累，使建国后一度缩小的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58260.5 亿元，其中东部地区为 33615.4 亿元，中部地区为 15867.6 亿元，西部地区为 8149.7 亿元。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比为 57.7:27.2:14，东部是西部的 4.12 倍。

1995 年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为 4754 元，其中：东部地区为 6860 元，中部地区为 3553 元，西部地区为 2850 元，东部是西部地区的 2.41 倍。

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1980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91.33 元，东部、中部、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 1.39:1.11:1。1991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708.5 元，东部、中部、西部之比为 1.71:1.26:1。1996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926 元，东部、中部、西部之比为 1.98:1.37:1。目前，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约 40% 来自乡镇企业，沿海发达地区已占 80% 以上，而西部地区不足 8%。

到 1998 年底，我国还有 4200 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有 90% 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迄今为止，我国经济是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在投资方面是向东倾斜。从 1982 年至 1995 年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及贷款，东部、中部、西部大体保持在 56:29:15 的范围内，个别年度有所变化，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21.7%、16.1% 和 18.28%。从全国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985 年为 2543 亿元，1990 年为 4449 亿元，1995 年为 19445 亿元，1996 年为 22974 亿元，11 年增长了 9.03 倍。1995 年的投资量中，有 62.68% 是东部地区完成的，西部地区仅占 16.13%。以 1995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5 年全国人均投资 1607 元，而东部地区为 2835 元，中部地区为 877 元，西部地区为 770 元。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 3.68 倍。按投资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国家投资东部是西部的 3.8 倍；集体投资是 9.27 倍；个体投资是 3.74 倍；外资投资是

18.9 倍！这种全社会投资严重向东部倾斜的情况，是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讨 论 题

1. 如何看待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2. 你认为中西部地区应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实现加快发展、缩小差距的目标？
3. 你认为国家在扶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措施？

四、中西部经济强县——泽州

一提起中西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觉得那里经济发展缓慢、水平较低，但在山西有个泽州县却不同凡响，这里的乡镇企业总产值连续 5 年在全省夺魁，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纯收入位居全省 10 强之列，而且它还进入了山西省首批小康县（市）之列。泽州县发展经济的思路，对广大中西部地区有深刻的启示。

（一）从打“资源牌”起步

泽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并非偶然。一方面它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及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与当地干部群众憋足一股劲，要在中西部经济舞台上创造一番辉煌业绩的决心分不开。

泽州县总面积 2023 平方公里，51 万人，煤炭储存量 32 亿吨，硫铁矿储量 1 亿吨，是一个资源大县。改革开放以来，泽州人凭借当地丰富的资源，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把以挖煤、冶炼为支柱的地方经济搞得红红火火。1992 年至 1997 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总收入以及财政收入，以年均 25.2%、35.4% 和 25.9% 的速度增长，已分别达到 38 亿元、85.5 亿元和 1.9 亿元。为泽州下一步的发展积累了比较雄厚的资金。

然而，在发展的背后，泽州县经济中却蕴含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突出表现为支柱产业单一，产品和产业初级化、粗放型、低水平发展问题严重，市场竞争力不强。但泽州人能正视这些问题，并在实践中知难而进。解决矛盾，这正是泽州人的难能可贵之处。

（二）找准实现经济二次腾飞的“起跳板”

发展经济离不开资源，但光靠挖煤、炼铁来发展经济，犹如走入一条“死胡同”，要不了多久就会走到尽头。

1995年，泽州新的县委、县政府班子组建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泽州经济带出发展的“死胡同”。他们深刻地认识到：靠打“资源牌”，泽州实现了经济腾飞的第一次跨越，而摆脱依赖资源的包袱，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则是这里实现经济二次腾飞和建设中西部经济强县目标的“起跳板”。他们从1995年开始，制定并实施了事关泽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的“541”战略，其中重中之重是产业结构大调整，果断地进行了战略大转移。

对于煤、铁等传统产业，他们重点在深加工和转化增值上下功夫，这里先后组建了10大铸造集团，扩大煤炭筛选规模，新上了风力洗煤、白煤炼焦等项目，仅此每年可增收2亿多元。他们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组建了一批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集团、大公司、大企业，像泽州饮料食品有限公司、钢岭地集团、晋宏、润华、雄华、通达等公司已成为全县的龙头企业，它们开发出的山楂奶、花生奶、香酥玉米片、麦高快餐、安华锁等名牌产品，已享誉全国。

为了让高科技落户于中西部的泽州县，1995年，县委、县政府组织了6批人员到中国科学院取经。此后，他们到电子工业部洽谈多媒体电脑项目；到国家乡镇企业局洽谈煤炭深加工项目；与美国一家公司洽谈玉米深加工项目。就这样，东四义彩印厂、大箕活性炭厂等一大批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兴企业出现在泽州

大地。在泽州县的水东乡，人们还可以看到从以色列引进的无公害蔬菜温室中生产的西红柿，这种西红柿种子的价格高达每克140元，比黄金还贵，但这种西红柿的单株产量为50公斤以上，按每公斤1元计算，单株收益在50元以上。农民们种上这种西红柿，体会到了科学带来的巨大价值。

泽州人站在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建设中西部经济强县的高度，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并形成了泽州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创造文明新形象

当物质文明上了新台阶后，泽州人格外感到精神文明的重要，他们提出：要做到“精神与物质同富，经济与文化共荣，小康与健康并举”。在“文化卫生年”活动中，为了根治脏、乱、差，清理“三堆”、“六乱”，全县共投工40多万个，动用各种机械5000余台，清理垃圾、煤堆、土堆40多万立方米，栽种风景树4.3万株，开铺草坪3200平方米，使县容、村貌和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大力抓好环境治理的同时，泽州县文化建设也一并上马。“文化卫生年”确定的文化繁荣“4321工程”，使全县乡村日常文化活动场所得以巩固，不少已停止活动多年的文化场所现在又开门了，重新热闹起来。县文化馆组织的文艺轻骑下乡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过去泽州“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的局面已成为历史。

泽州县两个文明建设双获丰收，加快了这里传统农民向现代人转变的步伐。淳朴善良的泽州人用双手建起了一个现代化农村，泽州县也一步步从一个资源大县发展成中西部闻名的经济强县。

讨 论 题

1. 你认为泽州县发展经济的思路，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启示？

2. 假如你是一位县长，你所在县是一个农业大县，资源相当贫乏，只有“稻谷加稻草”，你如何调整该县的结构，加快经济发展呢？

五、多彩农业竞风流

湖北大冶市是我国著名的“矿冶之乡”，这里 84 万人口中，85% 在农村。让农民早日致富，是当地党委、政府多年的夙愿。从 1995 年起，大冶市积极推行多彩农业，不仅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农民奔小康的步伐也大大加快。

过去，大冶市农业产品以粮棉油为主，当地经济走的是一条就农业抓农业的路子。这样做，一方面不利于农业与大市场对接，以致出现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不进行农产品深加工，以粮棉油为最终产品也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要求农业不能是弱质产业，现代化农业更呼唤走集约经营的路子。

1995 年下半年，大冶市委、市政府从本地山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出发，利用这里碧水、青山和黄土地，大力开发多姿多彩的农业。他们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建立农村经济的龙头，发展规模经营，以“龙头”带基地，以基地带农户，形成各具特色的“龙”型经济，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向农业强市迈进。

经过一次次市场调研，请了一批批专家论证，这里确定了螃蟹、甲鱼、饲料、生猪、家禽、蔬菜、精制茶、杂果、优质粮油等 13 个亿元工程。1998 年，螃蟹、鲜鱼、生猪、家禽、优质稻、蔬菜等 6 个亿元工程在全市范围已全面启动。大冶市湖泊众多，其中湖岸线 30 公里的保安湖，水质优良，是全国四大无污染水草型湖泊之一。按照“公司 + 农户”的模式，他们以保安湖水产开发公司为龙头，联合了周围各国有渔场、水产乡镇、沿湖村庄，建起了 16 个螃蟹养殖基地，形成国有、集体、个体一起

上的生产格局，并成立了“大冶市螃蟹集团公司”，实行生产、加工和销售一条龙。1998年，这里共投放良种蟹苗1200万只，到11月份已收获螃蟹20万公斤。这些螃蟹畅销武汉、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并出口到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实现产值3200多万元。

东风农场，过去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集体农场，这里优良的水质适合进行大面积养殖，市委、市政府看准这一点后，因势利导，成立了“东风水产开发试验区”，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建成精养鱼池667公顷（即1万亩），承包给农场工人经营，并搞起了鱼种孵化、饲料加工等综合开发。这里已成为湖北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基地。类似这样的农业基地还有很多。比如，以金牛镇高河乡为龙头建起的10处优质稻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达2万公顷（即30万亩），年收优质稻谷1.5亿公斤，实现产值2.8亿元；以东风、东岳两街道办事处为龙头的16处蔬菜基地，全年复播面积0.82万公顷（即12.3万亩），每年有1亿公斤蔬菜上市，可实现产值1.2亿元。规模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大冶市1998年水产品总量已达3.13万吨，渔业总产值达1.8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2.3%，使湖区及临近乡镇的6万人脱贫致富。

大冶市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不过两年，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规模、见效益呢？市委书记马清明的一席话解开了这个谜：发展彩色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其中需要政府的拉动，需要良好的环境和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一句话，要实施“四个到位”：

领导到位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保证。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各分管农业的领导为副组长，各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农业产业化协调领导小组”，对龙头工程的建设实行了亿元工程领导责任制，每个工程，由一名市领导挂帅，一个职能部门总负责，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政策到位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条件。为了鼓励各部门和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建设，大冶市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允许国有、集体、私营进行合作；可打破行业隶属关系的界限，实行行业间的合作；可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允许市内市外合作；对农民自费开发荒山、荒滩免交集体提留，等等。

科技到位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动力。离开科技，农业产业化是很难上水平、见效益的。大冶市采取了鼓励科技部门、科技人员下乡和下场搞技术承包和技术服务，开展多层次、多种类型技术培训等措施，全面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青年、农户当家人的科技文化素质。

服务到位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大冶市委、市政府要求市直部门根据自身职能，提供服务，对农户发展生产，为农产品进入市场给予全力支持。同时，还创造条件建设一批市场，为农产品销售提供必要的渠道。如今大冶已建起了8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农贸市场。

讨 论 题

1. 湖北大冶的做法对你有哪些启示？
2. 农业要实行产业化经营，在具体操作上，应着重抓好哪些环节？
3. 我国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有哪些？

六、科技长一分，市场拓千里 ——苏南乡镇企业从草根长成大树

在江阴、常熟、锡山市交界处的偏僻农村，有一家门面不大的乡下工厂，门口挂着“港下镇晶石集团公司”的牌子，看上去实在有点“其貌不扬”。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大的高压包生产厂

家，其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巴西、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家，为许多著名企业如飞利浦、松下、夏普、日立、康佳等生产的彩电配套。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厂还是我国生产氨基酸的龙头企业，填补国内空白的异亮氨基酸有一大半是从这儿生产的。从1995年以来，这个厂的销售收入平均每年以30%的幅度递增。集团董事长冯建湘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厂大发展的奥秘：科技长一分，市场拓千里。

晶石集团是苏南乡镇企业的一个代表。在太湖之滨这一片被称为“乡镇企业王国”的土地上，几乎每一个乡镇都能拿出几样令人刮目相看的高新技术产品。经济学家们认为，苏南乡镇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已进入了以技术改造和科技进步为主旋律的新阶段。曾被称为草根经济的乡镇企业新的市场环境下如何长成参天大树，苏南乡企以科技进步赢得竞争的主动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一）从“四千四万”转向以科技进步为主旋律的新创业

20世纪90年代以前，苏南乡镇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众所周知的“四千四万”精神，这就是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凭着这种创业精神，他们走出了一条“上规模，增效益”，发展乡镇工业的成功之路。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苏南乡镇企业原有的市场不断缩小。面对严峻的现实和新的矛盾，苏南人逐渐认识到：当前的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科技竞争。谁在科技上领先一步，谁就在市场竞争中争得主动；不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纵然有“四千四万”，也不可能促进经济大发展。

觉醒较早的锡山市在苏南率先确定了“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围绕这个方针，全市形成了四大管理网络，以市、镇科技部门为主的科技管理网络，以民办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科技开发网络，以市、镇科协为主的科技咨询网络，以市、镇专业公司为主体的科技服务网络。全市33个

镇都建立了科技办公室。

这以后，苏南其他各市也像锡山市那样。纷纷建立起各级科技管理网络，使乡镇企业的科技进步在组织上得到了保证。

（二）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在工业产值中已过半

“产品靠城市脱壳，设备靠大厂淘汰”，这曾经是苏南乡镇企业起家的秘诀。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产品靠开发，设备靠引进”已成为众多乡镇企业自觉的行动。实践证明，采用先进设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档次的简便途径。从1991年以来的5年中，苏州、无锡、常州市的科技投入平均每年都在200亿元以上，工业投入的70%用于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新产品开发，设备投资中用于添置国内外先进设备的比重达到75%以上。

江阴市阳光集团从1991年以来，先后投入7亿多元，从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八个国家引进先进的箭杆织机、片梭织机、洗毛机以及后整理、测试中心、电脑配色等成套设备800多台套。使公司中90年代的国际先进设备占全部设备的70%以上。在这同时，还请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毛纺专家来厂现场指导。如今，阳光集团已成为我国毛纺行业中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企业，年产精毛纺呢绒1800万米，产品覆盖全国80%以上的大中城市，出口到西欧、日本、北美、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10大名牌西服生产厂家，有8家采用了“阳光”面料。

阳光集团的发展是苏南乡镇企业从“土”到“洋”的一个缩影。到目前为止，苏南乡镇企业中20世纪80年代的先进设备已占50%左右，90年代的设备占30%，70年代的老设备只占20%，新老设备之比已由70年代的2:8变成8:2。在锡山、江阴、常熟、张家港、武进等市，科技进步在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已超过了50%。

（三）从“借智登高”到自我开发，科技进步走入纵深

苏南乡镇企业，在其起家之初借用的科技人才绝大多数是城

市退休的老师傅和“星期天工程师”。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他们终于把注意力投向技术成果密集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精明的苏南人以“三请诸葛亮”的恭敬和热情，把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请到农村，为他们提供理想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科技成果以最快的速度变成发展生产力的宝贵财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苏锡常三市5万家乡镇企业已有1/3与全国上千所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协作关系。协作的形式从科研成果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发展到联合开发新产品和联合培养人才。

苏南乡镇企业这一规模宏大的“借智”工程，将城市和农村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城里的人才缺舞台，乡下的舞台缺人才”的局面，使乡镇企业做到了“才用八方，智纳百川”。锡山市东湖镇有个湖光电炉厂，起家之时，2000多名工人全是本乡本土的农民，没有一个技术人员，但是他们生产的大型电炉的质量却在全国遥遥领先。一个镇办厂何以有如此大的能耐？原来他们同国内16个科研所挂上了钩，这些科研所分别从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引进先进的电炉生产技术，湖光电炉厂便通过这些科研所，将各国先进技术的长处汇集起来。于是，德国电炉的经久耐用，意大利电炉的维修方便，日本电炉的外型美观，成本便宜，在此融于一体。

目前，苏锡常三市乡镇企业开发的技术含量较高的新产品，有一半以上是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多头联姻，发挥“杂交优势”的产物。“借别人的脑袋上水平”，为苏南经济发展闯出了一条捷径，但是苏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提出：也要靠自己的脑袋上水平。在苏锡常，随着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向纵深发展，一个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农村科研所正在勃然兴起。

据不完全统计，这种农民自办的科研机构，在苏南已有1000多个，其中80%以上是乡镇企业办的，15%左右是镇办或村办的，还有一小部分是乡村或企业与大专院校、城市科研单位

联办的。行业涉及机械、电子、化工、纺织、冶金、轻工、建材、生物、食品、医药、环保等。人员多则二三十人，少则七八人。大多经费充足，设备齐全。农村科研所研究的对象大多是一种技术，一个系列产品，也就是说生产什么就研究什么，什么厂就办什么研究所，从实践中提出研究课题，反过来又直接为生产服务。

我国西昌人造卫星发射底盘，受国防部通令嘉奖的人造卫星计算机存储器装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特种丝通讯电缆，乙烯裂解炉弯管等，都出自苏南农民自办的科研所。

据苏州市统计，全市乡镇企业已培养出一支 3 万多人的技术队伍。其中获得工程师职称的有 6000 多人。这一批技术人才，有 40% 以上经过农村科研所的培训。

讨 论 题

1. 我国农业粗放型增长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2. “苏南模式”对促进农业转变增长方式有何启示？
3. 你认为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主要应通过哪些方面来提高效益？

七、五粮液“五连冠”探秘

1998 年底，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企业信息交流中心联合举行的“1998 年全国市场产品竞争力调查”显示：五粮液在白酒类产品中获得了 1998 年消费者心目中的理想品牌、实际购买品牌和 1999 年购物首选品牌“三项第一”。这是五粮液品牌继 1995 年以来连续 4 年获此殊荣。与此同时，自 1994 年以来五粮液集团已连续 5 年稳居酒类规模效益之冠，利税连续 2 年超过 10 亿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酒业大王”。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五粮液集团只有两个品牌：五粮液和尖

庄。前者创造高附加值，后者仅仅是微利，价格悬殊几十倍。五粮液适合高层次的消费，尖庄适合普通的消费，两者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结构空间。因此，五粮液的巨额无形资产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研制开发不同价位的系列酒，抢占市场空间，这是五粮液集团调整产品结构的第一步。1995年，五粮液集团与福建邵武糖酒副食品总公司合作，共同开发一种既适合普通消费者又有一定档次的中档酒。当年，35度的五粮醇投放市场，实现产销1670吨，新增利税1000多万元。受此启发，1996年底，五粮液酒厂又开发出了中高档的五粮春，年创利税数千万元，迅速成为五粮液集团新的效益增长点。

五粮液产品结构调整的另一招，是开发适应不同区域消费群体的地方特色酒，如与北京市糖酒公司合作生产的京酒、主销西安的古都液、面向福建的闽台春酒、适合藏区的圣酒，等等。50多个品种、100多种规格的五粮液系列酒不仅覆盖了全国市场，走进了千家万户，还打入了国际市场。创汇1700多万美元。目前，五粮液集团正利用当地水果资源丰富、水质好等有利条件，计划投资上亿元，生产高质量的果酒、饮料、矿泉水、纯净水系列产品，进一步适应不同的消费需求，开拓国际国内新市场。

1998年4月，五粮液大型企业集团及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五粮液股票上市，10多亿元资本金的注入，现代企业机制的确立，为五粮液的资本运营和迅速扩张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投资2亿元新建的塑胶公司，采用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是国内目前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塑胶企业。这个公司的建立，不但替代了五粮液瓶盖的进口，每年节约上亿元的购买各种瓶盖的支出，而且还为五粮液集团培育了一个新经济支柱。

1998年兼并组建的精美印刷有限公司，通过五粮液集团的

人才、管理和资金注入，已建成为四川省目前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现代印刷企业。1998年，精美印刷有限公司实现利税3700多万元，名列四川省同行业前茅。

五粮液集团麾下的杰作还很多，集团公司的车队过去由企业养着，吃大锅饭，1993年与企业剥离后，成立汽车运输公司，不要集团一分钱补助，除完成集团的任务外，面向市场找货源，车队迅速成长壮大，1998年实现利税560万元。科研所成立10年，集团没投入资金，完全面向市场，依靠科技转化，先后自筹上千万元科研经费，为集团开发新产品和扩张提供技术保证，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随着近年的不断扩张裂变，五粮液集团已拥有16个子公司，涉及塑胶、药业、印刷、矿泉水、果酒、包装、饲料、运输、信息、服务咨询、商贸、科研、农牧等产业和产品。而今天的五粮液集团，已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联合舰队”。

五粮液“联合舰队”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的方式组建起来的，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旗舰”五粮液，是舰队的核心和灵魂，在五粮液极高的品牌声誉、质量保证、技术装备、管理水平带动下，发展了五粮春、五粮醇、京酒等系列“战舰”，这些品牌成功后，又扩展到塑胶、印刷、药业、农牧业等诸多“战舰”，这种辐射式的联合体拥有规模大、实力雄厚的优势，具有相当大的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发挥了 $1+1>2$ 的功效。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国内市场疲软的双重打击下，五粮液集团的产销和利润之所以能保持两位数增长，正是因为发挥了“联合舰队”的威力。

讨 论 题

1. 五粮液集团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何启示？
2. 假如你是五粮液集团的继任总裁，面对强手如林的环境，你将采取

何种手段使五粮液集团立于不败之地？

八、日本的科技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仅用 28 年时间就从一片废墟上崛起，由一个自称“二流半”的资本主义后进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被西方誉为“经济奇迹”。日本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在科技上采取了引进、模仿加改良的发展战略。这种大胆而务实的跳跃式技术发展战略，使日本培养了一支能干的科技队伍，迅速提高了科技水平并借助“跟进效应”后来居上，进而把日本的经济推向繁荣。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高技术的出现，日本的技术开发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虽然日本政府也早就把“技术立国”当作一项基本国策，但由于长期依赖技术“进口”，日本在基础研究和基础工业方面都落后于美、欧。走技术引进的道路，充其量只能达到二流水平，并势必在愈演愈烈的高技术竞争中被淘汰。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日本基于其“经济大国”和“资源小国”的尖锐矛盾，决心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制定并实施新的科技发展战略，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一）实行“科技立国”的新战略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致力于技术输出，开始放弃“贸易立国”而转向“科技立国”。“科技立国”的战略核心是要开发有独创性的科学技术，使日本以自己的力量为主，走在世界前列，以期实现 21 世纪的领先地位。

1. 逐年增加科研经费。日本在“科技立国”的战略方针下，用于科研与开发的经费明显增加。1983 年度日本科学技术研究经费达 71800 亿日元，超过了西德、法国、英国，与苏联相当，仅低于美国，占 GNP 的 2.58%。1984 年的《振兴科技基本政

策》中决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把研究与发展的投资由国民收入的3%提高到5%。日本在增加科研经费的同时，政府还通过不断增加振兴科学的补助金、提供贷款和减税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2. 加强基础研究。采取“吸收性战略”从引进入手，模仿与创新相结合，把实用技术开发作为发展整个科学技术的突破口，这符合日本战后的经济和科技形势，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长此以往，容易使人们产生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心理而轻视基础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和“自主技术”的开发。1984年的《振兴科技基本政策》中提出，要优先发展期待取得新发展的基础性和先导性科学技术的课题。1986年3月，内阁会议又通过了确定21世纪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方针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规定了发展可望取得新进展的7个基础性领头科技的重要领域。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日本通产省制定的《人体新领域研究计划》；科学技术厅制订的《人体地球科学计划》，它们被人们誉为可与美国星球大战、西欧尤里卡计划媲美的计划。

3. 推行“官、学、民协作”的科研体制。日本的科技体制中，除了政府一系列科研管理机构外，最基本的是国、公、私立研究机关、大学和民间企业。在这三股力量中，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科研机关主要从事应用研究，民间企业主要从事开发研究。

日本的科研体制长期以来是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民间企业拥有一支熟悉生产和市场需要、实际经验丰富、集团意识较强的技术开发队伍。特别是许多大企业拥有丰厚的研究资金，但在长远性、基础性的研究方面水平较低，积极性也较差。这与当前发展高技术的形势不相适应，为此，日本把“官、学、民”三位一体的科技体制作作为战略性方向加以推行。重点在于调整三股力量在科研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起到了平衡日本整个科研结构和

统一科研方向的作用，又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科技攻关的综合能力。

（二）坚持人才开发战略

人才开发战略就是发展教育事业。重视教育在日本是有传统的：自明治维新之后，重视科学、教育的思想就比较顺利地渗透于社会之中。战后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盛行的是：“教育投资论”，把教育看作经济投资，当作追求“经济效益”的手段。1983年来，中曾根首相在大选中就提出一套新的教育改革设想。这些年，日本正在进行第三次教育改革。其内容包括：

1. 教育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日本进行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展望21世纪，适应日本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培养有社会公德、有崇高理想、有健全体魄、个性多样化的创造型人才。为达此目的，日本于1984年提出“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五原则：国际化原则、自由化原则、多样化原则、信息化原则、重视人格的原则。

2. 增加教育投入。日本目前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更新设备，促进教育手段的现代化。目前，日本有78%的小学教室配有电视作教学手段。在社会教育方面，特别是企业内职工教育，教学手段也迅速得到更新。

3. 改革教育体制和内容。大学在体制上实行“产学协作”，直至“产学一体”，大学内设有技术开发中心；推行学部与研究生院连续一贯制；以培养高级技术人员和技术领导层人员为目标，重视培养学员具有作为领导者所必备的管理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社会科学等素质，同时注意把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结合，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

4. 实行“终身教育”。198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关于“终身教育”的咨询报告》，以“终身教育”为中心，全面论述了日本的教育体制问题及其改革。进一步明确把整个教育制度建立在“终生教育”的基础上。在这一战略目标下，社会教育占据重

要地位，而“企业内教育”则是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日本十分盛行。

（三）争夺高技术优势的“生存战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日本对发展高技术的热情高涨，普遍认为“没有高技术，就无法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在一系列发展高技术的长远规划中，以下两项最为重要。

1. “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计划”。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使日本感到能源资源问题的巨大压力。接着又出现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问题，以及由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针对这种严峻的情况，日本将技术开发的重点转向计算机、半导体、电子产品等新技术产业部门。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大都具有节约能源资源、较少产生污染等特点，还能在传统产品市场上开拓新产品市场。“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计划于 1982 年开始实施，它将使自动化设备更为普遍地被采用，使一大批传统企业得到新的改造。日本人认定：只要在先进计算机领域里获得部分成功，就能够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如果在初期获得 20% 的技术成果，也就可以囊括该领域 80% 的经济利益。据报道，日本最近又开始进行被认为是 21 世纪人工智能的第六代电子计算机的设计理论研究。

2. “日光——月光”计划。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全面实施“日光——月光”计划，这项计划的实施，使日本比较成功地改造了工业结构，减少对能源密集工业的依赖，同时大力发展节能和新能源开发技术。目前，日本正朝着逐步建立起“摆脱石油”的能源结构的方向前进。

综上所述，在新技术革命来临之际，日本实施了“科技立国”战略，人才开发战略和争夺高技术优势战略。其本质是依靠科技带动经济起飞，反过来，又依靠经济进步推动科技发展，使日本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

讨 论 题

1.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的几十年里，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根本原因是什么？由此可得到什么启示？

2.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哪样更为重要？你认为应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3. 你还了解哪些国家的高科技研究计划？

九、“863 计划”与发展高科技

1986 年 3 月，曾为我国“两弹”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专家杨家骥和测量控制专家陈芳允等四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基于当今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间的竞争，已完全超出私人产业集团之间的竞争范畴，成为国与国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军事、政治、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这一国际背景，主张要像 20 世纪 50 年代着手发展“两弹”一样，及早组织精干队伍，在几个最关键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使高技术能有效地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否则，就有被别国远远甩到后面去的危险。为此，他们身负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托，上书中央主要领导，对跟踪世界几个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提出建议。这份建议报告对我国发展高技术的急迫性和必要性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二是建议选择有限的目标，积极地进行跟踪；三是要珍惜和培养人才，我们已有的一大批搞高技术的人才不是能随便培养出来的，今后还要依靠他们去培养后备力量。邓小平很快看到了这份建议。3 月 5 日，邓小平立即作出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随后，邓小平立即责成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具体落实。国务院很快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

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调查论证。各领域专家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的计划纲要》。由于促成这个计划的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863计划”。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计划正式公布于世，并于1987年2月正式宣布组织实施。

“863计划”根据王大珩等人提出的建议，采取了制定有限项目，实行重点突破的方针，重点选择了对我国今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7个高技术领域进行研究。其主要目标是：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力争在一些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解决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同时在研究攻关的过程中锻炼和培养人才，为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准备后劲。

“863计划”重点选择的7个高技术领域分别是：

1. 生物技术。目标是到下个世纪更好地满足人民营养要求和提高健康保障水平。有三个主题项目：

- (1) 高产、优质、抗逆的动植物的新品种；
- (2) 新型药物、疫苗和基因治疗；
- (3) 蛋白质工程。

2. 航天技术。主题项目为：

(1) 大型运载火箭。研究发展性能先进的大型火箭，提高我国航天发射商业服务能力；

(2) 空间站系统。继续进行以和平为目的的空间科技的研究与开发。

3. 信息技术。目标集中在下世纪初有可能获得重大突破并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技术上。主题项目有：

- (1) 智能计算机系统；
- (2) 光电子器件与微电子、光电子系统集成技术；

(3) 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

(4) 通信技术。

4. 激光技术。研究高性能和高质量的激光技术, 带动等离子体技术、新材料及激光光谱学技术科学的发展。

5. 自动化技术。主题项目有:

(1) 计算机综合自动化制造系统。跟踪研究计算机综合自动化制造系统的关键技术, 建立示范生产线;

(2) 智能机器人。研制出精密装配作业、水下作业和恶劣环境作业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

6. 能源技术。主题项目有:

(1) 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

(2). 先进核反应堆技术。

7. 新材料技术。其主攻方向为:

(1) 光电信息材料;

(2) 比重小、抗腐蚀性能好的结构材料;

(3) 特种功能材料;

(4) 耐高温的高强、高韧材料;

(5) 新材料的特种工艺测试与检验。

“863 计划”从 1987 年组织实施以来, 一开始就注重借鉴国外高技术管理的有益经验, 吸收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搞“两弹一星”的组织管理经验和近些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经验, 在实践中创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863 计划”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至 1995 年底, “863 计划”囊括的 7 个高技术领域中所选定的 2800 多个课题, 已有 1398 项 (占 49.9%) 完成并取得了成果鉴定。其中: 550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占 39.3%); 475 项已进入应用领域 (占 33.9%); 133 项已转化为产品 (占 9.5%)。在参加“863 计划”的 3 万人次科研人员中, 有数百人被培养成为决策层次的专家, 其中数 10 人已被接受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 同时还培养出博士 1490 人, 硕士 3868 人。“863 计划”的实施,

使 15000 多种军工产品转为民用，增加产值上百亿元；使卫星覆盖率达国土面积的 80% 以上；使每位国民多得口粮 25 公斤；使每个新生儿对乙型肝炎免疫；使共和国拥有向世界科技前沿冲击的队伍……“863 计划”在“九五”期间的实施强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从 1994 年的 8.3% 增长到 2010 年的 25%。

通过“863 计划”对国际高技术进行积极跟踪研究，从长远目标看，将为我国在 21 世纪初形成具有一定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创造必要的技术条件，为国民经济向更高水平的稳定持续发展增强了后劲。从近期目标看，着重借鉴并开发各项相关的关键技术，全面提高我国的高技术水平，并不断将其中间成果产业化，为国民经济服务。“863 计划”把中国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她必将圆中国人做了几代的强国梦！

讨 论 题

1. 我国当初在制定“863 计划”时，为什么只选择 7 个高技术领域，而不包括高技术的所有领域呢？
2. 你认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为什么？
3. 21 世纪将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你对我国在 21 世纪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有信心吗？理由是什么？

第四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同时，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其根本在于不断提升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另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沈阳国企：依旧砥柱中流

沈阳是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基地，作为共和国重工业基地的长子，50 年来它上缴的利税相当于国家同期投入的 5 倍多。在外国人眼里，它享有“中国鲁尔”之誉。

沈阳拥有占全国总数 70% 的工业门类，集中了为数众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全国国企大面积亏损，纷纷改组、改制的大背景下，面对成建制的企业“集团军”，背负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减员增效等诸多重任的沈阳，雄风依旧。

在 1999 年进行的沈阳“百万市民评议市政府”问卷调查中，116 万份问卷统计结果，市民给市政府打出“94% 满意度”的高

分，可见，它的成绩是显著的。

沈阳先后跨入全国科教先进城市、卫生先进城市、综合治理先进城市行列，据国家有关部门对全国 219 个重点城市的评估，沈阳市的综合实力名列第五；根据世界银行考察评估，沈阳与北京、上海同时入选全球 41 个“最具竞争力的城市”；由于城市建设和发展变化突出，沈阳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大城市可持续发展计划”25 个首批试点城市之一；为表彰沈阳市在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沈阳市长慕绥新被授予 1998 年度联合国人居奖。同年，沈阳退出“世界 10 大污染城市”名单，并通过国家旅游局验收，成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如此令人称道的成绩，缘于依旧砥柱中流的沈阳国企。以 1998 年为例，沈阳宏观经济运行已进入“适度”的绿灯区，实现了全年 10.5% 的经济增长目标。国有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2.5%，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1.3%，工业产品产销率达 96.2%。工业经济效益显著回升，全年实现利税总额 3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9%，利润比上年增长 71.5%。国有企业脱困目标总体上得以实现，全市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到 60%，企业亏损面由 38.8% 降低到 20% 以下，4 年间实现 68 万人再就业。

为什么沈阳国企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却撑起了沈阳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呢？

（一）转换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沈阳将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制度创新同步推进，对部分企业实行“承债式购股”、“债权变股权”等尝试。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为公司的达到 53 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覆盖面达到 48%。为确保改制后的企业充满活力，沈阳在全省率先推出年薪制试点，建立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和制衡约束机制。严格奖惩使多年“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责权利含糊标准变得清晰，第一批扭亏不力的企业领导受到黄牌警告。

(二) 收缩国有企业战线，狠抓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

为了减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担，沈阳首先收缩国有经济战线，解决传统产业生产能力低水平，重复过剩和投资分散的症结。其次，精干主体企业，使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通过采取资产置换、强强联合、行业转制和裂变扩张等多种重组方式，使一汽金杯、东药、机床等大企业集团的 58 亿元不良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与主业分离。第三，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目前市属国有企业所办的中小学、医院、劳动服务公司都走出国企母体，开始自负盈亏。

与此同时，为了抓好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沈阳市改变“撒芝麻”的帮扶国企方式，将资金重点投向市场份额大、附加值高、效益好的产品，将有限的生产要素、必要的政策措施集中向大企业集团和重点骨干企业倾斜。一汽金杯、长白、输变电、化工、东药、环保等重点企业集团的销售产值和利税占全市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 60% 和 65%。

(三) 大胆引资，以开放促改造，振兴国企

资金短缺是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沈阳也不例外，沈阳国企仅技术改造的资金就需要数百亿元。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沈阳聘请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对企业集团进行包装策划，18 户重点企业集团有 17 户与国外大公司实现对接，主导产品对接面达到 67%。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合资面达到 50%。如美国的通用、ITT，法国的米其林，日本的丰田、松下，韩国的 LG 等。合资、合作使沈阳国企获得了资金。仅通用公司向金杯车项目一次性追加的投资即达 2.3 亿美元。同时，沈阳国企也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18 户企业集团与外资合作后开发新产品 523 项，占全市的 53%。东药集团模拟三资企业管理，采购成本降低近 9000 万元。东药的探索实践为沈阳国有企业嫁接先进管理经验打开了局面。

(四) 优化政府职能，改善企业生长环境

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行为，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交还给企业，把资源配置权转移给市场，把经济活动中心的社会服务和监督职能赋予社会中介组织。市委、市政府还颁布了《沈阳市改善企业外部环境规定》，使“三乱”得到有效整治。47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为“企业合法权益特别保护单位”。仅两年时间，取消乱收费乱摊派即减轻企业负担近6000万元。

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政府主要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国有企业进行间接管理。并向国有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加强财物监督。

为了给外商投资创造条件，沈阳市政府还建立了审批管理服务中心和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大大简化了审批程序，提高了办事效率。

为了规范政府行为，市政府各部门广泛推行政务公开，既提高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又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五) 正确选择国企发展方向，变劣势为优势，盘活存量资产

虽然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但是我国远未达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程度。而且，即使是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基于这一点，在发达国家纷纷将制造业向其他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之际，素有共和国装备基地之称的沈阳抓住了这一机遇，以其巨大的工业固定资产存量、庞大的机械制造加工能力和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队伍，抢占国内国际制造业的制高点，仅1998年，沈阳国企向国内外重要工程提供成套设备总额达到6亿元。同时，为了增强产品竞争力，沈阳国企不断开拓进取，1998年已确定100项重点科技项目，一批重点企业已率先进入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阶段，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50%以上。

为了盘活国有资产，沈阳国企不仅内引而且外联，在国外办

厂。非洲、南美洲、东南亚及俄罗斯市场都有沈阳国企的再生触角。以机械加工、汽车组装、食品加工、医药制剂、纺织品等生产线为重点，采取独资、合资合作、补偿贸易、易货贸易等方式成功地实施了企业的战略转移，盘活了闲置资产，变劣势为优势。

沈阳国企改革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它将成为国企发展的有力佐证。

讨 论 题

1. 结合沈阳国企的发展，谈谈你对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理解。
2. 通过沈阳国企改革，结合家乡实际，谈谈国企出路何在？
3. 试分析“搞活国有企业”与“搞活国有经济”间的关系。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光彩事业”

通过中国扶贫大行动，至 1993 年底，我国贫困面已退缩到大石山区、高寒山区、荒漠区、大型水利工程淹没区、黄土高原干旱带、地方病高发区。1994 年 3 月，国务院制定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拉开了到 20 世纪末彻底消灭绝对贫困攻坚战序幕。

“光彩事业”是 1994 年 4 月，由 10 位民营企业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民营企业大型扶贫活动，开展 5 年来，有 2669 个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了这一活动，完成了 3589 个“光彩项目”，到位资金 75 亿多元，培训人员近 33 万人，安排就业 38 万人，帮助 153 万多人解决了温饱问题。

被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为 1994 年中国富家排行榜第一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刘永言、刘永行、刘育新四兄弟

也参与了“光彩事业”，他们所领导的希望集团 5 年来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近 10 个省建立了“光彩事业”扶贫饲料工厂 23 家，形成了 250 万吨优质高档饲料基地，使 4000 多名职工重新上岗。

希望集团西昌新希望天然色素公司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帮助凉山地区农民大量种植万寿菊，种植户收入每年新增 1400 多元，万寿菊被凉山人喻为“光彩的‘扶贫之花’”；贵阳、宜昌希望饲料公司广泛开展“光彩助学活动”，使上千名面临辍学的贫困户子女重新走进了课堂。

希望集团在扶贫的过程中，“义利”兼顾，提出了“1/10 经营理念”，即每让农民 10 元钱利润，“希望”只得 1 元。“光彩事业”使希望集团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仅“光彩事业”工厂年产值就达 10 亿元，利税 2000 多万元。希望集团企业已经分布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目前饲料年产值达 65 亿元，被国家评为中国最大私营企业 500 强第一名，以两家“光彩公司”为主的新希望股票顺利上市，总裁刘永好先后获得全国 10 大“扶贫状元”和“光彩事业”奖章的殊荣。

像刘永好四兄弟这样的民营企业家里还有很多。如投身西藏“光彩事业”，使荒滩变成万亩良田的张少华；无偿捐资 2500 万元，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县修建“中国光彩扶贫移民公司”的香港嘉浩集团董事局主席许智明；在北大荒开发了 667 公顷（即 1 万亩）荒滩的张江平……可以说，“光彩事业”为中国的扶贫宏图添上了一笔重彩。

目前，参与“光彩事业”的民营企业家里经过多年的投资、建设、经营，已经形成了“一线、一片、多点”的扶贫项目布局。“一线”在京九地带，依托京九沿线，形成以种养加基地和京九市场链为重点的发展态势。如赣南“光彩大市场”、深圳市湖华龙批发市场、九江火车站市场、安庆农贸大市场、阜阳“光彩大市场”等。这些大市场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买难、卖难问题，推动了扶贫进程。“一片”指在三峡库区及周边。围绕三峡

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和发展农业产业化，这里设立了“光彩事业”示范区。“多点”即指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批准的 115 个全国重点项目，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扶持的“光彩事业”项目，共同形成“多点”布局。

“光彩事业”在项目实施中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一是组建龙头企业，率先进入农业产业化发展轨道；二是加大科技扶贫力度，提高项目的科技含量；三是综合国土整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自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四是积极参与再就业工程。

为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 2000 年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准备 1999 年在原资金规模的基础上，再增加 65 亿元扶贫资金，中央扶贫资金总量将达到 248 亿元。用于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国家还加强了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工作，动员全社会参与扶贫开发。并不断深化东西扶贫协作，促进东西部共同发展。只要全力以赴，“共同富裕”是能够实现的。

讨 论 题

1. 结合“光彩事业”谈谈你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解。

2. 非公有制经济是帮手，是放手？是建设者，还是掘墓人？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三、亚星——奔驰有限公司

亚星——奔驰有限公司，是由我国最大的客车企业——江苏亚星客车集团公司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合资公司。投资总额 9550 万美元，双方各占 50%，是我国客车行业目前最大的合资企业。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7000 辆整车、12000 辆底盘的年生产能力。

亚星、奔驰合作之初，德国奔驰认为：它投入公司的产品、品牌、厂名及产品技术软件等，都应该作为知识产权，单方面计入外方投入。它的商标要作价1亿美元，按照国际惯例，这无可厚非。而亚星则指出：品牌价值有特定含义。奔驰无疑是一种驰名品牌，但中国拥有的广大市场，也是一种资本，它使亚星的年产销量达到6700辆，亚星标牌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可达26%，而奔驰却无法做到。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按照效益原则，投入要给公司带来利益、商品、厂名、产品的技术软件对等投入，互不作价。双方共同向新的合资公司投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不存在谁援助谁的问题。

由于奔驰公司提出他们投入的产品，要在合资公司注册登记24个月才能投入，实现小批量生产，更要等36个月。也就是说，3年内支撑合资公司生存和发展的产品，是亚星的产品。而在这期间，奔驰分享合资公司的利益，则是对亚星的不公平。经双方协商，奔驰公司同意，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对亚星的补偿。同时，这一协议的达成，大大促进了奔驰公司产品的投放进度。

在人员培训方面，亚星公司600多个各类工程技术人员，3000多熟练工已先期培养。为了使合资公司产品与奔驰公司产品具有同样水平，作为对等投入，奔驰公司承担对公司员工的海外培训，总费用不低于350万马克。

1997年3月合资公司成立以来，已先后派员工到德国、巴西、澳大利亚培训，平均每月79人，学成回国都成为生产奔驰许可证的骨干。同时合资公司还举办技术、管理培训班39期，受训人员达1911人次。还投资203万元，建成了国内一流培训车间，为全面开展职工培训奠定了基础。

在技术引进方面，亚星要求奔驰公司向合资公司投什么整车、什么底盘、什么总成，包括技术文件的ABC清单，都必须明确写进合同。这样，中方对自己掌握技术的多少能一目了然。

合同还规定，奔驰产品投入合资公司以后，要根据中国的条件，帮助合资公司改进设计。这样保证了合资公司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同步。

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根据中国市场的变化，从支持合资公司发展的长远大局出发，奔驰公司主动将投入产品作了重大调整。在原先投入 7 米、12 米整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8.7 米和 10.5 米的整车技术。在公司成立 9 个月内，7 米、8.7 米、12 米的整车已投入合资公司，10.5 米车也在 1998 年 5 月投入。这样，整车技术的投入，不仅数量上比合同规定增加了 1 倍，而且时间上也整整提前了 1 年半。同时，底盘投入增加了动力更大、性能更好、水平更高的新品种，还将全承载的“4”系列底盘，投入到合资公司。由此，合资公司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为了实现人和技术的有机结合，合资公司将中德技术人员混合编组，分别负责引进接收、消化吸收利用奔驰技术改进亚星产品。这样以来，在奔驰许可证产品实现销售的同时，亚星的产品也得到了改进。

在全国客车市场持续低速的情况下，1997 年亚星——奔驰公司实现销售客车 6065 辆、底盘 71 台，销售收入达 84000 万元，销量遥遥领先于全国同行，市场占有率达 25%。

亚星与奔驰的合作得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讨 论 题

1. 试分析亚星与奔驰合资成功的原因。
2. 民族工业是否需要救亡运动？为什么？
3. 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加入外企？你加入外企的原因是什么？你怎样在外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四、安徽农民的自发改革

在改革开放前，安徽是有名的穷省。每遇灾荒，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到外地讨饭。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腰鼓走四方。”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1977年11月，万里等已进行了3个多月的调查。在调查中，他曾和定远县一位穿着破棉袄的农民交谈。万里问：“你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打开空心破棉袄，拍着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农民又拍拍肚皮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万里听了，深有感触，他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管。农民生产产品的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里会上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我们这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死活，以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啊！”

随后，安徽省委订出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

同形式的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要个别人干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下称《六条》）。

《六条》的颁布，使农民们受到了鼓舞，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最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78年，安徽省春季出现了旱情，9个月没下过透雨，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当时一些地方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小岗生产队就是其中之一。

20户人家的小岗生产队，先是包产到组，开始分成4组，后又分成8组，都不行。当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去向老农关庭珠请教。关说：“1961年的‘救命田’很中用，一干就增产！”严宏昌说：“好，就那么干，干脆一竿子包到户！”关老汉说：“行是行，就怕上面不准干。”严宏昌说：“时代不同了，现在讲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只要对国家、集体、个人有利，就可以干。”队长严俊昌也表示同意：“只要社员都赞成，出了事，我们几个顶。”

在社员大会上，严俊昌说：“咱们干脆承包到户，秋后打下粮食，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再也不用记工分了。”参加会议的人一致叫好。

严俊昌站起来又说：“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么干。但是要偷着干，瞒上不瞒下。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不能‘肉吃千口，罪落一人’。口说无凭，得立个字据。”大家都同意，于是他当众写下这样一张字据：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的上交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到会的21位农民，3人盖了私章，18人按了血红的手印。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一张有错别字的契约，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然而，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由于“包产到户”曾三次受到严重打击，许多农村干部因为包产到户被斗、被关，甚至家破人亡。因此，有的人害怕，有的人则对包产到户不理解，他们用顺口溜来表示不满：“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都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农民看到这个文件，非常不满，要求去掉“两个不许”。万里了解到这些情况，支持农民的意见。他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这是一件大事，省委要专门讨论一次。”在省委常委会上，他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不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主张到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

结果山南区6个公社全都搞了包产到户，受山南区影响，肥西县40%的生产队也都搞起了包产到户，万里这时的态度仍然是明确的：让他们搞！

事实上，改革非常成功。安徽省凤阳县1979年70%实行联产承包制度，这一年粮食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了99.9%，调出的粮食超过了1953年以来26年调出粮食的总和，尽管如此，安徽还是遭到围攻。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编辑在来信前面加了很长的“编者按”，并作了一个《“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标题。《人民日报》3月15日发出的这组稿件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天之内全国冲垮2万多个承包组，冲掉的承包户就更多了，安徽省全椒县县委领导向万里汇报：“《人民日报》文章一播，不得了哇！乖乖，全椒上

下乱了套了，春耕搞不下去了，农民找公社、县委，领导吓得躲起来了……”

万里打断了他的汇报：“一张《人民日报》，一篇读者来信，看把你们吓得！”万里接着说：“《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

果然，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又发表了一组文章，一篇是支持张浩来信的，一篇则是批评张浩来信的。其实，这时中央也在进行讨论。由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支持，包产到户开始在全国推广。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使包产到户取得合法地位。1983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达98%，1994年达99.1%。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一直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直到今天，还有些地方在继续搞集体经济，如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刘庄，江苏的华西村等。

安徽农民的自发改革，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而中国农村的改革又为后来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讨 论 题

1. 试分析安徽农民改革成功的原因。

2. 你如何理解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两个飞跃。

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什么缺陷？你认为当前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五、由调整工资引起的恶性事件所想到的

我国职工的工资一直由国家直接掌握，每隔几年调整一次。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 10 多年内，工资基本没有调整。到 70 年代后期，开始每隔几年调整一次，但每一次调整，只给以一定的比例。1980 年，杨继绳作为新华社的记者，对天津的工资调整进行了一次调查，并且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下面抄录其中一部分：

“天津市在调整工资中出现多起恶性事件：应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工资制度。

从年初到七月底，天津市在评定工资过程中，发生了服毒、投河、跳楼、自焚等自杀事件 21 起（死亡 3 人），行凶杀人未遂事件 9 起，绝食 5 起，出走 4 起，还发生了多次打人事件。

北京铁路局天津电务大队 27 岁的二级工黄德江，由于没有评上工资，往自己身上倒柴油，自焚身死。库工石敏（21 岁）、王岚（20 岁）在调资中喝了敌敌畏，经抢救，王岚脱险，石敏死亡。二轻局锅炉修造厂女工孔庆延，评资时第二榜无名，她找领导反映评分不合理。后来她听说第三榜又没有她，就喝了一瓶敌敌畏。经抢救脱险后，她说：‘评不上还得死。’在一些单位还发现有人身带匕首，准备和人拼命。”

天津市在这次调整工资中矛盾十分尖锐。有人用影片的名字描述评工资的几个阶段：思想动员阶段是《沉默的人》，谁也不表态；发榜前是《激战前夜》，都在想办法如何压倒竞争对手；从头榜到三榜之间是《生死搏斗》，打架、斗殴、凶杀事件多在这时发生。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害怕工人殴打，不得不逃到外地去

避难。

一些负责调资工作的干部说：“其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根本原因是调资政策有问题，工资制度本身不合理。”

天津市调资办公室的同志反映，这次调资工作有很多不妥之处。首先，这次调资和1977年的调资在政策上缺乏必要的连续性。上次基本上是按工作年限，解决低工资问题。但是，由于升级比例的限制，当时有一些年限长、工资低的人没有升级。由于这次不考虑工作年限，这批人还有可能升不了级。他们的抵触情绪最大，同时，这次规定的三条原则（贡献大小、技术高低、劳动态度好坏），在具体执行上很难掌握。特别是一些集体操作的工种（如炼钢、轧钢等）和科室干部，要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是很困难的。因此，有些单位不得不在没有差别中找差别，在没有矛盾中找矛盾，人为地制造了很多不团结因素……

这种每隔几年提高一部分人工资的做法，不是根据劳动者付出劳动多少、贡献大小来确定升级的对象，而是根据国家财力的大小，能付多少钱，就让多少人升级，这样实际升级的人数和实际需要升级的人数就相差很远了。与此同时，国家是企业的所有者，劳动者付出多少劳动，国家就应该付给多少工资。但是这种调整工资的制度使得劳动者与国家的经济关系转变成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合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

这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我们实行了几十年，就是一直在喊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是不是就错了呢？无论如何，“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是公平的。但是，它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必须改革这种工资制度，使工资真正成为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杠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工资制度改革开始朝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向发展。

首先是恢复奖金制度。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我国也曾经在工厂实行过奖金制度，1957 年以后，它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取消了，作为奖金的那一部分工资后来被平均发放。1977 年，我国又开始在企业中实行奖金制度，拉开分配改革的序幕。

1978 年，国家规定奖金制度的试行面控制在 30% 以内。实行奖励制度的企业，奖金总额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 10%。后来，奖金制度全面推开。由于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一个利润分成的问题，所以国家开始规定：1 年的奖金不能超过 1 个月的工资，后来又放松到不超过 1 个半月或 2 个月的工资。但是这时企业认为奖金“封顶”影响到工人劳动积极性的发挥。

1984 年，国家对企业实行利改税，规定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税利增加的前提下，发放奖金可以不“封顶”，但要交纳奖金税。奖金税是超额累进制，奖金在 2 个半月工资以内不征奖金税，4 个月以内交 30% 所得税，半年以内交 100% 的奖金税，半年以上交 300% 的奖金税。各企业提取的奖金额，可以用于发放奖金，也可以用于实行浮动工资升级。

其次是实行效益工资制。1985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的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工资总额与上交利税挂钩；国家对企业工资实行分级管理，除核定挂钩方案以外，不再统一进行企业的工资改革和调整。从此，企业的工资由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定。国家只管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

1986 年 12 月和 1987 年 3 月，国务院分别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和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包括奖金）和政策范围内，对企业内部职工工资、奖金分配的具体形式和办法，以及调升级时间、对象等，由企业自主决定，国家一般不作统一规定。这时企业奖金税的 30% 的最低税率和 300% 的最高税率也分别降为 20% 和 200%。

工资总额与上缴利税挂钩，上缴得多，工资总额就可以按比例提取得多；上缴得少，就提取得少。企业亏损，一般不能提取奖金。属于政策性亏损企业，工资总额就和减少亏损的额度挂钩，亏损减少得多，工资总额就提取得多。

在企业内部，一般把企业的经营目标分解成若干指标，层层落实到车间、班组、个人，再按完成情况进行分配。

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它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奖励工资。从 1986 年开始，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为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按照专业技术职务确定工资。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务员制，其职务工资是主体。

工资制度改革以来，劳动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这其中还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分配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对的。

讨 论 题

1. 你认为按劳分配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2. 你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怎样实行按劳分配？
3.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会不会导致贫富悬殊？

六、是是非非论私企

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以来是一个不断提高公有经济比重、减少私有经济比重的过程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是一个恰恰相反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触动着人们的神经末梢。因为消灭私有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又是共产党人的行动目标。

我国的私营经济大体经历了三个大发展阶段：萌芽、起步阶段（1986 年以前），曲折发展阶段（1987～1991 年）和高速增长阶段（1992 年～1997 年）。

（一）萌芽、起步阶段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数以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然而这批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在农村生了根，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进入农民这个群体之中。到 1978 年，全国各地出现了知识青年回城工作的高潮，为解决当时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政府号召回城青年们自谋职业，从事个体业、商业。当时还只是把他们称为个体户，以区别于私有经济。但是，随着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现在看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上海有一个居民叫×××，40 多岁。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已平反。他父亲是一个大资本家。落实政策后他继承了一笔遗产。1980 年他向工商管理局申请登记，想买一部载重汽车搞运输专业户。市工商管理局感到难以答复，他们倾向不批准发证。

广州市个体户×××，继承了外祖父传下来的一种熏鸡技术。这种熏鸡早年曾闻名省港，20 世纪 50 年代他外祖父逝世后这种熏鸡歇业。1979 年，这位个体户恢复了这一传统食品，生意兴隆。由于人手不够，他一天只能制作 50 只熏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他向政府提出：能不能雇工？没有人明确答复。

当时，中央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很微妙。“傻子瓜子”就是一个典型。1981 年 9 月 12 日，安徽省《芜湖日报》报道了《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因投机倒把罪被羁押、绰号“傻子”的年广九生意日趋火爆。1981 年至 1984 年，他的雇工由 3 人发展到 103 人，仅 1984 年就纳税 30 多万元。在“傻子瓜子”的带动下，芜湖市瓜子产量由原来不到 50 万公斤，猛增到 1984 年 1500 多万公斤，税收达到 400 多万元。尽管如此，缘于原来的思维方式，有人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了解

情况后，经他提出，1984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规定了“三不”政策，即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事实也说明，年广久开办私营企业对社会不仅没带来什么害处，还带来了很多好处。以1982年为例，这一年“傻子瓜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交国家税费分别为44.6%、12.0%和43.33%。

从此以后，私营经济开始逐步发展。

（二）曲折发展阶段

1987年中央文件规定，对于私营企业“允许存在”。同年，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私营企业取得了合法地位，继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从1988年下半年起，国家开始整顿经济秩序。私营企业发展遇到了资金不足、原材料紧张、“三角债”等问题。198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税收大检查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惩罚。私营经济的发展受挫，并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的基础”。

1989年9月25日，年广九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逮捕。1990年8月16日，芜湖市新芜区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将“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

1991年，中央15号文件终止了50年代时私营“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更不是要像50年代那样对他

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三) 高速增长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姓“社”姓“资”的争论告一段落，私营经济的数量和规模也创下了新纪录。

1992年年广九被释放，同年，党的十四大指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1997年，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广九说：“十五大给了我们一个保护伞，我们不用再害怕了，要真正大干了！”他一口气开了96家分店，雇了200多人炒瓜子，500多人卖瓜子，1997年销售收入达3亿元。

1993年底，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23.8万户，投资者人数有51.4万。私营企业户数比上一年增长了70.4%，到1994年底，又增加到43.2万户，比上一年又增长了81.5%，和改革初期相比，改革18年以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见表4-1），它还将继续发生变化。

表4-1 1996年所有制结构状况（%）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其他经济	个体经济
工业产值所有制结构	28.5	39.4	16.6	15.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所有制结构	27.2	18.4	21.8	32.0
城镇职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	56.7	15.4	19.9	8.6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版。

讨 论 题

1. 通过“傻子瓜子”的发展过程，你体会出怎样的思想解放历程？
2.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
3. 私有经济会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七、从诸城“卖”企业看非国有化

山东省诸城市，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城，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不靠港口码头，没有铁路和高速公路；山区丘陵多，自然条件差；资源贫乏，土地基础薄弱。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诸城市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农工贸一体化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在当地开始有点影响，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地方名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诸城名声大噪，引起全国甚至世界瞩目，各方面对它的关注显然超过了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县城的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等先后来诸城视察工作；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1100 个县，5680 个团体的近 11 万人来诸城参观学习。这种现象的背景，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有企业举步维艰，前景不容乐观，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子，以期重振国有企业昔日雄风。诸城作为一个县级小城，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方面闯出了独具特色的路子，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一时“诸城模式”一词不胫而走。诸城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因为诸城把国有企业卖了，把集体企业也卖了。

1992 年 4 月，诸城市委对 150 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结果有 103 家明亏和暗亏，亏损额高达 1.47 亿元，有些表面看来“红红火火”的企业，实际已资不抵债，成为“空壳”。1992 年，全市财政收入只有 1.09 亿元。面临如此困境，诸城市委深刻认识到，企业要发展，单纯靠放权让利，政策扶持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但是新的出路又在何方？市委领导心里也没有谱。

陈光是诸城“卖”企业时的市长，谈到为何想到“卖”企业，他告诉记者：在他担任山东省潍坊团市委书记期间，曾在潍

坊玻璃纸厂蹲点，期间所见所闻，使他渐渐形成国有企业不能不进行深化改革的认识。有一次这个厂生产了一批彩色玻璃纸，等着日本客户看货后再签供销合同，可是等日本客户来到之后，这批货在仓库里已被厂内有些人偷盗。说起这件事，陈光感慨万千：“一张透明的玻璃纸，反映了企业的深层次问题，它不仅仅是管理问题。”为了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一问题，陈光对厂内400名工人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到“当看到有人偷盗工厂财物时，你怎么办”时，32名答“装作没看见”，78人答“他偷我也偷”，290名答“思想内部矛盾，拿不定主意”，没有一个人说要与这种现象作斗争。看到这个调查结果，陈光的心凉了，他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同时又引发深深地思考，他逐渐认识到这种现象背后是企业产权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说到深处是一个产权问题，所以才造成这个企业3年亏损3670万元的后果。旧的企业制度不改不行。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国家对中小企业政策虽有一些优惠，一些专家学者也在绞尽脑汁为政府、为企业出谋划策，但真正有可操作性的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诸城市委领导多次与潍坊市体改委和山东省体改委联系，共同探讨中小企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同时，市委领导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学习外地经验，并把诸城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以及改变企业亏损的想法，与专家学者联系，以求为诸城出谋划策。在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中，诸城市委成立改革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并召开了七次常委会，按照：“加强领导、大胆尝试、积极推进、严格规范”的方针，决定以“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为主要形式，对城乡企业大力推行股份合作制改革。1992年10月，市里由分管市长牵头，组成专门工作组，选择了国有小型企业进行改革试点，改制的企业根据职工的承受能力和入股的自愿性，采用定额认购和自愿认购的方式设置股权。同时，市政府决定：卖差的，上新的，干大的，通过改制把国有（集体）的资产

收回来，转投到重点行业和企业，优化经济结构，培植新的财源。一时间，诸城把国有企业卖给职工的消息不胫而走。

股份合作制是劳动群众以股份为纽带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集体占有、统一使用、共同劳动、民主管理，实行按劳分配、按股分红、共担风险的经济组织形式。它吸收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积极功能，既是资金的联合，又是劳动的联合。

中国股份合作经济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1984 年，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面对几十年积累起的 300 多万元固定资产，在“分还是不分”，“要分怎么分”这个重大问题上，经过一年多的等待，终于完成了体制创新。

针对我国的一些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涌现，中共中央 [1984] 1 号文件明确指出：“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方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

1985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倡股份式合作”。文章指出：“我国农民创造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只有新的合作内容，农户才能以资金、劳动、技术、管理等入股，入股者即生产经营者，实行按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取酬办法。”

1987 年和 1988 年，国务院先后确定三个地区作为全国农村股份合作的改革试验区。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股份合作制开始“农转非”进入城市，逐步成为城市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诸城企业改革经过了与全国企业改革大体相同的历程：放权让利、利改税，但企业仍没走出困境，而且发展越发艰难。产生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营机制和产权问题，以往进行的多项企业改革，都是绕过或回避产权问题，其结果是政企无法分开，企业不可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企业名义为全民所有，实际为政府所有或更准确地说是为只受益不负

责的政府官员所支配，没有人真正对企业经营的好坏及企业资产负责，资源不可能得到合理配置，资产也得不到保值增值，损失、浪费现象也就难以制止。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并区分了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改革形式。对“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这其实是为国有小型企业的产权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诸城电机厂是第一家股份制试点企业。在企业职工拒绝了市政府拟定的两套改组方案（一是国家完全控股，个人股不得超过20%；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后，市政府同意了企业职工提出的要求，即由企业277名职工买下企业270万元生产经营性资产，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土地有偿使用。改制后的电机厂很快就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到1993年底，企业实现利润134万元，比上年增长173%，职工人均收入3800元，增长32%，股本红利达32%。

原来的诸城电机厂厂长、现任董事长的岳宁超说：厂长一夜变成了董事长，它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以前厂长由政府任命，干好干坏一个样，但现在做董事长，要对全体股东负责，搞不好股东就会罢免你。同时，企业的发展也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我是企业第一大股东，当时东挪西凑了10万元钱，购买了100股企业股权，经济压力很大。在当选董事长后，我对职工讲：“西方资本家搞不好要跳楼，咱们搞不好也得跳。”技术员潘研福说：“我拿借来的5000元钱买了5股，我成了企业真正的主人，投票选举中我要选能领导我们企业迅速发展的能人。”职工夏玉英说：“企业今后是自己的了，责任心当然增强多了，看到有人偷东西，那不仅是偷工厂的，而是在偷自己的，我坚决不答应。”

企业凝聚力增强，职工积极性空前高涨。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全体职工变成了股东，以资产为纽带，与企业紧紧捆在一

起，企业职工自觉地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把企业经营活动当成自己的日子过，更加关心爱护企业，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从1993年以来，公司共收到合理化建议277条，其中采纳148条。同时，工人获得经营自主权，他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身利益的实现。他们伴随着厂里经济的发展，通过对自身利益的占有，走向富裕，这就构成了电机厂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根本目标和动力。

诸城电机厂改制的成功，使得股份合作制在诸城全面铺开。诸城推行股份合作制，意味着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特别是县、市政府代替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集人财物、产供销等经济大权于一身，把企业当成行政附属物的经济模式被抛弃，企业和持股职工将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角，政府逐步从中小企业所有者的位置上解脱出来。在这场改革中，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对政府来说，这是一场自我革命，一次艰难痛苦的“蚕蜕”。在这个改革进程中，政府既是“教练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改革的难度也正在于这三位一体的顽症。诸城企业改制的成功正在于诸城市政府比较成功地扮演了这三位一体的角色。

诸城的企业改革初步结束了，但由此引起了种种争议：

专家指出，股份合作制在理论上至少有三个问题悬而未决：一是股份合作制的所有制性质问题；二是是否是规范的企业组织形式问题；三是股份合作制的内涵与外延问题。在理论界，认为股份合作制是私有的，不规范的和过渡的。

在新闻界：《光明日报》、《改革》杂志、《工人日报》等报刊对诸城改革各抒己见，刊登文章，再度把诸城推向高潮。批评者认为，诸城把国有企业“卖”了，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在对诸城进行考察后认为：诸城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明显，群众满意。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王珏1994年7月专程考察诸城时认为，诸城经验给了人们以下启示：传统的产权制度

是制约国有企业效率的“瓶颈”，只有以企业改革为契机，实现企业产权向劳动者的易位，并建立起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才会塑造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才会有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也才会出现具有独立意识的企业家和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

诸城改制 2 年来，工业利润增长了 1 倍，税金增长 68%。卖出企业收回资产 1 亿元，投资企业因而每年收回利息 1000 多万元，比原来全市国有企业承包总利润还要多。诸城把小企业搞得红红火火，使 272 家企业迅速发展，资本结构得到优化，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加快了企业技改步伐，发展了一批骨干企业。1997 年，全市完成工业增加值 20.5 亿元，实现利税 7.1 亿元，全市企业国有资产总额达 9.26 亿元，改制 5 年累计完成财政收入 13.66 亿元，超过改制前 20 年的总和。诸城成功的经验，为我国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讨 论 题

1. 从诸城“卖”企业的实践出发，试分析我国对国民经济实施非国有化改革的原因。

2. 有人说“党的十五大精神就是卖，就是快卖”；个别地方的负责人甚至提出，要“差的送，好的卖，实行非公有化一步到位”；“放小就等于卖小”……你怎么看？为什么？

3. “职工加股东，才是主人翁”，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

4. “诸城模式”可否全面推广？为什么？

八、公费医疗下的医、患、药

城镇机关、全民所有制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已

延续了近 50 年，，这曾经被人们当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基本特征的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它缘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下不正常的医、患、药关系。

（一）医生宰患者，认钱不认人

医生是权威，患者只能言听计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之间这种本来并不让人怀疑的关系，因为某些因素的参与，让人感到一种无奈的“不公平”。正如一位医院院长所说：用苍蝇拍可以打苍蝇，可我用了“必扑”，总之把“苍蝇”打死了，谁能说我用“必扑”用错了？”

安徽某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曙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

1995 年，张曙请了家在农村的老保姆带孩子，老保姆家境贫寒，腿有一点瘸，她的女儿也有腿病，来省城看病，张曙给某医院骨科一位医生打了个电话，便没有再过问此事。

那医院将女孩推荐到某校医院，校医院又将她推荐到某小医院，先是花了 900 元做核磁共振，说片子不清楚，再花 900 元做了第二次，然后在这家不符合做大手术的医院，女孩被推上了手术台，手术费 7000 多元，治疗不见效，至今女孩还瘫在家中。

张曙事后得悉，这中间的“推荐”，核磁共振、开刀等环节，都有回扣在里面，如大医院转介病人到校医院，医生拿到 30 元手续费。

对于享受公费医疗的患者，医生什么药贵就开什么药，患者点什么药就开什么药，甚至销售非治疗性物品。这样导致财政和企业用于职工医疗的支出逐年上涨，1978 年 27 亿，1980 年 60 亿元，1987 年 180 亿元，1990 年 283.4 亿元，1993 年 300 亿元，1994 年 558 亿元，1995 年 654 亿元，1978～1997 年，全国职工医疗费用增加 28 倍，年增 19%。同期财政收入增加 6.6 倍，年增 10%。目前，国家一天就要为公费医疗支出 9000 余万元，国家、企业不堪重负。

由于缺乏对医院的约束机制，为了赚钱，医院争相引进高技

术医疗设备，导致重复建设，医疗资源严重浪费，大量流失。如CT机，北京一地现有95台，核磁共振器8台，CT机超过了英国总数（91台）。与之规模相仿的伦敦市，CT机只有5台，核磁共振器只有1台。一些医院的CT扫描，查出有严重疾病的比例只有10%，远远低于国外50%的比例，大量经费浪费在不必要的检查上。

（二）“一人看病，全家吃药”，家家户户自备药抽屉

由于享受公费医疗的患者看病几乎不花自己的钱，国家和单位包揽了职工的全部和绝大部分医疗费，很少有患者看病会精打细算，琢磨着如何为公家省钱。小病大养、无病住院，“一人看病，全家吃药”比比皆是。享受公费医疗家庭的药抽屉里的药品，价格在百元至千元不等，许多药品还没使用就过期作废了，与此同时，不享受公费医疗的80%的农民，有病也只好在家抗着，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平。

（三）药品市场混乱，医院靠卖药赚钱

由于我国药政管理混乱，1985年以来，我国共批准新药3897件，其中按品种计算仅1819件，其余2078件为重复研究开发投入生产……这类新药绝大多数是改头换面的产品，其疗效比同类老产品好不了多少，价钱却高出好几倍。这样的高价位、高利润，等等，孽生出高回扣。

我国处方药占药品流通的90%，医院是回扣的最大受益者。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刊出了署名“牛汉”（张曙，安徽某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的短信《医院回扣为何屡禁不止》，信中列举了触目惊心的回扣现象，并指出回扣已成网络，医生开多少药，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

如退烧药布洛芬、阿斯匹林、氨基比林这三种，一支药0.40元左右，但若开一支叫N的新药，一支9元，医院很快就会得到1支1元的好处费。有的医生手中还有“滞销药品清单”。

开药时，只要吃不死人，滞销药品就多开，医生从中得利。国家规定的药品出厂价高于成本 5.8%，批发、零售两道环节各加价 15% 的规定，已经不起作用。据厦门市的调查，仅医院从医药公司、药站或药厂拿到的回扣（不包括医生个人的回扣）普遍为 15%~30%，然后医院再加成 15%，仅医院卖药的平均利润率即达 30%~45%。如快安感冒药，医院以票面批发价 7.68 为基础再加 15%，作价 8.83%，时照 5.50 的实际进货价格，加成率高达 54%~60%。如此攀高的药品价格，使贫困人群、大病只好等死，社会大多数成员难以享受医疗服务。

显然，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立起来的职工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虽然对于保障职工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这种制度存在的缺陷也日益突出，弊端日益暴露，已难以为继，国务院决定，自 1999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于当年年底完成。

我国医疗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低水平”即是指根据财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实际承受能力确定基本的医疗保障水平。“广覆盖”即指最大限度地扩大受保人的覆盖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城镇国有、非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不管效益如何，都要参加。所涉受保人数将由目前的 1.5 亿扩大到 3 亿左右。“双方负担”即指基本保险由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统账结合”即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

用人单位以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将按规定的缴费率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其中一部分注入个人医疗账户，主要用于个人门诊；另一部分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主要用于住院。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职工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的 2%，全部记入个人医疗账户。根据财政和企

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初步测算，用人单位的缴费率控制在工资总额的6%左右，记入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的比例由各地根据二者的支付范围规定，可能为1:2。社会医疗统筹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初步定为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4倍左右，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由个人账户支付或个人自付。社会统筹医疗基金起付线与封顶线之间的医疗费用，个人也要负担一定比例。

除了基本医疗保险外，还有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政府要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各地还将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解决基本医疗保险问题。

讨 论 题

1. 试述医疗改革的必要性。
2. 试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3. 为了配合医疗改革，你认为要建立怎样的机制才能约束、规范医院行为？

九、“五九现象”与企业家年薪制

近年来，在政府机关及国有企业中，涉及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问题越来越多，而多数的经济责任问题，都发生在干部退休、离职之前，人们由此称之为“五九现象”。

如曾多次被评为“劳模”、“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的云南红塔山集团前董事长兼总裁的褚时健，在离退休还有一年的时候，被人发现利用“海外关系”，在海外收受350万美元的“私账”，事情披露后，他企图闯关出境而被捕入狱。

经过两年的审讯，1999年1月被云南法院以“重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止褚时健，在过去的一年中，多起贪污大案都与主事者的退休年龄有着微妙的关系。像前两年在海外相当轰动的中首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宝钢集团企业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赵超、长江动力公司总经理于志安……

这些轰动一时，曾为企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家，为什么临到退休时，会晚节不保呢？赵超被捕后曾表示：“看到很多老同志，因为生活指数上升，生活水平下降，于是想到了自己。如果以后除退休金以外，还有点银行存款，利用利息来补贴生活费就好了。”这些曾经大权独揽，不在意工资多少，一切为国家的国有企业老总，在面临退休后须交出权位，并将所有成就都拱手让人时，面对改革后的社会，尤其在“向钱看”的今天，就不免要估算有多少应该属于自己的了。主观上看，他们之所以晚节不保，关键在于自身素质不高，自我约束力不强；客观上讲，则是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缺乏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企业家的收入即指企业家才能的报偿，经济上称之为正常利润。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企业家才能的认识比较早。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得，把企业家称为市场经济的原动者。1992年冬，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到中山大学访问时，曾指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比俄国优越的地方，是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比较容易复苏。因为前苏联70年没有市场，那是整整的两代人；而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市场的时间不到30年。

企业家才能是十分珍贵的经济资源。企业家的本质是决策、组织和实施成功的创新、赢利的创新。企业家的成功可以为社会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失败一般不会给社会带来大的损失。另外，企业家的“劳”不同于一般人的“劳”。企业家的“劳”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力劳动的“劳”；也有脑力劳动的“劳”；既有有形劳动的“劳”，也有无形劳动的“劳”；既有市场

经营的“劳”，也有日常管理的“劳”。这一切决定了企业家才能的收入——正常利润，必然是很高的，它包含风险决策的报偿。可以说，正常利润是一种特殊的工资，其特殊性就在于其数额远远高于一般劳动所得到的工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认识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也逐渐为人们所承认。许多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弹性年薪制度，百万年薪的国有企业老板，尤其在开放程度比较高的深圳、上海，已不为绝对少数。到1997年底，中国施行年薪制度的国有企业已经超过了1万家。目前各地都在试行年薪制，把它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各地的做法又各有千秋。有的搞倍数制，有的实行新增税利提成制，有的一次性重奖；倍数制的标准也各不一样，有的1~4倍，有的1~5倍不等，新增税利提成制标准也不一样，有的1%，有的4%，有的5%。从费用来源看，也不一样，有的从工资总额中出，占用工效挂钩指标，有的从利润中出。不管怎么说实行经营者年薪制能够强化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家队伍的形成。

我国在庞大的国有企业中实行年薪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企业家身价究竟多少，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公平的，许多问题都在探索之中。从国外的经理报酬结构看，一般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薪水，一般是一个固定的数目，相当于我们的基薪收入。和普通职工一样，经理的薪水也会根据工作年限、竞争条件、生活费用和工作表现适当调整。第二部分是奖金，是报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占报酬的25%。奖金是一种短期奖励，用来鼓励经理人员的短期成果（通常是1~2年），如上一年的实现利润或收入增长率。第三部分是长期奖励，奖励的时间一般是3~5年或更长，这一部分一般占经理报酬的35%左右，最常见的奖励手段是股票期权。第四部分是福利，如带薪休假，由公司和个人购买各种保险等；第五部分是津贴，如提供良好的办

公条件，提供低息贷款，免费修缮个人住宅等。虽然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国外企业有很大差别，但在报酬结构上，国外企业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合理、有效、公平的年薪制将为我国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减少经济犯罪提供必要的条件。

讨 论 题

1. 年薪制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按劳分配原则？为什么？
2. 年薪制可以扼制腐败吗？为什么？
3. 你认为怎样的年薪制才能激励企业家？
4. 试从供求角度分析企业家的身价。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从而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特征，又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自己的特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一、无形的“墙”谁来拆

新华社于1980年8月4日播发了一篇通讯——《谁来拆“墙”？》，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事情是这样的：安徽芜湖钢铁厂有一个炼焦车间，拥有两座焦炉，设计能力为年产焦炭20万吨。联盟化肥厂是用焦单位，每年需要1.68万吨焦炭。两家工厂坐落在一条马路上，中间只有一墙之隔……长期以来，联盟化肥厂的用焦却要到长沙以北将近300公里的淮南市或500公里以外的淮北市去拉；而芜湖钢铁厂生产的焦炭，除供本厂和江南一些小钢铁厂使用外，还要供应

长江以北的安庆、滁县、巢湖地区以至蚌埠市的一些机械工业部门。造成这种不合理状况的原因就在于，芜湖钢铁厂的焦炭是属于冶金部门分配使用，叫“冶金焦”，而淮南、淮北的焦炭属于石油化工部门分配使用，叫“化工焦”。因为企业的归属不同，行业不同，焦炭的供应渠道也就不一样，所以两个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也只得舍近求远。

对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两家工厂都不满意，多年来两家工厂都迫切希望能就近供应焦炭。他们多次打报告，提方案，派专人到省里向各自的主管部门请求解决。但是芜湖钢铁厂从省冶金厅得到的答复是：“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联盟化肥厂从省石油化工厅得到的答复是：“他是他，我是我！”

为什么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解决不了呢？说来也真巧，两家工厂是毗邻，省里的两个厅又同在一座办公大楼的楼上楼下。可是不同的行业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据了解，这种各立门户、自成体系的状况，不仅这两个行业如此，在全国许多行业也普遍如此；不仅在原材料供应上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这是按行政系统管理企业造成的恶果。

这篇通讯确实揭示了改革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待于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就这个具体问题而言，有关部门如果采取积极的态度，作些局部改革还是可以解决的。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一些人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筑“墙”！当记者将要结束这次调查时，却又听说：省石油化工厅为解决江南化工企业的用焦问题，正在芜湖县新建一座年产4万吨的炼焦厂，目前已投资200多万元，估计还要投资100多万元才能建成。石油化工部门在这里新建炼焦厂，而属于冶金部门的芜湖钢铁厂，却有4万吨炼焦能力在富余着。这不是怪上加怪吗？

最后，记者大声疾呼：“这种情况再也不应当继续下去了。

然而，谁来‘拆墙’呢？”

这篇通讯播发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8月7日看到这篇通讯后，在刊登这篇通讯的报纸上批注：“请省经委尽快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墙’必须拆去。”省经委8日开会研究，当天作出决定：芜湖联盟化肥厂所需焦炭，从8月中旬起由芜湖钢铁厂就地供应，并立即下达了调度指令，使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新华社8月15日就芜湖市两家工厂的焦炭问题得到解决一事又播发了《长期隔在芜湖市两家工厂之间的“墙”已经“拆除”》的报道，如实反映了“拆墙”的情况，在这件事的报道上做到了有始有终。总社对“墙”已“拆除”一稿加了编者按，就事论理，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政策。这一报道提醒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而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安徽省经委一位负责生产调度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拆的仅是一堵“墙”，而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人为的“墙”，都应该有步骤地一一“拆除”。

讨 论 题

1. 结合本实例，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2. 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上还存在哪些无形的“墙”？怎样才能“拆墙”？

二、农业市场化改革

农业市场化是指在市场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实现从计划配置资源、分配剩余向市场配置资源、分配剩余的转变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

1. 市场制度的形成，即是在农业生产、经营、分配中适合

市场交易的环节用市场代替政府。

2. 市场主体的发育、成长。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农业中排斥市场的存在,不存在市场交易主体,市场化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塑造市场交易主体,使之成长,适应市场制度,减少交易的外部性。

3. 市场组织(主要是中介组织)的建立和完善。组织的产生就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使市场制度更好地配置资源、分配剩余。

我国农业市场化的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1978~1984年为第一阶段。首先进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集体经营体制的改革,逐步引入市场因素,改善政府交易方式,缩小统购派购范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允许市场交易的出现,对农产品增量进行市场化改革。国家统购派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1981年的113种减少为1984年的60种,18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22.1%。

2. 1985~1991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加快政府调控向市场交易的转换力度。主要的措施是取消统购派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同时减少定购数量,扩大议购议销,部分直至全部放开农副产品价格。1991年与1986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中,国家定价由17种减少为9种,销售价格国家定价由14种减少为7种。农产品生产价格形成中,计划定价由1978年的94.4%下降为1990年的25.2%。

3. 199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该阶段市场化进程速度加快,农产品市场制度已基本形成。1992年和1993年许多地区取消了合同定购任务,实现了向市场定价制的转变。农产品消费价格形成也由市场交易决定。这些改革措施主要是存量的补贴改革,许多也是互补式改革的要求。

伴随着农产品市场化改革进行的还有诸如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化改革,农业投入市场化改革,农村市场的建设,农业中介组织

的建立完善等，它们都与农产品市场化进程一样，具有渐进、阶段性特征。

农业市场化的绩效。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加：

1. 以市场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许多农业潜在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促进了农村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我国农村以往单一的经济结构。

2. 市场化产生的农村非农产业带来物流、人流的增加，使作为市场交易载体的农村小城镇数量剧增，规模扩大，走出了一条主要依靠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

3. 改革过程中农业在劳动投入减少，资本、技术投入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多的增长，不能不归功于农业市场化改革。

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实例说明，市场配置比计划配置更有效率。

讨 论 题

1. 农业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什么？
2. 农业市场改革的趋势是什么？
3. 农业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是什么？

三、天津市鸡蛋价格管制的复归

鸡蛋，作为中国人现阶段消费中的重要副食商品，其供求状况及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历来受到各地各级政府的关注。天津市和全国各地一样，大体经历了从计划统购统销逐步到市场调节这样一个过程。从其价格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月～1985年5月）：价格调整阶段。这期间天津市在保证鸡蛋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诸方利益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提高了鲜蛋的收购价和销售价，为下一步深化鸡蛋价格改革做了必要准备。这一阶段天津市鸡蛋购销体制仍属由国家单一渠道控制的统购统销模式，只是价格作了一些调整。

第二阶段（1985年5月～1991年11月）：“三多一少”流通格局形成阶段。随着价格改革的深化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开始，天津市改变了过去鸡蛋经营上的固定进货渠道、固定销售对象、固定倒扣作价的“三固定”形式和分层次、分环节、大流转的批发经营模式，逐步形成多经济形式、多流通渠道、多经营方式和少流通环节（“三多一少”）的禽蛋流通格局。这一阶段国有副食商业仍是鸡蛋经营的主渠道，发挥着较大的调控作用。

第三阶段（1991年11月～1995年8月）：市场调节开始与价格管制复归阶段。1991年11月后，天津市鸡蛋及饲料价格的全面放开，标志着整个鸡蛋购销体制由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的根本转变。这一制度变迁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然而却不是稳固的。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又重新实施了价格管制制度。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部分复归。在保护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市政府制定了国有副食商店鸡蛋销售价格的最高限价，并强制执行，同时配合以对鸡蛋实施部分统一收购和部分统一销售的措施。

第四阶段（1996年3月至今）：价格管制解除与市场调节最终确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表现为市政府对鸡蛋价格管制的解除和市场机制最终成为调节鸡蛋的生产和销售的主角。这种市场调节机制对政府计划管理体制的再次占优势是伴随着鸡蛋价格的相对稳定，人民群众心理承受能力的相对提高和市政府在鸡蛋价格问题上的观念转变而出现的。它预示着市场调节制度将长期持续存在下去。

1995年，天津市政府面对鸡蛋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于8

月25日对鸡蛋价格实行管制，最高限价定为每公斤鸡蛋6.60元。为了对价格管制工作进行组织、协调和统一领导，市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天津市鸡蛋调市工作组，各级政府也成立专门办公室。其次是鲜蛋调市，逐层下达鲜蛋调市任务，保证鸡蛋日上市总量达到10万公斤，调市价格（收购价）定在6.3元/公斤。市里统一按6.6元/公斤销售。由于1995年前后，天津市鸡蛋的成本逐步由6.3元/公斤上升到6.7元/公斤，再加上0.1~0.2元的生产利润，出厂价定为6.8~7.0元/公斤比较合理，因此养鸡场每售一公斤鸡蛋损失0.5~0.7元。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出现有价无货，政府实行层层补贴并且挂牌销售每人限购1.5公斤，各销售点每日排队人数200~300人。市公安局曾派100多名干部分别到各鸡蛋销售点维持秩序，物价、交通、工商部门也抽调大批人员进行监督。

从1991~1994年，天津市对鸡蛋购销体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4年，1995年9月至1996年3月又实施价格管制制度，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部分回归，1996年天津市政府最终放弃了鸡蛋价格管制制度。

讨 论 题

1.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得失优劣分析。
2. “菜篮子”、“米袋子”工程最理想的制度安排是什么？
3. 价格管制复归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四、四川长虹的体制转型过程

目前，中国多数国有企业背负着人员负担、债务负担、社会负担三座大山，如何使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是中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四川长虹的改革

体现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使我们看到了大型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曙光。

四川长虹的改革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旧体制下艰苦创业。四川长虹（原名长虹机器厂）是我国“一五”计划期间确定的，为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由前苏联援助制造机载雷达等电子设备的工业项目。1956年5月开始筹建，1958年10月1日在绵阳动工兴建，国家投资1000多万元，到1959年末，建成4座主厂房共2万多平方米，8幢单身宿舍9200平方米，职工达到2074人。经过缓建，重点续建，1965年11月基本建设工程完成，交付生产使用。长虹厂建成后，隶属于第四机械工业部，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主要从事军品生产。70年代中期，军品任务减少，长虹厂开始走军民结合的道路，1973年开始试制电视机。从1959年到1978年在旧体制下的20年间，共实现利润1178.6万元，生产不稳定，波动很大。

第二阶段：突破旧体制的束缚——从扩权让利到承包制。长虹厂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走上了军民结合的道路，但是从1973年到1978年的5年间，民品产值在总产值中的份额都没有超过20%。

20世纪80年代是长虹厂发生巨大变化的10年，在生产发展和体制改革两个方面都开创出崭新的局面，为90年代的新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6年8月，长虹厂建成了第一条彩色电视机自动流水生产线，这是从日本松下公司引进的先进技术，引进当年达到年产32万台，其中彩电达到19.6万台。

在体制改革方面，20世纪80年代长虹也迈出了大的步伐。建厂以来，长虹厂按照前苏联模式，先后隶属于国务院各部（第一、二、三、四、电子工业部）领导，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财物、产供销全部由部统管，企业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缺乏活力。1985年7月，企业下放到四川省，1988年1月

再次被“正式下放，依托企业所在城市”，即由企业所在绵阳市政府管辖。当时，想通过中心城市管理企业的改革措施，来解决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条块矛盾。

20世纪80年代长虹的改革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虽然在整体上还没有突破计划体制的框框，但是，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改革在逐步深化。80年代初期到1983年以前，长虹厂实行企业基金制度，利润大部分上缴国家，按企业标准工资的10%~12%提取企业基金作为职工的奖金，在企业基金制度下，企业的自主权非常之小，1984~1985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办法，按实现利润的55%缴纳所得税，按25%上缴调节税，比上年增产部分按50%~70%减征调节税，余下为企业留利，按照第一步利改税办法，企业留利只有10%~20%，上缴国家太多，企业的自主权仍然很小；1985~1986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企业按实现利润的55%缴所得税，按14%（后改为7%）缴调节税，调节税的基期利润定为1000万元。纳税形式也有所变化：1985年以前实行产品税（民品按销售收入5%缴税）；1986年起，实行增值税，按销售收入减去外购部分费用的差额的14%缴税。第二步利改税没有使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国家收走了实现利润80%以上，留给企业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仍然很少。

1988年是长虹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开发的直角平面54厘米（即21英寸）彩电大批量投放市场，供不应求，价格猛涨，获得了高额利润。当年同政府签订的承包合同，上缴利润为4000万元，结果当年实现利润为1.97亿元。如果按原承包合同实行，企业要留1.57亿元之多，而国家仅得4000万元，不符合当时提出的“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的分配原则。因此，绵阳市财政部门提出修改承包合同，改为上缴国家1.57亿元，企业留4000万元。企业不同意，理由是，承包合同经过公证，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修改。绵阳市委、市政府在

处理长虹承包合同的问题上，采取了“支持企业，留富于企业”的非常开明的态度。不仅决定不修改合同，仍然按 4000 万元上缴国家，而且还决定稳定合同，同长虹建立稳定的承包关系。新的办法是，对长虹实行利润总承包，在 1988 年上缴利税 4000 万元的基础上，每年递增 7.2%，一定 7 年不变。这一承包办法极大地推进了长虹的发展，从 1989 年开始，长虹每年都有上亿元，甚至几亿元的企业留利用于技术改造，到 1993 年长虹股票上市前夕，长虹彩电自动生产线已由原来的 3 条，发展到 14 条，产量由 1987 年的 42.3 万台，增长到 159.8 万台。利税大包干的承包制和政府的支持，对长虹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 1988 年国家按照“国家得大头”的原则，收走 1.57 亿元，企业没有资金搞技改，就不会有今天的长虹；如果绵阳市政府不实行一定 7 年的利税总承包，长虹以后若干年也不会有 10 亿元以上的资金用于技改，从而也不会有今天的长虹。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长虹在企业内部改革方面也迈出了大的步伐，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一是实行厂长负责制，相应推行党委保证监督、职工民主管理的制度；二是调整机构设置，加强了决策机构、经营机构、产品开发机构和外事机构，促进了科学管理；三是在人事、劳动、工资三大制度的改革方面，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实现了能上能下的干部聘任制度，不拘一格地选聘了一批新干部到领导岗位；对新招工人实行合同制，将班、组、室的机构设置权和资金分配权下放给各车间和科室；在工资制度上，实行浮动升级办法，职工工资中的活动工资部分达到 40% 以上；四是推行年度目标管理和厂内各单位经济责任制，车间实行单位经济承包，科室实行专项任务承包。通过以上各项内部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逐步实现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使长虹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前进了一大步，实现了从过去单纯指令性计划到指令性、指导性计划和市

场调节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转变，参与了市场竞争，相应地使产品结构、生产方式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长虹在横向经济联合，企业扩张方面迈出了第一步。1986 年长虹实行横向经济联合，组建起“四川长虹电视机集团”，这是一个以大型企业为骨干、长虹为主体、以长虹牌名优产品为龙头的、有 63 个企事业单位参加的企业集团，包括了高等院校、商业部门和生产厂家，具有一定的科研、生产和流通实力。1988 年 3 月，更名为“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

第三阶段：制度创新——从承包制到股份制。长虹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利税大包干的承包制，取得了很大成效。一是保证了国家增收。二是实现了企业多留。三是促进了企业技术改造。四是促进了职工集体福利的改善和工资、奖金的增加。承包制把职工集体福利的改善和工资、奖金的增加同企业的经营成果挂起钩来，职工的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捆在一起，企业留利多，用于职工住宅建设及其他集体福利设施的投资，以及用于调资和增加奖金的资金就多，职工生活改善就快。

长虹实行承包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效益提高，并为企业下一步改革积累了经验和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承包制难以克服的缺陷日益暴露。一是承包制是在高度集中的旧体制范围内进行的改革。二是承包制不能使企业真正实现自负盈亏。在承包制下，国有企业的产权没有变化，企业的资产仍然是国有的，仍然是单一产权的国有产权制度，企业只有国家赋予的一定范围的经营权，而无自己的资产可以负亏。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在产权制度上的缺陷越来越暴露，越来越明显。

当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到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长虹不失时机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92 年长虹采用社会募集方式，由长虹机器厂独家发起，面向社会发行股票，组建四川长虹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末的持股情况为：发起人（长

虹机器厂)持有国有法人股 14062.96 万股,占总股本的 70.96%;社会法人持有的法人股 757.90 股,占总股本的 3.82%;个人持股 4997.37 万股,占总股本的 25.2%,总股本为 12.3 亿元。

长虹成功地实现了从国有独资企业,向产权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转化,实现了国有产权制度向法人产权制度的转变。如果说股份制改革使长虹迈出了制度创新的第一步,那么,按照母子子公司模式组建企业集团,使长虹迈出了制度创新的第二步。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是由核心层、紧密层、半紧密层、松散层等四个不同层次的企业构成的企业联合体。核心层为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它是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在公司性质上属于国家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负责经营本集团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它与下属子公司是以资产为纽带的全资关系和控股关系。紧密层由母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组成,长虹电子集团公司包括三类子公司:一是集团公司的全资公司;二是由集团公司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已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它是集团公司最大控股公司;三是集团公司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中中合资、中外合资、中中外合资的公司)。如长虹新艺电工有限公司为集团公司控股 63%的有限责任公司,长虹科技开发公司则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第三层次半紧密层为集团公司参股的关联公司,长虹集团公司在组建时同九家公司有参股关系。第四层次松散层为同集团公司有较为稳定的生产经营技术联系的企业。长虹集团公司和长虹集团的组建,为长虹的进一步发展和加速扩张奠定了组织基础。

讨 论 题

1. 评价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的利弊。
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3. 结合本实例，说明国有企业 3 年走出困境的发展对策。

五、邯钢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邯钢是老牌国有企业，装备技术与国外现代化钢铁公司相差很远，人员多，“企业办社会”问题相当严重；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为建筑钢材，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是很高；论市场竞争的基础条件，邯钢与国内的宝钢相比，存在不少的差距；与世界现代化的钢铁公司相比，更不在一个技术档次上。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优势的极普通的国有企业，却创造出了令国内外企业界惊叹的成就。邯钢 1997 年人均创利、吨钢利润、百元产值利润率，皆名列世界冶金行业的前茅。吨钢成材率、成本利润率、销售利润率、资金周转率、炼钢连铸比等 10 多项指标排在冶金行业第 1 名，其余指标绝大部分排在前 3 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功的因素正逐步由单一约束条件向多元约束条件发展。邯钢的成功就是靠创造成功的管理手段及不断推进技术创新获得的。

同样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外进口钢材和走私钢材的严重冲击。加上国内消费低迷等因素，邯钢的生产经营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电价的调整、煤价的调整、运输价格的调整，加上增加折旧，仅这几项，邯钢全年减利近亿元。而且钢材价格每吨平均下降 135 元左右，邯钢全年生产 250 万吨钢材，减利 3.4 亿元。两项相加，几乎全部抵消了 1997 年 5 亿元的利润。显然，1998 年要完成 5 亿元的利润计划，将要付出超常规的艰辛。面对严峻的现实，在部分职工中产生了指标到顶、潜力挖尽等畏难情绪，将希望寄托在钢材的“价格”上。但总经理刘汉章并不这样认为，他的观点是：“只要技术经济指标上还有差距，设备的产出水平没有达到极限值，企业就有潜力。对照指标找差距，同国内外先进企业比高低。邯钢在冶金行业 44 项主要指标中，现在仅有 10

多项是第1名，其余30项不是第1名，而是第2名、第3名，这就是差距和潜力。如果所有指标都在国内领先了，还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去努力。即使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了，也需要不断挖潜创新，不断进步和提高。”于是，刘汉章倡导在全公司开展了“全国学邯钢，我们怎么办”的大讨论，统一了认识，坚定了信心。

同时，邯钢深化完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经营机制。公司在挖掘设备潜力，充分发挥设备功能的具体措施上，努力抓好“增铁促钢”的增盈办法。在邯钢的系统化生产中，炼钢、轧钢能力大于炼铁能力。若外购生铁化铁炼钢，吨钢成本将上升20%，若年增产30万吨铁水，将使邯钢综合效益再提高10%。因此，加大自产铁水的比例，千方百计抓铁促钢，使生产能力充分发挥，这样既可节约购铁成本，又能使炼钢、轧钢产出水平有较大提高。可是由于高炉的容积所限，增加炼铁能力如果靠新建高炉，需要资金和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刘汉章的办法是挖掘现有设备潜力，加大科学管理的力度，在设备的使用效率上再上台阶。为此，公司组织技术攻关，贯彻按效分配原则，终于各项指标都创出了国内一流水平。像设计能力为月产20万吨的炼铁高炉，自1998年4月以来，产量逐月提高，达到月产24万吨以上。全年多产生铁35万吨，仅此一项全年挖潜增效1亿元。同时，由于铁水产量增加，炼钢、轧钢系统能够满负荷生产，挖潜增效6000万元。在煤炭供应、矿石供应等方面，实行公开招标、比价采购制度，原材料供应部门在外部市场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1998年较1997年压缩支出5000万元。各项检修费、能源、油料消耗费较1997年节约6%左右。在进一步挖掘内部各项潜能的基础上，1998年较1997年可比产品总成本又降低2.61%。

在深化模拟市场核算机制的基础上，邯钢的产品结构得到优化，各项物化指标有了新的突破。

综合能耗全国大中型企业平均为 1100kg/t, 10 大钢为 1043kg/t, 邯钢降至 804kg/t, 在全国冶金行业仅次于宝钢排第二位, 比去年降低 51kg/t, 仅此节支 7000 万元。

坚持以用户满意为宗旨, 狠抓产品实物质量。16 个主要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达到 100%, 钢材双标率达到 100%, 其中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产品比例达到 49.5%, 省部级以上的名优产品占全部产品的 86%。1998 年以来开发出 10 多个新产品。

技术改造力度大, 进展快, 效果好。为调整产品结构, 经国务院批准的具有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年产百万吨薄板坯连铸连轧热卷板工程, 目前土建和基础已基本完工, 今年底可望建成投产。同时利用发行股票募集到的 26 亿元资金和自有资金, 淘汰工艺装备落后、能耗高、成本高、质量差、污染严重的小烧结机、小高炉、小转炉、小轧钢机, 建设现代化、大型化装备。

拓展市场空间, 向市场要效益, 向管理要效益。面对全国钢铁的产销率连续 3 年下降, 邯钢采取的市场竞争战略是: 确保同类产品中质量最优; 加大售后服务的力度; 及时按合同发货; 在全国增设 20 个经销处, 组建 150 多人的直销队伍奔赴全国各地促销; 坚持现钱发货制度, 不搞相互拖欠。资金周转速度提高了, 资金使用效率也提高了。

邯钢所兼并的舞阳钢铁公司, 通过推行邯钢模拟市场核算经营机制, 兼并 5 个月后扭亏为盈。1998 年, 在市场遇到很大困难的特殊情况下, 钢产量较上年增长 50%; 钢材增长 28%; 预计全年可实现利润 300 多万元。

邯钢兼并衡水钢管厂 8 个月后, 衡水钢管厂扭亏为盈。目前工厂产销两旺, 开始焕发生机。

邯钢成功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新思考:

1. 国有资产的代表者怎样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 用什么约束手段能够使产权主体的利益得以保证。用什么方法激励和约束经营管理者, 促进企业效益最大的目标实现。邯钢的成

本控制体系，把企业经营者、生产者的利益同企业的设备运用、资产增值、产出效益综合联系在一起考核。这是资产增值一体化的责任管理制度。邯钢这种方法的突出特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各个岗位均根据市场的要求和变化，科学决定出自己的劳动质量和劳动强度。将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方针落到了实处，在保证职工主人翁地位（如参政议政、厂务公开、民主评议干部）的同时，在经济上让职工有家可当、有财可理、有责可负、有利可得，贡献大的可以先富起来。达不到平均要求的成本指标，该岗位干部职工的工资奖金将受到直接影响，甚至职工的工资级别、福利、干部的任用等都受到影响，可谓奖罚分明，从而调动了职工积极性。这种多元要素、体系化、具体指标约束的管理方法，在现代化联合企业中具有约束力强、管理层次深、管理效益高的特点，是适合一切制度下的现代管理方法之一。

2. 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之所以丧失竞争力，主要原因是近几年的重复建设，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加上装备老化、技术创新能力弱，产品不适应市场，需要大力度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另外，管理滑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邯钢走过了一条让人钦佩的成功之路。从建厂到1997年，邯钢共投入60.5亿元，形成了104亿元总资产。他们本着装备要先进、投入要少、建设要快、产出要多的原则，在1998年到2000年3年期间，将要投入70亿元建成别人要花100多亿元才能建成的工程。

在技术改造中，邯钢的经验是以降低成本为主线，本着“量力而行、梯度发展、滚动前进”的原则，结合中国实际，结合企业的实际，结合市场的实际进行。从1991年到1997年，邯钢共投资40多亿元进行了22次大中型技改，每项均比别的企业少投入30%~50%的资金，但效益却多产出50%以上，完成基建技改项目217项，不仅没有一个项目超支，而且比预算还节约投资

5.37 亿元。邯钢出资 2000 多万美元从法国购买的 100 吨转炉炼钢厂，全套设备属 20 世纪 80 年代先进水平，设备是八成新，全部建成投产的投资仅是新建装备的 1/3，其有效产出水平不亚于新设备，但设备成本及折旧费用降低了一半，企业的效益自然比全部新建要提高 100%。

邯钢易地改造建设一台 400 平方米的烧结机总投资 6.5 亿元，装备属世界一流水平，而国内有的厂家要花 16~17 亿元；邯钢易地改造建设一座 2000 平方米高炉总投资控制在 9 亿元以内，别的厂家要花 20 多亿元；邯钢仅投资 5700 万元建成 5 台连铸机，新增连铸能力 150 万吨，而别的厂家建一台小方坯连铸机就要花 4000 多万元。邯钢能做到少花钱办大事，关键在于精打细算，自力更生，坚持自己能干的不外委，能国内制造的不进口，能引进软件的不引进硬件。投资数亿元的项目，也要从一点一滴算起，使投资费用节约，建设周期缩短，投入产出效益保持较高的水平。如第四轧钢厂，原为一套年产 10 万吨棒材的小型横列式轧机，消耗高，质量保证不了，如不改造，没潜力可挖了，若大量投资企业又没钱，公司只给他们 8000 多万元，要求改造成一个年产 30 万吨全连轧棒材车间，该厂抽出一半人员搞生产，一半人员搞改造，除土建、热加炉外委专业公司建造外，所有机械、电器总重量 1500 多吨的安装任务全部是本厂职工一边生产一边安装，仅节约安装费就达 1240 万元。

3. 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邯钢，以刘汉章为首的领导班子，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搞好国企为己任，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计时间，不计报酬，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领导带头不做。

这些年，邯钢新建职工住房 30 多万平方米，一批一批的职工都乔迁新居，而总经理刘汉章和书记王国兴仍然住在不足 60 平方米的旧普通住宅里。邯钢的钢材用在北京许多重点工程中，

像西客站、国际饭店、东方广场等都是邯钢产的钢材在唱主角，然而刘汉章的办公室仅仅是一间 12 平方米的小斗室。他的一句名言说得好：“再好的办公室也炼不出钢”，这正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他把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荣辱与兴衰同自己的生命和信仰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正是这种无限忠诚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事业心，才使得邯钢的资产保值增值速度高于其他企业，才使得邯钢的利润水平高于条件好于自己的其他企业。

4. 尽快推动产业升级，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现代化水平，增加市场有效供给是国有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主要环节。邯钢通过市场研究发现，尽管国内钢材市场销售不畅，但进口钢材却有很大的市场。汽车用薄板、造船板、马口铁、合金钢，我国每年进口这些优质钢材要花掉巨额外汇。尽快提高钢铁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我们的装备水平，提高产品的档次，有效满足国民经济对高品质钢材的需要，是钢铁企业急需解决的难题，也是启动市场的关键所在。邯钢人把企业每年积累下来的利润，不是忙于建造荣光一时的高楼大厦，也不是让职工高兴一时分光吃净，而是勒紧腰带瞄准世界一流的工艺技术，抓紧实现引进、吸收、消化、创新、提高的产品升级战略，使技术装备逐步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能生产国内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全部钢材。

邯钢计划在 2~3 年内，着眼于优化结构和产品的更新换代，逐步淘汰小高炉、小烧结机、小转炉、小轧机，建设现代化、大型化装备。调整产品结构，改变目前只能生产普通建筑钢材局面，形成以板材为主，建筑用钢材为辅的产品结构。实施精品战略，使产品的技术含量、档次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生产成本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通过“精干主体，分离辅助”（这几年，邯钢共精减 7000 多人，没有将一人推向社会，全部转岗从事新的生产门路，立足企业内部消化），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均年产钢达到 250 吨。

邯钢 1990 年的资产仅为 22 亿元，1998 年已达 140 亿元，

还不包括兼并组合企业的资产。8 年净资产由 5.8 亿元增加到 69.6 亿元，国有资产增长了 11 倍，资产负债率由 70% 下降到 44.7%。上缴国家利税 40 亿元，支持地方财政 7~8 亿元。国家对邯钢的投资回报率近 300%。同时，邯钢企业为社会兴办了 10 多所学校、2 所医院，管 10 万人吃住、4 万人就业。

邯钢经验及其他国有企业的实践再次证明，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并且完全可以大有作为。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运行方式及规则是相互适应和融合的。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国有企业同样具有发展壮大的机遇和潜力。

讨 论 题

1. 你认为邯钢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2. 邯钢模拟市场核算的机制存在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六、国企改制中的犯罪

党的十五大以后，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国有企业改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全民财产的再组合、再分配，涉及全体公民的切身利益，因此预防和遏制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犯罪，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是当务之急。

据某地检察机关举报中心统计，在受理的各类举报案件线索中，涉及乘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之机进行违法犯罪的占 30% 以上。国企改制中的犯罪现象表现为：

（一）视改制为“发财机遇”

许多不法分子将企业改制当作自己致富的一次重大“机遇”。一个腰缠万贯的厂长一语道破天机：“今天最有效、最快捷的发财致富方式，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钱。”

某国有企业投资创办了一家公司，公司资产达 1600 万元。公司经理马某在经营了一段时间后，未经厂方许可，暗中修改了公司章程，并采取吸收假股东、假验资、假审计等手段，数次变更工商登记，转移资产，将一个国有公司变成了马某个人的私有公司。马某一夜之间成了腰缠千万元的“财主”。

某主管局党委书记郑某，在一公司筹建中，利用手中职权，不交股金，非法占有公司 20 万元的股份，并接受“干股”分红 5 万元。

(二) 国有子公司变了姓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国有企业在境外设立了子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由于在境外设立公司必须以个人名义登记注册，有些不法分子便有预谋地逐步采取子公司更名和股东、股权变更转让等手段，使他们掌握的境外子公司脱离国内公司，变为其个人控制的私人公司。厦门一家汽车公司的总经理，通过借贷外汇，购买、抛售公司法人股等手段，将公司在香港注册的一家子公司，变成自己所有的私人公司，侵吞国有资产 3700 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三) 贿赂现象伴随发生

有的企业在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和债务清理中，向有关主管部门、资产评估机构等工作人员行贿，以求少评或漏评企业资产。

广州个体户张某得知某地要出售一批国有企业，就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认识了国资局一位实权人物，送上贿金 10 万元。这样，只需在评估企业的资产时做点手脚，张某购得数家企业稍加整理后，转手卖出，就是 200 多万元的差价收入。

(四) 对国有资产“压级压价”

按照规定，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应该将原有企业全部资产投入公司，转为股金，成为国家股。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利用资产评估、产权界定之机降低国有资产价值，低估、少

估、漏估的情况比较普遍。特别是非经营性资产、无形资产的评估经常被忽略。

如某企业改制前账面固定资产净价为 110 万元，经评估测算本应保持账面值，但有关领导则要求评估人员人为压低一点，结果七折八扣，只评估了 70 万元，改制未开始，资产就人为地流失了三分之一多。

按规定，国有资产按重置价格评估增值后，应将增值部分计入国家股，但很多企业却将其计入资本公积金，作为全体股东共同享有的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股比重的不合理降低。

实践中低价折股、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往往和公司、企业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索取、收受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回扣等相交织，互为因果。

（五）中介组织不“中正”

在企业改制工作中，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一些中介组织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阻碍了企业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由于我国目前的评估机构绝大部分是由政府部门组建并管理的，资产评估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情况比较严重。为了拉客户、争项目，评估机构之间不正当竞争现象愈演愈烈。有的评估机构不是以优质服务争取客户，而是以“高额回扣”为诱饵招揽业务。

某些评估机构的工作人员置职业道德于不顾，为一点蝇头小利，一味迎合委托单位的不正当要求，故意提供虚假的评估文件，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方便。有的甚至和不法分子相勾结，采取“低评买进，高评卖出”的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牟取暴利。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故意提供虚

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六) 虚假的非国有股份

当前，一些单位和个人出于种种非法目的，在企业设立登记环节中，虚报注册资本，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骗取登记，侵害国有资产。

某企业和一个体户张某合作共同组建一公司，企业出资 120 万元，张某出资 80 万元。注册时，企业资金到位，张某资金却迟迟不到位，后来通过“打点”关系，公司予以注册。张某一分钱未花却拥有公司 40% 的股份，年底分红时分得现金 20 万元。后经知情者透露，原来化名张某的个体户实际上就是企业里的厂长。

实践中虚假出资主要是指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时，在评估作价时，对个人或非国有资产的出资额高估作价，而对国家资产故意低估作价；抽逃资金主要是把个人或非国有的资本从中抽逃，只留下国有资本营运，危及国有资产的安全。

(七) 虚假报告骗公众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在制作招股说明书、认股书、企业债券募集办法时，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公司、企业债券。

二是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八) 清算成了“最后的晚餐”

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他人利益的，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两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金。”

有的亏损企业提前得知自己将被其他企业兼并，于是便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将一个企业分解成若干小企业，将主要设备、资金和技术骨干从母体中剥离出来，并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原来的企业就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使兼并单位只能得到一个烂摊子和巨额债务。有的企业在清偿债务之前，就分配公司、企业的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犯罪现象也比较复杂，政策性很强，而且随着改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类型的违法犯罪。这类违法犯罪侵犯的主要是国有资产和市场经济秩序，要从根本上遏制和预防此类违法犯罪现象发生，还有待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

讨 论 题

1. 如何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2. 怎样才能遏制国有资产重组中的犯罪？

七、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收购战略

可口可乐能发展至仅低于万宝路的世界第二品牌，其经营战略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收购。

可口可乐最早历史可追溯到 1886 年，随后，通过特约装瓶厂（几乎遍设各个国家），使其生产的软饮料得以畅销全球。直至 1960 年，该公司基本上是一家单一产品的制造商。20 世纪 60 年代，公司陆续兼并、购进了其他一些企业的股权，才逐步向多种经营业务发展。1960 年购进了密纽特·梅德冷冻果汁公司；1961 年又购进了邓根食品公司（主要经营咖啡业）及其他一些

企业。随着多种经营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从单纯生产一些软饮料及其他食品发展为还从事其他工业生产活动。例如，1970年购进了化学溶液公司，从而开始水净化系统的业务；1977年又购进了普莱斯托产品公司，增加了塑料薄膜包装材料的生产业务。特别是在1977年购进了泰勒酿酒公司后，公司业务突飞猛进，一跃而成为美国第五大酒商。在20世纪70年代，该公司陆续买进了各国好多家装瓶厂，为其产品行销全球奠定了稳固基础。

到戈伊祖艾塔担任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时，他认为要保持可口可乐的竞争优势，必须进一步增添可口可乐的文化品味，加强其美国经典象征的形象，于是一再坚持公司战略应进一步向娱乐进行分化。收买哥伦比亚制片公司的决定被认为是精明之举，尤其是《幽灵爆破者》在票房上一炮打响之后。

1985年，可口可乐公司买下了使者通讯公司的全部产权，它是几家主要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不到一年，即1986年春天，他们又买下了默芜·格里芬制作公司。华尔街被戈伊祖艾塔一系列举动震动起来；同样的可口可乐股票在戈伊祖艾塔出任主席的那天以29美元的价格出售，而在5年之后要卖到100美元以上。在1978年，《商业周刊》曾经认为可口可乐公司已防卫不住百事可乐的挑战，然而，现在它承认戈伊祖艾塔是“一度守旧的企业中勇于改革的经理人”。

对可口可乐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说，百事可乐曾以其富有潮流感的广告及形象步步抢占汽水市场可口可乐的地盘。同样，收购也是百事可乐增强资源优势，扩大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

“七喜”是美国汽水中继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后的第三品牌，以其“非可乐”的市场定位而深受顾客喜爱。1986年，百事可乐决定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收买七喜。如果收购能成功，百事可乐公司旗下的各种品牌市场占有率将超过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急忙进行回击，立刻与市场中的第四位“佩珀

博士”公司进行秘密谈判，准备收购这家公司，以对付百事可乐的挑战。这笔交易的谈判只用了不到1个月时间。1986年2月23日，可口可乐公司宣布同意出4.7亿美元购下“佩珀博士”公司，并等待联邦反垄断机构的批准。

这两桩收购最后都没有成交。因为在反垄断机构的官员们看来，如果这两桩生意成交，那么就会有80%的市场掌握在这两家大公司手里，结果只有将它们一并否决。

在汽水市场上，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保持4:1的比例，然而百事可乐公司却并不把自己认为是“可口可乐的竞争者”，百事可乐的总裁韦恩·卡洛威认为：百事可乐在美国的市场已相当成熟，而可口可乐又力量雄厚，除非不惜成本，否则要抢后者的汽水市场是极不可能的。反观世界上那些目前迅速工业化的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正逐渐改变，市场潜力不可限量。于是在他的领导下，百事可乐逐渐向一家多元化的食品和饮料公司发展。目前，百事公司的制造部门每天生产价值3000万元的薯片和其他小食品，4300万元的意大利藻饼、墨西哥式杂米饼和炸鸡，以及7000万元的百事可乐和其他饮料，饮品只占百事公司业务的35%。

百事公司的食品工业的发展，许多是依靠收购实现的。目前百事旗下拥有塔科·贝尔墨西哥式快餐店连锁店、必胜客薄饼店以及著名的肯德基家乡鸡连锁快餐店等。这些进行国际化拓展的快餐店在中国、俄罗斯等都大受欢迎，百事可乐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快餐店集团。卡洛威充满信心地说：这些初步成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甚至还未真正起步呢。在美国以外，我们有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百事通过拓展全球性业务，在5年时间内把海外资产增加了一倍，达到560亿美元。1993年，百事先后收购了一个墨西哥餐厅连锁集团和一个同级的意大利薄饼餐厅连锁集团。

在饮品市场上，百事可乐也将收购作为一种快速攻击市场的

方式。可口可乐一般与各地独立的瓶装厂商建立合作，由它提供浓缩料，由后者负责投资兴建瓶装生产线，购置运输卡车和管理销售网。这样的做法是使可口可乐用十分低的投资而获得非常高的利润。与此相反，百事可乐与费列图·雷合并，这家庞大的食品厂使百事可乐获得了长足发展。

让我们来看百事可乐最近进行的一次“快速攻击”，这次攻击名为“沙漠风暴行为”，发生在墨西哥的蒙特雷。蒙特雷是个干旱得像沙漠一样的地区，每个居民平均每年汽水消耗量为1114瓶，高居世界首位，可口可乐在其市场中占九成。但该地区还没有塑胶瓶装的汽水饮料，1992年12月，百事可乐从Eupo Protexa集团手中收购蒙特雷市的百事汽水厂49%的股权，从而控制了该厂。百事可乐调入250辆新卡车，并运入50万箱新玻璃瓶，200万个2升装塑胶瓶，8000个冷藏柜。同时要1150名新职员接受16天的严格训练。百事可乐通过收购以创纪录的速度兴建了一家新灌装厂。

4月27日，收购瓶装厂4个月后，百事可乐在街头和广播中展开宣传攻势，2个月内，百事可乐的销售点由6900个，即市场的30%，激增至18.6万个，即市场的81%，百事可乐推出的新瓶装要比可口可乐便宜23%，结果一下子将市场占有率提高了3倍，达到了24%。

百事可乐发展食品业，目前已拥有全球快餐店22万家，总营业收入达250亿美元，1993年纯利高达16亿美元，普通股每股值2美元，1994年增至2.38美元。对比之下，可口可乐普通股的总市值为570亿美元。几乎是百事的2倍多，而可口可乐1993年的税前利率为22%。

讨 论 题

本案例对国企改革有什么启示？

八、建设市场的警钟

1998 年政府在追加投资的基础上，又增发 1000 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据有关部门调查，近几年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事故造成的损失和浪费也在 1000 亿元左右。另一组统计数字更让人触目惊心：中国每年基本建设中的土建投资达 16000 亿元，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仍有 20% 的工程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而国家检察机关近几年查处的 7 万多件贿赂案件涉及建筑质量的占到 63%。

云南昆禄公路通车十几天，便满目疮痍成为废路；重庆綦江虹桥建成不到 3 年，就带着几十个鲜活的生命转瞬消失；浙江宁波大桥发生断裂……路陷，楼倒，桥塌，媒体不断曝光的这些坏消息，令人对本该是百年大计的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不但充满远忧，而且顿生近虑。一连串血的教训，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觉。

我国正处在各项建设快速发展时期，尤其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这样一个建设的高潮时期，工程质量这一重大课题横亘在我们面前。工程质量不同于一般商品的质量，隐患是否会演变成杀伤力极强的杀手？这些顾虑并非杞人忧天，专家们呼吁警惕第四次工程事故多发期的到来，有鉴于过去，有警于将来。

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建设时期，这对建设从业人员的素质及建设安装工程的质量应当有更高更严的要求。而现状令人忧虑，全国 3500 万建筑从业人员，其中 2000 万农民工，面对日益复杂的工程也使很多技术人员遇到了过去从未遇到的问题。更有甚者，许多工程在缺少充分论证、科学分析的前提下匆匆上马，加上劣质建材充斥建材市场，事故隐患自不待言。

倒塌的重庆綦江虹桥是“六无工程”，但问题远不止于此。

断裂的宁波大桥，其设计方案由国内一流专家审查通过，招标投标、正式合同、政府质量监督也一应俱全。这就不得不让人去深究困扰着工程质量的深层原因。

不是没有基本的工程质量法规和制度。如果现行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能够严格执行的话，应当能够基本保证工程质量的百年大计。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体制的改革，我国已形成以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这四项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工程建设管理体制的框架。但这几重保险却面临着多重挑战，在仍旧存在的政企不分、封闭管理及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等面前，法规条文显得很脆弱，社会上各类腐败现象在工程建设领域充分表现出来：

1. 业主行为不规范，没有约束机制，为回扣受贿、垫支压价、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和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了滋生的土壤，很多质量事故由此发生。

2. 建设工程招标制相当一部分走过场。某些领导干部滥用职权，干预工程招投标，项目法人行为不规范，甚至行贿受贿，任意胡为。虽然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按照国际惯例开始实行工程招投标，但由于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和缺乏权威性法律的因素，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致使业主规避招标、虚假招标、私泄标底、投标人贿赂投标、哄抬标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犯罪行为充斥招投标领域。

3. 本该对工程施工实施监督管理职能的监理，某种意义上形同虚设。自鲁布革电站建设从国外引进监理制起，这一制度在我国推行已有 10 年，但监理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在实际工作中，设计、施工、监理“一条龙”现象比较普遍，导致监理无效。

治沉痾要下猛药。建筑市场病症核心是管理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治理。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正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立法确立规范的市场准入原则，用法律屏障阻挡资质差的企业入市，规范市场经营行为。与之配套的《项目法

人责任制》确保将项目的责任落实到人。《国家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的监督检查办法》，将重大工程项目的稽查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共同建设一个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

除法律规范外，建立和完善各地的有形建筑市场，是现阶段规范政府行为和工程交易行为的一个有效形式，在1999年初召开的中纪委三次全会明确规定，地市级以上的城市都要建立有形建筑市场，并进行规范化管理。

建设部已经从1999年3月1日起，集中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加大整顿和规范建设市场的力度，重点清理和整顿危害极大的挂靠和转包、违法分包问题。一些省市则相继对工程项目进行了拉网式清查：上海限时一年，集中查处和纠正所有投资在50万元以上的各类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各类违纪违法行为；山东对“九五”以来竣工和在建的工程也在进行质量大排查。

整顿清查建设市场，仅仅起到对当前治乱的作用，而要治本，就要下大力气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封锁，进一步深化建设体制的改革，真正实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保证工程质量的百年大计。

讨 论 题

1. 住宅建筑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 怎样健全建设市场？

九、美国、日本、法国的宏观调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宏观调控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对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概要地介绍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情况。

（一）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大概可分为六个阶段：

1. 1945~1952 年，为战后恢复时期，其中 1952 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年份 1944 年的生产水平；

2. 1953~1960 年，经济徘徊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仅有 2.4%；

3. 1961~1969 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达到 4.2%；

4. 1970~1982 年，经济滞胀时期，年均增长率降低到 2.8%，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涨率达到 7%；

5. 1983~1989 年，连续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达到 3.8%，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涨率降低到 3.6%；

6. 1990 年至今，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保持了无衰退的持续增长，物价指数则保持在较低水平。

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

1. 促进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危机；

2. 抑制通货膨胀。这两个目标之间有时存在矛盾，美国政府一直在摸索如何将两个目标统一起来。20 世纪 90 年代的调控实践已开始将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即在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物价水平。

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两个手段实现。美国的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约为 30% 左右，因此，政府通过增税或减税措施可以有效的影响企业和投资者的活动，从而达到抑制或刺激生产投资活动的目的。此外还可以通过政府订货等方式增加需求总量，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货币政策通过联邦储备委员会执行，该委员会有 7 人，均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同意后任命。执行金融政策有三大手段：公开市场业务、调整贴现率、变动法定准备金比例。实际调控中，这两个手段是结合起来的。一般通过减税政策鼓励生产投资增长，通过紧缩的货币政

策防止通货膨胀发生。形象地说，就是“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实现持续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的双重目标。

（二）日本政府的宏观调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有巨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日本的实际生产水平仅相当于其历史上的1925年，产业职工仅有214万人。但到1994年其GDP达到4.2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3万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经历了11次景气循环（到1993年），1986~1993年为第11次景气循环，其中景气上升期达4年，平均增长年率为4.9%，景气下降期也达到3年左右，是又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景气下降，此次上升和下降分别被称为“平和景气”和“平和萧条”。

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很高，是以市场失败论为理论基础的。战后日本在落后情况下追赶欧美，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多方面干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干预。实际证明，这比经济结构在市场调节下的自发升级要有效快速得多。

日本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主要依靠以下手段：

1. 政策手段。有政策目标和相关的措施构成，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类。包括景气对策、产业政策等，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活动的方向。

2. 经济手段，又称为金钱诱因。主要由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构成。具体运用中有政策减税、政策金融等。这些政策都为政府的政策目标服务的。

3. 法律手段。使政府政策措施法律化，包括一般法和个别法。例如，一般法有《外汇及外贸管理法》，个别法有《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据公正交易委员会统计，1979年，日本全部法律1500余项，其中179项是反映政府产业政策的，政

府直接通过法律干预的产业，其产值占全部产业产值的 20% 左右（1975 年）。

4. 行政指导。通常通过指标、劝告、指导等形式进行，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正式的命令形式，但实际效果很大。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始终坚持财政收支平衡政策和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金融政策，并与稳定物价的政策结合起来。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法国政府的宏观调控

1950~1975 年，法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5%，比其他西欧国家平均增长率高 0.5~1 个百分点，其后，法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和联邦德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仅低于日本的增长率水平。

面对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法国选择了计划作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1946 年建立了全国计划委员会，1947 年开始执行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至今已实行了 11 个五年计划。形成了被人们称为的“计划主导型宏观调控模式”。法国政府认为计划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各有自己的长处，二者应该密切配合。认为计划的作用是向全国提供所有与国家利益符合的集体目标。

在宏观调控方面，认为主要的目标是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协调好。但他们认为供求关系的协调或平衡，主要不是依靠短期的政策，而是依靠中长期政策。他们更强调改善供给、增加供给的目标。计划、财政和金融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三大手段，其中计划主要负责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财政和金融政策则侧重于短期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

讨 论 题

1. 美、日、法宏观调控有什么共同点？
2. 美、日、法宏观调控对我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十、一次空前的成功之作

“过热——治理——再过热——再治理”……

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屡屡出现的“大起大落”现象，曾被人们称之为新中国发展史上难以根治的一大顽症。

然而，自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局面，以及今年以来继续得以保持与巩固的一系列调控成果，引起国内外经济界和舆论界一片喝彩，纷纷赞誉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是我国把“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宏观调控实践所获得的空前成功。它表明：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把握逐步深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驾驭经济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日趋成熟。

在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之际，在顺利实施跨世纪宏伟目标的进程中，回顾总结这次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将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长期坚持下去，为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确保我国经济继续沿着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的新轨道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一）一座里程碑

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空前高涨的阶段。但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偏向。盲目扩张投资导致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乱拆借、乱集资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急剧扩张，超过社会供给的可能，导致经济总量失衡，货币发行过量，由此引发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92年10月开始，零售物价涨幅逐月升高。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再度导致“大起大落”。

如何抓住这一大好机遇，保持和发展这一良好势头，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已成为摆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项历史性重任。

创造一个持续平稳的增长时期，比之实现经济扩张或经济紧缩的单一调控目标要困难得多。仅就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周期性经济波动进行的宏观调控也有多次，但都远没有进入“软着陆”的境界。“急刹车”的办法带来了震荡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人民生活、社会安定造成极大冲击。减缓经济波动，从“过热——治理”的不良循环中摆脱出来，进入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的良性循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亦是一个普遍性难题。

面对这一难题，党中央和国务院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及时洞察了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动因之后，提醒各地区、各部门要对经济形势有个总体把握，加强预见性，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注意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吸取以往等到酿成大祸时方被迫调整的教训。

事实证明了党和政府高超的预见性。1993年上半年，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7.4%，6月份达到创纪录的21.6%，通货膨胀已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尽管当时对经济运行中是否存在过热现象的认识尚不统一，但决策层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在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关于制止乱集资和加强债券发行管理的通知》和《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等整顿金融秩序、抑制盲目投资的一系列法规性文件之后，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正式下发，以扼制经济过热势头继续蔓延和发展。国民经济运行从此开始了“软着陆”。

这次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没有采取以往调整中“急刹车”、全面紧缩的做法，而是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把控制物价上涨作

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突出结构调整，保持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适度增长，形成了适度从紧、稳中求进的主基调，使之既有利于抑制通胀，又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而避免了重蹈历史上“大起大落”的覆辙。这不仅在我国没有先例，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一成功实践，为我国今后的经济运行开辟了一条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的新轨道，为我国经济的跨世纪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从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漫漫征途中，竖起了一座里程碑（如表 5-1）。

表 5-1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峰谷落差

历次波动（起止年份）	峰谷落差（百分点）
1953~1957	9.6
1958~1962	51.7
1963~1968	24.2
1969~1972	20.4
1973~1976	11.0
1977~1981	6.5
1982~1986	6.4
1987~1990	7.8
1991~1996	4.5

（二）两个新突破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先例可循，一切要靠实践，在实践探索中前进。本轮宏观调控在理论认识上取得的颇多突破，都是实践的升华和总结。这些突破，可简单概括为以下两点：

1.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全面、正确地理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正确处理和把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者关系，以及发展中速度与效益关系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既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也善于把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来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在经济发展上强调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又及时推进治本性质的各项改革，审时度势地进行预调和微调。

2.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并必须坚持搞好宏观调控，有了广泛统一的认识和较为正确的把握。这是此次宏观调控获得成功的重要理论成果。

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些同志对市场机制促进发展深信不疑，但对市场经济到底要不要搞宏观调控则有模糊认识。对此，党中央国务院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在当今世界，没有政府干预的绝对自由经济是不存在的，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历了沉痛教训之后也开始重视运用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在我国，特别是在经济改革的转轨期，如果没有宏观调控，也就不能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必然带来的盲目扩张和被迫紧缩的恶性循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效率与公平等关系方面，作出了成功的探索。

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遵照市场规律进行宏观调控，正确地运用计划和市

场两种手段优化资源配置，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三）诸多宝贵经验

这一轮宏观调控的成功，不仅在理论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在实际操作上也积累和创造了诸多的宝贵经验。

1. 抑制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效结合。总量和结构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在以往的历次宏观调控中，如果总量受到控制，结构问题就暴露出来；如果迁就现有的结构，总量就无法控制。这也是以往宏观调控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这一情况，在本轮宏观调控中，一方面总量控制严格而适度；另一方面在结构上有紧有松。对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于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的部分，对于“泡沫经济”部分，坚决从紧。而对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于农业、交通通信、能源以及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于有效益、有市场、有利于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骨干企业，则给予支持。从而使抑制投资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1993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实施“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两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粮食连年增产。农业的稳定增长，为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条件。由于集中力量加强国家重点建设，长期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明显缓解，基本消除了重要生产资料长期存在的全面短缺现象，供给层面的改善，不仅缓解了总量控制造成的诸多矛盾，减缓了经济波动振幅，而且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

2. 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有效结合。不是简单地用“压”的办法解决经济过热问题，避免陷入经济大起大落、冷热循环的怪圈，在成功实现“软着陆”的同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

本框架，这是本次宏观调控的一条基础经验和重要的成功之处。

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起，财税、金融、外贸外汇、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这些改革，着眼于理顺基本经济关系，解决深层次矛盾，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都是过去所没有的。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

这几次重大改革的成功，对近3年多来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作用。财政包干体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赤字不再靠向银行透支弥补，改用发行国债的办法解决，减轻了中央银行发票子的压力；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主体地位，对商业银行开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剥离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加快其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这些措施进一步增强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信贷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确保稳定币值这一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实现。金融改革还提高了经济的货币化、市场化程度，为国家利用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调节货币供应量和资源配置创造了条件；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推行建设项目资本金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权责结合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约束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这为以经济手段为主，有效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作用。

3. 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有效结合。本次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调控手段的运用上，以经济手段和法制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着眼点在于既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又要有利于让市场机制进一步确立并充分发挥作用。主要是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和经济杠杆，同时加快经济立法进程，以法律法规调节和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物价监督等方面仍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

从总的趋势看，以市场为导向的间接调控机制在宏观调控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过去主要依赖计划手段进行直接调控的局面正逐步得到改观。由于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计划、金融、财政得以密切配合。

4. 适度从紧与灵活微调有效结合。这将是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综观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看出，抑制通货膨胀虽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不能盲目乐观，掉以轻心，更不能因此而改变宏观调控的大方向。

目前，宏观经济运行面临来自就业和国企经营困难的压力。因此，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放松银根的呼声，把失业率上升和企业经营困难归罪于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事实上，造成失业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复杂的。除了经济体制转轨期间和结构调整过程中有一部分职工失业或待安置外，还有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给就业带来的巨大压力。失业问题，主要应当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就业门路，实施“再就业工程”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而不能采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换取就业压力的暂时缓解。

国有企业经营困难，根本原因也不是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这是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恰恰是适度从紧的总量政策，为结构调整营造了一个强制性的外部环境。

并且，目前执行的适度从紧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党中央、国务院非常注意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握宏观调控力度，适时灵活微调，力求取得最佳调控效果。1996年，国家随着物价涨幅明显回落，适时停办新的保值储蓄，5月和8月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减轻了企业和国家负担。同时适当增加贷款规模，保证农产品收购，支持结构调整。

中央确定，要努力做到“稳中求进”，按照“九五”计划的要求，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根据经济运行具体

情况，不失时机地进行预调和微调。可见，适度从紧和灵活微调的有机结合，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这是实事求是、从大局出发的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六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的对外关系，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要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除了坚持改革，搞活国外经济外，还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一、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 ——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

（一）中国的“谈判方式”

亨利·基辛格博士 1985 年 11 月 9 日在我国外交学院的演讲中讲过这样一句话：“我深信，如果我们按照我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谈判方式行事……这就是可以达到的（指在他看来军备控制谈判应达到的目标）。”

基辛格是一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打过交道，特别是同中国打过许多次交道的有丰富经验和取得过重要成就的美国外交家。中国的外交给这位西方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外交确实具有使中国取得一系列外交成就的鲜明特色，这一特色的重要表

现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以及二者之间的正确和巧妙的结合。

（二）“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0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着手进军西藏并准备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和平解决西藏的问题，以统一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这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当时在西藏有特殊的利益和影响。中印两国政府曾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文书来往和外交谈判。从1950年两国来往的外交文书看，两国对于西藏问题的立场有着原则的分歧，也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妥善解决。例如，印度政府在来文中只提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印度为保护来往于西藏和印度之间的印度商人和香客的特殊利益，不仅在西藏设有贸易代表处、邮政设施，而且还驻有少量的武装卫队。怎样解决好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于中印两个刚刚获得独立和解放的亚洲大国和邻邦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最后，两国通过谈判在1954年顺利达成了有关西藏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协议，建立和发展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两国共同倡导了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可喜结局的出现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就中国方面而言，这也是由于一方面坚定地坚持了原则，同时又采取了灵活的态度。这表明在中国严正指出西藏的自治是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自治，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应企图“影响和阻挠”；同时，中国政府真诚希望“在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外交、通商和文化关系，保证两国友好关系的正常发展。在随后举行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又充分照顾到印度和西藏地区的传统关系，同意为来往于印度和西藏的印度商人、香客提供方便，为他们开放指定的山口、通道和集市，并允许印度按互惠原则仍在西藏设立贸易代表处。1954年4月29日两国顺利

地签订了《中印有关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印度关于撤出武装卫队的换文》。正是上述历史性的协定中，两国一致确认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的诞生是我国正确运用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结果。随着历史的进程，“五项原则”已成为不仅是指导不同政治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成为指导有相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三）万隆会议和“求同存异”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代表不同种族和政治社会制度的29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以“万隆会议”著称，标志亚非国家觉醒的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西方国家和反动势力非常害怕这次会议的召开，尤其害怕新中国在亚非国家中影响的增长，因而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议。他们先是制造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4月11日的空中爆炸事件，后又利用一些与会代表对新中国的疑虑和反共情绪在会议上以中国为主要目标提出种种挑衅性的问题和攻击，企图挑起无休止的争吵以达到破坏会议的目的。实际上，会议也因此而濒临破裂的危险。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自始至终面临着十分复杂和微妙的局面。为此，周总理没有在全体会议上宣读早已准备好的主要发言，而作了长篇的即席补充发言，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周总理向会议宣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明确指出“我们的会议该求同而存异”。周总理的发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一点也没有让步，他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好制度”，但又指出没有必要在会议上“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一国的政治制度”。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本可以提出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紧张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问题，要求会议讨论，但中国没有。他又就不同政治和宗教信仰问题，所谓的颠覆活动问题，双重国籍和少数民族等问题都作了既坚持原则又令人信服的表态和说明。他指出会议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也不应妨碍会议就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协议。他最后还说，“我们是容许不明真相的人怀疑的”，他欢迎与会代表访问中国，并且非常机智地反击西方国家的挑拨离间说：“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总理的话大义凛然、光明磊落，同时又照顾大局、通情达理，把使会议濒临破裂的种种疑虑和攻击一一解释开和顶了回去，扭转了局势，终于使会议在“求同存异”的精神下达成最后决议，发表共同宣言，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订了被称为“万隆精神”的十项原则。

“求同存异”原则的提出是实际运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产物和典范，从它提出之日起即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是在这一原则刚刚提出时，还一度认为仅仅适用于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而不适用于对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当时看来，对西方国家只有“异”没有“同”，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同”没有“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随着对这一原则本身的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应该说，“求同存异”在国际中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

（四）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自从尼克松总统 1972 年 2 月访问中国至今，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上海公报》是中美两国发表的第一个联合公报。正如尼克松总统在 1972 年 2 月 21 日为他访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中说：“让我们一开始就承认这样几点：我们在过去的一些时期曾是仇敌。我们在今天仍有重大的分歧……”是的，当时的美国

曾与新中国为敌 20 多年，两国不仅政治社会制度不同，而且在对待当时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特别是亚洲重大问题上，立场也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双方又都有恢复和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这是共同的。两个“宿敌”寻求关系正常化，发表第一个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这决定性的一步将怎样迈呢？两国当时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独特形象，又都各有自己的盟友，在联合公报中将怎样反应？妨碍两国关系最关键和最微妙的问题——台湾问题又将怎样措词？人们拭目以待。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人们发现公报对以上一系列问题都作了当时条件下可能做到的和意想不到的最好表达。这是在国际关系史上从未见过的一个独特的联合公报。就我国而言，它既是“求同存异”原则的一次独特运用，也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一次独特的运用。

《上海公报》的第六和第七段篇幅最长，讲的不是“同”而是“异”。一段表达了中国对国际问题特别是亚洲问题的基本立场；一段表达了美国对国际问题特别是亚洲问题的基本立场。“你讲你的，我讲我的”，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各自保持了自己的固有形象和立场。然后，公报才转到双方取得协议的各点：一致确认“五项原则”，确认不在亚洲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别国或国家集团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确认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达成针对第三国的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接触公报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时，中国方面全面的、毫不含糊地重申了一贯的原则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国应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旨在制造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一切活动。美国对这一问题的表态是：“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此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

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此外，公报还确定双方保持联系以及发展民间往来与贸易等。

以上就是《上海公报》的基本内容。

中美之间的外交谈判并非始自尼克松访华前后。在这之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早已时断时续地进行了15年，但毫无成果。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拒绝按“五项原则”对待台湾问题。通过《上海公报》，美国确认了“五项原则”，在事务上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承担了最后从台湾撤军的义务。尽管美国的承诺离开中国所坚持的原则立场距离仍很大，措词也十分含糊。但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这已是划时代的突破。因此，中国在明确全面地重申了自己的原则立场的同时接受了美国的表态，采取了灵活和现实的态度。公报发表以后，我国又在美国仍同台湾当局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同意互设联络处，以保持渠道的畅通，也同样表现了坚持原则下的灵活性。中美正式建交和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在《上海公报》发表之后7年才做到的，但是《上海公报》所产生的反响和连锁反应之快却出乎人们的想象：日本在《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半年即同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41个欧、亚、非、拉国家在美国之前同中国建交，使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从60多个增到100多个；维持代表处水平达20多年之久的英国和荷兰也于1972年将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此外，在尼克松访华前夕，联大已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中国在几乎所有联合国系统的组织中都先后都有了自己的真正代表。总之，出现和形成了对中国空前有利，也对美国和整个世界局势非常有利的新局面、新格局。这种新局面和新格局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以他们的非凡的主动精神所共同开创的；而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这更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根据整个形势作出疏通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正确和巧妙地运用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另外，“一国两制”也体现了这一特色。当然，运用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的策略原则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所坚持的原则必须是正确的；二是要达到的目标必须是正义的。

讨 论 题

1. 我国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外交时应怎样坚持邓小平理论？
2. 一国外交最重要的是什么？

二、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洲经济共同体（简称欧共体，英文缩写为 EEC），最早的名称是西欧共同市场。它是根据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6 国外长在 1957 年签订的《罗马条约》于 1958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的。40 多年来，欧共体的规模不断地扩大，成员国不断地增多。1973 年 1 月 1 日，英国、爱尔兰和丹麦正式加入共同体；1981 年 1 月 1 日，希腊被正式接纳为共同体的第 10 个成员国；1986 年 1 月 1 日，葡萄牙、西班牙成为共同体的第 11 和第 12 个成员国；1995 年 1 月 1 日，奥地利、芬兰、瑞典三国正式加入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国扩大到 15 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塞浦路斯 6 国期望在 2002 年被接纳为共同体成员国。

在《罗马条约》中，6 个成员国提出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经过努力统一大市场于 1993 年 1 月 1 日建成，主要内容有：

1. 建立统一大市场所需要的大量共同体立法，并使之转化为成员国的国内法。

2. 取消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即取消成员国贸易的一切海关手续。

3. 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即共同体的居民、企业、公司、

金融机构可向共同体的任何一个国家，用共同体的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货币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和储蓄，就像在一个国家内一样。

4. 实现人员、劳务的自由流通。统一大市场实行“欧洲公民身份”制度，规定凡是共同体公民，不论其在共同体的哪一个国家都享受与当地公民同样的就业、工资、社会福利待遇和开办企业、设立机构的权利，还规定劳动者的毕业文凭和其他资格证书在成员国一律生效。

5. 对共同体的决策机构实行了重大改革。将一致同意原则改为多数表决通过制，大大提高了共同体的决策效率。

6. 制定了实现统一市场的大量配套措施。如政府采购公开化措施，监督企业合并措施，统一技术标准措施等。

1993年1月1日午夜，欧洲人民点燃了1000座灯塔，照亮了欧共体12个成员国的夜空，庆祝他们梦寐以求的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正式诞生。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个由3.4亿人口，802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组成的，国内生产总值达5.3亿欧洲货币单位的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诞生，标志着欧共体12个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边界已不复存在，标志着欧共体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商品、资金、人员、劳务在12个成员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现有资源将在这一空间里得以合理的配置，使生产成本得以下降，效率得以提高，从而推动所有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整个综合体的综合实力。

在欧洲统一大市场诞生的前夕，1992年12月欧共体12国首脑在荷兰的一个小城市马斯特里赫特会晤，规划了一体化合作的下一步目标：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会议通过了《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货币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马约》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的3个阶段，其中第3阶段的主要任务是1999年1月1日发行统一的货币——欧元，开始实行货币联盟，经过3年的过渡时期，到2002年替代成员国的货币。尽

管成员国与欧元的汇率尚待锁定，但欧元于 1999 年 1 月 1 日已正式启动。

欧元的启动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

1. 欧元将改变世界货币格局，世界货币体系将形成美元、欧元分庭抗礼的局面。1996 年，国际货币储备中，美元占 58.4%，德国马克占 13.6%，日元占 6%，英镑、法国法郎占的比例都很小。实行欧元之后，欧洲联盟成员国货币统一，按 1996 年的数字计算，欧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比例将达到 30%。据专家预测，到 2005 年左右，欧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将上升到 40%，而美元下降到 50%。从国际贸易中使用货币的结构来看，美元所占比例已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67%，降为近年的 40%，而同期欧盟各国货币所占的比例则从 13% 上升到 37%。因此，无论在国际储备中，还是国际贸易中，美元的作用都将被削弱。

2. 欧元将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结构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改变。欧元启动后，原以各成员国货币表示的债券和股票都将转换为以欧元表示。在成员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上原先存在的币种限制和汇率风险都将消失，并将省去兑换货币的成本和麻烦。证券的流动性增强，规模也将扩大。证券市场的中心一旦形成，将吸引世界各国来发行和投资证券，形成世界证券市场中心，并对纽约证券市场的地位发起挑战。

3. 欧元将为欧盟加速经济与政治一体化奠定基础。欧元的诞生宣布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诞生，欧盟国家可以真正利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与美国相抗衡，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联合也势必得到加强，提高欧洲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4. 欧元将推动区域经济集团化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欧元的诞生将对其他区域经济集团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世界经济的竞争更集中在区域集团之间。

讨 论 题

欧元的启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所谓亚太，即亚洲与太平洋的简称。亚太地区一般指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南北美洲濒临太平洋的国家，太平洋内岛国、大洋洲及亚洲东部各国和地区。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以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亚太地区加快了亚太经济区域合作的步伐。

亚太经济合作的构想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经历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探索和曲折发展之后，90 年代进入讨论实施阶段。1989 年 11 月，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提议下，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东盟等 12 个国家的 27 位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在堪培拉举行了“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的首次会议，标志着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问世。APEC 的产生，使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很快。中国于 1991 年 11 月与香港、中国台北一起加入 APEC，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在 APEC 中占据两个位置，而且 APEC 还是目前中国正式加入的惟一的国际经贸组织。因此，APEC 对中国意义重大。

亚太经合组织原 18 个成员国所拥有的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31%，人口 22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40%，国内生产总值 13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 50%，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45%。现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已达 21 个，人口超过 25 亿，占世界人口的 45% 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55%，是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组织中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人口最多

的经贸组织。

APEC的目标是实现成员国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1993年11月20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了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经济展望声明》,揭开了探讨促进亚太经济合作的序幕。1994年1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了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茂物宣言》,宣布APEC中发达成员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迟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首次把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并列为APEC活动的两大支柱。1995年11月15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大阪宣言》和《行政议程》,重申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两者相辅相成。1996年11月25日,在菲律宾苏比克举行的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是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97年11月25日,在加拿大海滨城市温哥华举行的APEC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推动APEC又取得了新进展。会议就扩大经济技术合作并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推动部分贸易部门提前实现自由化,以及进行区域金融合作等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1998年11月18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APEC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是在APEC成员努力克服金融危机,力争早日恢复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领导人着重讨论了克服金融危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等议题,并通过了《走向21世纪的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和《吉隆坡技能开发行动计划》等重要文件。

APEC成立以来,中国一贯抱着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参加活动。从1992年至今,中国已7次主动降低关税,关税降幅达60%。中国政府决定,到2005年,将工业品的平均关税降至10%;中国决定加入《信息技术协议》;中国将承办2001年APEC会议。所有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中国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的诚意,受到各成员国的普遍欢迎。

讨 论 题

1.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区别？
2.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前景如何？

四、GATT 与 WTO

1999 年 4 月，朱镕基总理访美勇闯“地雷阵”，为中国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英文缩写）扫除了美方障碍，中国即将加入 WTO。

（一）关贸总协定

WTO 的前身是 GATT（“关贸总协定组织”的英文缩写）。GATT 是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宗旨，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目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而制定的有关贸易政策的多边国际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就向联合国提议，召开世界贸易与就业会议并建立国际贸易组织。1947 年 10 月在古巴的哈瓦那举行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亦称《哈瓦那宪章》）。当宪章送交各国政府批准时，由于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国会不予批准，导致这个拟定中的国际贸易组织夭折。但在会议期间 23 个国家〔即参与《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的国家〕就关税减让达成了 100 多项协议，他们把宪章中的贸易规则和关税减让协议合二为一组成《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于 194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1. GATT 的基本原则

（1）自由贸易原则。GATT 渗透着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开展自由贸易的原则。它在原则上规定了参加 GATT 的国家原则上要实行市场经济，并以此为基础开展自由贸

易。

(2) 非歧视原则。即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应当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避免歧视或差别待遇。它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缔约国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一切特权，优惠和豁免，要同样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国其他各方。二是国民待遇原则，要求缔约国一方保证缔约国另一方的公民、企业、船舶及产品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公民、企业、船舶、产品的同等待遇。

(3) 关税减让原则。关税减让是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它要求缔约国的关税水平要逐步降低，而且已经降低的关税水平不能任意重新提高或采取其他手段使其发生变化。

(4) 公平贸易原则。为使贸易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总协定允许缔约国采取措施来抵消补贴和倾销行为对进口国造成的损害，反对不公平贸易。

(5) 透明度原则。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只允许关税而不能用非关税的手段来保护国内的产业，使保护程度是透明的，一目了然的。二是所有缔约国国内要统一贸易法规，并向总协定秘书处提交国内有关贸易法律规章和各种规定的副本。

(6) 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原则规定任何缔约国除征收关税外，不得设立或维持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缔约国产品的输入。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例外，如进口国国际收支陷入困难时，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减少时，等等。

(7) 磋商调解原则。《总协定》规定，首先在总协定范围内由当事国双方进行磋商。如果磋商不能解决交由特殊工作组解决，并向总协定理事会报告，理事会作出的决定如果一方拒绝执行，理事会可授权另一方进行报复。

2. GATT 的局限性

GATT 为国际贸易制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促进了国际贸易

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为稳定国际贸易秩序，稳定世界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起了重要作用，有“经济联合国”之称。同时 GATT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 GATT 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经济组织，因而存在很多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GATT 是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多边协定，在解决矛盾争端上不力。解决缔约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是 GATT 的一项基本工作。其基本程序是：贸易争端双方依 GATT 所拟定的贸易“交通规则”进行协商，以期达到满意的结果；若双方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则可要求 GATT 进行公平裁决；败诉方执行裁决。败诉方如不执行裁决，胜诉方可以进行报复，但报复需要有经济实力，如果没有经济实力作后盾，只能不了了之。

(2) GATT 保留了不少例外条款，而且某些条款本身含糊不清，往往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例如，总协定规定“数量限制的一般取消”，禁止使用配额。然而一些国家采取施加压力的手段迫使对方“自愿出口限制”。1979 年，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为 182 万辆，占美国汽车市场的 21%，美国提出要日本“自愿”出口限制，数量为 168 万辆，结果是 1980 年、1981 年、1982 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均为 168 万辆。

(3) 无法解决国际贸易中出现的新问题。由于世界贸易范围的拓展和世界科技进步，GATT 过去仅限于商品贸易的规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世界经贸发展的需要，于是出现了许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主要有：服务贸易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

(二) 世界贸易组织

随着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国际分工的加强使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增大；另一方面 GATT 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1990 年初，意大利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提出建议成立“多边贸易组织”。同年 7 月，欧共体 12 国正式建议成立“多边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委员会采纳了这一建议，

在 1991 年起草了《多边贸易组织协议》草案，并成立筹备委员会。在 1994 年摩洛哥的马拉喀什部长会议上，104 个成员国正式通过《多边贸易组织协议》，在美国的建议下，组织的名称改为“世界贸易组织”，即 WTO。1995 年 1 月 1 日，WTO 正式成立生效。

1. WTO 的特征

(1) WTO 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正式的世界性经济组织。WTO 具有法人资格，“多边贸易协定”作为世界贸易法，成员国必须按照各国宪法所规定的立法程序对其在整体上加以批准。它以国际法的形式出现，各成员国对于 WTO 承担着严格的法律义务。如果成员国的国内法与世界贸易法相冲突，应当一律作出符合世界贸易法的修改。

(2) WTO 在组织机构上比较健全，它建立起政府政策审议机构，对于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凡是不符合 WTO 的基本原则的政策也必须作出必要的修改。

(3) WTO 管理的范围更加扩大，有关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的协议相对比较完善，使得 WTO 具有统一性。

(4) WTO 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注意到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多边贸易协议”明确提出，各成员国进一步承认有必要作出努力，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相应的份额。

2. 中国与 WTO。1947 年 10 月，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仅派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贸易与就业”会议，并且参加了会议期间的关税减让的谈判活动，是 GATT 的 23 个缔约国之一。1950 年 3 月，台湾当局决定退出 GATT，于 1950 年 5 月 5 日正式生效。1949 年后，由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环境，无条件参加 GATT 的活动。直到 1980 年中国政府才开始与 GATT 直接接触，1986 年 7 月 11 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恢复 GATT 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时至今日，我国仍在“关外”，用朱镕基总理

的话说是“从黑发谈成了白发”，其原因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客观上的原因，即西方国家“要价”太高，他们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

13年来，中国为了扫除加入WTO的障碍，提出了若干惹人注目的承诺，如削减关税，放宽对美国小麦及柑橘类产品的进口限制，进一步让外资银行到中国开业，等等。但基本立场是不能改变的，它们包括：

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

第二，中国关税还会进一步降低，但不会降到10%以下，因为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水平为12%；

第三，在市场准入方面，金融、保险、零售业还会进一步开放，人民币继续保持稳定。但对金融市场、保险和证券市场的开放还得采取渐进政策，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讨 论 题

加入WTO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有哪些？

五、海尔，真诚到永远

“中国家电第一名牌”——多少民族企业梦寐以求的广告词，然而只有海尔有资格使用它，因为别人没有这个实力。

从1988年海尔凭借一流的产品质量获得我国冰箱史上第一块金牌之后，有关海尔的新闻便成了它最好的广告。

海尔是全国十大驰名商标之一。

海尔是家电行业中惟一的消费者最信得过的冰箱商标。

海尔在中国家电企业中最先获得国际ISO 9001认证。

海尔在国际市场竞争中10次中标。

1993年德国《TEST》杂志对德国市场上的产品进行抽查，

海尔产品以 8 个“10”的得分夺得第一。

.....

海尔，已成为高品质国货的代名词；海尔，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

然而，有谁知道当张瑞敏接手“海尔”的前身时，它竟是一个亏损达 147 万元的集体小厂，又有谁知道海尔人在 15 年来是以怎样的辛苦才换来了今天质量高于进口产品的精品国货？

“要么不干，要干就争第一！”1984 年张瑞敏进厂时所说的话后来成了海尔一贯追求的目标。当时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几乎是全国最后一家电冰箱定点厂，面临全国 100 多个厂家的竞争，如不出奇兵，很难站住脚。他们认为，要成为真正的名牌，必须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于是，海尔人引进了德国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技术，生产当时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代四星级电冰箱，结果是海尔产品凭借其质量的先进性和可靠性获得了领先一步的优势，使企业一举扭亏。

如今，海尔的五个主导产品都已相继通过了 ISO 9001、ISO 9002 国际质保体系的认证，最近又通过了 ISO 14001 国防环保管理体系的认证，成为中国惟一拥有国际“质保体系”加“环保体系”的家电双保险企业。持着这张“国际通行证”，在国际上屡获殊荣的海尔产品已出口到欧美、日本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家电进入国际市场最早、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企业集团，目前已在印尼设厂，并正在洽谈于波兰、墨西哥、沙特阿拉伯设厂。

那么，海尔为什么成功呢？主要有两条：

1. 能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这是海尔成功的关键。1996 年海尔集团电冰箱公司副经理周云杰在德国见到了老合作伙伴，昔日的“老师”德国利勃海尔的朋友，对海尔人说：“你们过去从我们这儿引进技术，可贵的是，你们能消化、吸收，能创造发展。”这决非溢美之词。据了解，

青岛海尔只用了 10 年时间，就走过了德国利勃海尔 50 年的历程。德国检测机构曾对德国、意大利、巴西、瑞士及海尔产品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是海尔产品得分最高，名列第一，德国利勃海尔的产品名列第二，“老师”败在“学生”的手下。

2. 严格的生产管理。在海尔，企业每天所有的事都有人管，做到控制不漏项，所有的人均有管理、控制内容，并依据工作标准对各自的控制事项，按规定的计划执行，每日把实施结果与计划指标对照、总结、纠偏，达到对事物发展过程日日控制、事事控制，确保事物向预定目标发展。总账不漏项、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事、管事凭效果、管人凭考核，这就是海尔人“日清日高”的管理方法，每天对各种消耗和质量进行清理，落实原因和责任，做到不日清，不下班回家。海尔产品的高质量正是来自严格的管理，来自“日清日高”的管理理念。“要干就干最好的！”在市场竞争中，先战胜最强的对手，其他对手自然会不战而胜。

海尔人拥有雄厚的高新技术实力和以高科技产品创造市场的经营理念，不知疲倦地创造着市场，不断地把开发的新产品推向国内外市场，使之走进千家万户。今天的海尔已拥有电冰箱、冰柜、空调、洗衣机等 7 个门类，3000 多个规格品种，其中冰箱产品平均每 7.6 升就开发一种新型号，最小间隔只有 1 升。每一种产品都以其独特的性能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那么多“大王子”、“小王子”、无霜无氟又可节能，不是繁琐，而是为海内外、东西方、大小家庭、南北地带的顾客作了人们意想不到却又十分体贴的设计。正如美国企业管理中的名言所讲，“企业第一位的不是创造利润，而是创造顾客”。海尔正是通过孜孜不倦地创造市场，才以其高质量的产品赢得了众多顾客的倾心。

有心人会发现海尔的广告词在 10 余年间走过了一个由“琴岛利勃海尔”到“琴岛海尔”再到“海尔”的简化过程，几个字的缩减，包含了海尔人的无数艰辛，体现了海尔人为发展民族工业的奋进精神。

“海尔，真诚到永远！”

海尔的这句广告词已传遍了神州大地。中国人，在记住了“海尔”这个名词的同时，心情又怎能平静呢？

讨 论 题

引进先进技术与国内技术创新的关系应怎样处理？

六、我国首例反倾销案

倾销是一种国际价格歧视，即一家出口厂商在国外市场上，以低于其他市场（主要指国内市场）上的价格销售商品。倾销在市场营销中是一种价格策略，而在国际贸易中被认为是价格歧视，被列入“不公平贸易”中。为了“公平”起见，进口国可以反倾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品在美国、欧共体、加拿大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等国遭受到愈来愈多的反倾销的诉讼。这些产品有猪鬃、油漆刷、蜡烛、薄荷等中国的传统出口产品，也有鞋类、毛巾、自行车以及一些化工产品。如1992年美国对我国出口的硫化染料征收210.35%的反倾销税。然而，外国商品在中国倾销的例子多年来也比比皆是，并且造成严重损害：在外国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下，不少企业濒临破产倒闭，工人大批失业。近几年外国新闻纸的进口倾销就是典型的一例。但是，在此之前，中国却没有以反倾销武器来保护自己。

1997年10月16日，吉林造纸（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9大新闻纸生产企业联合向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和国家经贸委提出申请，要求对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进行反倾销调查，从而开了国内产业对国外产品提起反倾销的先例。1997年12月10日，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经贸委对来自国外的新

闻纸倾销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加拿大、韩国和美国在大量对华出口新闻纸的同时，不断降低价格，以谋取更多的市场份额。1997年加、韩、美三国向中国市场出口的新闻纸价格分别比1996年下降了10.78%、7.79%、10.53%。由此导致中国国内新闻纸产业受到严重损害，主要表现在：

1. 中国国内相同产品的产量急剧萎缩。1997年1~11月份，国内9家新闻纸生产企业产量为55.45万吨，比1996年同期下降20.57%。

2. 中国国内相同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收入下降。1997年1~11月份，国内9家新闻纸企业销量比1996年同期下降26.8%，销售收入比1996年同期下降40%。

3. 中国国内相同产品价格被迫大幅度下调。1997年1~11月份，在成本趋高的情况下，新闻纸平均价格比上年同期平均下降7%。

4. 中国国内相同产品的库存大量积压。1997年11月底，国内9家新闻纸生产企业库存比1996年同期增长了2.55倍。

5. 中国国内新闻纸产业开工率严重不足。1996年下半年，国内9家新闻纸生产企业机器平均开工率为90%，1997年下半年下降为60%。

6. 中国国内新闻纸产业陷于严重亏损状态。1996年国内9家新闻纸生产企业实现税前利润2.65亿元，而1997年1~11月份已处于全面亏损状态。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纸产业失业率均大幅度上升。国内9家新闻纸生产企业1996年的平均失业率为4.46%，1997年达到17.94%。

根据以上事实国家经贸委的结论是：加、韩、美向中国大量倾销出口新闻纸是造成我国新闻纸产业受到损害的重要原因。而且这几个国家拥有巨大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同时拥有相当数量的库存，存在进一步向中国市场大量低价出口新闻纸的可能性。

为了消除倾销进口产品给我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失，外经贸部根据调查结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决定从1998年7月10日起，对原产于加拿大、韩国、美国进口到我国的新闻纸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从1998年7月10日，中国进口商在进口原产于上述国家的新闻纸时，必须向海关提供与初步裁定所确定的倾销幅度相应的现金保证金。

中国首例反倾销案有了结果。

讨 论 题

反倾销的实质是什么？中国应如何面对倾销和反倾销？

七、中策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市场而言，纯粹的西方外商投资绝大多数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扩张的行为。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及行为规范上的差异，西方外资进入表现为一个非持续的过程。而华裔外商投资则不一样，由于华裔不仅具有“同根性”，而且在文化背景和风俗人伦、语言习惯等方面是共同的，因此华裔外资进入不仅是持续的，而且势头迅猛。黄鸿年和他的中策投资有限公司的资金进入，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

（一）何谓“中策现象”

中策公司是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它的名字是1991年底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公司显示屏上出现的。其前身是红宝石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日资为主的上市公司。红宝石公司过去主要经营饮食房地产业，1991年亏损1038万港元，黄鸿年将其改名为中策之后，公司重心转为投资大陆工业，此后除了在香港增发大批新股集资外，还出售了中策在港的大部分物业，1992年扭亏为

盈，盈利达 6180 万港元，每股盈利率为 22%；1993 年盈利超过 1.6 亿港元。1991 年以来，中策公司的主要举措如下：

1. 积极参与国际资本市场运作。1993 年 7 月，中策将其在大陆所收购的轮胎、橡胶企业股权在美国百慕大注册为“中国轮胎公司”，并在纽约上市，企业资产投资表中的长期投资就是中策在太原双喜轮胎公司 55% 的股份和中策杭州橡胶公司 51% 的股份。此后中策与国内几家轮胎厂的合资，所使用的资金也是中国轮胎公司在美国集资所得，以此“滚雪球”的办法，中策所控制的中国轮胎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大。

2. 远离中国国境，从事产权交易和股权转换。1995 年 5 月，通过美国 Regal Int. Inc 注入 25% 的股权，中策将其拥有的泉州啤酒厂 60% 的股权和杭州啤酒厂 55% 的股权出让，使日本第二大啤酒厂朝日啤酒和伊藤忠财团获得了其中的 75%，至此，日本大财团伊藤忠终于跨入中国市场，同时以 100% 的股权（含北京中策啤酒 55% 的股权、莱州中策啤酒 53% 的股权及烟台中策啤酒 53% 的股权）在香港登记中国啤酒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由于中国啤酒股份集团公司以“中国概念”在国际资本市场寻求合作，而中策的运作又具有“符合国际惯例”的特点，国际大资本集团开始加入到中策的股权结构之中。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公司在中策目前已持有 10% 的股份，美国的摩根斯坦利、日本的伊藤忠也是中策的重要股东。

3. 成功地收购海内外企业。1994 年 4 月，中策收购了澳大利亚药业上市公司 Medical Rsc. Int. Ltd. 51% 的股权，从而通过该公司持有中国大陆烟台中策药业和无锡中策药业两家国有企业的股权。1994 年 7 月，又成功地收购了香港南海企业集团以及南海控股的明报集团，成为明报集团的最大股东，并通过一系列由其控股的企业联合成立了中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 在 1994 年内，中策又调整投资方向，将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同时投资周期延长。其中大型的投资项目包括从山西铺设煤

管至山东，总投资将超过 10 亿美元，由中策、美资和中国煤炭工业部共同合作，中策占有 25% 的股权；同时，在杭州将以 130 吨的方式兴建高速公路。其余的工业项目，诸如造纸、动力以及化工、机械项目都将逐步推向海外上市。

我们把中策公司凭借上市公司的性质，通过收购中国的国有企业股权，在美国或其他地区登记注册上市，其募股所获得的资金投向其收购的同行业企业的一系列金融资本运作行为称之为“中策现象”。

（二）中策公司进入我国国有企业的模式

第一种：选择经济效益良好的行业骨干企业，加以控股，组成不同行业的中策集团。如在橡胶轮胎行业中，中策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占 55% 的股权），杭州橡胶厂（占 51% 的股权），随后又收购了重庆、大连、银川等地的三个橡胶厂 51%、52.5%、51% 的股权。所收购的 5 家工厂中有 3 家是我国轮胎行业的定点生产厂。太原、杭州、大连、重庆的 4 个厂效益均不错。

第二种：一揽子收购一个地区的全部国有企业，泉州即为典型。合资前，泉州市属国有企业 37 家，固定资产 3 亿元，占地 114 万平方米，职工 1.4 万人，离退休职工 3500 人。1991 年实现利税 3150 万元，其中利润 496 万元，37 家企业中有 13 家亏损，亏损额 911 万元，待业在家职工 6000 人。1992 年 8 月，中策公司与泉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合资成立泉州中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方以 37 家国有工业企业的全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作价入股，占股 40%，中策公司出资 2.4 亿元占股 60%。合资后的中侨公司承担合资前的 1.4 亿元银行债务，中方在职职工全部进入合资公司。合资后中侨公司进行了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按照行业特点和优势互补的原则进行企业重组，1993 年实现利税 5000 万元，80% 的企业盈利，职工工资也相应提高。中侨公司的收入前景十分可观。

第三种：一揽子收购一个地区某一行业的全部企业控股权。中策公司与大连市轻工业局签订合同，收购 101 家企业，中策分 3 年投入 5.1 亿元，占股份 51%。后因在收购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国家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干预，只对其中两家实施了收购。

（三）中策成功的关键

1. 利用了最好的政治时机。黄鸿年早在 1984 年就萌发了收购、重组国企的念头，但当时的政治气氛并不合适，他因此退而结网，等待时机。当 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他于 1992 年 3 月果断出击，一举成功。

2. 利用最有利的经济时机。不知什么原因，中国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是相反的。外国萧条时中国兴旺，中国紧缩整顿时外国经济复苏。1992～1994 年初，西方经济增长缓慢，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1991 年初的 9% 以上降至 1992 年初的 8%、1993 年的 7%、1994 年初的 6%，随后才上扬，国际资本相对过剩。而中国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年年高达 10% 以上，而且拥有广阔的市场潜力，中策正是利用这一特点，获取了巨额利润，集中了大量资本。

3. 收购目标选择得当。中策单个收购的企业一般是有潜力、规模和盈利条件的中型国有企业。行业选择也较好，一般选择市场看好、需求量大、利润可观、产品进口关税高的行业进入，如啤酒、轮胎、造纸等。

4. 利用中国现行法规漏洞。原中外合资法规中允许外资分期到位，中策利用此漏洞往往预付 15%～20% 的投入就控制了国有企业，将头批企业在海外上市后所获资金再投入滚动式收购。又如中国法律规定外资合资方不得转让其合资股份，中策却转让了持有这些股权的海外控股公司股份，的确没有违反这一法律。同时中策利用中国对合资企业的各种优惠（如税收上的三免两减）、汇价双轨制等获利非浅。

讨 论 题

“中策现象”的启示。

八、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是对外开放的直接产物。从 1979 年至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 年。这一时期，拥有进出口权的专业外贸公司及各省、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机构，在对外开放政策鼓励下，开始在以往海外业务联系的基础上尝试着进行跨国经营。1979 年 11 月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公司与日本东京丸一株式会社在日本合资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境外开办的第一家合资公司。这一阶段属自发性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很少。

第二阶段：1985～1990 年。1985 年外经贸部作出“只要是经济实体，有资金来源，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业务专长，有合作对象的，均可申请到国外开设合资经营企业”的决定后，一批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内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开始在国外直接投资兴办企业。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进行跨国经营试点，接着首都钢铁公司也开始跨国经营。

第三阶段：1991 年至今。1992 年中国政府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内大量企业纷纷在“利用两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的战略指导下积极探索到海外投资办厂的路子，使跨国经营获得了迅速发展。据统计，自 1979 年至 1996 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已达 5045 家。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如下：

1. 投资主体。我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大致有以下四类投资主体：第一类是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综合机构，如中国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等，主要从事海外贸易、金融、工业生产和资源开发，有较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第二类是全国性的对外贸易公司和工贸、技贸结合型的大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纺织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等，它们因外贸体制改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而向海外发展；第三类是生产集团企业借鉴欧美跨国公司经验，直接在海外投资建厂或合资、合营、独资等，如首钢、二汽等；第四类是金融性的企业向海外投资，正逐步成为经营国际化的跨国公司，如中国银行。此外，服务企业和中小企业也逐步加入到对外投资的行列。

2. 投资规模。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在美国的炼油厂、澳大利亚的铝厂等少数项目外，普遍规模较小。据统计，平均每个海外企业投资额不足 120 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 260 万美元，发达国家平均为 600 万美元，相距甚远。这样小规模跨国经营难以在东道国中取得有实力的企业地位，也不能放手在东道国主导经济行业中发挥作用。

3. 投资区域。目前，我国的境外投资已遍布世界 139 个国家和地区，但从分布上看，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地区是相当集中的，几乎一半在港澳地区，在剩下的一半中，又有 60% 集中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欧盟等 20 多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对外投资不能过于集中在某个投资市场，而必须全方位地开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市场。

4. 投资产业。目前我国境外投资的产业范围从资源开发、加工制造、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到医疗卫生、旅游餐饮、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等涉及领域较为广泛。按投资额计，资源开发型约占 30%，工农业生产约占 50%，第三产业约占 20%。但我国的跨国投资过分偏重于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偏重于加工型项目投资，忽视了出口导向型行业的投资；偏重于建筑、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对日益占据国际投资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

资。

5. 投资形式。我国海外企业大多采取的是合资形式，大约占 80%，独资企业大约占 20%。就合资而言，在所有权安排上以对等或少数股权为主；从新建和购并的角度看，新建的大约占 95% 以上，购并企业在 5% 以下。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于 1988 年购买了美国海岸总公司太平洋炼油公司的一半股权，建立了中化太平洋炼油公司；1989 年又在美国购买了磷肥厂和磷矿，组建了中化美国农化公司，从而迅速地建立了自己的跨国生产经营基地。

6. 投资效益。开展跨国经营，无论在宏观上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还是在微观上提高企业技术管理水平，加速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其效益均十分显著。目前在我国的海外企业中，盈利的占 55%，盈亏持平的占 28%，亏损的占 17%。但是，我国海外企业的投资效益还不尽如人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头小，中间大”，即盈利可观和亏损巨大的企业占少数，大部分处于一种略有盈余，保本持平和少量亏损的状态。

讨 论 题

1. 我国企业为什么要跨国经营？
2. 怎样进行跨国经营？

九、深圳特区

深圳位于我国广东省东南沿海地区，毗邻香港，因境内主要河流——深圳与香港两地的界河深圳河而得名。

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1979 年 3 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邓小平

同志适时提出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倡议。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确定在深圳市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由此，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诞生。

深圳具有特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丰富自然资源。深圳素有“粤省前哨、门户”之称，它地处日本、韩国经台湾、香港到新加坡的中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经济战略地位，是我国通往世界的重要口岸枢纽和门户。深圳背山面海，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土地资源宜农、宜牧、宜林、宜渔，为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际环境的制约，加上“左”的思想影响，使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深圳处于与世隔离的状态，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是广东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建特区前的1979年，工业总产值仅为0.71亿元，农业总产值3.48亿元，职工人均年工资769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52.2元。县城的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镇内居民2万多人，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几家旅社，十几家小店。镇内几乎没有像样的城市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偷渡成风，大量劳动力外流，土地大面积抛荒。改革开放后，深圳特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创新，奋力拼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由铺摊子、搭架子、打基础的初创和奠基阶段（1979～1983年）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的战略调整阶段（1984～1991年），再到提高整体素质，增创新优势阶段（1992～1998年）。通过这样一个艰苦奋斗和迅速发展的过程，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1979～1998年，深圳累计完成基建投资1537.06亿元。城市建设面积已达299.5平方公里。建成了

具有相当规模的 39 个工业区，5 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 126 个，建成和在建的 18 层以上高层楼宇 610 多栋；建成了深圳机场、新火车站、新汽车站、皇岗口岸等交通枢纽设施；建成了盐田、妈湾、赤湾、蛇口等 8 大港区 119 个泊位。开通了广深准高速铁路、广深高速公路、平盐铁路、平南铁路和深惠、深汕等出境公路，修建了市区主要干线和 30 多座大型立交桥以及 1400 多公里高等级公路，形成以港口、机场、车站为枢纽，公路、铁路、远洋航线为骨架的现代化海、陆、空立体交通网。1998 年邮电业务总量 76.47 亿元，电话交换机装机总容量 167.48 门，全市电话普及率每百人 49 部。“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等先进通讯设施和技术已在深圳“登陆”，建成了大亚湾核电站、沙头角 B 电厂、南山热电厂、月亮湾电厂等大电厂和遍布市内的 10 多座燃油电厂，形成了一个电力充足的电网格局，是全国少数几个不限电城市之一。1998 年全市用电量 129.36 亿千瓦时。建成了东深三期供水工程等一批水源和供水工程，1998 年自来水日供应能力 338.7 万吨。还建成了大批设施先进且齐全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旅游、商业、金融等服务设施。

2. 经济高速增长。18 年来，深圳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 30% 以上的高增长速度，创造了闻名的“深圳速度”，深圳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最快时期的速度高出 2 个百分点。1998 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达 1289.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5%，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7 个百分点；全年工业增加值为 515.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9%；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25.52 亿美元；全年进出口额 452.76 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 264.24 亿美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 1 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 164.91 亿元；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2238.37 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 4 位。市场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0.7%，是全国零售物价最低的城市之一。

3. 招商引资成就瞩目，基本形成了外向型经济格局。从1979年至1998年，累计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外商投资项目近2万项，外资企业已达13000多家。其中在深圳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国际大财团、大企业、大商社150多家，投资项目达140多个。在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列入全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深圳有60多家；全国外商投资高出口创汇企业，深圳占6家。外资企业的出口创汇总额近几年均占全市出口创汇总额的一半以上。外资的投资结构已分布三大产业，尤其是金融业中的外资金金融机构发展迅速，1996年达到54家，分别来自港澳、亚太、欧美的12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银行、信托、财务、证券等多个金融领域。深圳通过发行B股筹集建设资金也获得成功，至今已有28家企业对外发行B股。深圳特区产品已远销全球五洲，与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跨国经营企业已有150多家。此外，在全国率先成功创办了保税区和保税生产资料市场。深圳已成为我国外向型程度最高的城市，并成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

4. 工业迅速发展。到1996年，深圳工业已形成拥有35个生产门类，1000多亿元生产能力和320多亿元固定资产，拥有各类企业32000多家的规模。高新技术产业挑起工业大梁，其产值、利润均占全市工业系统的1/3，产品出口率达60%以上。工业品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八成以上。1996年深圳有19种工业产品的出口量居全国第一，而且有若干产品成为世界区域加工中心，深圳还是全世界最大的手表和自行车生产基地。工业成为对深圳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在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高达41.7%，是深圳国民经济中的“龙头”。

5. 创汇农业发展迅速。深圳已初步建成750个鲜活商品生产基地和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龙头”的农副产品批发、零售市场体系，形成了以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为主体的现代农业体系。建立了2公顷（30万亩）农业用地保护区，并在广东和外

省建立一批果菜基地。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企业化经营管理，名优特品种大幅度增加，出口创汇保持较高水平，1996年，鲜活产品出口总值达11.2亿港元，销港活鸡、乳鸽、鲜奶和蔬菜分别占香港市场销量的40%以上、70%以上和25%以上。深圳农业经济商品率已达到95%以上，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

6. 辐射内地的功能日趋增强，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从1981~1996年，深圳财政已累计向国家上缴67.32亿元，海关、银行、铁路、邮电系统利润也向国家上缴了近600亿元人民币。对口扶持的范围扩大到广东省外的10多个地区，扶持兴建了258个“造血型”项目。深圳在经济上已成为内地融资、国际贸易、技术转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窗口”和基地。深圳积极实施“三点一线”的发展战略，已形成深圳接单——内地加工——深圳出口结汇的新格局，使内联经济在深圳蓬勃发展，目前深圳的内联企业有7000多家，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1/3。同时，“深资”也大举挺进内地，到内地投资总额达150多亿元，兴建项目1400多个。深圳对内地的体制投资和观念投资的辐射力越来越大。

7.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86元，人均消费性支出1543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35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年末储蓄存款余额861.88亿元。城镇恩格尔系数31.9%。城乡居民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全市人均居住面积15.3平方米，特区内人均居住面积14.4平方米。社会保险事业取得了很大进展，至1998年底，全市有57.61万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47.47万人参加了医疗保险，有71万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

讨 论 题

从深圳特区的成功看邓小平理论。

第七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要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改革政治体制，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一、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

曾几何时，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橡皮图章”的说法甚为流行。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与监督两大职权未能得到很好地行使。改革开放 20 年后的今天，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橡皮图章”形象已一去不复返了：在立法方面，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制定、通过的法律及有关法律决定即达 300 多个；在监督方面，由开始的讳言监督，到其后提出“用支持代替监督”的羞羞答答的监督，再到基本上敢于理直气壮地开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不能不说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各项具体监督制度也正在得到逐步完善。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的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李鹏委员长强调：“人大的监督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对人大监督权的概括。

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体制中属于核心地位，国家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它能够对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监督其实施，其他国家机关不能脱离或者违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意志而进行活动。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实质就是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权力的制约和规范。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承认或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社会主义的人大监督制度或者叫社会主义制约制度与西方的“三权鼎立”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也不同于党组织的纪检监督，不同于政协的民主监督，与政府行政监督的处理权限不同，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范围不同。

根据法律规定和人大监督的实践，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可以具体分解为知情权、检查权、审议权和处理权四权。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内涵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人民和国家的意志，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和宪法、法律的实施，所采取的了解、检查、审议、处理的强制行为。

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对象，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指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的，并向它负责的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具体讲就是同级的“一府两院”及其组成人员。就全国人大来说，还包括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法律监督方面，它还可以监督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权力机关不能直接监督普通公民和公务人员，否则就混淆了同国家执

行机关的职权。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按其内容可分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个方面。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已形成了一些具体监督制度，如宪法监督制度、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制度、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制度、审查和批准计划与预算制度、个案监督制度、询问和质询制度、特定问题调查制度以及罢免和撤职制度，这些监督制度正在日趋完善。但毋庸置疑，当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与立法工作相比，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完善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制度，切实改进和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首先，要明确监督原则，努力做到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第二，加强监督立法，使监督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第三，建立和健全监督机构，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讨 论 题

1. 请你谈谈建立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意义。
2. 怎样完善人大的监督制度？
3. 怎样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厂务公开

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推行的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重要之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 政务公开，让人民来监督权力

政务公开是指除属于国家规定保密以外的党务、行政事务、

社会公共事务等，都要向社会和群众公开，以接受监督。

1996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六次全会明确指出，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县（市）、乡镇及行政村、基层站所，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凡是可以公开的办事内容、办事程序和结果，特别是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财务等事项都应公开，以便群众监督”。1997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八次全会要求“要继续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站所及‘窗口’行业，办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除属于国家保密的事项以外，都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向群众和社会公开，以接受群众监督”。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的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对实行政务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政务公开制度的进一步开展。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政务公开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推行。

——湖南省前几年就把政务公开制度称之为“阳光行动”，在全省普遍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长沙、常德、张家界等14个试点市、县统计，1995年一年共录用干部1100多名，招收工人5600多名，民办教师转正780多名，农转非8800多名，安置转业退伍军人1680多名，分配大中专毕业生5000多名，因全部实行办事公开，无人因发现问题而上访告状。

——浙江省自1998年5月开始在全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后到年底，全省11个市（地）已有484个部门推行了政务公开制度，推广面达68.6%；全省各县（市、区）所属部门已有3089个推广了政务公开制度，推广面达0.8%；全省农村已有1198个乡镇推广了政务公开制度，推广面达0.5%。

——浙江省教委实施招生工作公开以后，去年共为全国各类高校录取新生近5万人，超额完成招生计划，期间没有发生一起违纪违规行为。

——辽宁省沈阳市建委把21个部门集中在一栋楼办公，从项目审批到办完开工前的各项手续，由原来的200多个工作日减少到50个，要盖的公章由原来的120个减少到19个。

——“两高”分别实行了公开审判和检务公开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了在全国检察系统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这是迄今为止政务公开最深刻的内容。各级检察机关迅速行动，向广大群众公开履行检察职能的法律依据、司法解释、工作制度、办案纪律、办事程序等10个方面的内容，并向案件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告知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广为宣传。全国法院大力推广公开审判制度，一些地方还对审判情况实行了电视实况转播。

除上述省市以外，上海、天津、江苏、山东、河北、陕西等省（区、市），有的在全省（市）范围内推行政务公开制度，有的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推行。政务公开的广泛推行，提高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改进了机关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规范了行政行为，提高了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提高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

在实行政务公开制度时，不少地方都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取得了不少经验。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要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领导，这是落实政务公开制度的前提和保证。浙江省、沈阳市都成立了由党委、政府、纪委领导参加的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指导、督促和检查，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化和完善。

2. 要明确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在公开的内容上，金华市、沈阳市等都要求各部门：一是管理权限公开；二是办事依据公开；三是办事程序公开；四是办事标准公开；五是办事结果公开。在公开的方法上，金华市从市级机关、重点部门抓起，继而陆续推广开，并逐步延伸到乡镇街道和行政村、居委会。同时要求各部门从容易引发矛盾和滋生腐败的“热点”问题（如工商登记、招生、干部选拔聘任、财务收支管理等）入手，稳步推进到其他领域。沈阳市则一步到位，全市 113 个部门按市里的要求，一下子公开了各类政务工作总计达到 14118 项。在公开的形式上，各地比较普遍采用的形式是挂牌上墙、张榜公布、设立引导员、印发宣传材料、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大众媒体的办法，不少单位还采取触摸屏幕显示等现代化设施。

3. 要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要建立健全举报，投诉监督网络，充分发挥责任单位、主管部门和职能机构的职能；要加强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大纠正和查处的力度，对违反政务公开的人和事，必须分别情况，依照规定及时作出处理。

（二）村务公开，还广大农民一个明白

村务公开，就是把涉及村民切身利益或村民普遍关注的村中事务，通过一定的形式告知村民，使村民在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再去参与决策与管理，实施有效的监督。村务公开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体现的却是一个至高神圣的理念，那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村民自治的诞生，村务公开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亿万农民的热烈期待和强烈要求中，迎来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20 多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在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村务公开在全国普遍展开。1987 年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村务公开、民

主监督的程序和形式作了规定。1994年党中央召开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制度，并对村务公开的内容作了具体要求。江泽民总书记分别在1994年、1997年和1998年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和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村务公开的要求。很多地方分级成立了专门的村务公开工作的领导机构，认真规划、专题部署、培养典型、总结经验，继而全面推广。截至到1998年7月，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党委、政府名义对本行政区域的村务公开工作作了统一部署。到1998年底，村务公开制度已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河北、河南、福建、江苏、辽宁、湖南、上海、天津8省市90%以上的村，实行了村务公开，其中比较规范的约占60%。河北省173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了村务公开，其中较规范的121个，占70%。

随着实践的深入，村务公开开始走上制度化的轨道，成为经常性的民主监督活动。公开的内容按类别，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政务公开，主要是涉及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级政府布置的有关任务，以及村里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等事项的公开；二是事务公开，主要是涉及村内的日常事务的管理等事项公开；三是财务公开，即公开公共财务的收支，如农民负担、集体企业经营、日常开支等。公开的形式主要有：在村务公开栏中张榜公布；打印成明白簿、公开卡等样式的图表、小册子分发到村民小组和农户家里；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面对面地向村民公开；在村民较多的地方，设立固定的、能长期使用的公开栏，公布村民关心的事项。公开的时间如果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6个月公布一次，如果涉及其他事项，有的可以随时公开，有的可以定期公开。为了保证公开的真实性，各地建立了严格的程序。公开前，有关专职人员准备好计划公开的详细内容，由主管村干部签字同意，然后由负责村务公开的组织，如村民代表会议或民主理财小组、财务公开小组审查核实公开内

容。做完这些工作后，由村委会负责公开。公开后，还要接受村民查询，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公开中出现的错误；并保管好公开档案。各地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方面，加强对村务公开的监督，保证公开质量。

当前，村务公开已经成为解决基层诸多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促进农村的改革，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有人曾把村务公开喻为“阳光行动”。确实，村务公开像阳光一样，照亮了每一个角落，腐败难以藏身。同时，又像阳光一样，带来了温度，化解了干群矛盾，带来了团结和凝聚力，有力地维护了农村基层的稳定。

（三）厂务公开，让职工当家作主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经贸委、全国总工会于1999年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厂务公开制度。

近年来，为贯彻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坚持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各地有一批企业实行了厂务公开制度。这不仅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上了新台阶，而且调动了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管理和效益达到了新水平，创造了职工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宝贵的新鲜经验。1998年下半年，天津市已有80%的国有企业推行了这项制度，辽宁省召开了“厂务公开，民主议事，民主监督，深化民主管理现场经验交流会”，并下发了有关文件，对全省推行厂务公开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

天津市实行厂务公开获得了好的效果。天津市纪委曾对厂务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标准、时间及效果检验作了统一规范。他们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已有的规定，要求把企业的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奖惩办法、规章制度、职工福利、评议干部等必须公开，同时结合企业实际，要求把企业重大改革方案等企业改革发展的难点，工资、奖金分配、住房、保险福利等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企业领导的工资收入、住房、业务招待费、通讯费等企业廉政建设的关键点必须公开，还根据企业改革遇到的新情

况，要求把改制、改组、兼并、出售、职工下岗分流等直接关系企业和职工命运的重大问题公开。例如，天津大明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前几年生产经营十分困难，公司下决心进行产权制度的根本改革，由全体职工出资买断全部国有资产，组建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让职工明明白白地拿出辛勤积攒的钱来支持改革，公司将改革方案印发给职工讨论，领导就职工关切的出资、利益保障、企业资产现状及发展规划、前景等 14 个问题与职工进行专题对话，同时开展“我为改制献一计”的活动，集中全体职工智慧，反复补充修改方案，得到职工许可。全体职工踊跃认股，出资数千元到 10 多万元不等，仅用 3 天就认股 2558 万元。公司又通过职代会向全体职工公开股东代表选举、民主推荐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等情况，经股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企业新的法人治理机构。

改革后的大明公司，成为无上级企业，企业领导对全体职工的命运负责，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持股的所有者，既有按劳分配的收入，又有年终按股分红的收入，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由虚变实，与企业连股、连利、连心，成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厂务公开、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不再是外部和上级的要求，而成为企业和全体职工发自内心的需要。公司改制半年后，实现利税比上年同期增长 97.3%，其中利润增长 3.58 倍，职工人均收入增长 21%。1997 年对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中，天津有 2643 户国有企业的 1 万多名领导干部接受了职代会评议，根据职代会评议的结果，有 2363 人被调整，有 467 人被免职或停职。大港油田在推行厂务公开过程中，经职代会评议，对 230 名干部给予奖励，提拔了 114 名，有 87 名干部受到“黄牌警告”，有 65 名干部被“红牌罚下”。

厂务公开涉及《工会法》、《劳动法》、《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要使厂务公开更具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长期性，必须法制化。

讨 论 题

1. 请你谈谈“三公开”的意义及完善措施。

2. 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你怎样认识这一问题？

三、祁东县的村民议事会

1998年以来，湖南省祁东县大力推进农村民主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

该县灵官镇毛桥村村办小学扩建，原计划建3层楼，人均需集资140元。村里将扩建方案公开，召开“村民议事会”征求群众意见后，改为建2层，压缩基建费45%，人均减少60元负担。群众感叹说：还是“村民议事会”力量大。这是该县推进农村民主建设设立“村民议事会”的一朵浪花。

祁东县“村民议事会”规定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民主产生一名办事公正且有一定参政能力的代表参加。每月定期召开一次“村民议事会”，内容涉及财务收支、征购提留、计划生育、电价电费、宅基地审批、村办企业招标投标承包、公益事业集资捐款、救灾钱物等。县、乡村均建立“村民议事会”档案，定期进行督促检查。

“村民议事会”有力地遏制了少数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归阳镇前进村村干部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村民议事会”配合上级政府查出了存在的问题。原村主要干部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据统计，全县共追回贪污挪用款近100万元，退回乱补乱发、公款吃喝7.15万元，有76名村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4名有严重经济问题的村干部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村民议事会”充分行使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金桥镇新留村原村主任在任期内，不但村里面貌依旧，而且还因经济问题引起群众不满。“村民议事会”提议，并经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罢免了他的职务。上半年，全县共有9个村的26名村干部被调整，有6名德才兼备，深受群众拥护的村支书被破格提拔为国家干部。

“村民议事会”提高了村干部的威信，完善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讨 论 题

1. 讨论“村民议事会”对建设农村民主政治的意义。
2. 怎样“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四、官僚主义者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浙江省丽水地区农垦场为扩大肉鸡生产，于1990年5月12日提出扩建鸡舍800平方米的立项要求，这仅仅属一层平房的简易建筑，只需办理国家建设计划拨土地审批手续。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扩建鸡舍项目，申报立项后一年多，还未办完手续。在审批过程中，仅报送的大的部门就有12个，填写各类表格文书23份，累计盖章249枚，这种低下的效率实在令人发指。

然而这并不仅是惟一的例子。某地要成立一家食品公司，盖章427个图章，最后仍不了了之。河北某县一个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为各种手续整整跑了4个春夏秋冬，仅上级批示的红头文件就达203个，公章盖了678个。没多久，《无锡日报》刊载文章说，一家工厂的基建项目在审批过程中，一共盖了745个

大印。本来大家认为这足以载进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不料 1993 年又冒出一个“新”纪录：盖章逾千枚。事情是这样的：到 1993 年 2 月 2 日止，在建中的南京中央大厦工程项目所盖图章突破 1000 枚。工程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到 1993 年上半年竣工试营业，起码还要盖 100 个图章。”1100 个图章太壮观了。中央大厦从 1986 年下半年起，工程被批准建设，到 1993 年已有 6 年半的时间。在这 6 年半中，几乎每天就要盖一枚公章。官僚主义的低效率，完全不能适应充满活力、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的需要。

讨 论 题

1. 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2. 官僚主义的危害性。

五、政府机构：不改革没有出路

中央政府机构的庞大是举世闻名的。1993 年 3 月，八届全国人大确定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国务院的工作部门达 86 个，全国省级党政机关的厅（局）级机关多达 2100 多个，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 70 余个，超过中央编制部门规定机构限额 15 个。非直辖市的大中城市党政机构为 5 个，地区 50 个，县一级 45 个，分别超出限额 15 个、20 个、10 个。我国级别最低的政权机构即乡镇，这个“小政府”也不甘示弱，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成立人民公社时，全国共有 217 个公社，1980 年人民公社被撤销，成立乡镇人民政府。现在全国共有 6 万多个乡镇。综合起来，中国目前县级以上常设党政机构在 20 万个左右，超出规定限额的 3 万多个。1990 年，全国机关单位数比 1984 年增加了 5.5 万个，平均每年增加 9000 多个，这还不算大量的非常设

机构。实际上，我国各级政府中党政机构的内设机构也相当多，事务性人员居于极高的比例。例如，某地区常设行政机构 29 个，但这 29 个常设机构中竟有 263 个内设机构，其中属社会性、事务性的内设机构就有 90 多个，人员比例高达地区行署行政干部总数的 43%。

政府机构多，人员必然就多。而且可怕的是，中国官员数量的增长是很快的。有资料显示，全国党政机关干部 1979 年为 279.12 万人，1989 年为 543.5 万人，10 年翻了一番。政府人员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 1979 年的 6.6% 上升到 1992 年的 10.5%，1994 年稍低，降到 9.3%；从 1986 年开始平均约 10 个国有单位职工中，就有 1 个政府工作人员。1994 年同 1979 年相比，政府的规模扩大了 1 倍多。据官方 1992 年统计，到 1991 年底，全国靠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员为 3400 万人。若再加上“以工代干”与机关招聘的干部，机关人数近 4000 万人。而且，至少每年还在以 100 万人的速度增加。中国有 12 亿人口，官民比例为 1:30 左右；而解放初是 1:294，现在的比率是解放初的近 10 倍。而美国 1987 年的官民比例为 1:83。我们是 4000 万人管理 8000 亿美元的产值，美国是 300 万人管理 60000 亿美元的 GDP，相差何等悬殊！有的县只有十几万人，县、乡两级的行政机关人员却有几千人，官民比例达到 1:20 左右，也就是说，每 20 个人中就有一个国家干部。

讨 论 题

1.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2. 你认为怎样才能精简机构？

六、国务院机构改革一马当先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由此国务院 40 个部委精简为 29 个，而国务院部委办局工作人员要压缩一半。这项改革能否顺利完成，是对新一届政府的考验。人们在关注着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改革，而国务院领导身边的机构——国务院办公厅的机构改革方向，更是引人注目。实际上，到 1998 年 8 月初为止，国务院办公厅的机构改革，不但精简人员超过了 50%，而且定编定岗和人员分流的工作，也已于 7 月中旬完成，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 5 个月。

国务院办公厅作为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机构，是国务院领导身边的工作机构。面对此次机构改革，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国务院办公厅要起表率作用。4 月 10 日，朱镕基总理在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学员座谈会上强调：“这次精简，我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必须起表率作用。现在，国务院副总理已由 6 人减为 4 人，国务委员由 8 人减为 5 人，副秘书长由 10 人减为 5 人，差不多减了 50%。下一步机关的精简，我已经给王忠禹同志下达了指标，国务院办公厅非减一半不可，并已经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国务院办公厅不能减 50%，就没有理由要求部委减 50%。如果国务院不带头，对下面就没有说服力，这个决心一定要下。”

对国务院办公厅的机构，朱镕基总理在提出严格要求的同时，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关心。为了使此次改革顺利进行，朱镕基总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干部做工作。4 月 20 日下午，朱镕基总理亲切接见了办公厅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深刻认识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意义，积极参加改革，顾全大局，正确对待定编定岗和人员分流问题，

要认真搞好国务院办公厅的“三定”工作，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起表率作用。只有国办带了头，才能要求各部委的机构改革不折不扣地进行，各省市才有了榜样，今后基层的机构改革才会顺利进行。

朱镕基这次与办公厅副处长以上干部的见面，极大地推动了办公厅的机构改革。办公厅的干部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总理的这次接见仍记忆犹新。他们说，朱镕基总理在这次讲话中，既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方面深刻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的意义，又实实在在地说明了对分流人员细致周到的安排和打算，推心置腹、语重心长。他们说：“我们的总理能在地雷阵和万丈深渊面前，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还有什么顾虑和担心呢？”在随后的改革过程中，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主动献计献策，对如何解决人员分流、妥善安置分流人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4月25日，国办报送了《关于学习朱总理讲话的情况报告》，朱镕基总理仔细阅读之后指示：“所提意见很好，要认真考虑，一些具体问题要专门研究解决。”

早在1998年3月24日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部署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任务时，朱镕基总理即对国务院办公厅及其秘书局的职能转变和机构精简作了重要指示。此后，国务院办公厅的机构改革工作开始启动。国务院机关党组对办公厅的机构改革也非常重视，4月8日，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王忠禹主持召开了国务院机关党组会议，成立了国务院办公厅“三定”工作领导小组，王忠禹亲自担任组长，并确定了“三定”工作的指导思想 and 具体方法。在王忠禹的直接领导下，遵照朱镕基的指示，多次召开党组会议和领导小组会议，对国务院办公厅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作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反复征求了各单位和有关同志的意见。经过从领导小组到办公厅各司局五上五下酝酿讨论，提出了国务院办公厅的“三定”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三定”规定，国办的行政编制由原来的

435人核定为217人，精简218人。作为政府的枢纽，国办既要保证国务院各项工作一分一秒不停地运转，又要快速紧张地完成精简机构的工作，做到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间断、机构改革及业务工作两不误。国务院机关党组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在国办“三定”规定获得批准后，他们即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王忠禹总负责，多次召开党组会议和各司局长会议，研究解决“三定”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党组副书记张克智一刻不放松地抓日常具体工作；党组成员分兵把口，每人负责一个司局落实“三定”规定和做政治思想工作。机关党委也积极行动起来，动员广大党员在机构改革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国务院领导到国务院机关党组，从办公厅机关党委到每个党支部，都为落实“三定”规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通过动员和学习，国办的大多数干部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政企不分，政府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已严重影响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甚至危及到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人员分流，是改革大局的需要，是实际工作的需要，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不少干部主动提出转岗分流，国办人事司司长兼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龚禄根主动提出：“我的退休年龄快到了，不再适合在现职岗位上工作，应该把位置让出来给年轻干部。”党组同意了他的要求。

原秘书一局技术处是从事计算机和办公自动化工作的，过去是行政编制，大家都是公务员。这次机构改革把他们改为事业编制，他们认为这样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因为他们设计的软件和程序完全可以有偿出售，有了收入就可以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不再需要像公务员那样靠国家财政负担。改制以后，他们可以评定技术职称，不像晋升行政职务那样受限制。

分流的人员是大量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通。当有的干部听说自己要分流转岗，离开自己熟悉、热爱的岗位时，思想上产生了隔膜。国务院机关党组和各级领导，并未采取简单的行政命

令方式，而是发扬我党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找他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困难，把工作做到深处、细处、实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尽管有大量的政务要处理，但还是带头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找干部谈话，有的谈话达四五次之多。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和各司局长通过采取逐个谈话的方式，充分了解每一个人的志愿，并结合工作需要，达到优化人员结构的要求，做了大量深入细致地引导、开导和疏导工作。到7月中旬，分流人员或培训，或充实基层，或提前办理退休手续，愉快地接受了这次机构改革的考验。

通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国办机构改革定编定岗和人员分流工作到7月中旬基本完成，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5个月。精简后的国办体现了“精干、高效、务实、清廉”的原则，一股行政新风正扑面而来。

翻开《国务院办公厅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在职能调整一栏中可以看到，减少了“承担协调任务”1项，却又大大加强了3项，即“审核把关、督查落实和跟踪调研”的职能。根据职能的调整，国办负有11项主要职责，可以说，国办的职能在机构改革后进一步加强了。在人员编制一栏中，国务院办公厅将原有的435名行政编制（中办、国办信访局除外），精简核定为217名，精简218名，精简幅度为50.1%；局级机构由7个减为6个，精简幅度为14.28%；处级机构由38个减为30个，精简幅度为21.05%。局级领导职位数由22人减到20人，精简幅度为9.1%；处级领导职数由103人减到67人，精简幅度为35%。据介绍，国办重新确定的留岗人员在文化程度和年龄结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平均年龄为37.5岁，比原来降低2.2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92%，比原来提高了11个百分点。

国办的这次机构改革，力度、难度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它却是在积极稳妥中完成的，不但没有耽搁这个政府核心枢纽的

1 分钟工作，而且通过机构改革，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开始出现了—些新的气象：

——信息更灵了，办文、办会、办事的效率提高了。在过去的—基础上精简了有关文件和刊物，集中力量办好“昨日要情”，使重要信息尽快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指示及时传达给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强了联系，沟通了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

——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根据工作需要和朱镕基总理提出的“约法三章”，制定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办公厅据此也拟定了“秘书长办公会议制度”和“机关党组会议制度”等，各司局也分别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为领导和机关服务的质量提高了。广大职工反映，就连机关食堂也有很大改进，越办越好。

讨 论 题

1. 机构改革的意义。

2. 怎样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系？

七、普通市民吴杰祺状告政府

1995 年 1 月 15 日的广州，天气并不十分寒冷。大街小巷，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市民，名叫吴杰祺。这天，他像往常一样，驾驶着自己的摩托车出门办事，没想到却碰上了一起不平常的官司。

在经过海珠桥时，在桥上收费的广州市市政管理局属下的市政收费所的工作人员，突然把他叫住，以没交过桥费为由，要对他处以 20 元罚款。

20 元钱，对于一个广州市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吴杰祺却不肯认这个罚。他想：这海珠桥建起来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这桥上经过的车辆千千万万，历来都是免费通行的，而今怎么却收起费来了呢？

有人告诉他说，海珠桥从 1990 年起就开始收费了，其根据是广州市政府（1989）123 号文件。该文件规定由广州市政管理局对来往机动车辆征收管理费。如此算来，海珠桥过桥管理费已经征收好几年了，谁也没有对此提出什么异议。

过去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就可以说是对的了么？不，吴杰祺还是不服。经过这些年的普法教育，他懂得了：公民要依法办事，行政机关也须依法行政。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治理整顿乱收费的规定》明确指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无权审批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调整收费标准。中央文件明确规定省级以下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无权审批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调整收费标准，广州市政府有什么权力批准在海珠桥设立行政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呢？

吴杰祺通过调查，进一步了解到有关事实和法律规定后，心里更是不服。1985 年广州市政府出台了（1985）38 号文件，称“经省市政府批准，为偿还（建广州大桥的）贷款和为新建桥梁、隧道积累资金，自 1985 年 6 月 10 日起对通过广州市区珠江河面上所有跨江桥梁的机动车辆实行征过桥费”。后经查实，当时广东省政府批准的只是在新建的广州大桥收费，而在其他桥上收费则是广州市擅自决定的。此《办法》出台短短 1 个月，就被国务院（1985）89 号《关于立即制止在公路上乱设卡、乱罚款、滥收费的通知》所明令禁止。4 年以后，广州市政府以为风头已过，又以穗府（1989）123 号《关于恢复在珠江大桥、人民大桥、海珠桥征收车辆过桥费的通知》，再次乱收费，并擅自制定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

他还查到，国务院（1994）41号文第5条明确规定：“凡利用贷款（包括需归还的集资）新建、改建（不包括局部改动）的高等级公路、桥梁、大型隧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对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但是贷款、集资还清后要立即停止收费。凡是由国家投资养路费、民工建勤、民办公助、以工代赈办法以及个人和社会捐资修建的公路、桥梁、隧道，一律不得收取通行费。”

由此可见，广州市政管理局在海珠桥上收取过路费的做法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也就无权对其罚款。

因此，他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法讨回一个公道。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他的诉讼，并进行了审理。

作为一名公民，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自认为是不合法的，敢于提起诉讼，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

讨 论 题

1. 怎样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
2.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八、打假“雷锋”郭振清

郭振清在河北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他的出名，缘于他无偿帮人打假，人们称他为“雷锋式”的打假英雄。今年33岁的郭振清个头不高，他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一脸的憨厚：憨憨地笑，憨憨地讲叙他那自己说是很平凡的故事。然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3年来分文不取地帮助素不相识的消费者解决消费纠纷400多起，免费提供法律咨询5000多人次。

郭振清是石家庄市热电煤气集团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

1995年春天，郭振清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不很起眼的广告，

大意是：为方便电话用户，石家庄市电信局每月将对每部电话加收 2 元钱的“代维费”。郭振清查了有关规定后认为，代理维修、维护本来就是电话服务中的一项，不该再额外加收费用，便向新闻单位反映了此事。电信局很快纠正了这一做法，并向郭振清道了歉。

使郭振清“成名”并最终走上打假之路的是 0.5 公斤杏脯。1996 年春节，郭振清从石家庄一家大食品商场买加 0.5 公斤杏脯，打开后发现其中一块上沾着一只苍蝇，他立刻回商场换了一块。回家后又吃出了一只。他断定这是以次充好的劣质食品，便拿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找到商场经理要求加倍赔偿。坐了半天冷板凳之后，经理说只能按原价赔偿。郭振清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条款指给经理看：“这是法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是依法维护我的权益，也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学了 20 分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后，经理终于认了错，并加倍赔偿了他 24 元钱。临走，这位经理拍着郭振清的肩膀说：“小伙子，你真行！”

这事成了石家庄首起见诸报端的消费者双倍索赔成功范例，虽然数额只有 24 元，可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人由此记住了郭振清。

郭振清打假的事被媒体报道后，一些人纷纷找到他，请他帮助解决在生活、在消费中遇到的各种纠纷和难题，郭振清从此踏上了帮人打假之路。

郭振清帮人打假，大到帮人打官司，小到帮小学生退一块橡皮，他都尽力去做，从不收取 1 分钱费用。和他打交道的人都认为，他是掏出心窝来为求助者排忧解难的。

孙凌云老太太给儿子办婚事在一家大商场订购了一套家具，订好在儿子结婚前送货上门，可晚了 3 个多月才送到，以致儿子的婚期一拖再拖，而且家具还严重变形。为这事老太太多次找经营者，但拖了 8 个月也没能解决。她慕名找到郭振清，请他帮

忙。郭振清二话没说，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和老人一起找厂家、找经营者，帮老人讨回了2500元的损失，而自己分文未取。

消费者陈国山骑着刚从商场买的一辆自行车回家，途中在没有与任何人或物体碰撞的情况下，车的前梁突然断裂，导致陈当场摔伤。事后，这位消费者多次找到厂家经销商要求赔偿解决，都没有结果。他找到郭振清给他做代理，将代理商送上法庭。最后，经法院判决，陈国山获得了1万多元的赔偿。陈国山要答谢郭振清，被他谢绝了。他说：“这是在与假冒伪劣商品作斗争，我责无旁贷地应当挺身而出。”

帮人打假，关键是懂法。为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郭振清每年都要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上千元订报纸、买书籍。凡是报上刊载的政策、法规和保护消费者方面的知识，他都要剪下来钉在一起。3年多时间，就积累了厚厚的几十本。

这几年，在郭振清的生活里，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下了班、休息日，他总是背着那个装满了法律、法规贴报本的黑书包，风风火火地为消费者讨公道而奔忙……他还担任了许多商家和厂家的义务监督员，在河北省会许多新闻媒体上开设专栏，宣传维护消费者权益知识。

郭振清说，他从小最崇拜的人是雷锋。“做人就该像雷锋那样不图名、不图利。”他笑笑说：“现在好像很少有人这么说了，其实，助人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快乐。”“你想，当你在大年三十晚上接到全国各地你帮助过的人的祝福电话；当你坐在出租车里被司机认出死活不肯收钱；当你被一个陌生的老大妈拉回家捧着积攒的关于你的剪报本时，你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义务帮人打假，这是郭振清的品格，但这却也是一条充满了艰辛的路。郭振清并不富裕，一家三口就靠他和妻子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这点钱除了家用，还得从中拿出一部分来订报和每月付出数百元的电话费，为调查取证赶时间的“打的”费。3年来，为帮人打假，他自己贴补进了1万多元。他有自己的工作，

他帮人，只能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

郭振清帮人打假贴进去的不仅仅是钱和精力，还有误解和风险。郭振清说，他每帮消费者打赢一场官司，就得罪一大片人。一些制假、贩假的企业和商场一听到郭振清的名字或看到他的身影就头痛，“砸”了人家的“生意”，他心里能不存恨意吗？“多管闲事、动机不纯、别有用心”等恶意中伤常让他伤感、默默垂泪。

社会承认了郭振清，老百姓信赖郭振清。他的行动影响着大家，也感动着大家。1997年，江苏小天鹅公司无偿给郭振清提供了150万元的人身保险；青海雪舟集团有限公司老总在电视上认识了郭振清后，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派人专程赶到石家庄，向他捐赠了1万元现金和1双皮鞋；曾经受过郭振清帮助的孙凌云大妈，也学着郭振清，义务帮人打假。1998年，郭振清赢得了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的“保护消费者杯”，使他成了河北获得这项奖励的第一人；1999年3月，他又被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命名为“全国城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十佳志愿者”。

讨 论 题

1. 怎样把法制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2. 谈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中的作用。

九、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权斗争

从1990年起，美国每年都要纠集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搞反华提案，企图在全世界丑化中国的形象，置中国于被动地位，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人权为武器，搞垮中国的社

会主义，根本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共有 53 个成员国，每年改选其中 1/3。非成员国也可参加。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会上集中攻击苏联、东欧各国和古巴的“人权”问题。1991 年底苏联解体后，他们把矛头转向了中国。

1991 年没有搞成反华提案。因为 1990 年下半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为取得中国的支持，跟西方其他国家打招呼，算是“放过”了中国一次。

1992 年我国以压倒多数的支持票（27:15，10 票弃权）挫败了西方的反华图谋。1993 年支持我们的多了 5 票；1994 年多 4 票；但 1995 年只多了 1 票。究其原因：一是成员构成有变化，一些原先支持我们的国家被选了下去；二是西方施加了强大压力并更加注意策略。1995 年他们气势汹汹，玩弄了许多花招。在攻击中国的报告中也写进一些肯定中国人权状况有所改进的话，'以便于通过，但基调不变。美国在会内外对我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恶毒攻击。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亲自去日内瓦督战。有时一天找 20 多个国家代表谈话，大大加大了对第三世界的压力。他公然声称，第三世界国家如不站在西方而站在中国一边，就是对西方的敌意；如果站在他们一边，那么这些国家的利益他们会予以考虑。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

我国代表在会上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则仗义执言，说中国解决了 12 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为什么还要攻击中国？！

1995 年 3 月 7 日进行程序表决。西方国家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我们提出反对讨论的动议，叫“不付诸表决”。结果 22:22，9 票弃权。我方协议未获通过。美国代表为此而兴高采烈。

第二天会上，就西方攻击中国的提案进行公开投票。投票结果 21:20，11 票弃权。西方反华提案又一次被否决。总的看，支

持我们的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穷朋友”，即第三世界国家。弃权的也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这次俄罗斯爆了冷门，反对西方而支持了中国。我国在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支持下，再次挫败了西方反对中国的图谋。美国对此大失所望，然而第三世界国家都很高兴。

美国代表团团长和沙特克说，明年（1996年）一定要争取通过，他们认为提案如被通过，美国就可以说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

果然，1996年和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部分国家又连续搞了两次反华提案，但都遭到了失败。1996年以27:20，1997年以27:17之比分两次通过了不付诸表决的动议，美国又未能使其反华图谋得逞。

1997年第53届人权会上的表决事实上在事前就已经预测到了结果。因为西方阵线第一次遇到麻烦。在该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会不久，3月28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经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三国政府磋商，四国一致决定不参加反华提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三国不愿继续与中国进行对抗而愿意对话。随后，历年均作为反华提案国的日本、澳大利亚、希腊和加拿大也宣布不参加反华提案。这样，就无法形成1996年第52届人权会上欧盟作为集体提出反华决议案那样的局面。

考虑到欧盟和许多欧洲大国都不再主动搞反华提案，1997年11、12月我们与欧盟进行了两轮人权对话，在司法、公民政治权等问题上进行交流。我们还提出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进行对话。两轮对话很有成效。原来顽固反华的一些国家认为中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合作是有诚意的。1998年2月，中方提出举行有关司法问题研讨会更为他们所始料不及。1998年2月28日，欧盟正式提出不搞反华提案。该年欧盟主席轮值国英国的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劳埃德说，欧盟不想重蹈失败的覆辙。这说明美国的后院已经起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权衡利弊，不得

不最后放弃了再搞反华提案的图谋。

总的讲，美国之所以改变态度是由于其反华提案越来越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西方其他国家的冷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利用人权外交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事实上，美国仍然每年一次地提出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并且继续攻击中国是“极权主义”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从1998年下半年起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抓住几个问题向我国施压，即宗教问题、西藏问题和结社（组织政党）问题。

关于宗教问题，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不信神，因而不会真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是专制国家必然压制宗教；他们不断地抓所谓“个案”，例如，说中国迫害基督教徒，甚至把邪教徒破坏分子也当作是迫害者，递交出这些人的名单，要求释放这些“受迫害人”。

关于西藏问题，这是美国对中国另一大攻击点。美国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却又不遗余力地造谣说西藏人权受到严重侵犯，攻击西藏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把带给藏胞幸福的百余项援藏工程诬蔑为“汉化工程”，等等，多方鼓励和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企图以西藏作为分化中国的突破口。

1998年11月江主席在马来西亚会见美国副总统戈尔时用了大量事实说明达赖是在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可西方却一味指责中国在西藏人权问题上后退了，企图共同向中国施压。

美国对华又一个重要攻击点是所谓“违反自由结社原则”，把我国惩处犯罪分子说成是“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98年底1999年初，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和人士，就中国司法机关对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三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依法进行审判一事，大造舆论，指责中国“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耸人听闻地攻击中国人权状况倒退，这是一例。

其实，徐文立等人利用境外资金从事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于这样的违法

犯罪活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是不会允许的。中国的法律规定与国际人权公约是一致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至第21条在规定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同时，也明确规定行使这些权利依法要受到必要的限制，如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等。至于美国，其法律规定不允许利用境外资金从事竞选活动，更不用说借助外国势力颠覆政府了。《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1至2391条对滥用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其中，第2385条明文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为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或印刷品”者，均要处以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两者并罚。根据美国联邦法院历来在案例中的解释，言论自由的运用以不致妨碍美国宪法的规定为限，任何出版物的刊行以不得恶意诽谤政府或企图颠覆政府的存在为限。

1999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再次提出反华提案，并且再次以惨败而告终。

总的看来，当前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权斗争的特点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人权外交为手段西化、分化中国的方针始终不变，西方恃其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使人权斗争处于“西攻东守”的形势难以一时改变。尽管经过若干年艰苦斗争，我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领域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绝非决定性胜利。随着人权斗争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权斗争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点，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这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维护“人权”和“人道主义”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以及1999年5月7日对中国大使馆的袭击，就是其人权外交的一次恶性升级。

我们与美国“人权外交”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制度谁优谁劣，谁胜谁负的斗争。我们对人权问题的基本态度可概括为12个字：“反对霸权；捍卫主权；保障人权。”中国政府自1980年起至现在，共加入17个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1997年10月，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中国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于已经加入的人权公约，中国政府一贯按规定提交执行情况报告，严肃地履行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如果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以来的50年计算，中国人权事业进展走过了三大步：第一步是中国人民的解放；第二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和保护人权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三步是正在做的，即在全面推进人权事业的同时，继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充分保障人民依法享受人权和民主自由权利，并为缔造一个公正合理、和平繁荣的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与美国“人权外交”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发展、人民的团结，以及世界人民的觉醒。

讨 论 题

1. 西方国家的反共反华势力攻击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侵犯人权”，你怎样认为？

2. 邓小平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是两回事，观点不同”，你怎样认识这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5页）

3. 从科索沃战争看西方的人权。

第八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市场经济给精神文明带来了什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给我国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思想道德建设的新的契机。

1.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它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深化了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结出的硕果。它鼓舞人们打破各种习惯势力和僵化教条的束

缚，勇于实践，敢于创造，大胆开拓。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的法律建设加快了步伐，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法制观念。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一步打破了闭关锁国状态下形成的狭隘保守观念，积极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与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在参与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增强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敬业精神和拼搏精神。

5. 市场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为了增强竞争能力，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和社会的良好风尚。

6. 市场竞争是平等的竞争，无论大厂小厂、国有民营，在市场上都是平等的法人。平等竞争的环境，有助于消除封建特权的影响和由垄断造成的官商习气。

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理想光辉照耀下的市场经济，它非但不排斥优良的革命传统，而且恰恰要求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克己奉公、公而忘私的精神，助人为乐、舍生取义的精神，勇敢进取、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地弘扬光大。

8. 事实表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经并正在孕育出大批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思想境界与感人事迹，同雷锋、焦裕禄一脉相承而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无需一一列举，如上所述，已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开拓了更为广泛的空间，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当前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的冒头，其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市场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尚且不够完善所致。譬如，企业走向市场后，企业租买权力的冲动与某些官员权力寻租的可能导致腐败现象孳生；法制的不完备，为发财心切、不惜铤而走险的人留下了空隙，也为执法人员违规牟利留下了活动的空间；假货充斥反映

了市场制约机制与执法力度的软弱，等等，都要靠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与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决。当然，精神文明建设包含着更多的内容，理想教育、道德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薄弱环节都需要大力加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相悖的，而是相成的；不是双峰对峙，而是花开并蒂。丰润的经济土壤，当孕育出璀璨的精神文明之花；精神文明之花，当结出硕大的物质文明之果。

讨 论 题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二、都市社区文明之路

天津市和平区是天津市的中心城区，10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住着近50万人口，有劝业场、滨江道这样繁华的商业区。

如今，人们把目光投向这里，不是因为这里有繁华的商店，而是被这里的新景象所吸引。如今的天津市和平区，社会安定，政通人和，环境改善，经济发展一直行进在快车道上，几项主要指标列市内6区之首；精神文明建设捷报频传，“五根支柱”声名远播，形成了以群众评选“十佳公仆”和社区志愿者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办好区街两级教育中心，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和创建文明小区为基础，以提高城区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为目标，努力提高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水平的工作格局。人们说，和平区走出了一条大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子。

来到和平区街道，从老年人到小学生都能用亲身体验向你讲

一番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好处。在和平区的 12 个街道、256 个居委会，生活氛围是那样的轻松协调，邻里关系是那样亲切，真是“小事不出楼院，大事不出社区；难事人人都帮，家家乐业安居”。在这里，精神文明建设不再是过去多年沿袭的官方组织的政治活动，而是人们生活中的自然而然的行为。有人称这种变化是从“官办民助”到“民办官助”。

谈起“民办”，和平区有两项活动堪称国内的首创：一是群众自己投票评选“十佳公仆”；另一项是社区志愿者服务。

1988 年秋末冬初，由于市场变化，群众过冬用的煤和大白菜十分紧张。为了保证让全区 10 多万户居民家家备有冬煤和大白菜，机关干部先照顾群众买煤买菜，供应高峰时白天在街头帮助商店售菜，晚上为群众家搬煤。这期间，没有一个干部往自己家捎一块煤、一棵菜。

关键时刻，干部不与群众争利，为使居民们深受感动。有人建议群众做了好事，领导表扬；干部们做了好事，老百姓也应该表扬他们。这个建议得到了区政务监督组人民代表的支持。他们根据群众的意见，在全区范围内组织了由群众参与的评选“十佳公仆”活动。1989 年 2 月 1 日，和平区召开了首届群众表彰干部的大会，10 名当选的“公仆”走上台，由群众为他们披红戴花。随着每年 2 万多张选票投入票箱，“十佳公仆”的队伍也在扩大。8 年来，当选区、街两级“公仆”的达 740 人次，并且成立了“十佳公仆”协会。这项没有奖状，更谈不上奖金的称号，被和平区干部视为最高的政治奖赏。

“十佳公仆”的评选促进了干部的勤政廉政。而干部们的勤政廉政又感染了广大群众，和平区上下形成了干群合力干四化的喜人态势。第一届“十佳公仆”评选活动结束后的一个月，新兴街朝阳里居委会的 13 名居民就自发组织起了我国第一个志愿者服务协会。发起人之一宋元朴说：“干部们无私奉献，我们群众也不能老坐着不动呀。”如今，这个以“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

姓解难”为宗旨的群众组织，会员已经遍及全区，有 5 万人参加。

在碧云里小区，有一位被人们称为“上甘岭走来的志愿者”。她就是 63 岁的退休医生吴炯，电影《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的原型。吴炯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套医疗器具，为社区里的人们义务治病。为了了解社区内 60 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状况，她逐户家访，给 100 多名有慢性病的老人发放了保健卡。几年来，吴炯入户体检 8700 多人次，医治小伤小病 1700 多人次，却从来没有收过 1 分钱。

和平区委、区政府十分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并因势利导，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们在群众两项创举的基础上，支撑起全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五根支柱”：群众评选“十佳公仆”活动、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社区教育、社区文化、文明小区建设。这五项活动都是从群众需要出发，从具体事抓起，渗透到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使精神文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为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社区成员找到了做奉献的机会和场所，使他们都能参与精神文明建设。

和平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1995 年全区经济总量比 1980 年翻了 3 番，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经营收入、财政收入等保持稳步上升势头。和平区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大城市的中心老城区，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社区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大有可为的。

讨 论 题

都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

三、我国目前道德状况的基本估价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道德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现实中出现了空前错综复杂的局面，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意见：

（一）滑坡论

从这种观点我们认为，社会发展与道德状况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的联系，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性。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且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的话，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确是过去闭关锁国时代无法相比的，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社会道德状况明显地衰退了，这种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仰缺失。在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动摇。丧失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丢失了集体主义、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政治冷漠主义严重，理想道德根基动摇。

反映在它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主义的各级权力机构之中。从执政党自己所用的“不断升级”的语言的描述中，很能反映问题的严重性，“不正之风→严重的不正之风→腐败行为→严重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是与道德的衰退联系在一起的。

反映在影响公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近年来，犯罪案件，尤其是大案要案不断上升，不仅直接威胁到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直接威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常发展进程；在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短斤少两，坑蒙拐骗，强买强卖等，则是肆无忌惮地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早期所出现的丑恶行为已经达到了使人见怪不怪的程度。

反映在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以

往那种过于定位于群体利益的价值观向现在的那种过于定位于个人本位的价值观的发展，由政治崇拜向金钱崇拜的发展；为此，金钱成为一部分人疯狂追求的对象，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使不少人的语言和行为散发着贪婪的气味。

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处在较为严重的失调之中。尽管社会越来越发展，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然而，大众媒介却越来越多地向人们发出这样一种信息：社会冷漠、见死不救的现象越来越多。

从这种观点我们看到了目前道德状况的严重性，产生了相应的危机和忧患意识。但过于悲观和过于情绪化，未作深入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缺乏道德主义的倾向。

（二）有得有失论

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道德建设成就非常突出，问题也突出；成就空前伟大，问题也十分尖锐。

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迷信的束缚，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民族精神的大振奋，思想道德觉悟的大提高；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打破了历史上几百年闭关锁国的局面，引进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其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连最具开放气魄的“汉唐盛世”也无法比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发掘，规模空前，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强化了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文化走向复兴的时代大潮势不可挡；邓小平理论的成熟和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创立了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走向不明。一个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种种错误思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盘西化热”曾经泛滥一时，90年代“儒学复归论”粉墨登

场，目前出现二者合流，一起针对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苗头，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尖锐问题。其次是力度不够。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时紧时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长期不能根本解决。“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的现象依然存在，思想道德建设在很多方面远流于形式。还有就是腐败现象的存在，甚至蔓延的趋势，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关系。

（三）爬坡论

这种观点认为，当前的道德失控和道德尴尬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道德现象。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一些深层的道德本质的进步因素。如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懒向勤，由依附顺从型向独立争取型，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的变化，从长远看，这是新的、现代道德文明振兴的开始，我们的道德从本质和趋势上看，正在爬坡。

在两个转变的过程中，道德的转轨，虽然出现了某些道德现象的尴尬，但决不是道德的滑坡，从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转型期的整体高度看，应该强调我们当前面对的道德形势，本质上是爬坡——向着一个新的境界攀登。

面对同样的道德现实，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甚至有滑坡论和爬坡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究其原因，在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道德理论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看不到十八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

讨 论 题

1. 你怎样评价我国目前的道德状况？

2. 道德建设的意义是什么？

四、社会的毒瘤、人民的祸害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鼓吹歪理邪说，毒害人们思想，制造社会动乱，对抗人民政权，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的毒瘤，人民的祸害。进一步揭批“法轮功”对社会、对人民的严重危害性，才能更加认清当前我们同“法轮功”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关系到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一）聚众闹事，破坏正常秩序

稳定是政治，稳定是大局，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无视国家法律，无视人民利益，惟恐天下不乱，以“弘法”、“护法”为借口，频频聚众闹事，挑起事端，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秩序。

从1998年以来，“法轮功”以“上访”的名义，以“静坐”的方式，组织策划、指挥了“法轮功”练习者冲击新闻单位，骚扰党政机关，甚至组织大规模的非法聚集活动，向党和政府示威施压。据统计，“法轮功”组织在全国各地策划组织指挥了几百次围攻事件，直至围攻中南海。李洪志及其核心骨干，自己躲在幕后，操纵受蒙蔽的练习者冲在前面，要求“去的人越多越好”，甚至叫嚣“流点血才好”，妄图制造流血事件，嫁祸于党和政府，在国内外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法轮功”组织的聚众闹事，是从围攻新闻界开始的。这是因为，新闻是舆论导向，有影响，有号召力。从1996年以来，一些新闻单位不断发表文章揭露“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和严重危害，由此招致“法轮功”组织的轮番非法围攻。他们妄图钳制舆论，要挟社会，令新闻单位不得对其稍有微词，企图造成“法轮

功”谁也惹不得的局面。

1999年4月初出版的天津师范大学校刊《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功》。这竟成了“法轮功”又一次发难的借口。当月20日，众多练习者围攻该校。22日，李洪志从美国飞到北京，决定使围攻进一步升级，并一手策划围攻中南海。25日，万余“法轮功”练习者从各地赶到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非法聚集中南海的“4·25事件”。躲在香港遥控指挥的李洪志，在1天时间里，同北京的“指挥部”通话达29次。事后，他做贼心虚，自知难逃罪责，5月2日，在接受境外新闻媒体采访时竟公然撒谎说：“北京发生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在从美国到澳洲的路上。”

随后，“法轮功”组织又在河北、黑龙江、广西、河南、甘肃等省市自治区制造了多起围攻党政机关的事件。7月20日，湖北、安徽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武汉水位涨至130年来第三高度。就在沿江军民全力以赴迎战大洪水的紧要关头，7月21日，湖北省政府受到数千名“法轮功”练习者的围攻。同日，湖南省政府也受到围攻。7月21日、22日，安徽省政府也受到七八百名“法轮功”练习者的围攻。在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受到洪水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法轮功”组织却丧心病狂地围攻党政机关，这就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善举”！

（二）培植骨干，建立非法组织

李洪志很清楚，在社会主义中国，想要扯旗造反，公开建立一个与党和政府抗衡的组织，人民是不答应的，法律是不允许的。因而，他打着“祛病健身”、“益寿延年”、“弘扬功法”的旗号，以不显山、为露水的面目出现，网罗亲信，培植骨干，建立非法组织。一旦羽翼丰满，形成气候，他便打出旗帜，同党和政府较量。

“法轮功”决不是松散的、自发的组织，而是由一套严密的决策系统、指挥系统、信息传递系统等结成的庞大的非法组织。

它层层发展，环环相扣，对练功者进行严密控制，形成了从北京到全国许多地方的一个组织网络。

它在全国的最高机构是总部设在北京的“法轮大法研究会”。李洪志任会长。在全国各地设有辅导总站 39 个，辅导站 1900 个，练功点 28000 个。各“法轮功”辅导总站统一由“法轮大法研究会”指挥，李洪志的指令通过总会传达到各总站，再由各总站逐级传达到各辅导站、练功点和练习者。“法轮功”组织要求练习者每天到辅导站或练功点进行“修炼”，还定期进行各种集体活动，“法轮功”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李洪志进行各种违法政治活动的工具。

众多的“法轮功”练习者并不知底细，他们是受蒙蔽者，也是受害者。当李洪志的罪恶和“法轮功”组织的政治本质被揭露之后，绝大多数练习者已经幡然悔悟，纷纷反戈一击，“法轮功”组织已经土崩瓦解。当然，李洪志和极少数死硬分子是不甘心失败的，对此我们切不可麻痹大意。

（三）邪教控制，戕害身心健康

李洪志宣扬邪教教义，采取各种邪教手段控制修炼者，戕害广大练习者的身心健康。“业力说”便是他歪理邪说中一个最迷惑人的内容。他胡说什么“造成有病和所有不幸的原因是前世的回报”，“生老病死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回报，你欠了债就得还”。“真正修炼的人是不会得病的，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真正要治好病人，必须是真正修炼的人”。他宣扬打针吃药并不能消除“业力”，“你的心如果摆正的话，相信练功能练好，把药停了，不去管，不去治，就有人给你治了”。

“业力说”欺骗和蒙蔽了许许多多练功者，生了病也不能看病吃药，造成了一幕幕家庭和社区的悲剧。至今已发现全国各地因修炼“法轮功”致死的有 743 人，致伤致残者更是不计其数。而因练功导致精神失常者，就无法统计了。据北京医科大学的医生说，从 1992 年开始，因练“法轮功”出现的精神障碍患者人

数明显上升，占练功出偏患者的 10.2%，今年上半年急剧上升，占到了 42.1%。那些冤死者，有的是听信了李洪志“有病不吃药、不打针、不看医生”的歪理邪说，贻误治疗致死，有的是修炼“法轮功”走火入魔，导致精神失常自杀或杀人。更为可悲的是，有的冤死者，至死都不醒悟，在受着病痛和死亡折磨的同时，还在内心忏悔自己对神灵的不诚，对“法轮大法”修炼不到家。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为了诱骗更多的人上当，“法轮功”组织还采取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手段，精心炮制了一系列祛病健身的调查报告，如《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广东省部分地区法轮功学员身心状况调查报告》、《广东省高校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和《广东省党政军系统部分法轮功练习者身心变化实例》等。这些“调查报告”名为客观事实，实为骗人的胡编滥造，害人不浅。

对于利用邪教戕害生灵，世界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放任不管，我国法律对此已有明确规定。李洪志犯了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罪证确凿，罪责难逃。

（四）鼓吹歪论，制造思想混乱

为了强调“法轮功”的神圣，李洪志妖言惑众，渲染恐怖气氛，制造紧张气氛，大肆鼓吹人类面临毁灭的“末世论”胡诌一套“地球爆炸论”、“科学无用论”、“劳动无用论”、“医学无用论”、“政府无用论”，以此动摇群众的信念，摧毁群众的意志，制造思想混乱，搅乱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

李洪志胡说“会发生一起宇宙的大灾难”，“人类有 81 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现在……社会在整体往下滑”，“再滑下去就面临毁灭，彻底的毁灭，那叫：形神全灭，很可怕！”这是对现实的诋毁，对未来的否定。

他抓住某些社会问题，无限夸大，目的是造成人们的恐慌。而面对灾难，政府无能为力，科学无能为力，医学无能为力，甚

至连“众神”都“对人完全失去了信心”，“再不管人了”。整个人类都处在叫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悲惨境地。此时此刻、大慈大悲、大智大勇的“活佛”李洪志显灵了，他说：“惟有我才能推迟地球的爆炸”，“我是来度你的”，“不让你面临这样的绝境，把你从人的痛苦之中度到天国去”，将你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李洪志宣传“末世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相信，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只有他才是惟一的“救世主”，是宇宙的主宰，整个人类惟一的出路就是乖乖地跟着他走，无条件地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交给他，服服贴贴听从他的指挥，浑浑噩噩地做他的奴隶。

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满怀胜利的信心。我们不回避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不回避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发展阶段，都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社会问题，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推进和发展的。正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动力了，就停滞了。冰清玉洁、一尘不染的“桃花源”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12 亿人民由贫困逐步走向小康，这是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有力证明，也是对李洪志“末世论”的有力批判。

（五）诈骗钱财，建立非法产业

李洪志决非不食人间烟火，要“度”信徒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神仙”，而是一个假正经、真贪婪、疯狂聚敛钱财的吸血鬼。

李洪志早在传功初期，就演出了许多“免费”为人治病的闹剧。他往往一面“免费”给人治病，一面暗示患者应当捐助“功德”款 100 元以上，露出了这位既无医术又无“法术”的现代神

汉的本来面目。

在李洪志传功的中后期，已不满足于做小生意了，剥去了“救人”、“度人”的伪装，在宣传“法轮大法”的书刊、“经文”中直接宣称“有施才有德”，“小施得大德”。李洪志及“法轮功”组织打着“授功治疗”的招牌，宣传封建迷信，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各种非法出版物；并在许多省市开办所谓“法轮功”辅导班、“法轮功”功法报告会，在全国众多的练习者中骗得了大量钱财。据山东一位原“法轮功”练习者揭露说，李洪志等人卖书、卖图、卖“法轮”章，仅在山东聚敛钱财的数量就不止几百万。为了敛财，他们甚至采取极为卑劣的手段，断章取义、肆意曲解、偷偷拍摄等伎俩，制作名人的发言、录像在全国各地销售。一方面为“法轮功”张目；另一方面为自己敛财。事实上，“法轮功”组织通过非法生产、销售大量图书、图片、音像制品以及练功用具等产品，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非法产业。他用这些从练习者身上搜刮来的钱财，为自己购买豪华汽车和住宅，恣意挥霍。在从练习者口袋里掏钱的同时，他们也将黑手伸向国家，逃税、偷税、牟取暴利。

（六）伪装科学，干扰科教兴国

无知产生狂妄。李洪志是个科盲，但懂得现代科学知识是“法轮功”的天敌，是愚昧迷信的克星。

因此，他在鼓吹歪理邪说的时候，一方面歇斯底里地攻击现代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多地用现代科学的名词术语来包装自己的歪理邪说。他胡说什么“现代的科学不算科学”，“是站在错误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对宇宙、对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导致了人类社会道德的败坏”，“这个科学又是邪教”。

与此同时，李洪志又不择手段，歪曲科学，制造伪科学，把尚未证实、无法验证的假说当作结论，把子虚乌有当作客观存在，在没有必然联系的现象之间任意推理，蒙骗、吓唬那些现代

科学知识不多的人们。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实现人类的全部希望，都要靠科学。相信科学，尊重科学，运用科学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社会才能进步，人类才有希望。而歪曲科学，反对科学，制造伪科学的种种做法，不仅使练习者放弃了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也大大影响了人们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干扰和破坏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

（七）污辱宗教，侵犯信仰自由

党和政府对合法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信仰，是尊重的，保护的；同时，也保障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然而，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以“最高佛法”相标榜，肆意歪曲、诬蔑、利用佛教和道教，污辱合法宗教，亵渎教徒的信仰，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这是愚昧和专横，充分表明他们与人民为敌，与宗教信仰者为敌；与现代文明为敌，也与传统文化为敌。

李洪志一面吹嘘“法轮大法”是拯救人类的“惟一大法”，“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要人们虔诚地信奉“法轮大法”；一面又担心“法轮大法”同其他学说、教义交锋时原形毕露。他吓唬练习者说：“弘扬大法，你根本就不能再提你以前学过的东西”，否则，“会把你自己修炼的身体和你所要修出来的一切搞乱，你就无法回家，你在破坏你自己前进的路”，就是“一下子死了”也不行，也是在“破坏大法”。

“法轮功”不准练习者独立思考，也不准练习者学习别的知识，甚至连以前学到的东西，连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统统扔掉，都不能提，也不准问。他要把练习者死死封闭在他的“法轮大法”之中，不仅行动要跟着他的“法轮”转，思想、言论也得跟着他的“法轮”转。这是对公民信仰和言论自由的粗暴侵犯，也是对公民思想的禁锢和封锁。这哪里是什么“普度众生”的“活佛”，而是蛮横跋扈的邪教主！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言，

“法轮功”打着佛法的幌子，盗用佛教的一些名词术语，欺骗社会蒙蔽群众；它是一种邪教，一种魔道，一种地地道道的歪理邪说；它不仅与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根本对立，而且与佛教和其他宗教完全对立。

（八）腐蚀干部，窃取国家机密

“法轮功”组织为了达到他们险恶的政治目的，把触角伸进共产党内。他们打进党政军机关，甚至打进一些要害部门，特别重视在中高层干部中发展练习者，腐蚀党员和干部队伍。在“法轮功”的练习者中特别是在骨干中，确实有些人是党员、干部，极少数还是党的领导干部。有了“名人”、“大官”，“法轮功”组织就更有欺骗性，更便于钻进党和政府内进行破坏。值得高度警惕的是，确实有些干部，包括身居相当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成了李洪志的俘虏，供其驱使，为其效劳。

“法轮功”组织所以能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轮功”组织利用了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利用了练功的那些党员、干部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从严治党的警钟。

“法轮功”动摇我们党的根本信仰，动摇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党要求自己的党员必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而“法轮功”却要求练功者“逐渐地把各种执着心、欲望去掉”，使我们的党员成为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信念、没有意志，只会规规矩矩听他们指挥、任他们奴役的信徒。

“法轮功”组织的一些骨干分子已打进我们党和国家的某些要害部门，千方百计盗窃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我们有的要害部门中也有人甘愿为“法轮功”组织效劳，他们偷文件、递情报、传信息，组织非法活动，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法轮功”祸国殃民，危害严重，天怒人怨。中国有句古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对这个社会的毒瘤、人民的祸害，一定要坚持切除和清理。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我们务必一

鼓作气，乘胜追击，不取得彻底胜利决不罢休！

讨 论 题

1. 谈谈你对邪教危害性的认识。
2. 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是什么？
3. 在对人的评估上，“智力比知识更重要”，“素质比智力更重要”，“觉悟比素质更重要”，成了西方管理界的“三大名言”，你怎样认识这一问题？

五、曹春生：民间教育家的地下实验

44岁的曹春生因为收养了50多个孤儿而被传媒勾画成一位大善人的形象：放弃一掷千金的大款生活，倾其所有精心养育没有爹娘的孩子；洪水冲垮了经营多年的游乐场，最狼狈的时候放出了卖肾换钱的口风；更有两度婚变，为故事添加作料。不仅是这样，他进行的一场教育实验，已经有些苗头，有从事多年教育的官员说：“咱们搞了几十年，怎么就不如一个曹春生呢？我们的孩子跟人家没法比！”

曹春生办的学校在河北邢台市东郊。曹春生创办学校的最初动机是赚钱。他申请的校名为“英豪子弟学校”。他想迎合中国一些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设置最优越的环境，请最好的教师，把学校纳入应试体制的范畴。

批文有了，地皮也买到了，一座贵族学校矗立在野沟门游乐场旁边。几个从游客手上抢瓶子的脏孩子，改变了他的念头。他决定为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办学。38岁那一年，招收了全市38个孩子的希望小学开学了。

一切采取供给制，他把爱心捧出来让孩子们舔。但真实的景象让他深为震惊：孩子们并不珍惜从天而降的生活，本子乱撕，

馒头吃不了随手便扔，考试成绩很差。1994 年他就购置电脑，孩子们学了半天仍旧不会用，电脑不过是一堆时髦的摆设。高薪请来的 13 个教师按照惯例运行了很长时间。他决意自己管理学校，生意不做了，专心教孩子们读书。

他决定从废除书本开始。不买教材，教了几十年书的老师惊慌失措：“火车还要在铁轨上走，没有书怎么行？”

曹春生觉得奇怪，活生生的东西，如树叶、石子等为什么不能用来教学？为什么不能把孩子能看见、能感知的东西都变成你的教具呢？学的东西全是死的，孩子怎么会有兴趣？他教数学，就让孩子从树上摘叶子，75 加 25 等于多少？先数 75 片叶子，再数 25 片叶子，一片片叶子数下去，孩子们一下子高兴起来：数学原来这么有趣。

没有课本，不等于没有章法。他把最好的老师请回家。从小学到初中的全部课程软件都放在电化教室，让孩子们自己取用。教孩子电脑他则另有一套。先是指法考级，然后背五笔字型口诀，接下来练打字。为了破除孩子对电脑的神秘和畏惧，他将两台电脑放在教室里，让孩子们拆了装，装了拆。

电脑会了，语文、数学就全部自学。上语文课时，有一个学生领队，一边操作磁盘，一边领念生词。其他人跟在后边先一笔一画齐声念一遍，再手写一遍，不懂意思就查字典，每人桌前摆着两部辞书，一是新华字典，一是学生词语词典；如果觉得领念的发音有问题，大家就一起拼字母，直到读出正确的音来，生字生词学毕，就上电脑打课文，每天一值日生，先自己找到课文，自学一遍，然后上课领念，一边打字，一边大声提示同学，标点符号，分段，随着他的高声朗读，噼噼啪啪的声音响起来，不会打的向旁边同学请教。一个上午，他们要打近万字，而且必须是五笔输入；一个孩子五笔不过关，用拼音打，被曹春生看到，当场勒令下机，限定时间通过五笔字型考试。

曹春生并不急于教孩子们作文，他认为字词是基础，这个基

础打好了，以后再拼装句子写作文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更绝的是他并不严格分班，只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大致分成A、B、C三级，今天你可能在A系列，学一段时间跟不上，就下到B系列，从低年级学起；反之，你可能从低一级升到高一级系列。不断地由低到高，又随时到低系列补课，每个人都往上走，基础差的被挟裹着往前走，自学能力强的走得更快。他的目标是，这儿的孩子们小学毕业时，水平达到了初中以上的水平。

教室后边堆放着书籍，有教材、课外读物、辅导材料，等等。上面的已经翻烂了。孩子们就是从这儿自己找书看。这儿上课不打铃，也没有课间休息，孩子可随时上厕所，随时进来，一天上语文课、一天上数学课，没有课外作业。

此外，还设立了音乐、射击、翻跟头等科目。这些全靠自学。曹春生所有的教学原则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音乐也是如此。一人发一只塑料笛子，教唱“1234567 1”，然后是指法训练，接下来就靠自己琢磨了。孩子们自己听收音机，看歌本，一遍一遍琢磨，很快就吹出调子。

凡事全自理，五年级的七八个孩子组成职业班，负责做饭和管理，采购结账全是他们一手操作。正因为如此，现在学校只有几个员工：曹春生——按他的话说，是身兼数职，校长教师会计出纳爹爹，一个把孤儿从4个月带到现在的杨老师（兼管学生生活），一个校工，还有一位葛老师，桥东区政府派来的女指导员，负责组织教学，解答孩子疑问。一个毕业后留在学校的湖北孤儿做门卫。今年2月，曹春生19岁的儿子也来到学校，曹春生说是让孩子实习，跟校工修理。“他在学校什么都没学到，现在让他重新学习，坏什么修什么。”

儿童村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带锁的抽屉，里面放自己的宝贝东西，但无一例外，都有一叠钱，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钱都是挣来的，钱的多少，证明着自己的本领。当然，他们手头的钱并不是真正的人民币，而是银行点钞时的代用币。曹春生从银

行弄来2万块钱这种纸币，1997年设计了一套货币流通体系。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学习融于生活，让孩子明白劳动创造财富，学会过日子，当家理财，把学校变成社会。刚开始，每人每月发200元，交饭费买东西。但很快发现，成为大锅饭，就改进设计：年龄小的，每人每月仍旧发200元，大一些的不发钱，全靠自己挣。在这里，挣钱的途径很多，你会吹一首别人不会的曲子，就能得钱；射击比别人准，也能得钱，电脑打得快也能得钱，总之只要你领先，爹爹随时发放奖金，数额从10元到数百元不等。当然，如果你走路步伐不对，起床最晚，卫生没做好，不洗澡，大声喧哗，也就会立即被处以罚款。在这儿，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否则就会破产——孩子们都熟悉这个词，没钱就寸步难行，进电脑室要交钱，吃饭要掏钱，买铅笔本子要花钱，洗澡还要5毛钱。没钱就得贷款，利息1%；存钱也有利息0.8%。越有钱越能得到机会，曹春生规定，存款100元盖一个章，表示有某种资格，500元以上可以在小卖部买任何东西。而且，外出活动、比赛，存钱数目也是标准，经常是500元以上才有资格。

他掌握着平衡，谁的钱太多了，他就会想办法，找茬没收一些，“不能让他们钱欲膨胀”。有人放高利贷，他就予以没收。然而又给那些钱少的人制造机会，让他们手头有钱。这样，孩子们都保持竞争的活力，不敢懈怠，稍有不慎就可能破产。

去年冬天，曹春生向孩子提问：谁知道无家可归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举手。他顿时心生一计，把厨房门锁上，把孩子们赶到外边，又在学校门口撒了几把麸子。那个时候，孩子们每人都有一口锅，自己做饭吃。北风呼啸，地里什么都没有。刚开始，一些孩子还能咬紧牙关，渐渐的就浑身哆嗦。几十个孩子在外边转来转去。饿坏了的，开始从地里找东西，他们把残留的萝卜白菜根都挖出来，擦擦土就囫囵吞枣咽下去；还有人捡来柴禾，把麸子煮进去。3天后，他们终于知道无家可归的意思了。曹春生煮了满满一锅生姜汤，一盆鸡蛋，一锅疙瘩糊糊，孩子们

狼吞虎咽一扫而空。

儿童村种了 10 多亩玉米，掰棒子时，曹春生又出了题目。磅秤放在地头，剥完皮自己称，旁边放着几个秤砣。有几个孩子辛辛苦苦剥一大堆棒子，称的时候加了秤砣，但看秤时却忘了，自己报数：2.5 公斤。一看别人都是几十公斤，方才明白过来。“你不用讲，他们一辈子会明白怎么样看秤”，曹春生说。

在这里，谁都不能退缩。曹春生通过奖罚激励孩子们的斗志。早操，最能体现曹春生的设计。每个人轮流当指挥，学拳路，集体做完，再单兵操练，每个人都得表演，让大家找不足，好的是掌声，不过关的大家一块儿提示，帮他改进。然后，打拍子指挥唱歌，所以，每个人都既是兵，又是指挥员，合作意识特别强。全军赫赫有名的济南第一团三连已经与儿童村结成对子，指导员邹勇说：“这儿的孩子们让我们震惊，吃完饭，战士的桌前有饭粒，有菜汁，孩子们那边干干净净。我们的战士在众人面前说话脸都红，有的到复员也没在集体面前指挥过。现在我们已经引进了他们的训练方法，每个战士轮流值班操练。”不仅如此，部队连孩子们吃饭时走步唱的五笔字型歌也学过去。

曹春生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分级是为了方便，按照著述人教授的想法而定；如果从童心兴趣着手，就会找到合适更有意思的办法。最根本的问题是情感问题，教育者到底对孩子有无感情——是把孩子当作自己挣钱升官的筹码，还是真心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人。”

曹春生认为已经看见希望的曙光了。孩子们的高素质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去年秋季，曹春生带孩子们拉练到石家庄，和河北师大的师生联欢、包饺子、打字比赛、文艺表演几个节目下来，大学生们羞愧了：我们比不过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今年春节，曹春生设计去上海寻亲。他带了 30 个孩子，5 人一个小组，寻找资助儿童村的好心人。下车后，将一张标有好心人和总部地址的示意图交到孩子们手里，还有 100 元盘缠。规定，不许搭

车，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总部，还给了应急电话。孩子们买地图，寻找到捷径，就去了。没有一个打电话求救，在规定时间全部到达总部。

在曹春生看来，教育就是把孩子育熟，达到做人的成熟。这里面既包括知识的丰富，更重要的是品德、意志等基本素质的锤炼，能自己生存，一有机会就能掌握住。而知识，不仅是指书本上的东西，更值得掌握的是人生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学以致用，学而能用，才是教育的目的。能自立的人必定对社会有用。他设想自己的实验能看到孩子的成熟，但他又不得不顺应现行的教育体制，小学毕业有前途的，他赶紧送到附近的中学，让孩子及时进入应试环境，他每年从别的学校买试题，也分两次考核孩子，结果不错。他有自己的标准，但没有人认可他的标准，他还得想法适应固有的标准。“我真的很痛苦！”他不知道自己的路能走多远。“我这是地下的干活。”他所说的地下，指的是未经许可，他痛苦的是，自己不能一直把他们带大。

儿童村的墙壁上大写着鲜红的“善”字。门口的照碑上写着一句话：不同的教育培养出不同的人。

显然，曹春生的实验也是见仁见智，其利与弊留待人们去评说了。

讨 论 题

1. 你怎样评价曹春生的实验？
2. 教育应怎样改革？
3. 怎样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六、校园创业计划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既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

挑战，同时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发展机遇。从世界各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完善的风险投资业和富有活力的创业者群体是成功的关键。而在创业者的塑造上，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们：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这批人，是否胜任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主力军的角色？是否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创业者的内在要求？是否需要培育一个具有高新技术及相关管理知识并富有活力的创业者群体？怎样培养这一全新的创业者群体？

目前，正在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校园如火如荼地举办的“创业计划大赛”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历时5个多月的首届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已经圆满结束。在大赛的举办过程中，引起了国内外风险投资公司和企业的密切关注，政府部门和教育界也高度重视。目前已在洽谈多项成果的融资和转让。近期组委会将在北京科技成果的拍卖公司的协助下，对这些成果进行公开拍卖。在清华大学着手进行第二届大赛的同时，北京大学正展开声势浩大的创业计划大赛，上海交大也在积极筹备。一时间，“校园创业计划”成为学子们引用频率颇高的词，社会各界也在广泛关注。

创业计划又称为“商业计划”，这是一无所有的创业者就某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或服务向投资者游说以取得投资的“可行性报告”。它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新科技的发展和风险投资浪潮兴起而产生。创业计划活动最早出现在美国。这一活动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德州大学分校的几名学生自发举办的小型活动，发展为遍及全球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影响广泛的年度竞赛活动。

“只要我们梦想，什么都可能发生！”这一激动人心的大赛口号，点燃了清华人积蓄已久的创业热情，由校团委、学生科技创业者协会组织主办的这次比赛，要求参赛者组成优势互补的竞赛小组，提出一份具有科技含量和市场前景的产品或服务，并围绕这一产品或服务完成一份完整、具体、深入的商业计划。

短短的1个月中，大赛组委会就收到由98支队伍提出的102份参赛作品。参赛的320名选手中还包括40多名从北大、北农大、北方交大以及中央财经学院等高校慕名而来的同学。在长达半年的赛程中，大赛组委会精心安排了12次培训，从金融、法律、市场等不同角度对“未来创业者”进行全方位素质培养，选手们相互了解后，按专业优势互补的原则组织起自己的“公司”，从产品出发、设计定位、市场分析、制定营销策略、进行财务预算和公司管理的初步构想，确定融资渠道，最终体现到一份40页的商业计划书中，几乎经历了一位MBA（工商管理硕士）所修的全部课程。每一位参赛者都有一种被“催熟”的感觉，他们学到了课堂上没有的东西，内心深处的创业意识被唤起。一位参赛选手兴奋地说：“这次创业大赛融高科技、风险投资和激励作用为一体，是最富有创新精神和时代感的一次校园革命！”虽然这次大赛与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相比，只是一场创业“演习”，但几乎所有的参赛队都在努力“假戏真做”。许多创业计划的产品包含着一项甚至多项国家专利。

现在，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中心”合作，将在亚洲高校中举办首次“创业大赛”，并进入全部由美、欧著名高校组成的“创业计划大赛全球网络”。无疑，这项比赛将为理工学科优势很强的清华学生提供一个学习、提高展示创新能力和经营意识的舞台，为培养创造中国未来的高科技创业者带来一次新的契机。

校园创业计划活动最成功的当属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1990年首届创业计划竞赛就有一份获奖计划赢得了风险投资，现在已成为一家相当成功的高科技公司。1997年的竞赛后，当年就有7家公司在这次创业计划活动中诞生，而且绝大多数成长率通常在50%以上。

那些由“创业计划”直接孵化出的企业中，有的在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营业额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一批批创业者在比赛中

得到锻炼和成长，风险投资家们蜂拥而入大学校园，寻找未来的技术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的创业计划竞赛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直接驱动力量之一。

放眼美国经济，其主导者几乎都是由具有高新技术和管理知识背景的创业者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如微软的盖茨、英特尔的摩尔·葛鲁夫、戴尔的德尔、苹果的乔布斯和雅虎的杨致远等都是创业者的典范，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大部分都是刚刚离开校门或者在校园里就开始了他们的创业活动。

我们知道，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有三个必备条件：高科技成果、风险投资机制、创业者。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高科技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举世瞩目的，但每年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5%，这受风险投资机制和创业者的制约。1998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的“一号提案”带动了社会各界对风险投资业的广泛探讨和积极实践。而创业者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体，极具能动性，通过创业者的能动性可以推动风险投资的完善。但是创业者赢得了风险投资并不是创业成功的标志。只有新产品或服务经受住市场的考验，产生经济效益，才是真正的创业成功。这就要求创业者不仅有创造性和盈利潜力的完整的创业计划，还必须愿意和能够说服各种各样的人，诸如风险投资商、相关产业的公司经理、政府官员和顾客，这样才能真正让自己的事业让更多的人接受。

至关重要的是，创业者应是一个愿意冒风险而永远不怕失败的群体，正因为是创业者，他们从事的事业是全新的，他们要去开垦的处女地上布满陷阱，随时都有可能落入失败的深渊。但创业者必须永不言败。

清华大学的这次大赛也暴露了大学生创业的一些不足。如大赛的计划偏大，可操作性不足；风险意识较差，害怕承担风险；财务分析尚有缺陷等。当然，对首次参加创业计划活动的大学生来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到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的自我完善中，

这些欠缺并不可怕。

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到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路还很漫长。

创业计划活动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原因在于这项活动积极的社会经济意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归根到底则是具有创新精神和高科技知识的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具有风险意识的企业家的竞争。高校的创业计划活动的目的主要在于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着眼于创业人才的培养；二是通过创业计划活动直接推动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创业人才首先必须具备很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比尔·盖茨就可能只是一个优秀的电脑教授。而创造精神根源于创新文化的土壤，硅谷的产品之所以具有竞争力，与其说是科技含量高，不如说是文化含量高。而产品的文化含量越高，其产品的附加值往往越高。

培育创新文化，首先就是要有敢想敢干的人才。我国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大批高校，其强有力的科研技术力量是公认的，但为什么大部分毕业生只满足于捧个“金饭碗”，做个工程技术人员？这是因为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缺少足够的训练，缺少与其高水平专业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作意识、管理能力，乃至创业精神。

创新文化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和尊重。成功与失败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一个成功者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失败者。硅谷精神作为美国创新文化的典范，就是风险投资者心甘情愿地支持那些敢想敢干的创业者，即使他们曾经有过失败。

从长远看，成功创业者将是那些敢于创新并且愿意和能够承受风险的人。

讨 论 题

1. 创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2. 怎样才具有创新素质？
3. 学校应怎样培养创新素质？

第九章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了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祖国统一问题的由来

（一）香港问题的由来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据多次考古发掘，早在约 6000 年前，已有中国的先民在香港地区生活。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兵平定白越，设置四郡时，香港地区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从此，香港历经汉、晋、唐、宋、元、明、清诸朝，均在中国封建王朝有效行政管辖之下，并逐渐发展成为广东沿海一带的海防要地。

英国从 18 世纪后半叶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为贩运鸦片和将来发动侵华战争建立据点的需要，多次谋求向清政府提出割让一处岛屿的要求，被清政府严正拒绝。英国侵占香港，可以说是蓄谋已久。他们经过长期调查，发现香港岛是理想之地。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派出远征舰队向中

国发动侵略战争。1841年1月26日，英军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香港登陆，举行升旗仪式，强占香港岛。1842年8月29日，英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将已被英国侵占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3月21日，英军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签字、盖印，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南端。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10月24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部分（包括昂船洲）割让给英国。1898年6月9日，英国乘势强迫清朝政府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后统称为香港“新界”，从7月1日起计租期99年。至此，英国殖民者完成了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

对于晚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来不予承认，并进行了长期的抗争。辛亥革命后，除袁世凯、黎元洪外，新中国成立前各个时期的政府也曾试图收回香港，但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澳门问题的由来

澳门位于广东省珠江口西岸，东临珠江口，西接磨刀门，南临南中国海，北与珠海经济特区的拱北相连。由澳门半岛以及两个由大桥相连的凼仔岛和路环岛组成，到1994年，总面积235平方公里，人口约43万，其中97%为华人。

澳门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新石器时代，澳门即有中华民族祖先繁衍生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澳门及其邻近地区就被正式纳入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王朝的版图，属南海郡番禺县的一部分。南宋以后一直由香山县管辖。

16世纪中叶，随着“航海大发现”的成功，为了夺取海外利益，葡萄牙人的商船和舰队大举向东方进发，到达我国东南沿

海一带。1553年，葡萄牙人以船遇风浪，“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由，通过向明朝官员行贿的方式，获准在已经开埠的澳门半岛暂时居住，并迅速聚集成村，扩大在澳地盘，设立自治机构。但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半岛整体上仍一直由明清政府负责行政管理，葡萄牙人只是由于中国皇帝的恩准才得以居留，并且要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银500两。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亦趁火打劫，于1845年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8年封闭了清政府在澳门的海关，赶走了中国官员，扩大了对澳门的占领。1851年，葡萄牙人武装占领了澳门半岛南面的凼仔岛，1864年又占领了路环岛，从而逐步完成了对整个澳门地区的占领，并实行殖民统治。1887年，葡萄牙更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北京条约》，清政府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与葡治理他处无异”。该条约于1928年被国民党废止，并以新的通商条约所取代。但未涉及澳门的主权及管理权问题，葡萄牙继续占领澳门的现实并未改变。

（三）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古称夷洲、琉球。在远古时代，台湾同中国大陆本为一体，由于地壳运动，连接部分的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为中国第一大岛，位于大陆东南100多公里的海面上。台湾省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等80余个大小岛屿。

据史籍记载，早在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就派万人去台开拓，12世纪中叶，宋朝政府已派兵驻守澎湖，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1684年，清政府置全台为一府，隶属福建省。直至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升格为台湾省，成为中国行省之一。

从15世纪后期起，先后有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次年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被荷兰侵占38年的台湾。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求和，被迫签订丧

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自此，日本占领台湾达 50 年之久。

1937 年，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得到了同盟国其他国家的支持。1943 年 12 月 1 日，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 年 7 月 26 日，中、美、英签署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台湾归还中国。

中国人民经过 8 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将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抛入血泊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 3 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近 200 万军政人员及家属退居台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偏安求存”，造成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讨 论 题

为什么说香港、澳门、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谈谈你的认识与看法？

二、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 1983 年 6 月，双方

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 1983 年 7 月至 1984 年 9 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实质性问题进行了 22 轮会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其中涉及的分歧及其解决，都体现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中英谈判中的主导作用。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揭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我国政府以 1997 年一定要收回香港这一前提进入谈判，而英国政府则持着“三个条约有效论”的立场坐到谈判桌前。中英之间的这一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在我国政府看来，香港问题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英国当年以武力迫使清王朝签订的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我国从来就没有丧失对香港的主权，因此收回香港是我国的主权权利，是我国的内政。只是出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的，中国才与英国展开谈判，这就决定了谈判的内容只能是中英之间如何合作确保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而英国政府出于继续对香港统治的目的，以“三个条约有效”为出发点，提出其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按照英方的逻辑，三个条约是有效的，因而英国对香港和九龙拥有“主权”，对“新界”拥有为期 99 年的管治权。当“新界”租期届满时，英方准备让出香港和九龙的名义“主权”，以换取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治权。这是与我国政府的立场针锋相对的。

1982 年 9 月 23 日，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撒切尔夫人却提出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是有效的，中国政府不能单方面废除的立场。她表示，如果要改变这些条约，应通过别的协议来取代，这个协议就是中国同意英国 1997 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满足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撒切尔夫人为了证明香港仍应由英国统治，对中国领导人“晓之以利害”：第一，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管理。如果英国

不再对香港管理，对香港信心产生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第二，一个繁荣的香港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有好处。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针对英方的这些观点，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针对英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背后的主权问题，邓小平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的，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与办法。

针对英方关于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管理的论调，邓小平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并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符合于香港的政策”。

针对英方的有关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繁荣的香港的论调，邓小平指出：“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政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针对英方提出如果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会出现“灾难性影响”的论调，邓小平指出：“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

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场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之后，指出：“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么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英方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即两国通过外交途径磋商解决香港问题。但英方同时又不接受邓小平提出的中英谈判应在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一前提之下进行，撒切尔夫人在会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一再宣扬“三个条约有效论”。英方这一说法理所应当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同时也引起香港同胞的强烈反应，甚至也遭到英国一些人士和舆论的批评。

1982年10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与英国驻华大使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会晤，英方提出，英中两国政府领导人就维持香港繁荣和稳定这一共同目标而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这与中方坚持的前提条件有相当大的分歧。在此期间，英方积极展开活动，在谈判桌外向中国施加压力，其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1）颂扬香港

政制，鼓吹只有维持现行的政治架构和行政体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暗示“港人治港”不可行；（2）鼓吹“三角凳”理论，营造“民意”。企图以香港人民要求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来迫使中国政府让步；（3）打经济牌，煽动悲观舆论。此时正值香港经济处于低谷，一时人心惶惶，人才资金出现外流。面对英方的这些动作，1982年12月，廖承志在会见香港客人时宣布，如果香港出现动乱，不排除提前收回香港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3月10日，撒切尔夫人致信中国总理，立场有所软化，要求中方能够同意下个月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中国总理复函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1983年5月，中英双方就三项协议和谈到的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在会谈过程中，与香港未来有关的各项问题均应讨论。特别是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信中提到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997年后为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所作的安排，从现在到1997年间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讨论按此顺序进行。双方同意对这一议程应予保密。”议程完全把谈判的内容纳入了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所确定的轨道。当然，英方在此时还不可能完全接受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这一前提。有关中方坚持的谈判的先决条件与英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之争，表面上是以双方各让一步告终，但实质上通过这场斗争，把谈判纳入邓小平预想的轨道，以后的谈判中，英方再也没有正式提出“三个条约有效论”。

1983年7月12日至13日，中英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一轮会谈。一开始英方就阐明了“主权换治权”的立场，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并在此后的三轮会谈中坚持这一立场。针对英方的这一立场，中方坚定地提出了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观点，并郑重指出：1997年中国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包括恢复行使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只收回一个空洞的名义上的主权。中国决不接受这种“以主权换治权”的想法。

如果英方坚持这种立场，谈判就无法进行下去，如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在一二年内宣布对香港的方针政策。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希思，阐明了中方的这一立场。

而事实上，在邓小平说这番话的前5天，也就是1983年9月5日，撒切尔夫人已经作了一个赌博性的决定：她排斥了英国外交部向中国“让步”的建议，信奉港英布政司和行政局提出的经济牌，即让香港经济出现崩溃的前景，以迫使中国退缩。紧接着，撒切尔夫人9月23日在伦敦声称，如果不是香港地位特殊，早就像新加坡一样独立了，香港由于“前景不明”，正面临着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1997年前资金会进一步撤出。9月28日，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卢斯在香港说，如果中英谈判失败而找不到顺利的解决办法，香港就会出现“骚动”、“冲击”和“风暴”。在英方的煽动下，香港港元汇率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直线下降。恒生指数从1102点跌至690点，在9月19日至24日的5天内，港元汇率从7港元兑换1美元跌至9.7港元兑换1美元。英方为使这张精心策划的“经济牌”达到撒切尔夫人所说的“最大效果”，不仅不采取措施稳定港元，而且还不时地火上加油。面临英方的“经济牌”，姬鹏飞主任9月27日会见客人时，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宣布，中国政府决不允许香港独立，1997年7月1日一定要收回香港。10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表达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实行特殊政策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立场。英方看到中国政府立场坚定，只好自己收拾局面，决定采取干预汇率、稳定港元的措施。10月15日宣布港元与美元的固定联系汇率为7.8元兑换1美元，一场金融危机终告结束。

英方在谈判桌外没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只好又把精力放到谈判上。这回撒切尔夫人听取了英国外交部官员的建议，既然中国不接受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观点，英方应探讨中文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基于此立场，在10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第5

轮会谈中，英方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但同时又提出了1997年后实行“中英共管”的要求。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同意。为避免谈判破裂，后来撒切尔夫人授权柯利达在第6轮会谈中向中方进一步阐明她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的内涵，确认双方政府如能达成新的安排，英国将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1997年后同香港的任何“权力联系”，即不再谋求任何形式的中英共管。在第5和第6轮会谈中，中方详细向英方介绍了有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至此，中英会谈的障碍开始排除，谈判纳入了中国政府预先设想的轨道。

从第7轮会谈开始，中英双方在中国对香港12条政策的基础上讨论1997年后的安排，即讨论“一国两制”政策的一些细节问题。从第12轮会谈开始，中英之间开始讨论第三项议程，即有关政权移交问题。经过磋商，双方同意建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中，还有两项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问题”，一个是会谈的期限，另一个是中英协议的形式。

在会谈开始前，中国政府考虑到会谈的难度，为避免英方采取“拖”的策略，导致香港前途长期不明朗，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邓小平一开始就给英方提出一个会谈的期限，即1984年7月。英方一开始反应强烈，但在中方的坚持下，英方被迫同意设定期限，为照顾英方面子，中方同意将草签日期推迟到9月，年底前正式签署。

关于协议方式问题，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同意协议采用“联合声明”的方式，各自声明自己的立场，达到英国在1997年6月30日结束对香港的统治，中国自1997年7月1日起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一目标。1984年9月18日中英双方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中英之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终于取得成功。

讨 论 题

1. 中英双方对于香港问题有何根本分歧？
2. 为什么香港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3. 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本质是什么？

三、《基本法》的制定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了长达 13 年的过渡时期，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并且承诺要制定《基本法》加以规定，50 年不变。因此当《中英联合声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时，制定《基本法》也提上议事日程。

1985 年 4 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审议并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及其三个附件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6 月 18 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委员共 59 人，姬鹏飞任主任委员。

1985 年 7 月 1 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大致规划和步骤。在这次全体会议上还决定在香港成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随后，香港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经过近半年的筹备，1986 年 12 月 18 日，由 180 名香港各界和各阶层代表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

1986 年 4 月 18 日至 22 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基本法结构（草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规则》，成立了“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五个专题小组，开始进行《基本法》条文的起草工作。

1986年11月至1985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共召开了5次全体会议，对各专题小组草拟的《基本法》各章条文草稿进行讨论、修改。1988年4月24至28日召开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对各专题小组草拟的《基本法》各章条文草稿进行讨论、修改。审议并通过了《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决定开展为期5个月的征求意见活动。第一次征求意见结束后，根据各界人士的意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各专题小组对《基本法》各章条文进行了修改，1989年1月9日至15日，在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基本法（草案）》。198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公布了《基本法（草案）》，在香港和全国其他地区广泛征求意见，同时委托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持征求意见工作，并对《基本法（草案）》作进一步修改。1990年2月13至17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征求意见的情况，对《基本法（草案）》作了24处重大修改，同时对区旗、区徽图案评选委员会设计的图案进行评选，确定了区旗、区徽图案，草拟了《基本法》中描述区旗、区徽的文字。会议决定将经过修改的《基本法（草案）》和区旗、区徽图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列入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议程，完成立法程序。

《基本法》的制定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初步实践。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基本法（草案）》之后，邓小平对《基本法（草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作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

形成表示祝贺！”

《基本法（草案）》形成后，香港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基本法》的内容令人满意。《明报》1990年2月18日的社论说，“总体上说，草案内容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努力企图建立一国两制的构想……应当是可以满意的”。《天天日报》2月17日的社论说，“修改过的香港政制方案，中英港三方面都同意”，“比1988年政制白皮书更是向民主迈开大步”。《华侨日报》在2月19日的社论中评论，“《基本法》是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起草出来，任何方案都难使每一个人满意，任何一种政制都有人反对，以《基本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更不能例外”。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到会代表98%以上的多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关于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和决定》。全场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祝贺这部体现“一国两制”原则的法律的诞生。《基本法》的通过和颁布，是继《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在回归祖国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基本法》通过后，英国政府对《基本法》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基本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香港的未来地位奠定了基础；《基本法》是中国当局与香港人经过五年紧张磋商取得的成果；就整体而言，《基本法》是对联合声明的令人可以接受的反映。”

讨 论 题

《基本法》的立法基础是什么？

四、《政改方案》的推出和中英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谈判

1992年4月20日，英国首相宣布保守党主席彭定康接任卫奕信的港督职务，并于7月正式到港上任。彭定康成为香港第28任总督。10月7日，上任才三个月的港督彭定康在香港立法局作了首次施政报告。报告中的《宪制方案》（也称《政改方案》）部分，对香港现行政治体制作了重大改变，并对香港1994~1995年的选举办法提出了一套具体安排。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推出，为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设置了障碍，并挑起了对抗。

《政改方案》的推出不是偶然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英方对中国形势继续作出错误判断的结果。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1994年4月13日发表的题为《从现在到1997年及1997年后的英中关系》报告书，就毫不掩饰地道出英方近几年来对香港政策的改变，并将这种改变建立在对1989年前后国际形势和我国局势作出的错误分析的基础上。如上述报告书说：“如果我们认为北京政权自然会维持到1997年的话，那是不明智的。”因此，英国对华政策，“不应固定在单一策略上”，而要维护“高度弹性”，以适应中国的“任何转变”。该报告书还承认，英国政府委任彭定康为港督，标志着英国对香港政策的改变，声称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绝对支持”这一政策的改变及彭定康处理《政改方案》的手法。从报告书可以看出，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政策的改变，始于1989年春，成于1992年夏彭定康上任之后。

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违反了《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了中英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是一个“三违反”的《政改方案》。彭定康是打着“扩大香港民主”的旗号推出他的《政改方案》的。《政改方案》所要

达到的目的，就是企图利用英国管治香港的最后一段时间，以发展民主为幌子，背弃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有利于香港平稳过渡的“直通车”安排，以便在 1997 年后尽可能地延续英国对香港的影响，企图使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在《政改方案》发表前夕，英方曾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口信的方式向中方通报了该方案的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方案涉及 1997 年前后香港政治体制的衔接问题，特别是香港 1994~1995 年的选举是英国管治香港的最后一届选举，这次选举产生的立法局、两个市政局和区议会的议员有一个过渡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之后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两个市政局和区议会议员的问题，所以这一选举就必须经中英两国政府磋商讨论并达成一致。因此，中方要求英方在未经中英双方磋商前不要单方面公布其方案。但英方置若罔闻，仍然公布了这个方案。

《政改方案》一提出，中国政府当即表示坚决反对。中外舆论也对英方的做法提出批评。在中方及舆论的压力下，英方不得不要同中国政府就香港政制问题即 1994~1995 年的选举安排举行外交谈判。中国政府从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出发，同意同英国政府就此举行谈判。

从 1993 年 4 月 21 日到 11 月 27 日，中英双方进行了 17 轮的谈判。为使谈判顺利进行，并早日达成协议，中方对谈判始终抱着诚恳积极的态度，并在会内会外为推动谈判，加快谈判的进程作了巨大努力。而英方却顽固坚持《政改方案》，同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为谈判设置障碍。甚至于第 16 轮谈判结束后向中方下了最后通牒：告知中方第 17 轮谈判是双方达成第一阶段谅解的最后机会。在第 17 轮谈判中，中方再次作了巨大努力，而英方单方面宣布中断关于区议会和两个市政局选举问题的谈判。并于 1993 年 12 月 10 日公布了有关香港选举的第一部分立法草案，从而导致谈判的中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 1994 年 2 月 28 日公布

了《中英关于1994~1995年选举安排会谈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真相》，并指出，中方有必要严正重申，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英国管治香港政治架构的组成部分，即港英最后一届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必将随英国管治期的结束而终结。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架构将依据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审议报告，审议了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法律委员会审议的郑耀棠等32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会议认为，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的选举安排，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域组织的职权和组成方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规定。

上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表明，由于英方坚持与中方对抗的立场，顽固推行“三违反”的《政改方案》，中方从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稳定的大局出发，不得不另起炉灶。

讨 论 题

《政改方案》是给香港人民主的吗？谈谈你的看法。

五、以“一国两制”构想解决澳门问题

香港问题解决后，澳门问题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同解决香港问题一样，解决澳门问题一开始也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时，着重谈到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他指出，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50年不变，等等。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中国政府为解决澳门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准备。

1984年11月，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葡萄牙，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葡，也是在澳门问题备受各方关注的时刻进行的。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应李先念主席的邀请回访北京，两国元首互访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澳门问题。1985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时明确表示：中葡之间没有矛盾，更没有必要吵架。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在1979年建交时已经解决。邓小平的这些谈话精神，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的立场。

中葡两国元首的互访，为谈判做了政治上的准备。葡萄牙总统访华结束后，双方随即就正式谈判进行了有关的准备工作。在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已确定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它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澳门问题是中葡之间存在的惟一问题，而这个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1979年中葡建交时，已经就澳门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葡方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双方同意暂由葡管治，适当时候通过谈判解决。由于主权归属已经明确，谈判澳门问题时，不再就此进行讨论，直接进入实质性谈判的具体阶段。第二，解决澳门问题与香港一样。也将按“一国两制”，

当地人自己管理澳门，即“澳人治澳”，50年不变的方针来处理。当然，在涉及具体政策时，澳门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要按实际情况订出具体政策。

从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经过4轮会谈，双方就所有具体问题达成协议，1987年3月2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圆满结束。3月26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两国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文本上签字。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葡萄牙国会分别于当年6月和10月批准了《中葡联合声明》。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在北京互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批准书。《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自即日起开始生效。

《中葡联合声明》是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与葡方经过谈判签署的，完全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中葡联合声明》首先体现了主权，在澳门问题上，只有在承认澳门是中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实行“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中葡联合声明》体现的另一个主要原则。

《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为使我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述的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具体化、法律化，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澳门《基本法》担负着将《中葡联合声明》这一国际协议法律化的任务。制定澳门《基本法》，既要將一些基本政策纳入其中，又要考虑澳门的特点。澳门地域狭小，人口较少，经济实力与香港比较薄弱，这是它与香港的表层差异。深层次上，澳门还

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葡萄牙人占领的时间较长，东西方文化融合较早；二是解决澳门问题的国际背景较为简单；三是澳门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较为单一。此外，作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的博彩业、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问题即土生葡人问题，也是澳门独有的。制定澳门《基本法》，就要把澳门这些方面的特点反映出来。

自起草委员会成立，经过4年的努力，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顺利完成。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日，江泽民主席发布第三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以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澳门《基本法》为标志，澳门进入后过渡期。在后过渡期，中葡友好合作一些与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的问题获得了解决或取得了进展，从而为1999年后实施《基本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日期的临近，未来特区政府组成的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98年5月5日上午9时，对澳门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成立大会。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主持，李鹏委员长向全体委员颁发了任命书。李鹏委员长在讲话中指出：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澳门回归祖国的工作进入实质性的阶段。1998年5月6日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委员。江泽民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江泽民指出，再过不到600天，澳门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摆在筹委会面前的工作非常繁重。从现在开始，各位委员就要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进行紧张的工作。他希望各位委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希望广大澳门居民积极参与，共同为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1999年5月15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在澳门土生土长的44岁的何厚铨当选为首任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人选。由澳门居民代表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人是澳门历史上的第一次。5月24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向何厚铨颁发了任命他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何厚铨当选后，就开始组建1999年12月20日以后的特区政府班子。

我们相信，随着澳门的回归祖国，澳门的明天会更好！

讨 论 题

1. 试分析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2. 谈谈你对澳门回归后澳门前景的看法。

六、“台独”活动的国际背景

“台独”活动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有国际背景。

从历史上说，日本军国主义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分子，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同时，驻台日本右翼军人发动“台湾独立”事件，即为“台独”活动的发端。但是，台湾重归中国已不可逆转，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行的“台独”活动遭到失败。

由于蒋介石在台湾采取镇压“台独”的措施，“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从事活动。1951年、1956年“台独”分子先后分别在日本、美国建立组织。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的“台独”派别众多、组织复杂，其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是最具代表性的“台独”组织。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随着中日关系发展，特别

是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在日本的“台独”组织逐渐衰落，“台独”活动的重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1970年1月，“台独”分子彭明敏逃往美国；而统一指挥“台独”活动的“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即“台独联盟”）亦在美国成立。此后，美国成了“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公开的“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其大本营绝非偶然。早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远东战略小组，其使命之一就是研究战后美国托管台湾方案。该小组在1942年春曾建议麦克阿瑟，从日本手中夺取台湾后，由美国军队暂时接管台湾，战后再进行“台湾民族自决”或成立“台湾共和国”，并着手培训一批“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1949年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提出：“美国亦宜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1957年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建议“中共入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为美国保护国”。正是在美国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下，美国的“台独”势力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整合，有了较大发展。中美建交以后，一些“台独”组织继续在美国活动。他们用各种方式游说美国议员，争取通过提升美台关系的议案；鼓吹“台湾加入联合国”，并组织各种宣传“台独”主张的活动。1995年李登辉访美得逞，也包含了这些“台独”组织的势力所起的作用在内。

讨 论 题

“台独”同国际反华势力的关系如何。

七、“两国论”的真实嘴脸

李登辉在1999年7月9日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公然向世人宣称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

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7月27日，他又跑出来解释说，由于“多年来两岸关系的定位过于模糊”，所以他要吧两岸关系的“实质内涵”定为“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李登辉公然鼓吹“两国论”，是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是他坚持分裂祖国，抗拒祖国统一，推进“台湾独立”的政治本质的大暴露。

李登辉的“两国论”出台后，他的一伙亲信和追随者出来帮腔，称“两国论”的公然宣示“是个重大政策变化，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形势”。7月30日台湾海基会，发表辜振甫的“谈话稿”，8月1日“陆委会”又发表“说明书”，继续大肆鼓吹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据透露，李登辉还想在他卸任“总统”之前进一步提出“实质的、长期的政策构想”。显然，李登辉是不肯悬崖勒马了，铁了心以沿着分裂祖国的危险道路走到底。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当日，正值民进党正式提名陈水扁参选下届“总统”，一向主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陈水扁立即拍手叫好，说“这与我们的主张接近”，是李登辉“送给民进党的一个大礼物”。“李”唱“陈”和，弹冠相庆！李登辉已经从包庇纵容岛内“台独”势力，走到与这股势力公开合流。

李登辉迫不及待地抛出“两国论”，是有其险恶的政治图谋的。

一是企图从根本上破坏两岸接触、对话、谈判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些年来，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国人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的气氛有所改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往有所发展。两岸民间团体的对话保持了良好的势头，要求及早进行政治谈判的呼声日益强烈。接原计划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将于今年秋天访问台湾。但是，李登辉不愿意看到两岸的这种发展态势，尤其不愿意看见两岸政治对话和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公开向一个中国原则挑战，目的就是企图将两岸对话的机

制置于他划定的“国与国的关系”的框架之中，从根本上阻挠和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

二是企图影响和操纵台湾当局今后的政治走向。明年台湾要举行所谓“大选”，李登辉下台在即。据台湾报刊分析，李登辉在“大选”前提出“两国论”，其动机之一就是蓄意把他的“台湾独立”的政治设计延续到“后李登辉时代”，造成分裂的既成事实，使未来的台湾当权者不得逾越。

三是企图抵制“一国两制”方针的强大影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这一完成祖国统一的惟一正确方针，在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实践中已经取得巨大成功。1999年12月澳门又将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人心。李登辉惶惶不可终日，妄图用“两国论”抵制“一国两制”，阻挡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前进步伐。

四是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挟外力推行“台独”。1999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悍然发动对南斯拉夫的武装侵略，使国际上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受到鼓舞。他们还公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激起我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一切爱国力量的无比愤慨，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又出现一股新的反华浪潮。在这种国际气候下，李登辉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有恃无恐地向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发难，企图混水摸鱼，以求得逞，在分裂祖国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李登辉上台之初，羽翼未丰，未敢造次，还常常故作姿态。1988年2月他就任“总统”后称：“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到1990年5月李登辉还表示：“台湾和大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中国人同为血脉相连的同胞。”但他在1990年另一次讲话中却抛出了所谓“一国两府论”，说什么“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是现实”，“愿意同中共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话”。1991年台湾当局“修宪”和公布《国统纲领》

后，李登辉公然提出：“台湾已经是个主权国家”，“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1993年2月，在民进党第五届全党代表大会通过“台湾独立”条款后，李登辉竟然向民进党表白：“我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有讲过一个中国。”同年4月，李登辉在“国大”开幕时又荒谬地宣称：“我们必须认识中国仍处于分裂的事实。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当局在大陆，分别行使有效的管辖权。”李登辉把两岸关系从所谓“一国两府”又进而变为“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关系。

1994年3月，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作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吐露真情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不仅根本不把台湾看成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宣称在他的“词典”中连“中国”这个词也是模糊不清的，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东西”。他把两岸的统一称之为“奇怪的梦”。他把自己比喻为圣经“出埃及记”中的那个“摩西”，以誓要台湾人“出埃及”，也就是“出中国”，创立一个新国家。1994年4月李登辉又公开声称：“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我们应当尽量忘掉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同年7月，台湾当局公布《台湾两岸关系说明书》，认为“在中国尚未最后统一以前，两岸既处于分治局面，理应各自有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权利”；“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双方既不属于国与国间的关系，也有别于一般单纯的国内事务”。这里李登辉为掩人耳目，对外仍用“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来定位两岸关系。在这一时期，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是在“创造性模糊”遮掩下，搞所谓“隐性台独”。

1995年4月，李登辉又正式抛出所谓“分裂分治论”，就是用“一个分裂、分治的国家”代替一个中国。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前后大讲“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到了1999年5月，李登辉在他出版的新书《台湾的主张》中，居心叵测地把中国划分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

北等七个区域。据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一家中文报纸透露，此书是由李登辉口述，由一个日本人捉刀代笔的。书中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七块论”，显然是为了呼应西方反华势力的“分化”“西化”中国的政治图谋的。书中写道：“‘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具有国家主体性，也保持了主权独立”，当务之急“是将‘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质化”。李登辉还表示：“希望在卸任总统职务之前，能集国际法学者之力，就台湾的国家定位问题，提出更完整的解释。”到此为止，李登辉及台湾当局的种种谬论，实质都是分裂祖国，表面上又都若明若暗留些许伪装。然而，就在“中国七块论”推出 50 多天后，李登辉又抛出“两国论”，终于完全撕下所有遮羞布，赤裸裸地亮出了“两个中国”。人们也终于看清了李登辉的本来面目，即“两国论”之前的种种说词，实际早已包藏“两国论”的祸心；而“两国论”的合盘托出，则沿着李登辉的分裂路线，最终完成对“一个中国”的根本否定，即对“一个中国”从虚化、淡化到“不简单地讲”，从“少谈”、“避谈”到“尽早忘记”直至“告别”、“跳脱”。李登辉蓄意分裂中国的图谋原形毕露，“暗独”终转“明独”了。

李登辉所以走上分裂祖国、背叛民族的可耻道路，绝不是偶然的。人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他一生的政治轨迹，就不难看到他走到今天这种政治结局，是有其顽固的思想基础和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他祖籍福建，生在当时处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从小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皇民化‘教育’”。他曾津津乐道地说：“22 岁以前是日本人。”他身为一个中国人，却没有一颗中国心。他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又背叛了中国共产党；他加入了国民党，又从根本上背叛了孙中山，也背叛了国民党中一切爱国的人士；他在所谓“总统”任期内的所作所为，完全背叛了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李登辉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一直靠政治投机、政治赌博过日子。他最终堕落成为分裂祖国的最大头目，自己把自己牢牢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

在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实现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任务。台湾同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已经 50 年了，全国各族人民绝不允许这种不正常状态长期拖延下去。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李登辉分裂祖国的阴谋是绝不可能得逞的。

讨 论 题

1. 谈谈你对“两国论”危害的看法。
2. 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两国论”进行批判。

第十章 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党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法宝，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要从严治党，密切党群关系，克服消极腐败现象，搞好廉政建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是我国人数最多的依靠力量；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后盾。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而民族区域自治则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和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仍然是新时期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但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内容、基本任务及特点上都有所改变。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中的作用，同时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一、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刘志华是曾被评为中国农村风云人物的河南省新乡市女农民企业家。她 1972 年出任新乡市小冀镇东街村第五村民小组的队长，带领农民以打草绳起家，以生产腐竹致富，建起了拥有食品工业、化工、机械制造、商业、房地产经营和旅游业、宾馆、矿泉疗养等 17 个经济实体的东华实业公司，成为国家二级企业、全国乡镇系统先进企业。刘志华也多次被评为市、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模、中国十大女杰之一、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三八红旗手等，面对各种荣誉，她却从不自我膨胀，而是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不懈地与乡亲们一道，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她入党时的誓言。

她们村 70 多户人家，370 多口人早已全部免费迁入仿各国建筑风格的农民公寓。吃粮吃油，由各户自报，公司每月按时供应。公司每年给职工发放两套工作服，春节时增发一套礼服。公司每年给老年人发三套新装，每月发给 30 元零花钱，几年发一床毛毯或毛巾被，年节再赠送一份礼品。每年免费为儿童、老人及全体职工检查身体一至二次，凡对集体事业有突出贡献者，还可享受保健治疗。幼儿免费入托、入园，免费用餐，每年发放两套新装。因小学生均可到新乡市最好的学校就读，所以每天有专车接送，并配有炊事员给学生做午餐，直到大学毕业，全部实行免费教育。女职工与男子同工同酬，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还享受特殊保护，产假、婚假工资照发，每季度还免费发给美容美发及其他妇女用品。从 1986 年起，每年 7 月为旅游月，由公司组织劳模、先进职工、老人、儿童及其他村民到北京、泰山、苏杭等名胜游览或免费到青岛、北戴河等地疗养。对集体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和有培养前途的职员，公司分期分批组织出国考察。

尽管党的政策已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刘志华依然选择了共同致富的道路，她没有忘记她入党时的宣誓。她说：“一个共产党员只追求个人发财，或者只知道以权谋私，那就是对自己入党誓言的背叛。我活着，就要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曾有不少人找上刘志华，希望以京华实业公司的名义贷款办企业，只要她同意，就算入了股，到时只坐等分红就行了。而刘志华的态度是：共产党员决不能干那种事！集体富裕了，自己不也就富在其中了吗？且和乡亲们一起富起来，富得踏实，富得高兴，也没人会骂这个党员以权谋私。

不仅如此，刘志华还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她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也坚决不做。

1989年，公司开办的豆浆品厂试生产，刘志华因指挥不当，使生产受了损失。按理说，试验的失败是可以允许的，但刘志华仍然在布告栏里张贴了公告：“经理刘志华盲目指挥，给生产造成损失，罚款100元以示警戒！特此公告。”并且还在公司职工大会上作了认真检讨。有时甚至责任在别人，她也要惩罚自己。

不仅对自己、对亲人她也是铁面无私，不搞半点特殊。儿子刘晓峰，平时工作认真，但一次与几个同学多喝了几杯酒，上班迟到半个多小时，被责令停职检查、停发工资，半年后每月发给50元生活费，考验了近一年才恢复原工作和工资。她二哥一次到厂里拉东西，因没办手续也被刘志华拒绝，她说：“是公事，就得公办。您是我哥哥，也不能搞特殊。”1993年初，新修的京华旅游区开业，刘志华的亲朋好友来参观，她就自己掏了600多元钱买门票，没让集体受一分钱损失。她的道理是：如果你当总经理的来客人就要照顾，其他职工的客人照顾不照顾？你当支部书记的客人要照顾，别人的客人怎么办？假如都给予照顾，都搞特殊，那公司还怎样管理？企业还怎么办？

但是，刘志华决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她对乡亲们的情义是他

人无法比拟的。

她把每个乡亲都当成自己的亲人，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们，尤其对老人和残疾人更是关怀备至。无儿无女的 70 多岁老人杨观景，一天因胃出血昏迷，刘志华知道后，立即派车送医院抢救并和爱人日夜轮流守护，为他熬药煎汤，直到老人出院。幼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双拐不能离身的刘志金，与老寡母相伴，曾一度失去生活勇气，在刘志华的多方鼓励开导下，当上了公司保管，刘志华还帮他成了家，他妻子坐月子和老母亲的丧事都是刘志华一手操办的，并在他搬入公寓时为他布置室内陈设，现在的刘志金工作尽职尽责，年年获得公司奖励。

刘志华用真情换来了乡亲们的爱心和信任。乡亲们说，现在啥也不缺，啥也不怕，就怕志华身体出点啥差错，1987 年，劳累过度的她再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在昏迷的 20 多个小时里，许多职工一天一夜没合眼地守护，并很快凑了 1 万元钱为她治病。

刘志华是个年近 60 岁的人了，有人问她是否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她不假思索地说：“民主选举，选上谁谁干。我早就这样说了。大丘庄禹作敏已经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我决不搞家族统治。”“谁要当‘土皇帝’，谁就别再披着那张‘共产党员’的红色外衣！”

讨 论 题

1.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何保持这种“先锋”地位？
2. 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3. 共产党员应有什么样的“致富观”和“义利观”？
4. “共产主义信念”过时了吗？

二、滕头村的富裕文明来自何方

位于浙江奉化市城北 6 公里处的滕头村现有人口不到 800，耕地 54.5 公顷（即 818 亩），果园 12.7 公顷（即 191 亩），山林 10.4 公顷（即 156 亩），水面 4.4 公顷（即 66 亩）。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经济作物并行发展，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使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与投资回报率大大提高，农业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建成了集体农场、大型畜牧场、果蔬场、花卉园艺场、特种水产养殖场和农机服务队。集体农场的 33.9 公顷（即 509 亩）粮田由 8 个劳动力经营，单产超过 1000 公斤。工业经济初具规模。全村有三个工业小区 20 多家企业（含六家“三资”企业），2000 余职工，形成了以服装为支柱，人造金刚石、出口包装、织物印染等业协调发展的工业格局，产品远销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和亚洲、美洲、欧洲的 10 多个国家与地区。“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自 1994 年以来，村里先后办起了建筑、房地产、水电安装、园林绿化、广告装潢等服务性企业 10 多家，并形成了设计、施工、安装、装潢等的一条龙服务体系，业务远达省内外的一些大中城市。

1998 年，全村完成社会总产值 6.12 亿元，实现利税 3723 万元，人均纯收入 8712 元，盖成了 32 幢“农家楼”和 20 幢“小康楼”作为住宅，并建了一家能容纳 600 多人用餐的便民餐厅。滕头村更大的特色还在于其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他们通过多种方式，经常向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五爱”、“三德”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形势、任务及法制教育，以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先后投资 1500 多万元，用于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建有一所配有 20 多台 586 电脑、1200 多平方米的小学，一个融爱国主义、环保、科普、国防、劳技教育和农俗“风情游乐为一体”的社会实践基

地，一幢藏书万余册的图书馆，一个集村史展览厅、歌舞厅、乒乓室、拳击健身室为一体的文化中心，一家老年活动室，一座“滕头公园”，一座日供气 375m³ 的沼气站，一台可接收 20 多套节目的电视差转器。

自 1984 年以来，滕头村先后荣获了省级文明村、小康示范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模范村委会、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环保局命名的全国四大环境教育基地之一等殊荣。1993 年还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生态 500 佳”称号。

30 多年前人均年收入仅有七八十元的滕头村，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村民改土造田、兴办工业、建设新村，这是他们文明富裕的关键。村党委规定：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党委委员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委委员做到的，书记首先做到。在村党委班子的带动下，全村党员干部精诚团结、分工明确、密切合作、敢于负责、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因此村民都愿意听从和服从党委的指挥和领导。也许正像原村党委书记傅嘉良所说：“为民办事，是党员干部应尽的义务。当干部，首先要考虑群众和集体的利益。集体富裕起来，村民自然会富，干部也会富起来，但这里有个先后问题，党员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干任何事情，吃准了，拿定了，就要一犁耕到头，全力以赴把它干好。”滕头村正是发扬了这种“一犁耕到头”和永不满足的创业精神，历经艰辛才有今天的成就。他们历时 15 年，投入 43 万个劳动日，改造了 1200 多块高低悬殊、大小不一、布局零乱、洪涝不断的低产田，使它们成为 200 多块大小划一、沟渠纵横、排灌方便的新良田，之后盖新村，办企业，搞“三产”，他们都是凭着这种精神干出来的。

滕头村在发展经济时，没忘记社会主义的本质，没忘记有比

物质富裕更重要的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协调共同发展。他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口袋富不算，脑袋与口袋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这是傅嘉良的致富观，他们制定了“滕头人形象8条标准，三次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实行依法治村。村里广泛开展了“文明村文明人”大讨论，进行知识竞赛、创建“五好”文明家庭，每两年评一次“好党员、好厂长、好职工、好村民”和“双文明户”等活动，使滕头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四无村”，即无封建迷信，无赌博、打架偷盗，无流氓刑事犯罪，无超计划生育等现象。

他们在抓紧发展工业、“三产”的同时，加强农业生产，并且非常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他们不仅做到了“以工补农、以农促工”；而且成立了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环保法规教育，树立环保意识，投入大笔资金绿化、美化、净化村容村貌。“宁要青山绿水，不要金山银山”，为坚持环保优先，他们先后否定了几十个有污染的投资项目。

滕头村走的是一条依靠发展集体经济、以村富带动民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他们始终把壮大发展集体经济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并且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还大量兴办集体福利事业，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

他们抓改革开放的同时，没有忘记党的建设。30多年来，村党委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经常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政治理论以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素质，遇有中央重大会议和重大政策决议出台及中央推出先进典型，都及时组织学习讨论，以不断更新党员干部观念、跟上时代步伐。他们尤其注重后备干部的建设培养，已先后输出20多名有志青年到大专院校学习，每年还要吸收3~4名优秀的中青年积极分子入党。

讨 论 题

1. 党组织如何才能硬起来？
2.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哪些变化？
3. 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如何？如何发挥农村、企业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4. 农村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保留了和应保留哪些好的东西？

三、副省长如何步入监狱

现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的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在狱中写过一篇“忏悔录”，从那里看他的前半生，无疑是一个无限热爱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根红苗正的共产党人。然而，这样一个“革命者”却晚节不保，终因利用职权，大肆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生活糜烂，乱搞两性关系而锒铛入狱。1998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决定开除孟庆平党籍，检察机关也依法将其逮捕。

的确，孟庆平曾经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海南一干就是32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也曾多次拒贿和拒绝违背原则。

1985年，孟到菲律宾购买汽车冲压厂和组装厂二手设备，不受金钱和美色的引诱，为公司节省资金2000多万美元。

孟的儿子高中毕业时，正赶上公安局招干，儿子参加考试，差了7分，希望老爸给公安局局长打个招呼，也被他拒绝。后来，这个副省长的儿子竟也摆过地摊。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在泥沙俱下的社会风气大变化中，这块“钢铁”经不住诱惑，最终被金钱、物质与美女一

点点地给腐蚀掉了。

1982年3月，孟在海南铁矿任矿长时，认识了包工头庄某。庄某当时承包了石碌铁矿大桥的建筑工程。1983年8月，孟调任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庄某有空就带些礼品到他家串门，孟也觉得是人之常情。有一次，庄某儿子因偷窃国防工地的钢材倒卖被昌江县公安局抓获，让孟给说说，由于这事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他于是给昌江县公安局长打了个招呼，庄某儿子不仅获释，而且没受到刑事追查。为了答谢孟的“仗义”，以后，庄某更是经常给他家送钱送物，但数量不大，仍没引起孟的警惕。

1989年庄某买通海口市坡博村干部，签订假协议购买坡博村土地，在孟的帮助下，于是庄某通过孟的妻子郭秀英送给他3万块钱人民币。此时的孟庆平已觉得有点“为人办事收人钱财是应该”的了，他说：“我也没太当回事，认为都是关系不错的熟人，庄某送钱是心甘情愿，因为我帮了他的忙，他肯定不会说出去。他不说，我和老婆不说，谁会知道，出不了什么事。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想到这就是受贿，没想到日后会为此失了乌纱帽，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当时我安慰自己，这世上以权谋私的绝不是我一个。仅这一次，下次不收他的钱就是了。”

但是，1990年后，庄某又通过郭秀英先后送给他10万元人民币和10万元港币，且以后每逢春节，庄某都以拜年为借口送些高档烟酒和“海货”给孟，并附一个少则5000大则1万元的红包。

孟庆平“爱江山也爱美人”，成了个风流成性的“花省长”。

H小姐是孟在海南任副省长期间认识的，两人“情投意合”。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说一定要等到孟娶她的那一天，并曾跑到海边要“以身殉情”。为了这样一个“多情女”，孟庆平曾大开绿灯。H小姐在海南申请办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他方方面面都关照，公司很快成立，她在琼山县与人合伙倒买1.3公顷（即20亩）地皮净赚500多万元，也是他给县委书记打过招呼的。以后

两人多有金钱往来。

X小姐是孟于海南建省之初接见广州汽车工业总公司的代表时认识的，第二天他借口顺路实际上专门到他们下榻的宾馆看望她。此时该公司想与海南农机公司联合搞一个广海公司经营汽车出租。此后每周或两周孟都要在下午或晚上到X小姐住处约会。不久公司在他的关照下很快成立，X小姐出任经理。孟曾亲自到北京跑海关总署，跑国家税务局，使广海公司进口的十几辆汽车减免了上百万元的流转税。1993年4月，孟调任湖北后又帮她联系做了湖北一家汽车公司的销售代理。1996年，X小姐贩卖的一批汽车在湖北咸宁的嘉鱼县被扣，他马上让秘书拨通了嘉鱼县工商局让他们放行，于是有关部门象征性地罚了点款就放行了。

讨 论 题

1. 如何从制度和组织上来保证党的“三大作风”的贯彻，防止腐败的产生？
2. 为什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3. 如何认识党内腐败现象？

四、当代工人阶级的榜样秦文贵

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扎根于荒凉的西部沙漠的华东石油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现为青海油田高级工程师的秦文贵，是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榜样，是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的榜样。

扎根基层，历经磨炼，不图享受，是秦文贵事业成功的基础。

西北风沙的吹刮，蚊子的叮咬，井架的磨撞，使他清楚这样一个道理——把期待降低一点，赢得一个目标。他说：“好比你

现在饿了，要吃东西，但你却定了这样一个目标——我要到王母娘娘那里去吃仙桃！恐怕你没走到那地方，先把自己饿死了！要我说，我既然饿了，目标是要吃东西，不如手头有什么可吃的就先吃一点。”“柴达木让我看清了什么是生活原色，它彻底改变了我洋溢在血管里的虚浮梦幻。是柴达木告诉我，上天之前，先在地面上干点事情。”秦文贵老老实实在基层干了许多“小事情”，并悟出了“小事情”和“大事情”的辩证法。他说：“我最初干打钳子，甩钻杆，扶刹把，下套管，爬井架……你也许觉得都是些小事情，但没有这些小事情就没有我后来搞科研这个大事业。正是在干那些小事情的时候，我不断琢磨研究各种设备，练就了一套千里眼顺风耳的本领：“看板房的灯泡明暗，我就知道井上启动了什么电机设备；听钻机的各种异常声音，我就能判断出井上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这可不是小事情！搞科研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没有干小事情时练就的本事，我能干什么大事业！”

秦文贵扎根基层的五年是磨炼他人生的五年，是苦、累、险和无奈的五年，正是这五年使他得到了刚刚走入社会的一个青年最缺乏的东西：就是在任何环境中都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和永远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的真挚情感。坚强就是要能在“不可能”中求生存，要敢于不停地迎接挑战，秦文贵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次钻狮20井发生井喷，为了压井，在海拔4000米左右，空气中含氧量只有60%的每天弥漫粉尘的地方，和工人们连干了3个月，用最简单的乏味的体力劳动整整背了1万吨重晶石粉，在这种现象的“不可能”中坚持了下来，使他认识到在每干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把“不可能”三个字从脑袋里去掉！而实践可以总结经验，而且实践中的学问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地管用。秦文贵来到井队就注重实践，留心生产各环节。诸如钻井设备和性能，井架安装要领、钻井操作规程、泥浆配制方法、观测井下情况，处理各类事故、协调指挥生产等，他都和书本知识对号，看理论与实际是否吻合。遇着不懂的东西，不论长幼、文化高低，只要能帮

他排解疑难的，他都拜对方为师、虚心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就熟练掌握了钻井各环节的操作诀窍。基层群众的感情是真挚的。秦文贵深深地体会到：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人们的日常笑骂是一种幽默，一种消除疲劳、调剂情绪的“良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你只有完全融入这种生活，才会由衷地喜欢这种真挚的情感。

要说享受，秦文贵是有条件的。1992年2月已身为工程师的他留洋加拿大，一边在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大学上课，一边在波尼维尔油田钻井队跟班作业，由于他的好学和刻苦钻研，得到他的老师格力克教授和波尼维尔石油公司董事长迈克尔先生的器重，并以优厚条件要留其在加拿大工作，但他婉言谢绝，带着他们的赞叹，带着沉甸甸的笔记资料和沉甸甸的对中国石油和柴达木的感情回到了祖国。

知识开路，是秦文贵事业成功的关键。

在基层的几年里，没有图书馆，没有多少资料，但秦文贵坚持学习、热爱学习。1994年底，为了完成《关于尕斯油田深井中简化套管程序的可行性研究》，油田职工冬休时的花土沟油田指挥部已是人走屋空，但他一人留下，买了两箱方便面和十几箱矿泉水，拔掉电话接头，关闭手机，阅读完每口油井240页左右共120多口油井的资料，读完这些原始数据资料，再用一台现在看来只能算计算器的计算机反复推敲验证。最终完成了这篇报告，已是除夕之夜，才想起给远在500公里外的敦煌妻子挂电话。

科技的应用是试验的结果，而这种试验是冒险，要冲破种种旧思维和教条的束缚。不下技术套管能打出井来，这次秦文贵怀疑起钻井史上百年应用不爽的铁律来了。1995年春节刚过，青海石油管理局决定进行不下技术套管实验，实验领导小组组长秦文贵，并号跃5~35[#]。秦文贵知道，在纸上作出的方案可能天衣无缝，一旦实施，地下情况可不认你那张纸。这是一次在“可

能”和“不可能”的夹缝中冒险进行的实验。2月17日，实验开始了，跃5~35[#]设计井深3460米，在秦文贵等的精心安排照料下，钻机一点点往下钻，但在3452米深时，几乎是祸从天降了，在尚有35米深处发生了卡钻事故。“泡油！”“震击！”“旋转！”“提拉！”所有的解卡方式都用过了，仍是无济于事。最终他想起了在加拿大留学时看过的“U型管解卡法”，在征得书记同意的情况下冒险运用，终于获得成功，跃5~35[#]节约直径244.5毫米技术套管2572米，节约费用130余万元，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项技术的成功突破，是科技的进步。

爱情、亲情和友情，是秦文贵事业成功的温床和延伸。

秦文贵的妻子余艳萍，可称得上是典型的中国式贤妻良母。结婚后两人讨论家庭分工问题，她觉得自己文化低一些，愿意全力以赴支持他的工作，希望他有出息。但秦文贵也尽量减轻其负担，衣服划破了自己缝，不会做饭但饭后洗碗的活儿大都包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敬爱着对方。夫妻，年轻时无所谓，时间越长，对方分量越重，不可缺失。秦文贵也许深有感触。

秦文贵说，他母亲对他的影响比父亲大。她的行为也许对秦文贵的人生态度起了重大的影响。小时候淘气，和一帮小孩揪人家的萝卜花，花一揪，萝卜不结子，结果让娘一顿好打。文革时一老师被批斗关押，母亲让文贵给送饭，因为她认为这个老师是个好老师。后来母亲犯病住院，秦文贵去看她，和二姐倒了水给她洗了头又洗了脚，村里每当有人看她，她逢人就说：我的脚是文贵给洗的。这事让他难受，但也懂得了母爱的内涵。

秦文贵在油田有许多好“兄弟”，他们很多时候是几百天里四五十个人在一起，没有老婆、孩子和父母，只有戈壁和狂风，这种感情正如亲兄弟。秦文贵说他拼命搞试验，有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那些井架旁的“粗鲁的好兄弟”能过得更好点。他们常常提醒他在试验、技改中没有想到的地方，毫无怨言地为他的突发奇想担当风险。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讨 论 题

1.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面临哪些新的问题？
2. 工人阶级有哪些优势？如何发挥其优势作用？
3. 我们当代大学生应向秦文贵学习什么？

五、弓棚镇的网上农民

吉林是我国的产粮大省，而榆树市是吉林的产粮大县。而榆树市的弓棚镇，就像当初人们互相问候“你吃了吗”一样，现在最具时尚的问候语是“你上网了吗？”弓棚镇上网第一人是镇党委书记裴中，三句话不离电脑，对于上网，他谈起来更是滔滔不绝，当年榆树市上网的不足 30 人，他是榆树市第一批上网的。现在连弓棚镇都有一批人上网了。他每天必看《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的电子版，最关心的是农业经济、市场信息，一看就是到大半夜。如今弓棚镇的电脑热方兴未艾，镇里组织了电脑协会，镇党委书记亲任秘书长，镇领导班子成员都准备家庭上网。进入 1999 年，镇政府还投资 50 万元与一家电脑公司共同注册成立了榆树市电子计算机有限公司，已买进了 30 多台电脑，准备在镇上办学习班，给农民学电脑创造条件，并要开通网络以带动农民上网。他们说，农民电脑入了门，比得个文凭更实际，也更重要，这话不假。

上网比较费钱，但是利用网上科技生产、利用网上信息抓销售流通，却可以节省更大笔的经费和获取更大的收入与效益。

1998 年镇上买联合收割机，电脑一打，农机市场的行情详细可见，机器配置、性能、价格、技术指标、产地样样都有，足不出户、货比三家，几天就敲定了买主，秋收一用，还真不错。

弓棚镇是养猪大镇，农民种地养猪，一边上网看市场、看科

技、看行情；一边看着自家的田头，用科技搞种植、搞饲养，又跟上大市场，心里有本准谱，袋里才有了钱赚。全镇有 2000 来个养猪户，20 万头生猪，日出栏三四百头，养猪收入占农民收入的一半。1998 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大跌，由每公斤 10 块多钱一直跌到 5.4 元（2.7 元一斤），对于是否继续养下去，农民心里发毛。一批镇领导便每天盯着网上看，了解政策、了解供求、了解价格，通过电子邮件请北京的专家帮助分析预测。最后镇政府得出结论：价格下跌不用慌，第三季度猪价有望回升。大伙吃了定心丸，熬过了这难关，年底一算账，收入都没减。

网上科学决策使弓箭镇种植、养殖的科技含量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和畜牧业产量屡创新高。1998 年全镇各业产值达 5.7 亿元，财政收入 520 万元。

网上获取信息、技术快捷，农民学得快、用得快、见效也快。从网上学到的“种子丸粒化配合精量播种”法，节约种子 60% 以上，一年可节省 70 万元；“刀式深施肥器”的使用可提高化肥利用率 10%；“三元杂交良种化”技术提高生猪繁殖力、抗病力和瘦肉率，每年增收 700 万元；“高产蛋鸡和优良饲料添加剂”的引进，使“弓箭镇鸡蛋比土豆多，要买得用大卡车”。每天上网，全国市场转一转，连通千家万户的市场，使全镇每天外销猪肉 30 多吨、鲜蛋 10 多吨。

网上科学决策使弓箭镇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使 84.15% 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因为从播种、施肥、中耕、锄草到秋收、秋翻、脱粒、运输，一个劳力 20 天就能干完全年的农活。

网上科学决策使弓箭镇的畜牧业得到大力发展，同时解决了种植业中的相对“过剩劳动力”的问题。粮食全部实现加工转化，以前农民愁卖粮难，现在年产的 8.7 万吨粮都转化成了肉、蛋、奶出售，尚须大量“进口”粮食。种粮收入与畜牧业收入之比，已由 1990 的 7:3 变为了 1998 年的 3:7。

讨 论 题

1. 如何调动 8 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2. 现代农业比之传统农业有何变化？
3. 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三次历史性转变对农民意味着什么？
4. 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六、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研制

为了确立积极防御战略，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来又决定研制导弹和人造卫星。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两弹一星”的研究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尤其后期因前苏联背信弃义，大多数工作只得自己独立完成了。

“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中央主要由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指挥，具体负责是这样安排的：二机部搞原子弹和氢弹；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搞导弹；中科院和七机部、四机部合作搞人造卫星（其中中科院负责系统工作并研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科学院与四机部共同负责地面测控系统）。但是“三家拧成一股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为了落实该任务，科学院决定由党组书记张劲夫负责，由裴丽生副院长具体抓落实安排，并把管理机构分成两个口：一是计划局，管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新技术局，管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后者除了资金、器材优先得到保证外，许多非标准设备可以安排到各产业部门协助完成，在此后的多年里，科学院 2/3 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为研制原子弹，中央决定把科学院原子能所整建制交给二机

部，但为了工作方便，名义上仍由两者共同领导。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还从科学院要了留美归来、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原子能所的大部分人迁到了由苏联援助建设的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里。包括留法归来的搞放射化学的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而留英归来的杨澄中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负责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化学家汪德熙也由大学调到了二机部。

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留学巴黎大学镭学院，约里奥·居里夫妇学生钱三强，是原子能研究所的所长，在原子弹的研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当时负责原子能研究，中央搞的“四项紧急措施”便都是围绕其服务的。在人事上，他要了搞电子显微镜的李林（李四光女儿）；要了后来在原子弹和氢弹研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邓稼先；并把院刊编辑汪容调到了原子能所当副所长，理论组的彭桓武那里搞核物理理论研究；把王承书调到了二机部。为能把气体氟化铀变成金属，他还要了沈阳金属所副所长张沛霖，他后来当了总工程师；为了能完成高速摄影，还从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处要了副所长龚祖同和一批科技人员建立西安光机分所，为二机部工作服务。

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铀 235，毛主席曾问地质部长李四光：“中国有没有制造原子弹用的铀矿石？”李四光说：“有！但是，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含千分之几。”因此，建提炼铀的浓缩铀工厂是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措施之一。但是，1960年苏联的单方毁约，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要使该厂恢复运行，必须自力更生解决三个关键性技术问题：首先是制造出氟铀使机器能运转。这是由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为主研制出来的，并把上海一个小厂要来生产氟油，该厂的杨庆年厂长，顾子恺总工程师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是浓缩原子弹气体原料用的“真空阀门”的制造，科学院金属所、上海冶金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集中了吴自良、严东生、李薰、师昌绪、张沛霖等科学家才把它攻克。再有一个就是引爆原子弹用的高能炸

药，这是普通炸药所不能替代的。这个难题是在科学院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于永忠等、上海有机化学所的黄耀曾等及五机部的一个所合作下攻克的。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5点，在前线总指挥张爱萍上将的领导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震惊了整个世界。爆炸现场观测也主要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力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光机所等来完成的，当然在这整个过程中，科学院在1959年9月研制出的每秒运行1万次的第二台电子管计算机起了很重要的帮助作用。另外，从高校调到二机部的朱光亚、周光召等专家贡献突出。另外，2年零8个月后的1967年又成功爆炸了氢弹，这是在钱三强、黄祖洽、于敏等人的精心组织下完成的，具体工作尤以于敏做得更多。

钱学森和师弟郭永怀、林家翘都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最好的学生。被美海军参谋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岂止抵得上五个师。身为中国的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创立者，亲自起草和制定了关于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他说：“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周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当时在北京的几位元帅、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大将陈赓都一致赞同，于是在国防部下成立了第五院，钱学森任院长，刘有光为政委，总参通讯部长王诤为副院长。

导弹以五院为主负责研制，但人手要从各方面调用，尤其从科学院调来一批科学家。同时为贯彻中央发展导弹的两条腿走路的精神，科学院也以自己的综合实力搞导弹的研究探索工作。中央决定要搞导弹，郭永为避免美国当局制造麻烦，烧掉了他十几年写成的没公开发表的书稿。回到祖国，受到毛主席等的亲切接见，担任力学所副所长，后又率怀柔力学二部加强国防部门，用他的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复合智慧为发展我军高技术建立了卓越功绩。但后来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因公牺牲。

发射导弹关键看火箭用的高能燃料，实验基地在京郊的一片林地，在那里成立了力学所二部，由钱学森的学生林鸿荪负责，化学所也成立了二所专门研制高能燃料，另外，大连化学物理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都接受了研究开发高能燃料的任务。而物理所的洪潮生主要负责低温实验室，让氧气在 -180°C 变成液氧，而氢气变成液氢则需 -250°C ，这都是难度非常大的任务，新高能燃料研制成功后，五院在力学所二部林鸿荪主持下建成的液氧、液氢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取得成功，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样第一枚导弹终于在1960年发射成功，从而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它为我军武器装备开创了新的纪元！为了加大导弹的推力、速度和自动控制问题，在钱学森的指导下，科学院进一步搞高能燃料、制耐高温材料，成立自动化研究所研制弹上微型计算机（这种我国的第三代计算机是由年轻科学家黄敞负责，由计算机所派出大规模研究力量在陕西一个山沟里完成的），同时搞了远程雷达。导弹发射场的光学仪器是由长春光机所负责的。与此同时，科学院搞的小型火箭如气象火箭发射成功，还能配合五院（后改为七机部）生产一些特殊产品。

原子弹、氢弹、导弹研制成功后，要“两弹结合”即把原子弹、氢弹安装在导弹上发射，才能攻击远处目标，完成该任务的关键在高能炸药，这主要是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五机部的一个所协作完成的，从而使导弹成为战略导弹。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那天，美国宣布为国耻日。中国也需要研制人造卫星。科学院的科学家最积极，尤其地球物理所的赵九章所长，他为科学院首先在我国提出研制人造卫星的方案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1958年党中央在武昌开会，身为候补中央委员和科学院书记的张劲夫向中央提出该方案，后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同意，且批专款2亿元人民币，组织各方面力量成立了“581组”和三个设计院。卫星上天，关键的是装

在卫星上的仪器要在地面建成的高空真空环境下先运转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需要在地面先模拟试验，因此首先得建成高空模拟实验室。

原方案准备在国庆 10 周年发射卫星，但因 3 年经济困难而推迟。卫星由科学院组织有关部门配合完成，尤其地面模拟真空实验设备需别人帮助做出来。卫星全体则由科学院研制，在北京成立了科学仪器厂作为卫星总装厂，3 年困难后，自动化所、电子所在卫星控制、连续通讯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后来由于“文革”，该任务交给了国防部门的七机部即现航天工业总公司。1970 年 4 月 24 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它凝结了科学院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心血。

讨 论 题

1. 曾几何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你对此有何看法？
2. 知识分子是“特殊的劳动阶层”，其特殊性何在？
3. 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4. 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两弹一星”的关系。

七、“黑色女侦探”折翼大陆

绰号为“黑色女侦探”的 U-2 高空军用侦察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研制而成，作为情报机构的战略侦察工具之用。它装有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全身涂满黑色的漆，主要材料为塑料和多层木板，能规避雷达探测。其最大升限高度为 3 万多米，最大航程 7240 公里，最高时速 800 公里。它装备有 8 台清晰度的全自动照相机，检测和接收雷达、无线电等信号的电子接收机以及其他极为尖端的电子设备，台湾国民党空军自 1962 年 1

月开始用它对大陆进行侦察活动。自1962年9月9日至1967年9月8日，我空军导弹部队针对U-2飞机的性能特点，违犯规律，采取机动设伏、近快战法、反干扰措施等手段，采用红-2地空导弹先后5次击落U-2飞机。

由于U-2飞机飞行高度高、活动空间广，其航路可变化多端。为击落敌机，在当时导弹部队少的情况下，我空军采用了重点保卫目标处机动设伏的导弹游击战术，近快战法、夜战战法相继奏效，加上反电子干扰设备及雷达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国民党空军“黑色女侦探”一次次折翼大陆。

空军导弹二营在营长岳振华的带领下，成为击落U-2飞机的头号功臣，他们先后击落三架该型号飞机。

1962年9月9日，该营于南昌设伏12天后，于当天上午8时34分第一次击落U-2飞机。国民党空军中校飞行员陈怀身驾U-2飞机于上午6点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7时32分从福建平潭岛窜入大陆，经福州、南平、鹰潭北上后进入南昌地区我伏击区，在距导弹阵地397公里处发现敌机在2万米高空以800公里时速前进，到75公里时，部队正要攻击，敌机却采用转弯机动突然掉头向北飞行，但在飞至昌北160公里处又掉转正南方向，距阵地越来越近，敌机飞行高度20600米，在距阵地38公里时，官兵们用前置发射法，每间隔6秒发出了三发导弹，陈怀身当场被击毙，随飞机残骸坠于南昌市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

此后3个多月敌机停止窜入大陆。1963年11月1日，国民党少校飞行员叶常棣驾驶U-2飞机从温州窜入大陆，经吴忠、潼关、信阳、九江直扑上饶，由于敌机采用了美专家新装的能及时接收我雷达无线电频率的电子设备，以至于能采用倒“8”字形机动飞行绕开我导弹阵地。叶常棣驾的U-2在距我阵地39公里时，我主要雷达突然失却目标。但在近快战法下，岳振华果断命令改用另一部雷达的情报计算射击诸元，从而准确将敌机击落，叶常棣跳伞后被当地民兵活捉。

1964年7月7日，国民党“克难英雄”少校飞行员李南屏伙同多人驾几架U-2窜入大陆侦察，仍是由已升为空军某师副师长的岳振华亲自指挥，在敌机距导弹阵地32公里时用假频率诱骗敌人，在导弹发射3秒后，开启真频率制导弹将李南屏的飞机击毁，残骸坠于漳州市东南7公里的红板村。

在连折三架U-2飞机后，敌为了有利于夜间利用红外照相机拍摄我核试验区原子尘影像，侦察我原子工业情况，也是为了躲避我导弹攻击，开始改为夜间窜入。

为应付敌变，我空导部队也加强了夜间训练，研究夜战战法，又梅开二度，再击落敌U-2飞机2架。

1965年1月10日夜，异常寒冷的夜，在寒风嗖嗖的包头地区，空军导弹一营营长汪林又专门召开了连长会议，命令检查兵器现状，加强夜间戒备。18时，曾被国民党授予“国军英雄”称号的台空军六大队少校分队长张立义驾3512号U-2飞机由桃园机场起飞，19时56分由山东海阳窜入大陆，经掖县、黄骅、静海、大同等地，直逼包头。当时U-2飞机又新装备了“12系统”，即干扰歼击机设备，躲避导弹侦测告警系统（1964年11月26日，一U-2飞机窜入兰州地区就因此而逃脱）。因前次失利，我导弹部队很快又研制了进行电子对抗的新式天线。敌机进入包头地区，距导弹阵地44公里时，正在飞机上拍照的张立义没想到“12系统”面临我新式天线又失灵了，飞机被击中后，他立即跳伞，后被生俘。

打下U-2飞机的关键在于反掉敌机电子干扰，敌机每被击落一架，又在其后飞机上增加新的干扰设备，而我导弹部队只有设法破除这些系统的干扰，才能打下敌机。1967年9月8日，已经装上了号称“第13系统”的欺骗式电子自卫设备的U-2飞机，在多次窜入大陆欺骗我军成功侦察之后，又一次从桃园机场起飞，从东南地区窜入南通、常熟、金山卫、海盐等地。此时，我导弹部队已研制出了新的反干扰电子设备和破坏敌干扰的

战术，并在导弹上设置了提前起爆电路。11 时 25 分，黄荣北驾 U-2 飞机窜到嘉兴上空，我导弹十四营迅速进入一等战备，在矩阵地 35 公里处，开始按既定战术跟踪敌机，但不一会，敌机启动了干扰系统，营长也果断命令，马上使用反干扰新式装置，致使敌机干扰消失。在几次反复的干扰反干扰之后，三发导弹带着通红的火舌利剑般地飞向天空，黄荣北躲过了第一枚导弹，却被后两枚击中，跳伞也来不及便毙命空中，U-2 飞机坠于海宁县西南约 5 公里处的伊桥。

讨 论 题

1. 现代战争和现代国防的特点有哪些？
2. 你对部队在新形势下裁军 100 多万有何认识？
3. 和平时期国防能否放松？民兵、预备役部队如何在和平时期搞好建设？

八、藏族人民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西藏，这块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领土，从唐朝唐太宗时期开始与中央政府联姻，到 13 世纪的元朝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后历代都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管辖下。今天，在这块土地上的 220 多万藏族同胞，正以幸福的生活和无比欢欣的心情迎接民主改革 44 周年和 21 世纪的到来。而在民主改革前的 300 多年封建农奴制度里，占 95% 的人口为农奴，他们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没有人权。

农奴制虽早被淘汰为“社会的木乃伊”，但在这荒凉高原上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时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其经济基础是领主庄园制。在该制度下，农奴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及农奴本身，农奴遭受残酷剥削，社会等级森严，形成的

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在等级森严的农奴制度下，绝大多数的人不自由程度在世界史上也为罕见。17 世纪中叶，五世达赖时期的甘丹颇章政权形成了“十三法典”作为噶厦政府统治西藏人民的基本依据。持续达 300 年之久。其主要内容就是保护三大领主（即封建政府、贵族和寺院）的利益和封建等级制度。“法典”把藏族人严格地分为三等九级：上等人是为数极少的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中等人是一般僧俗官员、下级军官，以及三大领主豢养的爪牙；下等人是占人口 95% 的农奴与奴隶。下等人尤其出身金、银、铁匠及屠夫家庭的人不能和其他等级通婚，甚至不得在政府里做事，他们的权利没有丝毫保障，遭到迫害也不能喊声“冤枉”。“法典”规定：“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械去之。”而“上等人”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大领主可随意将农奴打死打伤，对最下等人中被杀者仅“偿命草绳一根”。

旧西藏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90% 以上被三大领主占有，占人口 95% 的农奴只有不到 10%。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人们生活普遍贫困。以至于 1765 年以前便有 200 万人口的藏族到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仅剩 100 万，婴儿死亡率达 43%，人均寿命仅 36 岁；贫苦百姓生病了也只能求菩萨，因为仅有的 3 所设备简陋的官办医院和少量私人诊所及不过 400 人的医疗人员也只能为富人们服务了。并且，旧西藏 90% 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住房。对于广大农奴来说，基本生存权尚且没有，更不应说更高层次的管理权等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经过复杂艰巨的工作，1951 年 5 月终于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 17 条，后称为《十七条协议》，西藏得到和平解放。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西藏的民主改革并未顺利进行下去。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勾结国外反动势力，

不顾中央政府的仁义和耐心，违背西藏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历史潮流，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在拉萨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为保护广大藏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平息叛乱。

在平叛过程中，中央适时提出了“充分发动群众，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缓改”的民主改革方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于1959年6月28日召开会议，通过了《民主改革的决议》，提出了废除剥削制度即农奴制度的决议。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分配了土地，在农区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进行“三反双减”（即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然后将没收和赎买的生资料分给农奴和奴隶。使百万农奴首次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为争取温饱打下基础。到1960年底，民主改革基本完成。

民主改革后，西藏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西藏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力。西藏历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皆占80%以上。在一次乡镇换届选举中，选举出的31561名乡镇人民代表，866名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任，843名乡镇长和1318名副乡镇长中，绝大多数为藏族。截至1998年底，西藏已有民族干部5.1万多名，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5%，实现了周恩来总理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提出来的使用西藏民族干部的数量占干部总数70%的目标。西藏的工业、科技、教育系统也得到极大发展。目前，全藏有大中专院校数10所、行政院校8所、各级党校10所，在内地比如咸阳还办有专门培养西藏民族干部的西藏公学和西藏团校。

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翻了身，人民生活水平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截至1998年，西藏人口已增至244万，仅藏族人口就比1952年增加了120万，现占全区人口的95.4%。农牧民每

家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达 8000 元以上，每百户拥有汽车 9 辆、大小拖拉机 6 台、机动脱粒机 3 台、马车 12 辆、电视机等现代设施也逐渐增多；1993 年，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达 5410 元，农牧民年人均收入 1150 元；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14 平方米，农牧民平均每人达 20 平方米；农牧民存粮大大增加；全藏现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1324 家，各类专业医疗工作者 10929 人，婴儿死亡率 1998 年为 3.7%，人均寿命增至 65 岁。

讨 论 题

1. 邓小平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怎样理解“真正的民族平等”？
2. 民族团结的意义何在？
3. 西藏人民“没有人权”了吗？
4. 如何理解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九、“普通”公民溥仪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 年），满族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父亲为清末摄政王载沣。溥仪 3 岁登上皇帝宝座，称宣统帝，3 年之后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他退为逊帝被政府养起来，于宫中呆了 13 年。1924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其赶出宫，流往天津张园生活 8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掩人耳目，以“光复祖业”为诱饵将其骗至东北当了 14 年的伪满州国皇帝。日本投降后，被苏军在长春抓获押往苏联哈巴罗夫斯克拘禁 6 年。

新中国成立后，溥仪被遣返回国，于抚顺战犯所与日本战犯一道进行思想改造 10 年。1959 年 12 月 4 日，在时兼为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他和弟弟溥杰，以及原国民党将领杜

聿明、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康泽、董益三、沈醉、罗历戒、杜建时、郑庭笈、周振强、杨伯涛、李以劼共 16 人当上了政协文史专员，隶属政协文史编委会。至其 1967 年去世共 6 年多。

作为“普通”公民的几年里，溥仪不仅勤奋工作，著书立说，而且参与众多的外事工作，又重新组织了家庭，畅游祖国的东南及西北，最后受“文革”冲击而病逝。

溥仪虽然生活自理能力较差，但学习勤奋，且写得一手秀丽的楷字，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文件并记笔记，一年写了几十本笔记，他还能说一定程度的英语，待人也和悦诚恳。每逢有清末遗老遗少，皆劝之不可下跪，并且正色对他们说：过去的溥仪早已死了，今天的溥仪是新生的。自 1961 年 1 月进了政协，即参加外交活动，特别是《我的前半生》（即外文版《从皇帝到公民》）一书畅销世界后，外国名流不断来访，其接待工作更加频繁，从 1961 年到“文革”开始前，他接待外宾来访达几百人次。

作为文史资料专员，溥仪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审核各省寄来的有关清代末年及北洋、伪满文史资料。除此之外，他还奉上级指示写述了《我的前半生》一书。该书以他在抚顺时所交待的罪史为基础，由他与二弟、妹妹、妹夫万嘉锡、润其等多人研究，并由溥杰执笔完成的，后由群众出版社李文达进一步核实，历时了 3 年多，于 1964 年出版，并译成多国文字，成为流行一时的世界名著。

溥仪的妻子婉蓉其时已去世，李玉琴也改嫁，在毛主席、周恩来及张治中等人的亲切关怀下，溥仪经人介绍认识了杭州籍汉族姑娘，在北京朝阳区医院当护士的李淑贤，并于 1962 年在南河沿招待所举行了婚礼，参加的亲属、来宾达 200 多人，中央统战部、政协领导亦参加并主持了婚礼，此外还有全体文史专员及溥仪的七叔即光绪帝的七弟载涛也参加了婚礼。虽然溥仪有生理缺陷，但夫妻恩爱如恒。1960 年，溥仪在植物研究所香山植物

园工作时月工资 60 元，当政协专员后 100 元/月，1964 年应邀为第四届政协委员后为 200 元/月，家庭生活还是算可以的，尤其是《我的前半生》出版后，1 万元稿酬除 5000 元分给各位助手及编辑之外，个人实得了 5000 元，生活上更是宽裕多了。

1964 年 3 月 12 日，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全体文史专员及部分家属一行 27 人，由北京出发参观了苏、浙、皖、赣、湘、鄂六省，他们游苏杭、参观南京，到太湖、黄山等名胜驻足，游南京中山陵时，溥仪这样说：“孙中山虽然推倒了清朝江山，但他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崇高思想是非常伟大的，今日我作为公民来瞻仰是一种荣幸！”4 月底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及黄鹤楼之后，返抵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并同登天安门观礼台。游江南时，溥仪不无感慨：“今日之江南比乾隆皇帝当年游的江南不知好过多少倍了。”同年 8 月 16 日至 9 月上旬，他们再赴西北，参观了郑州、洛阳、西安、延安，并了解当地的生产建设情况，他们登大雁塔，游华清池及碑林，到延安桥头、宝塔山及延安大礼堂拍照留念。这一切，据溥仪自己所说，使他深深感到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灿烂，并且使他确信两条真理：“一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二是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1966 年 6 月开始的“文革”，使末代皇帝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批判目标。他几次受冲击并被追查皇帝的珠宝，所幸未遭殴打，但身体虚弱的他已是心中惶惶不安了，在“文革”前一年因患肾脏癌的他当时正住协和医院，几次被斗后，他痛苦不堪以致病情恶化，不久转入人民医院，尽管周总理特别指示医院要尽一切力量抢救他，但 1967 年 10 月 17 日早晨 2 点半，溥仪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死前他还说：“我不能死呀，还要为人民做许多事呀！快叫崔大夫救救我呀！”两天后出殡时，只有其胞弟溥杰、遗孀李淑贤、同事李以勋及夫人丘文昇四人把遗体送至八宝山火葬场，机关无一人相送，但附近工人农民知悉后倒有数千人前去想见到溥仪遗容，场面甚为感人。溥仪去世 12 年

后的1978年，全国政协补办举行了追悼会，有400多人参加，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主祭，骨灰盒也被移入革命公墓。

讨 论 题

1. 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2. 我国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3. 如何评价薄仪的一生？党的统战工作在其一生中起了什么作用？

十、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

西藏的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种，它有一般佛教的内容，又有自己的特色。

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藏传佛教形成了较有影响的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四大教派，俗称分别为红教、白教、花教和黄教，其中后期尤以格鲁派影响最大。公元7世纪以前，土生土长，崇信多神的原始宗教——本教在西藏占统治地位，而藏传佛教是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汉区佛教传入西藏后与本教斗争、交融和吸收的产物。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一般被分为“前弘”与“后弘”两个时期。“前弘”始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约7世纪前期），佛教传入后，王室、贵族中部分人极力排斥，仍崇本教，至9世纪中叶，达磨赞普在全境禁止佛教，从而终止流传达百余年；“后弘”始于10世纪后期，此时农奴制正逐步形成，它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结构，此期教派众多，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基本特征。在后期的四大教派中，形成最晚的格鲁派势力最大，它是15世纪初由藏族高僧宗喀巴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创建的，它因得到明朝永乐皇帝的确认和支持而声威大振，格鲁派的形成标志着藏传佛教发展到了高峰期，该教在西藏建有一批颇具影响的大寺庙，如著名的藏传佛教四大寺院即甘丹

寺、哲蚌寺、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

格鲁派的喇嘛不准娶妻，其宗教首领采取噶举派首创的活佛转世的承袭办法。清朝也独尊格鲁派，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正式册封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又正式册封班禅额尔德尼，从此历辈达赖、班禅的转世与坐床，都经中央政府明令授封，成为定制，形成了格鲁派的达赖和班禅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他们分别治理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

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民主改革前，封建政府、贵族、寺院三大领主统治西藏，达赖、班禅在宗教和政治上都是最高领袖。地方政府的决议必须有寺院代表同意方能生效；大寺院不仅设有法官审理僧人中的案件，还可设关押所，宗教戒律和寺庙法规都有法律效力，实际上他们掌握了法律，寺庙和上层喇嘛可以对下层喇嘛，寺庙领地的农奴进行体罚甚至施加酷刑。寺院拥有西藏实耕土地的39%，每个寺院又是一个经济实体，从而占有大量的农奴、牲畜和牧场；同时，寺院用宗教通过租税、高利贷和商业盘剥下层百姓，寺院是西藏最大和最活跃的高利贷者，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寺院债权约占西藏放债总和的80%；而且，地方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50%用来供养寺庙僧人。

宗教还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都浸透了宗教的踪影。西藏的传统节日即寺院主持的宗教节日，生产活动不得与宗教禁忌相冲突，不少生产活动须经喇嘛占卜，人们要祈祷、念经，还要到寺庙中烧香拜佛、布施钱物，使贫苦人们越发贫困。解放前西藏总人口的10%约12万人是僧人，他们基本不从事生产；佛教多数教派禁止僧人娶妻生子；而且一些人被迫成为僧人，许多寺院庙宇甚至实行强制摊派和抓丁为僧，这些都严重威胁着生产的顺利进行，甚至是西藏人口大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依然没有宗

教信仰自由，寺庙中等级森严，僧人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少参加真正的宗教活动，而且规定奴隶、债务人、屠夫、铁匠甚至五官不正者不能入寺当喇嘛。

标志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于1951年5月签订后，西藏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得到妥善的保护。

《十七条协议》中的第七条明确规定：在西藏“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进军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事先制定了《进军守则》，该守则规定，将士不得因好奇而乱动寺庙和宗教设施，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和对宗教不满的言论；不经同意不得住寺庙和经堂；战时不得借住或参观喇嘛庙，平时要参观须先行接洽，且在参观时不得随意摸弄佛像，不得吐痰放屁；不得收留喇嘛参军；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和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针对进入拉萨，十八军还规定了《入城纪律》，规定一切人员均不得到布达拉宫、三大寺、电厂以及拉萨当局之高级官员住宅驻扎和参观，解放军丝毫不触动沿途经幡、玛尼堆，宁肯住帐篷，甚至露宿街头也不入寺庙。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到藏不久，即给三大寺、大小昭寺、上下密院发放布施，并在以后每年传昭时给僧众发放布施。过去达赖和班禅不团结，致使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长期羁留在青海，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努力下，促使两大活佛系统实现和好。1951年12月19日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牙含章的护送下，班禅和其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从西宁启程，历经4个月于1952年4月8日到达拉萨，两大活佛实现了历史性会见，同年6月23日，班禅返抵日喀则。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更是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系列政策法规，如1957年6月西藏工委

办公厅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办公厅发出通知：“藏历4月是佛神释迦牟尼诞生、转法轮、涅槃的纪念日，故在全月禁止杀生”，并通知“全体工作人员在此期间严格禁止杀生”。即使在平息1959年西藏上层分裂集团叛乱时也坚持了该原则。西藏民主改革后，应广大农奴和贫苦喇嘛的强烈要求，政府宣布废除寺院中违反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违反僧民权利和佛教教义的各种政治特权、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对上层喇嘛依据是否参与叛乱，对其生产资料分别实行没收和赎买政策。即使这时，中央仍严格地把政治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区分开来。在1959年11月17日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和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在寺庙中必须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剥削制度的三反运动。”“对于喇嘛的生活，由政府统筹安排。寺庙的收入不够正当开支时，采取补贴的办法予以解决。”因此，寺庙内僧人学经、辩经、考试等正常宗教活动仍照常进行，群众仍正常地自愿给寺庙布施。

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给西藏人们的宗教信仰带来灾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这不正常的年代里，西藏人们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受到干扰、限制甚至禁止，不少寺庙如著名的甘丹寺、噶举派主寺粗布寺，著名的印经中心那塘寺等遭到严重破坏。但正如班禅大师所说：“‘文革’的破坏，并不是专对西藏的，它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某些方面，内地的损失比西藏地方更惨重。”因此，少数人利用此来制造耸人听闻的所谓“种族灭绝”完全是别有用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步恢复和落实，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拨出大量款项恢复和维护寺庙，宗教界人士不仅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管理寺庙，还可参政议政，政府还相当重视西藏宗教界的一些重大活动。比如，大寺庙中年长喇嘛都享受保护待遇；一次性拨款50万元刻印《甘珠尔》经；先

后拨款 5000 万元和大量黄金、白银，历时 5 年修复历代达赖喇嘛坐床和举行重大宗教活动的布达拉宫（1994 年竣工）；大力支持宗教界圆满完成了噶举派十六世噶玛巴活佛转世（1992 年）和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现在全藏有 1700 多处包括寺庙和拉康在内的宗教活动场所；有僧人 4.6 万余名，约占西藏总人口的 2.3%。西藏人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讨论题

1. 如何全面理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2. 如何区别“迷信活动”和正常的宗教活动？
3. 如何正视达赖集团利用宗教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现实？
4. 怎样揭穿帝国主义集团积极支持达赖集团的真实用心？

参考文献

- [1] 于勇、胡考绪：《山东省内东西合作走出成功之路》，《经济日报》，1995年8月3日。
- [2] 姜波、刘澍泉：《北上抢滩》、《退让战略》，《经济日报》，1995年8月。
- [3] 李志贤、郑波、姜波：《燕京为什么不合资》，《经济日报》，1996年7月2日。
- [4] 朱剑红：《看顺德怎样政企分开》、《靠改革创新优势》，《人民日报》，1997年11月6日，7日。
- [5] 高宏凡：《农经学界展开中国粮食前景大讨论》，《经济参考报》，1996年4月9日。
- [6] 陈俊生：《消除贫困——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求是》，1996年第19期。
- [7] 国风：《中国农村消除贫困问题分析》，《管理世界》，1996年第5期。
- [8] 郭正礼：《城市反贫困投入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 [9] 游光荣：《中低技术依然“垄断”中国产业》，《中国科技信息》，1998年第14期。
- [10] 王力：《能源效率——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到底有多大》，《高科技产业》周刊，1995年第37期。
- [11] 李连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途径》，《求是》，1996年第5期。
- [12] 高放：《苏联东欧局势剧变之我见》，《新世纪》（海南），1992年第12期。
- [13] 陈宗胜：《我国经济市场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时报》，1999年8月18日第5版。
- [14] 潘贤掌：《罗斯福“新政”及其启示》，《经济学动态》，1999年2月。
- [15] 白和金：《中国扩大内需决非权宜之计》，《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4期。
- [16] 王京忠：《泽州——冲刺中西部经济强县》，《半月谈》，1998年第1期。

- [17] 刘光海：《多彩农业竞风流》，《半月谈》，1997年第23期。
- [18] 袁芥和：《科技长一分，市场拓千里》，《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22期。
- [19] 彭昌昌等：《五粮液“五连冠”探秘》，《半月谈》，1999年第8期。
- [20] 朱玉旋：《百年科技经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2月。
- [21] 马晓丽：《中国“863计划”诞生记》，《读者》，1998年第5期。
- [22] 程远：《由法标撤资看亚星——奔驰》，《经济日报》，1998年5月3日。
- [23]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上、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
- [24] 寿蓓蓓：《中国私营企业20年》，《南方周末》，1999年2月12日。
- [25] 李庆华、李景春：《诸城是怎样卖企业的？》，《中国资产新闻》，1998年8月5日。
- [26] 高梁：《医改进入倒计时》，《经济管理文摘》，1999年10期。
- [27] 王中宁：《反贪倡廉下的“五九现象”》，《参考消息》，1999年3月26日。
- [28] 王学力：《年薪制面临的十大问题》，《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7日。
- [29] 辛向阳、陈光奎：《从分粥制度谈企业家激励机制》，《经济日报》，1993年4月7日。
- [30] 黄金祺著：《什么是外交》，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 [31] 王俊宜著：《国际贸易》，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 [32] 魏永哲主编：《世界经济概论》，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 [33] 佟家栋著：《国际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 [34] 吴越滔著：《外资能否吞并中国》，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8月。
- [35] 赵炳贤著：《资本运营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8月。
- [36] 丁坚铭：《我国首例反倾销案有了结果》，《经济日报》，1998年7月10日第2版。
- [37] 《1998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统计信息局，深圳统计信息年鉴（1999年）。
- [38] 《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深圳卷》，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中

- 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 [39] 王凤超主编：《“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 [40]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中国台湾问题》，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 [41] 观察家：《驳李登辉的“两国论”》，《人民日报》，1999年8月10日。
- [42] 化清：《评李登辉的分裂路线》，《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32期。
- [43] 张春亭：《一位女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27期。
- [44] 刘利华：《秦城监狱访贪官》，《中国青年》，1999年第7期。
- [45] 张建伟、孙凯：《秦文贵的故事》，《中国青年报》，1999年4月28日、29日、30日。
- [46] 刘晓光、刘源源：《网上农民》，《经济日报》，1999年3月17日。
- [47] 张劲夫：《请历史记住我们》，《中国青年报》，1999年5月6日。
- [48] 薛翔：《击落窜犯大陆的U-2飞机实录》，《文史精华》，1998年第10期。
- [49] 李锦：《西藏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40年》，《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3月8日第10期。
- [50] 李以助：《我与末代皇帝共事的六年》，《文史精华》，1999年第5期。
- [51] 史金波：《西藏宗教信仰和西藏人权问题》，《宗教》，1999年第5期。